



A DROP IN THE OCEAN

# 沧海一粟

——黄文欢革命回忆录

HOANG VAN HOAN'S  
REVOLUTIONARY  
REMINISCENCES

解放军出版社

# 目 录

## 前 言

## 第 一 部 分

走向革命的道路 .....	(1)
一、少年时代 .....	(1)
二、渴望出洋 .....	(10)
三、走上革命道路 .....	(20)

## 第二部分 1928—1935

在暹罗从事革命活动的岁月 .....	(31)
一、在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工作阶段 .....	(32)
二、胡主席在暹罗 .....	(44)
三、在暹共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阶段 .....	(52)

## 第三部分 1935—1942

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岁月 .....	(63)
--------------------	------

第一阶段：从南京到昆明(1935—1939)·····	( 63 )
一、去南京的路上·····	( 64 )
二、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	( 69 )
三、在南京的生活与斗争·····	( 79 )
四、与暹委失去联系，留在中国·····	( 88 )
第二阶段：从昆明到北坡(1939—1942)·····	( 95 )
一、在昆明的情况与工作·····	( 96 )
二、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广西·····	(103)
三、在龙州的活动·····	(111)
四、在靖西的活动·····	(116)
五、在平孟被捕·····	(128)
六、在柳州的斗争·····	(133)
七、准备回国·····	(152)

## 第四部分 1942—1948

八月革命前后的岁月·····	(159)
一、在高平发展和巩固越盟组织·····	(160)
二、南下凉山·····	(169)
三、胡主席在中国被捕和他的活动·····	(179)
四、胡主席去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	(187)
五、全国党代表会议与新潮国民大会·····	(195)
六、八月革命后的岁月·····	(203)

## 第五部分 1948—1949

<b>新任务——整顿几项国外工作</b> .....	(218)
一、整顿侨居泰国越侨工作 .....	(220)
二、整顿驻曼谷和仰光的代表处工作 .....	(229)
三、整顿协助老挝、柬埔寨革命的工作 .....	(237)
四、处理赴北京途中的若干问题 .....	(247)

## 第六部分 1950—1957

<b>担任政府和党中央驻华代表的岁月</b> .....	(252)
一、按胡主席的指示留在北京 .....	(254)
二、深厚的越中情谊 .....	(262)
三、在国内的几项活动 .....	(271)

## 第七部分 1957—1979

<b>越南革命与黎笋的背叛</b> .....	(286)
一、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与越南 劳动党的态度 .....	(289)
二、苏联对越南抗美提供军援后所发生的事件 .....	(300)
三、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与黎笋的作用 .....	(313)

四、越南革命与黎笋的背叛 .....	(322)
五、决心离开祖国继续革命 .....	(336)
六、有关的文件 .....	(343)
①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	(343)
② 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 .....	(345)
③ 就黎笋指使法庭对我作缺席审判, 并对我判 处死刑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 .....	(348)

## 附 录 部 分

① 简 历 .....	(351)
② 若干具体活动 .....	(355)

# 第一部份

## 走向革命的道路

我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记述：一、少年时代。革命觉醒的过程。二、渴望出洋。寻找革命的过程。三、走上革命的道路。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

### (一)

### 少年时代

我出生于义安省琼堆村一个贫穷的崇尚儒学的家庭，少年时代并不幸福。父亲长年累月在北圻各省教书，只有过年才回家一二十天，然后又匆匆离去。母亲靠借债买绸，挑到离村十几公里的吕集、榕集、黄梅集去卖，鸡鸣动身，摸黑回家。当时债利很高，年初借贷一百元，年底要偿还一百三十元。有些年，到了除夕还未还清债款，母亲只好躲到外祖父家，但债主仍找上门来叫骂。加上当时的封建习俗，母亲成为婆媳关系中的受害者，经常遭到责骂和欺凌。

在这并不愉快的家庭里，六岁时，母亲就把我送到外祖父家去学汉文；七八岁时我跟随外祖父到弘化、寿春两县上学；十一岁跟随姨父到绍化县上学；十二三岁跟随伯父到广化县上学。以上几个县都属于清化省。

在伯父那里读书时，除了书本之外，我开始增加了一些课外的知识。伯父是个乡学教师，在清化省广化县壶南乡教汉文，并兼教拉丁化越文。我读书并不聪明，唯一的优点是字写得较好，朗读清楚。伯父常让我读《中北圻新闻》报，有时还给他朗读《金云翹传》。他的汉文底子深，学识广博，常常给我讲述日本维新的故事，至今我还记着一些：

一在日本有一个“逢人便笑”的人，他见人就笑，笑日本之腐败；又有一个“逢人便哭”的人，他见人就哭，哭日本之落后。

一许多日本青年醉心于维新运动，决心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有一个青年想维新想到入迷的程度。一次，他脱下裤子淌过河，上岸后继续往前走，忘记穿上裤子，到了朋友家中，才猛然想起来。

一在日本有“冲天绳”和“扫海慧”。冲天绳的原意是直捅到天上的绳子，可能指的是钢丝、电缆。扫海慧的原意是扫海用的扫帚，可能指的是扫雷艇或渔轮。

连续六七年，母亲让我到远处求学，主要是希望儿子读书成人。但也使我免去年少对家境的忧虑，又省去家里吃饭的一张嘴。

我十四岁那年，祖母去世，家里的生活有些好转。父亲数年不外出教书，在家安顿家务，同时让我留在家里，向一位老宗伯苏翰林学汉文。苏老先生的汉学很有造诣，但在科举应试中因为不会写拉丁化越文而落第。他认为洋人硬造的拉丁化越文不值得一学。落第以后，他向京都顺化申诉，经考官重新审核，决定补录为秀才。

苏老先生教学的当时，还存在科举制度，但已有若干变化：应试的学子不象先前那样要作汉文诗、赋，而是用汉文作疏文，奏文，谕和论文，同时还要用拉丁化越文作论文。（疏文或奏文是朝廷官吏向皇上陈述事情的文章，谕是皇上教谕朝廷和臣民的文章，论文是主考官提出某一问题而作的评论。）试卷内容常涉及新题材，因此，赴试者必须读些新书，主要是读当时中国出版的汉文书籍。象我们家乡那样穷乡僻壤，苏老先生的汉文学堂也常常讲授有关卢梭、孟德斯鸠、培根、维多利亚、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等在大事业上有所成就，被视为一代英雄人物的文章。

对这些文章，老师同其他同学一样，只是对其造句、用词之精辟、典故之新颖，应对之工整而啧啧称赞。在这段时间中，我虽增长了一些新知识，但思想仍局限于文字和用在应考的范围。

一九一八年是最后一届的乡试<sup>①</sup>，但苏老先生仍嘱咐我

---

<sup>①</sup> 乡试：越南科举制度，在各省考选举人，秀才。

努力学习，等下届再去应试。

一九一九年在最后一届的会试<sup>①</sup>时，才确知此后不再搞科举了。这时，父亲才让我转入法越学校读书。

\* \* \*

法越学校设在县城，离我们村约三公里。琼堆虽穷，但具有好学的传统，到县里上法越学校的学生近四十人。许多人家不管怎样贫穷也要尽力让孩子上学，拿不到文凭也要学点文化，便于以后可以教教书或找其他门路谋生。

我转到法越学校后，思想上仍然认为读书是为了应举。但由于学习方法和过去大不相同，不再只埋头在书本和文章堆里，有星期天可以休息，还有暑假。因此，能抽出时间跟村里、县里的许多人接触，这时，我开始对时事有了一些了解。

琼堆有学问的人不少，又是一个著名的穷村，由于居民四出谋生，虽远隔城市（离荣市六十公里，离清化市八十里），但联系仍相当广泛，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消息灵通、各方情况集散地。人们常常谈论一些被夸大的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的抗法故事。比如说捐队长、奋队长会隐身术，每当获知敌人追捕的消息，他们就舀一碗水，在碗上放一双筷子，口中念念有词，跨过水碗就可脱离险境。人们还常常谈论“文

---

① 会试：越南科举制度，在京都考选乡选中选的举人。

绅起义”<sup>①</sup>、“黄花探起义”<sup>②</sup>和“东京义塾”<sup>③</sup>等事。

琼堆村本身也有许多革命斗争的故事。人们常常谈到儒生贵公被砍头；一位名为地的男子被敌人枪杀在营河岸上；以及一些勇敢农民的故事。例如青年阿曹被里长抓去给县官抬轿，他毫无惧色地对着县官说：“我从小没有抬过轿，里长强迫我来，我只好抬，但肩头痛得受不住时，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还得请大人恕罪。”县官怕这小子把他摔了，只好叫里长换人。

又如：村里里长出缺，没有人敢来当。胡士台大字不识却自告奋勇愿当里长。他当里长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吃县官的板子，硬要他说出村里去投“匪”的人。但不管吃了多少板子，他还是那一句话：“我养不活他们，他们要外出谋生，我拦不住，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他当里长时及以后不当里长时，都是一个道地的劳动农民。

人们也谈论某些中了举人而不愿当官的人。胡宽先生很有学问，但去应试却为他人捉刀拿钱，自己的试卷却写得潦潦草草，故意不让录取；鸿胪学士——黄老先生曾考中进士副榜，被委任知县，但因反对法国当局而被革职等等。

---

① 指一八八五年——一八九六年越南封建阶级的官吏，其中大部是举人和进士，在中、南、北各地组织反法勤王运动。

② 指一八八七年——一九一三年在越南北江、安世一带由农民领袖黄花探领导的反法游击战争。

③ 指一九〇七年越南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在河内、东京（北圻）创办的学校和宣传组织。除教学外，还开演讲会，出版书刊。宣传反法爱国，鼓吹改革，反对科举，提倡实业，服用国货等。

村民谈论最多的是胡伯温先生的一家。伯温老先生曾任南定省按察<sup>①</sup>，一八八三年在抗击法军进攻、守卫南定城时牺牲。他的长子胡伯健参加文绅反法运动，为帝国主义者逮捕入狱，后被枪杀于牢保狱中。次子胡叔灵考中举人，也参加抗法运动，被捕后，帝国主义者在拷问他时拿来烧热了的铜盘，他却从容地坐在灼热的铜盘上，表示自己无所畏惧。伯温老先生的儿媳阿绸婆，可称为琼堆村的女杰。她经常来往于义安与安世之间，担任义、静反法运动与黄花探的联系人。她多次历险，都能用智谋甩掉了敌人。后来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每次在受刑前，她嚼下一大团烟丝，使自己昏迷过去。醒来时，她大声叫嚷：“前辈人干吗要当官，害得子孙这样受罪。”拷问她的官吏听了有如刀刺在心，但抓不到什么把柄加罪，只好把她释放，交由地方管束。阿绸婆让她的儿子胡学览跟随潘佩珠参加“东游运动”<sup>②</sup>到日本，以后来到中国。胡伯温的孙子胡伯巨又名胡松茂于一九一九年出国从事救国事业。这些，对琼堆村有志青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在琼堆村的学生和教师中，有一批满腔热血、立志革命的人。此外，在崇尚汉学的人中也不乏慷慨之士。我在与他

---

① 按察：越南旧时管一省司法的官职。

② 东游运动：一九〇五年越南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而组织的赴日留学运动。

们交游中常常听到一些有意义的诗歌和对联，有时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到进步书籍。

至今，我还记住一些诗歌和文章，有的作者不详，也不知与原文是否相符。现按当时耳闻记下：

#### 首榜蔡公临刑诗

三回号角呜呼命，  
一下屠刀谢世身。  
生是三军常胜将，  
死为大地至灵神。

#### 斥高玉丽对联

无地可埋高玉丽，  
有天不死宋维新。

宋维新曾考中进士，有反法思想。高玉丽是宋维新的学生，曾向法国当局密报宋维新的革命活动，于是宋维新被斩首示众。

#### 悼友人母丧挽联

全国无泰西之男，遂令女杰消沉，到死不留苏泰笔。

同胞以越南为母，当此英雄痛哭，居丧合着马尼衣。

“泰西”指西方各国，主要指欧洲各国。无“泰西之男”意为西方男子尊重妇女，但在我国却不是这样。

苏泰(Kossuth 一八〇二年——一八九四年)是匈牙利民

族英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详述母亲教育之功。（“苏泰”二字，在寄送琼堆村村史展览室和义静党史研究会的材料中，都误成“犹太”，今订正。）

#### 贺友人考中庭元对联

父甲于乡，兄乙于会，君又魁于庭，科宦一家私，白昼对人，国宠君恩多若是？

潘栖于日，邓流于海，吴尚囚于狱，羈縻千里外，皇城回首，锦袍花笏谓何如？

这付对联以三位爱国知识分子：首榜潘佩珠在日本活动，副榜邓元谨和进士吴德继为法当局囚于昆仑岛的事例，启迪新科获得高第者的爱国心。

阮太拔曾于东游运动时出国，后回国向法当局投降，他未经乡试而得到阮氏王朝允许参加会试，中皇甲后当大官，不久即死去。他在狱期间，有一食店女子常来送饭，获释后即与此女成亲。时人遂将此事写成如下对联，寓意耐人寻味：

#### 哭阮太拔对联

出也奇，就也奇，大小登更奇，开幕演成悲喜剧。

罪不死，囚不死，富贵来而死，盖棺难定昨今评。

（“出”意为出洋，“就”意为投降，“大登科”是及第，“小登科”是娶亲。）

### 潘周桢斥骂官场诗

世局回头已一空，  
江山无泪哭英雄。  
万民奴隶强权下，  
八股文章醉梦中。  
长此百年甘唾骂，  
不知何日出牢笼。  
诸君未必无心血，  
凭向斯诗读一通。

据传，潘周桢应试时，试题“至诚通圣”诗，以通字为韵。潘周桢即写下以上诗篇，借以斥骂官场。

除这类慷慨激昂的诗篇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禁书如潘佩珠的著作，梁启超的《中国魂》、康有为的《变法通论》等等，常常通过一些爱国者的秘密传递，转到琼堆村阿绸婆的家，我也有机会读到。当时虽然理解不深，但我已开始想到自己要有理想，要在救国、帮助民众方面有所作为。特别是潘周桢斥骂官场这首诗使我对当时的读书感到厌倦，在县里的学校读书没有意思，只希望快点读完，远走高飞，干一番事业。

## (二)

### 渴望出洋

一九二三年，听说几年前出国的胡松茂已秘密回国，而且到过琼堆村。这一消息驱使我去思索，日日夜夜渴望出洋寻找革命道路。

一九二三年夏，我毕业于法越初级学校，但不再想继续升学了。这年八月，同村许多学生考入荣市中学，当时称为国学学堂。我也到了荣市，借口检查身体，作考国学学堂的准备，但实际上并没有去报考，而是去打听有无参加革命的线索。考试后，当同村六个人为国学学堂录取的消息传到琼堆时，我正在村亭前草地上踢球，村里一位秀才骂我读书不勤奋，不立志向上。

实际上，我的志向是不能跟别人说的。在同学中，经常同我谈心里话，只有阮柔和杨廷翠两人。但他们读完四年级就离校到河东学织布去了。

我没有报考国学学堂，父亲强迫我报考顺化国子监学堂。这是一所为阮氏王朝和保护国制度专门培养新型官吏的学校，报考者必须取得所在地知县的证明书。在我向县里要证明书时，知县看到申请书上我父亲的名字是黄鸣珂，他误认我是县里一个富裕的职役人员名叫鸣珂的儿子，于是显得很殷勤。后来他弄清楚了，不但不给证明书，还把我赶了出

来。这样我也用不着去报考国子监学堂。

为使父亲放心，我常常用功读书，有时还找一些古书和唐诗来读。

一九二四年夏，我报考南定师范学堂，但没有考上，只好到北部建安省水源县经潮区中山村找一个私塾教书的职业。我的父亲也在邻近的嵎山村教汉文。这年年末，我第一次把学生交的学费三十块钱带回家交给母亲，母亲非常高兴。

一九二五年初，我再去水源，但这时法国殖民当局规定，所有私塾必须申请批准才能开办。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请里长（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学生）同我一起到县里申请。到县衙门递了申请书，县官连眼都不抬，只是下巴动了一动说，到外头找位儒吏帮你另写一份。我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有人肯帮写。这时，还是里长对官场有经验，他取出一块钱的纸币夹在原来的申请书里，说就这样送去，县官准会接受。果然，县官打开申请书看到钱，当即接收下来，并说：“先回去，等候官府处理。”

这时我才知道：所有向衙门递送申请的人都要付钱，小事一块，大事三至五块。有个农民的牛死了，规定要到县里报告死情，申请允予埋葬，也得在申请书里交上一块钱。

县官接受我的申请书后，我便到衙门外游逛，看到县衙门的墙上刻着一付汉文对联，遗憾的是因为时间久远，我只能记住一联：“臣门如市冰壶秋水证臣心”，意思是说，官府

的大门如集市一样热闹，但府官的心却象盛在水晶壶里的秋水一样清白，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从县里回到中山，我心想：我懂汉文，懂拉丁化越文，又有法越初等学校的文凭，肯定是得到批准教学的，于是就通知学生照常来上课。不料过了两三个星期，县里却来了关闭学堂的通知。在水源教书一事就这样结束了。

我又返回琼堆村，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设法开展活动。

\* \* \*

那时，琼堆的情况仍然是一潭死水。劳动人民生活很苦。老一辈的儒士已退居后场，他们只会自鸣得意地称道琼堆是文化之乡。一些读新书的人关心的也只是新的科举。至于先前那些有志之士，大都无声无息，无所作为，有的厌世，抽上了鸦片烟。

在我继续向一位老师学习汉文期间，我写了一篇题为《中村览胜》的文章，描述当时这种走头无路的境况。我的老师汉学功底在琼堆村颇有名气。一天，他给我出了《中村览胜》作文题，要我描述他心目中认为美好的人物和景物。

历来，村里的耆老常用“南天胜地琼第一”来赞美琼堆的景物。在他们眼里，琼堆南面有马鞍山；北面不朽地区有伞岭；西面有馨山，其形如榜，是为甲榜；东面有龟山，其形亦如榜，是为乙榜；村中又有笔丘、砚丘；南面马鞍山之后有匈山、誓山，形如两面旗帜。据此，耆老们得出结论：琼

堆村有许多人学优及第，正是由于这样的风水。这位老师特别喜欢中村集市，那里有一家中药店、两三家裁缝铺和一家酒馆。每天下午，人们常常聚集在那里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然而具有新思想的人，既不信风水之说，也不爱凑在一起乱扯乱谈。因此，我接到老师出的作文题后，便想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批判意见。

我的作文是用汉文写的：

### 中村览胜论

客有：身不长、貌不扬、傲风月于酒壶，慢河岳于诗袋，异草芳花之处心以贻闲，奇山秀水之间足已殆遍。一日相遇于堆市，拱手揖我而问曰：此地何地？我对曰：此系琼堆之中村也。客乃莞尔而笑曰：我闻南天胜地琼第一，中村既是琼属，定必有不少胜景，可否示其一二，以便乘此过境之际，聊作览胜之游呼。噫游客一言果何言耶，假使诸君于此咄咄之时、当亦喑哑未知所宣，以解得此有理于无理中之说。幸哉我于斯时，灵机乍动，对答颇有伦次，客却似有心照、默默而听，其词云：我琼堆之为琼堆者、五百余年矣。自陈黎迄于阮朝贤哲名流曷胜屈指，历桑沧以至今日，英雄志士尚不乏人，地之所以称为胜者，以人而胜也。又以地理论则：马山朝于南，伞岭屹于北，馨山为甲榜，乙榜者龟山，笔砚排开，旌旗招展，琼堆诚可谓南天之

第一胜地也。然而运有否泰，世有隆污，如今谈起琼堆能不令人感慨。言乎地则：龟山耸矣，蜀龟无脱爪之灵，马岭峭焉，胡马绝嘶风之异，榜山黯黯，已不标琼堆豪杰之姓名，伞岭苍苍，只空长不朽杂丛之花草，地势已无可凭也。言乎人则：男子之沉醉于鴉毒者以百数，妇女之埋没于丝机者有千余。士则区区于科举二字，只思如何以得为助教者，为通判者，为记录者，为参辨者，以荣其身，以肥其家，至若国民之义务，社会之伦理，则等于无物焉，嗟夫其所谓士者，固为是耶，弟于沉思默想之间，不觉心肝如有碎烂者。农则待天时以便耕播，工则殚手巧以输利权，一不肯致意于农学工学之道。商则隔江唱后庭，商女固不知忘国恨，而须眉男子，爱国商亦无弦高。吁岂松山之英，梅水之灵有时而歇耶。呜呼如此风俗之琼堆，如此人民之琼堆，琼堆安能以胜地自居也。琼堆既非胜地，则中村何有胜景之可览者乎。游客闻言，顿开茅塞，遂咏诗一首，以示醒悟云：

邂逅相逢适也无。

断金一语更何由。

乃知地以人而胜。

休矣寻龙捉虎徒(风水先生)。

我这篇文章采用较为自由的体裁，但仍受八股文的影响，

使用对仗句和典故。我学着使用的典故有：“蜀龟脱灵爪”，指越史蜀安阳王得神龟赠爪作为弩扳机而打败敌人。“胡马嘶北风”，出自中国古诗，言想念故国之情。“商女固不知亡国恨”取自中国唐代杜牧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弦高”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位爱国商贾。

这样的一篇作文看来还可以。但行文用字偏激，有欠妥之处，如文中首段所指“身不长，貌不扬”，正是这位老师的形象。又如文中末段“游客闻言，顿开茅塞”句也是使老师听了很不高兴的。因此，当我把作文交给他看时，他生气地说：你想攻击我是吗？

他把文章还给我，不予批改。

\* \* \*

面对琼堆村犹如一潭死水的形势，一些先进的青年想采取一些行动来变革社会，但又找不到明确的方向。

阮柔和杨廷翠在河东学会了纺织，一九二四年返回家乡，在中村市集附近开办了一家纺织厂。名为纺织厂，实际上只有一间草房、两部改良织机，同琼堆村原有只能织四十到五十公分口面绸的投梭织机比较，新织机是拉绳投梭，可织八十到九十公分口面的布料。在生产组织上是个体经营。然而，这个纺织厂仍然成为村里的新鲜事物，成为爱国和关心时局的人们聚集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常常传阅一些爱国书刊，如陈有度的《独立之钟》、《自由魂》和潘佩珠、阮尚贤、潘周楨等人的文章。

由于书报和外地进步运动的影响，这期间在琼堆形成了一个“心交”的小组织，包括旧里长老弹、老顺、阮柔、杨廷翠和我。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分工与有志于革命的人接触。我们讨论了为劳动者开办识字班，并从外地请人来教武术。

参加识字班有十五六人，他们都是爱国的农民兄弟。我们利用在上课的时间读报，讲时事，采取隐蔽的方式传播一些爱国诗歌。村里的里长、豪绅没有任何理由禁止我们的活动，只好不管。武术班的组织是秘密的，只有六七人参加，每当夜深人静就集中在老顺家的庭院前，由从演州府铁丘村聘请来的一位武术教师当教练。虽然这个活动是秘密的，但过了几个星期就被正总<sup>①</sup>发现，威胁要报官，我们只好解散。

当时琼堆村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是吸食鸦片。琼堆约有数千人口，却有几十套烟具和三四家店铺出售鸦片。瘾君子中有各种人，包括如胡叔灵、胡宽等失意之士。

我们几个人交换了意见，起草一篇反对抽鸦片烟的演讲稿，趁全村聚会之日，由我在村亭中宣读，因为当时我们争取到村里一位有地位的进步人士统举人的同情。老实说，这篇演讲稿基本上受当时所谓“改良乡政”运动的影响。然而通过演说这一形式，在村亭中面对众多豪绅揭露一项村里的弊病，仍然是一种大胆的行动，倾向进步的人们都感到高兴。

---

① 正总：越南旧时相当于乡以上的区长。

另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是我们反对三个家族之间打的一场官司。一九二五年，村里胡姓、黄姓和阮姓三大家族发生争执，都要求阮氏王朝册封本族祖先为本村之神，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曾琼堆村的开基立业者。这三个家族中的几个头面人物闹宗派而引起的不良影响，造成村民之间互不团结。我们反对这一场官司，分头说服三个家族中的年轻人不去支持这一场官司。杨廷翠和杨文澜写传单扔到几位举人老爷的家里；阮柔和我径直到鸿胪学士黄老先生家里讲理。黄老先生是家族中也是村子里的首要人物，曾在乡试中名列榜首，会试中考中副榜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受封鸿胪寺少卿，但因他具有反法思想，弃官还乡，清白自奉，因而得到村民的敬重。我们对他讲道理，说明这一场官司只对盘剥百姓的人有利而有害于民。黄老先生本人就曾不屑为官，免得低三下四做人，而今却要去打官司，求得自己的祖先得到册封，这道理实在说不过去。听了我们的话，他默不作声，无言以对。通过这一活动，以前煽动打官司的人自行退却，这场官司就结束了。

一九二五年，我常到菜市，有时还去宜禄、安城、英山、清化等地，对人说是去谋求职业，实际上是去打听消息，希望能找到出国的门路。我到菜市多次，常常去找国学学堂的进步学生。在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何辉集、陈梦白等进步教师的情况。还了解到国外一些情况，如菲律宾、埃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听到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

主义；也听到了俄国革命。

最突出的事件是当潘佩珠被捕，即将递解河内刑事法庭审判的消息传来时，要求释放潘佩珠的群众运动高涨，席卷全国。这时，在琼堆村，阮柔的纺织厂和厂后的老顺家，几乎成了人们聚会的地点，关心时事的人都到那里去打听消息，听读报，谈论与潘佩珠和国家大事有关的许多问题。

潘佩珠的一些著作，如《天乎帝乎》、《海外血泪书》、《医魂单》等以前被视为禁书，只能秘密传阅的书籍，现在几乎是公开流传。潘佩珠的著作在内容上虽然有消极的地方，但突出的一点是爱国思想，促使人们团结起来，为祖国的利益牺牲奋斗。潘佩珠的文章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读的听的都使人渴望立即投身于革命斗争。当然，我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同样的感受。

出国的渴望更加急切。我们托阿绸婆设法和潘佩珠的儿子潘兄晤面，听说他常常组织一些青年出国。见到潘兄，他同意过了阴历新年立即送我们去暹罗，只要我们能自备旅费。

\*\*\*

一九二六年初，阮柔、杨廷翠、黄文合、胡玉章、杨文澜和我决定想一切办法弄到路费，以便阴历新年后一同去暹罗。按潘兄的嘱咐，每人需十五块钱的路费，而我们六人总共只凑了二十块，还差七八十块，怎么办？我们又动员一个有钱人家的青年同我们一道走，条件是他得出一百块钱。他

同意了，阴历新年过后几天，我们七个人秘密到菜市找潘兄，把路费交给了他，然后在第二水道街住下，等候消息。焦虑不安地过了几天，潘兄来通知说，带路的人遇到障碍，还不能走。我们只得赶快返回琼堆以免暴露。这次出门远行，就这样告吹了。

村里七个青年突然离去，引起不少的议论。村长、乡长嗅出了味道，威吓有孩子出走的人家。这几家的父母都很担心。我们回到村里，各人都准备一个借口搪塞，终于平安无事。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为潘周桢举行葬礼的那些日子里，我来到河内继续寻找革命的门路，但仍无结果。当时铁路局列车长训练班正增招考生，我想，要是能当上列车长，就会有去顺化、西贡，也可以到那岑、同登、老街等靠近中国的地方，出国的机会就更多了。因此，我便去投考。我各科都考得不错。但考上以后，路局却不让我到车上见习当列车长，而是派我到滨州车站当见习站员，负责售票、检票和收发电报。

在滨州站当见习站员与我的愿望完全相反。但在那里我不时能碰上为“兴业会社”而进行活动的人。这个会社是由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商人组成的团体。通过他们，了解到该社在清化设立了支社，有志之士常在那里进进出出。因此，我想辞掉车站的工作到清化去。

一天，在工作的当儿，站长责骂一位站员是蠢猪。站员

没有回嘴，但我听后却气愤难平。吃饭时，当着站长和站员的面，我严肃地对站长说，刚才你骂站员是蠢猪，你对当上正式站员这样骂，我这个见习站员，在你不满意时肯定你也不会放过的，你要知道，站长和站员都是来打工的人，只不过先来后到而已。不久，我写信回家说不想再在车站干了。有几回，我的母亲到榕集路过演州站，看到她当站员的儿子站在进出口处检票，很不体面，因而对我的想法也不反对。于是，我借口健康不佳辞去站员的职务，以便四处活动，寻找革命的门路。而这一次良机终于来到了。

### (三)

## 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秋天，我到清化东山县找瞿明为，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当时在乡校教书。我住在他家，曾写一篇反对阮氏王朝诽谤为潘周桢举哀的文章，想寄给西贡《新世纪》报。瞿明为看后，立即邮去。一周后我们收到登载这篇文章的一期《新世纪》。老瞿非常兴奋，立刻向他的朋友们作了介绍。

一天，教师阿立到老瞿家里看我，一开头就提到我写的文章和诗歌，并就时局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听说过你写的新春对联和新年开笔诗，最近又看到你在《新世纪》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你敬佩爱国者潘周桢，你有意报答天地覆载

之恩，父母劬劳之德，想远涉菲律宾、印度、埃及等正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那么，如果革命需要你去更远的地方，你愿意吗？

原来，老瞿把阴历新年我写了贴在屋里的春联和新年开笔诗读给几位当教师的朋友听，其中就有阿立这位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干部。

### 新春对联

春天不谁私，普看北、中、南，遍地韶光无觅处？  
佳节各有异，且访菲、埃、印，此间风景有观头。

### 新春开笔诗

廿一春光飞似箭，  
还余七九怎安排。  
江山依旧时间迈，  
岁月蹉跎约望乖。  
覆载之恩誓必报，  
劬劳之德岂忘怀。  
但希永保青春日，  
永保青春展俊才。

当时写的这首春联和开笔诗只是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料竟得到革命者的赞誉。

本来经过老瞿的介绍，我对阿立老师已多少有所了解，加上我在兴业会社常常见到他，更相信他是一位革命者，因而我不再隐瞒自己的思想。我说，我想参加革命，革命需要

我，再远的地方我也愿意去。

阿立当即同意了请求，并告知我不久将要送一批人到国外去，要我赶快做好准备。

我立刻返回琼堆，把一切安排停妥，留下一封给父亲的信，推说因为生计艰难，决心外出找出路，待事业有所成就，可以报答父母之恩时再返家。这封信是为防备官府传问时，家人借此具报，免受牵累。我把写好的信偷偷地放在父亲从建安教书回来一定要打开的一只箱里。而对母亲，我象往常一样告诉她我要外出找工作。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追求，这一次我终于找到送我出国学习，从事革命的人。我带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和信心准备起程。

\* \* \*

我同阿立老师乘火车从清化到河内，当晚就住在黄高启采邑中一个群众的家里。第二天，乘汽车到北宁，再换火车到同登车站。到站时天色已晚。下车后我们躲开检票员，向车站出口相反的方向走去。在夜幕中隐约看到同批出国的约有十多人，不等火车开动，我们就快速向丛林跑去。火车离站后，集合所有的人隐藏在路旁密林中等待。不一会儿，联络员找到阿立老师说，原先的道路有民团检查，我们只能绕道走，连夜走出这一林带才能越过边界。

一整夜爬山涉水，我们终于到达中国境内属贡阐乡的那底村，住在一位姓凌的老乡家里。

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派伞英同志在这里迎接我们。

当时，中国革命处于发展比较顺利的阶段。孙中山在世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他逝世时还留下遗嘱，主张联合各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中国之民族。虽然蒋介石包藏祸心，但尚不敢公开翻脸反共。在广东，国民党政府办了黄埔军校，胡志明主席安排了一批越南革命干部进该校学习。

伞英同志以黄埔军校干部的名义做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黄埔军校入伍生队”八个字，公开地把我们从边境带到龙州。在那里，我们住在一个姓梁的人家里，休息两三天后，便乘江轮到南宁，再去广州。

虽然我们以黄埔军校学生的名义到了广州，但没有进黄埔军校学习。

我们进的革命学校是阮爱国同志创办的政治训练班，设在广州市仁兴街五号的一幢民房里。

我记不清我参加的训练班是第几期，但后来有的同志谈起广州训练班才知道这不是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二十多人，大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的是刚参加过南定市罢课的学生，也有象黎孟桢那样的汉学秀才。

学习时间约两个月，课程的讲座大致分为三类问题：世界革命问题，越南革命问题以及革命运动的工作方法问题。

世界革命问题讲座是俄国革命与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教师着重分析俄国革命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革命的区别，有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作了批判。

越南革命问题讲座是分析法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压迫、剥削，指出推翻殖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工农，有多处批判了潘佩珠模糊不清的路线，例如他把革命分为“文明革命”和“野蛮革命”两类，主张拥立强祗亲王当皇帝，以后又主张推强祗为终身总统，等等。讲座中还有多处批判甘地企图通过“不合作”和“不暴动”实现民族解放的主张。

革命运动的方法问题讲座是讲授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等等。

胡志明主席直接领导训练班，但他不是唯一的教员。他化名王同志，常到训练班讲有关越南革命的问题。在学员中，许多人暗地里都知道王同志就是在国内早已仰慕的阮爱国同志。在这里见到他，对他朴实的作风，简练、深刻、易懂的语言，严肃的态度和亲切的同志感情，更使人倍加敬重。

除胡主席外，其他教员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其中有讲授农民运动的农运领导人彭湃同志，讲授工会运动的工运领导人刘少奇同志。

中国教员讲课，由胡松茂、伞英同志或林德树翻译。有一次，他们三人外出，胡主席亲自为学员翻译。我们许多人曾以为胡主席不会讲中国话，当听到他快捷、简练的翻译并能与中国同志直接交谈时，对他都很钦佩。

每次听讲之后，学员分组讨论。各人谈自己的理解，别的同志补充，直到掌握了全部的内容。

训练班出了一份墙报，发表学员的诗、文。有时我们还在住房里演出“即兴剧”，不要剧本，只由某几位同志提出一个主题和内容，然后分担角色，即兴演出。演出时，胡主席常扮演工人或农民。

除了听讲和小组讨论外，我们还去参观黄埔军校，瞻仰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花岗起义牺牲的七十二烈士墓这一广州著名的纪念地。

另一次，胡主席介绍训练班学员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工人大会上旁听。

这一年，我们在广州过年，虽然远离祖国，但却度过一个简单而充满革命同志情谊的节日。遗憾的是有两三个学员认为过年就得大吃大喝，变卖了几件衣服去大吃了一顿。这几个人以后在革命活动中都没干出什么名堂。

新年以后，训练班结束。我们到范鸿泰墓前举行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仪式。这位敬爱的烈士曾以他在沙面的炸弹声唤醒了年轻一代爱国者。我们在他的英灵之前举手宣誓，为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不怕牺牲奋斗终生。

以后，总部给我们分配工作。我和几位同志被安排回国活动。为了保守秘密，各人走的时间和路线都不一样，这样可以避免万一被捕不致损失过大。

回国的行程比出国顺利，我只花了两三个小时就越过边

界到达同登车站。当时天还没亮，我悄悄来到车站，背靠墙坐着等待。天朦朦亮便听到从那岑开来列车的声音。

我买去河内的车票，但到北宁站便下车，改乘卡车到河内，然后又坐黄包车到文典，转去南定的程川看望在那里教书的内弟，了解家里情况。据我内弟说，我没有回家过年，家里都很担心。家族中有人议论要去报官，以免牵连家庭。父亲犹疑不定，母亲却坚决不同意说，孩子出门，如官府追问就说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样，孩子还可以回来。要是去报官，那就堵死孩子回家的路。于是决定不报官。了解这种情况后，第二天一早我便到程川车站买回家的火车票。当列车徐徐开动，我随口吟颂一首不知名作家的诗：

耳际频来汽笛声，  
笛声推动故乡情。  
山河重责双肩负，  
车费虽多独见轻。

阴历正月的一个下午，我回到琼堆村，恰好黄姓家族正在宗祠祭祖，我径直走进宗祠，让大家见到我在场。当有人问及我最近去哪里，我都说到西贡找事做，但毫无结果，只得回来。胡宽先生是个细心人，几天过后，他见到我小声笑道：“走脱不了，是吧！”我含糊答道：“跟不上趟。”

广州之行就这样掩盖了过去。我终于实现了出洋寻求革命的愿望。从此开始了革命实践的阶段。

\* \* \*

在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为避开当局的注意，需要有个职业作掩护，并且还要有一个便于联系的地点。我托一位兄弟在球夏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主人是天主教徒，他答应除供膳食外，每年工资六十元，负责教他两个孩子学习拉丁化越文和一些法语。

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基层组织。首先发展过去在村里的知心朋友阮柔、杨廷翠、旧里长老弹和老顺、杨文澜、黄文合等几个人加入组织。接着进行分工，留在村里的就在本县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有条件外出的进行“远地宣传”，旧里长老弹的外祖家在安城县，他就到那里发展组织；杨廷翠在宜禄县开织布厂，又常到荣市，便安排他在这两地发展组织；阮柔常到英山县，就向英山发展；杨文澜在禁渡教书，也就地开展作。

我常到安里、万分两地同武梅以及在该地区的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同志联系，有时也到义安市与陈文恭、阮文利研究工作，但经常到球夏与我联系的是教师阿立，当时他用的化名叫矮黄。

一九二七年是青年革命同志会同新越革命党两个组织斗争激烈的一年。在这两个组织发生分裂前，矮黄同志介绍我在义安市附近的决山与陶春梅、蔡文得晤面，酝酿建立清、义、静联省组织。这是青年革命同志会与新越党合并的一种组织形式，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合并失败，我们便不再晤面了。

一九二七年底，为了便于到各地工作，我不再去球夏教书了。

一九二八年初，在广州的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传来消息，说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中，蒋介石公开反共，革命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一些越南革命干部也遭到逮捕，其中有胡松茂同志。青革会中圻圻委主张散发传单，号召华侨支持越南革命，要求蒋介石释放被捕的越南革命同志。

杨廷翠、杨文澜和我一起到菜市散发传单。杨廷翠由于误将度田机关的一名密探吸收到组织里来，在执行任务时被告密，旋即遭到逮捕。

我虽然平安无事。但听说杨廷翠被捕，不能不提高警惕。我找到阮柔商量应急的措施，决定要经常转移住处，同时设法到清化晤矮黄，征求他的意见。几天后，在去清化的路上，我趁天色全黑下来的时候，回到琼堆。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下午县里的巡丁到家里要抓人，给了他们两块钱，事情才算过去。

当晚，我找黄文合同志（一九三〇年在琼堆遭敌人处决）来交待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后，便到一个秘密地点睡觉。这次回来，家里对我的帮助十分妥贴周到，外人一点都没有发觉。

作为一个暂时躲避敌人追捕的革命者，我只能尽量做到使家里少担心，对母亲和带着周岁幼儿的妻子，我什么都没有讲。我更想不到这一走，就要离开祖国十四年，跟父母和妻儿分手十八年。

我带着一个饭团，布包里放一杆秤，装扮成收购蚕丝的商贩，趁着夜里穿过几片荒僻的田野，踏上一号公路，步行到清化。过了夹渡口，两腿酸痛异常，只好雇黄包车到清化市区兴业会社。这时，那里的朋友正在吃晚饭。

矮黄同志听了我的汇报，过了几天便通知我说，圻委决定派我到暹罗工作。

按照计划，我借一辆自行车从清化到荣市去找武梅，由他安排我跟近期起程的联络员一同去暹罗。这一趟他也同行，他是到那边商量有关联络工作的。

武梅带我到演州府，暂时隐蔽在杜章家。以后，由王叔春把我和武梅带到河静省香溪县，在背靠丛林的一个群众家里呆了几天后，穿越丛林，经老挝而入暹罗。

这是我第二次出国。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学习革命。当时心中既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急速前进。这次去暹罗，正当革命遭到镇压，心中难免牵挂留在国内的同志，也担心父母、妻儿将被豪绅和官吏迫害。我越想越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必须竭尽全力以赢得祖国的自由。

一九二九年，我在暹罗乌汶府编写剧本《出洋者》，这个剧由我和在乌汶的同志一起演出，其中有下面一段唱词，表达了当时出国的心情：

青山一片绿葱葱，  
故国遥瞻愁万重。

沉、赵峥嵘岩作壁，  
杉、梅汹涌水成洪。  
云横握岭途犹远，  
雨涨崑江渡未通。  
迢递关河无限感，  
缠绵家国百忙衷。  
层峦凭作庄严誓，  
收复江山再聚逢。

沉洞、赵洞、握岭是几座山的名称；杉水、梅水、崑江是到暹罗途中的河川。

经过六天爬山、涉水，我们到达距他曲市几公里住有几家越侨的地方。待到天黑，来到河边一个僻静的渡口，其间有一个越侨划着小船等待把我们载到对岸，这里就是暹罗界内湄公河畔的市镇纳空帕农。

这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底。

## 第二部份

# 在暹罗从事革命活动的岁月

(1928—1935)

一九二八年五月底，我和武梅踏进暹罗，那里的同志把我们暂时安顿在那空府迈村的一个联络站。

吴遵同志，又名三督，代表在暹罗的组织和我们会面。他原以为我们同前几批从国内派来学习的人一样，劈头就说：“你们回国去吧。现在暹罗不再接受国内派来的学生了。”

当时介绍关系的手续不很完善，这并不奇怪。我对他解释说，中圻圻委不是调我到暹罗学习，而是来这里搞工作。武梅同志是圻委派来负责在暹罗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与国内联系的人。

为了使三督对我进一步了解，我还告诉他我认识秀正（黎孟楨）、老周（陈文振）等同志，他们都是一九二六年跟我一起参加广州训练班的，而现在仍在暹罗工作。

接着，我们被安排到黎宽先生（李自重同志的父亲）家，那里是联络站的主要联络点。

黎宽先生的家旁边，有一所少年学校，学校的教员是我的族弟，名叫黄琢，他先我到暹罗。我们彼此都认识，但为了遵守保密原则，在这儿不认同族、同乡。

六七天后，我开始和合作组的人来往，合作组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这里的群众组织。在和他们交往中，我在他们中间常常朗读潘佩珠、潘周桢、燕睹、秀昌、伞陀等人的爱国诗文，他们逐渐地知道我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这时好象上级也通知他们我是组织派来的干部，所以大家对我比以前更好，更亲热，也更尊重。

不多久，黎孟桢来看我，并带我到乌隆。而武梅在商妥联络工作后便启程回国了。

我在暹罗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工作；另一是在暹共领导下工作。

## (一)

### 在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工作阶段

我到乌隆那天，恰好是范鸿泰烈士纪念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同志们安排我布置纪念会场和书写汉文挽联。这副挽联是：

大丈夫无所为而为，四年来纪念馨香，先志岂  
欺身后享。

精神界安知死不死，九泉下梦魂尸祝，成功留

付我同肩。

我觉得这副挽联很好，一直以为是这里的同志所作。后来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才知道这是邓元谨为悼念一位革命烈士而作，这里的同志借用了，也正适合于纪念范鸿泰。

纪念会还分工我读悼文。悼文是邓叔许先生(大家亲昵地称他为“徒步老翁”)写的。

纪念会后，我来到距乌隆约十公里的廊温工作，这是一个有青年革命同志会基层组织的地区，我和“徒步老翁”共同负责一所少年培训学校。

学校有十八个学生，多数是越侨子弟，还有一些从义安、河静送来培训的少年。梅文光、杨智中、杜文香等当时十六、七岁，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革命学校。学生和教师在课余都参加劳动。

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上文化课，其中包含有爱国主义的政治内容。“徒步老翁”教汉文，我教越文。我们向学生讲越南历史、地理，教他们算术，背诵爱国诗文。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法国殖民者的仇恨，锻炼革命意志，使之成为未来救国事业的人才。除了我和邓叔许外，黎孟楨也不时来上一两次课。

学校师生食宿条件很简易。学校有两排草房，大的一排三间作教室。中间放一块长方木板，作为课桌，两边有排椅。夜来课桌用作学生睡的通铺。另一排草房较小，又作厨房，

又当食堂，还放置各种劳动工具。

学校生活很有规律，早晨我和学生一起在校庭做早操（邓叔许当年五十八岁，身体较弱，不参加早操），然后去劳动，劳动完毕才上课。主要的劳动是种红薯、种菜、种果树，养鸡、养猪、做饭、洗碗、挑水等。有时我们还把收获的红薯挑到村里去同当地人民换稻谷。

这样的生产劳动也带有学习和培养革命精神的意义。但主要是保证师生的生活来源。组织上只补助学校不能自给的那一部分经费。

在家时，我是个学生，不太懂得什么是劳动，后来有了革命觉悟，对劳动才多少有些认识，在村里参加挑水、修路。现在到了廊温，体力劳动成为日常的需要。新的生活环境促使我更加接近群众，进一步认识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也是胡志明主席在广州训练班对我们讲得最多的一点。

\* \* \*

在廊温教书时，我还参加青年革命同志会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在暹罗中部彭世洛府披集县越侨聚居的万隆村，成立了旅暹青年革命同志会。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这个组织发展到越侨聚居的暹罗东北乌隆省的乌隆他尼、沙功那空、那空帕农等府。由于这些地方越侨很多，而且分布在不同地点，青年革命同志会的领导核心便从披集转移到乌隆。

一九二八年八月，胡主席来到暹罗。他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后，建议成立乌隆省委负责统一领导。省委五人包括邓太

诠(更新)、武文桥(阿廷)、陈文振(阿曾)、阮文裕(阿海)和我(化名阿义)。武从(阿六)和黎孟楨(阿进)同志仍留在披集继续领导那里的组织。邓叔许到清迈、喃邦建立新的基层组织，不参加省委领导。

青年革命同志会是通过合作会和越侨亲爱会这两个组织来开展群众活动。

合作会是群众骨干的组织，它为青年革命同志会培养后备力量。合作会吸收青年爱国分子，主要是从国内来的有志于革命的青年。他们按合作会的安排过集体生活，从事集体劳动。有的种地，有的专门从事锯木、木工、泥瓦工等手工业。劳动的收入用一部分来解决会员的生活必需，余下作为合作会基金，用于集体事业开支，如派人到国外或回国，建立学校，给学生补助，支出宣传费、出版费等。

后来，合作会还吸收了一些长年居住在暹罗的越侨。但这些会员按独自经营的方式从事个体劳动。他们除经常缴纳会费外，还要供养两三个少年儿童或专职革命干部。

到一九二九年底，越侨合作会有会员一百多人。

越侨亲爱会是一个广泛性的组织，具有越侨统一战线的性质。几乎在所有有越侨的地方都成立了亲爱会。亲爱会会员有正式会员和同情会员：正式会员参加定期举行的会议并按月缴纳会费，他们大多分布在越侨聚居的地区；同情会员则大多是分散在各地，不便于联系和参加集会的“老越侨”，他们在暹罗定居已有好几代，并已加入暹罗籍，但仍具有民

族意识，支持越南革命。这些同情会员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积极态度对亲爱会的活动提供精神或物质方面的帮助。

越侨聚居的地方，还成立了妇女会、青年会、少年会，作为越侨亲爱会的组成部分。

\*  
\*  
\*

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包括出版报刊，开办青少年训练班，组织演讲会让大家学习演讲，讨论各项政治问题，组织带有爱国意义的纪念日，如纪念范鸿泰、纪念国耻日（签订巴德诺条约）、纪念阮士策等。组织这些纪念活动还常演出话剧。

此外，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还向国内寄发书报和资料，从国内组织输送一些干部到暹罗和中国参加革命活动或进行培训，使之成为革命干部。一九二七年，我们派人到老挝，在万象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分会，并在暹罗的莫拉限、那空和廊开对岸的老挝市镇沙湾那吉、他曲和万象建立交通联络点。特别是从武梅同志到暹罗建立联系后，旅暹的革命组织与国内的组织联系日臻密切。

旅暹青年革命同志的活动对国内产生了影响。一九二八年六月，越南国民党派出由阮玉山、胡文冀、阮文潜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暹罗来，建议旅暹革命同志会总分会向国内提供武器、弹药以准备暴动。旅暹的组织与他们接触，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邀请他们参加范鸿泰烈士的纪念活动，参观有越侨爱国组织活动的一些地方。同时向他们阐明暴动的时

机尚未成熟，以还要得到在中国总部的意见为理由，婉言拒绝了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的建议。后来这三个人回到越南就遭到逮捕，他们把一切都招供了。

我在旅暹青年革命同志会领导工作中，除参与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外，还经常为《亲爱》报撰稿，组织演讲会、纪念活动和话剧晚会。

一九二九年春节，我编写剧本《出洋者》，和一些同志在乌隆演出。由于时隔多年，故事的整个情节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剧中的一个片断是一位教师和学生的对话：

教师：法国人在越南太享福了，甚至他们豢养的狗每个月光花吃的就要三、四十块钱。

学生：老师，那您每个月工资多少？

（教师一阵脸红，随即冷静下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十二块钱，县里法越学校督学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块钱。

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青年革命同志会和合作会、亲爱会都处在发展的势头上。这是由于大家的同心协力，这里有潘佩珠、邓子敬等老前辈，也有来自国内的青年和训练班的青少年的共同努力。而在旅暹越侨中深深扎下根，贡献最大的要算是邓叔许。侨胞尊敬他，习惯称他为“徒步老翁”或“徒步老师”。

\* \* \*

为了说明邓叔许的贡献，我从《旅泰越侨的革命活动》一书第二章中摘引一段原文：

“在建党之前的爱国人士中，可以说邓叔许是一位坚持革命到底的人，而且他总是紧跟着越南革命发展的历史步伐前进。

“邓叔许从参加勤王活动进而同情扶强祗亲王的君主立宪制，随后，他赞同解散维新会，建立走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越南光复会，他的最后转变是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邓叔许的转变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对革命必然性不断思考进而具有明确认识的过程。

“邓叔许一九〇八年出国，一九〇九年到暹罗，一九一〇年，当潘佩珠在暹罗活动时，他就是最早参与建立万琛农场的成员之一，并且一直在万琛基地坚持到最后。

“在负责万琛农场工作中，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邓叔许着手建立‘少年营’，抚养并教育来自国内仇恨法国殖民当局的家庭的子弟，以及旅居老挝、暹罗各地爱国越侨子弟。他的目的是教孩子们学会越语，增长学问，掌握生产技能，着重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使他们长大后从事救国革命运动。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暹罗政府成为法国的同盟者，越侨的爱国运动遇到巨大困难。由于法国政府的干预，邓叔许的‘少年营’不得不转移到披集的万隆。一九一六年，在法国的催逼下，暹罗政府下令万隆所有的越南人都必须在五天内迁往他处，否则法军就前来抓人，没收财产，当局将

不负任何责任。当时根据法暹不平等条约，法国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在暹罗惩治越侨，因为法国当局把越侨看作是他的受保护者。因此，邓叔许只好带这些孩子到中国继续学业，并在中国呆到一九一九年。

“在这期间，中国革命政权有一些省份落入军阀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广西军阀搜捕越南革命人士，潘佩珠也遭到逮捕。越南光复会在国内、在中国和暹罗策划的几次军事行动都遭到失败。

“面对多年来局势的演变，邓叔许认识到越南革命不能依赖外国的帮助，也不能象越南光复会那样多年来单纯从事策划军事暴动。他和潘佩珠商量后仍重返暹罗，作长期艰苦的打算，继续扎下根来，依靠人民搞革命。

“一九一九年，邓叔许回到披集，与邓子敬就救国工作的方针交换意见。但他们的观点差距很大。邓子敬仍坚持旧的主张，尊畿外侯强柢为‘盟主’，准备建立‘临时政府’，据此来向日本天皇请求援助。谈到越侨工作，邓子敬认为侨民来到国外谋生，没有谈论国事的知识。邓叔许反对邓子敬的全部观点，他认为现在还死抱着‘畿外侯’，企图依靠日本天皇是过时的旧观念。他主张要依靠侨民，教育侨民团结起来，为革命奠定长远的基础。

“邓叔许常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诲(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勾践复国的方针)’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所进行的具体工作，他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

“在与越南光复会的同志们会面时，邓叔许经常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批判所谓日本政府‘帮助’越南革命的说法，指出这不过是打着‘同文、同种’的招牌掩盖其‘想充当亚洲兄长之国’的野心而已。日本政府帮助潘佩珠培养越南爱国青年，他们教的是日语，夸耀的是日本如何高明；而他们内心深处却是要挤掉法国，取而代之，使用正在日本学习的一些人充当他们未来的走卒。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残酷统治与法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统治毫无差别。他经常提醒大家记取沉痛的教训：日本政府曾与法国妥协，下令所有的越南爱国学生在二十四小时内必须离开日本，后潘佩珠和其他学生进行了斗争，要求把离日本期限延长一周。

“对当时流亡在暹罗的越南人的救国事业，邓叔许曾比喻为一艘海上的航船，尚未找到方向。他说，我们不怕翻船，只怕迷失方向，逆流而行。

“在还找不到具体的道路时，邓叔许很注重在旅暹越侨中奠定长远的基础。他常常对着一些同心同德的朋友说，要想在侨胞中扎下根来，就要做到哪里有侨胞，那里就有我们，我们要做众人的公仆，而不当世间的圣人。他主张应当把在暹罗的越侨集结成村成寨，使大家能够互相依靠，共谋生计，并能保持民族的淳风美俗，特别要使越侨子弟不忘母语，不忘祖籍；从而动员侨胞参加救国事业。

“为实现上述主张，邓叔许不辞劳苦走遍暹罗有越侨居住的地方，接近群众，引导群众。他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因

此，暹越侨称他为‘徒步老翁’、‘徒步老师’。他常常徒步，而且几乎徒步走遍各地，以便于驻足在越侨散居的暹罗东北的穷乡僻壤。他到处鼓励侨胞团结、友爱、互助，牢记亡国的耻辱。

“邓叔许安排了和他同心同德的一些人在暹罗各地发展组织：

“一派儒嫂（邓琼英）等几个人到披集县重建万隆的基层组织。

“一他派阿荣到位于湄公河畔的与老挝他曲市隔江相望的那空市附近的越巴、廊成发展组织。接着他又派黎宽和台老两位老人到距离那空市五公里的万迈、万丰建立关系。

“一他派阿珠到乌隆发展组织。另外又派几个人到离乌隆三公里的廊布和离乌隆十多公里的山区东温建立关系。

“以后，邓叔许和其他的人一起又继续向乌隆到沙功路上的板限、廊汉，沙功到那空路上的他客、古苏曼等地发展组织，进一步开展到湄公河沿岸的乌天、那给、达帕农、莫拉汉、廊开等地。

“在邓叔许和上述他的许多同志多年坚持活动下，分散在暹罗各地的越侨逐渐聚合起来，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邓叔许每年都要到有越侨居住的自北挽坡至东北各省走一趟。沿途访问中，他坚持对侨胞进行爱国思想、培育好后代，保持优良民族传统的教育，要求侨胞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法律。他到每个地方都象一个普通人那样劳动和生活。

因而侨胞对他非常尊敬，暹罗人民也很喜欢他，称他为‘黑老翁’。

“有一回，法国殖民者跟踪追捕邓叔许，暹罗的地方当局和群众事先就向他通风报信，要他躲开。又有一回，法国当局向暹罗政府交涉，要抓邓叔许，地方当局不敢拒绝，但提出要认准，不得抓错人。他们让邓叔许和当地的许多老人坐在一起，由于他肤色黝黑，外形又象暹罗人，法国人无法辨认，邓叔许又一次脱了险。

“邓叔许一九一九年着手在越侨中建立关系，从那时候起，他还建立了一条通往国内的交通线，安排一些青年来暹罗，然后转到中国从事革命活动。

“自一九二〇年起，许多爱国青年来到暹罗，他们在那空、乌隆得到越侨基层组织的接待，后转到披集，在邓叔许农场中生活一段时间，接着领取路费，由交通员带往中国。有的爱国青年如邓太谏等，则留下在暹罗工作。

“一九二三年，经暹罗到中国的几位青年：范鸿泰、黎鸿峰、黎伞英、胡松茂成立了心心社，他们摆脱了潘佩珠路线的影响。一九二四年，范鸿泰在沙面向法国驻印支总督墨尔林投掷炸弹，这件事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革命运动。接着，胡志明主席来到中国，引导心心社的同志组成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自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二五年，一批又一批出国的人来到暹罗，总数达几十人，他们中多数人转赴中国，一部

分人留下参加旅暹的越侨工作。

“邓叔许提出在越侨中扎根和动员青年出国的两项主张，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广州，以及后来在暹罗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邓叔许一个人干的。他的同志阿金、阿六(武从)、儒嫂、阿詮、阿荣、宽老、台老，都是一些得力的干部和群众骨干，他们对实现邓叔许的正确主张也作出很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主席派人到暹罗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邓叔许是分会领导之一，他在分会和旅暹越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胡志明主席到暹罗从事革命活动，他对邓叔许先生的道德品质和在越侨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时，侨胞的各种爱国组织得到发展和巩固，但邓叔许仍坚持建立长远基础的主张。他自告奋勇要求胡志明主席和领导机关让他到暹罗北部接近缅甸和老挝的清迈、清莱和喃邦等地发展组织，为今后开展活动建立后备基地。他说：‘现在，侨胞群众已有了组织，而且这些组织也得到发展和巩固。但革命还会碰到困难，因此必须继续建立新的基地。古语说，“狡兔三窟”，我们也应当有为今后而准备的基地。’这样，胡主席和其他同志便同意他前往清迈。

“一九三〇年建党时，他虽不在场，但仍光荣地被接受为暹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一九三一年，他在清迈患病，返回乌

隆后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生，鞠躬尽瘁，在暹罗的侨胞和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的功绩应载入越南革命史册。”

## (二)

### 胡主席在暹罗

胡志明主席两次到暹罗。第一次从一九二八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九月。第二次从一九三〇年三月到四月。

以前我在广州训练班学习时，胡主席给我讲授了革命的基础理论。一九二八年在暹罗，我又幸运地能够经常接近他，许多时候都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工作。

胡主席徒步从披集走了十五天，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来到我工作的地点乌隆。他徒步远行，既能在沿途了解越侨情况，又能保守秘密。

胡主席到乌隆后化名九哥，当时，他只有三十八岁。而我们大多数干部都很年轻，大家看到他异常老练，又能以身作则，都十分尊敬他，称他为“九老”。只有少数曾在广州训练班的同志知道他就是阮爱国。

胡主席在乌隆常到合作会主要集中点廊布工作。

他在同乌隆的干部、群众见面时，常常讲解国内外形势，并和负责干部就革命工作交换意见。

当时，乌隆的革命组织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合作组已

发展到数十人，越侨亲爱会也有数百会员。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同声》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然而那时合作会有些青年却认为暹罗只是临时活动的地盘，以后不是去中国学习革命运动，就是回国工作。因此呆在暹罗时间虽然很长，但很少有人想到要学习当地语文，他们不关心与暹罗人民接触。还有少数人有偏颇的看法，说到暹罗是来干革命，结果却是辛辛苦苦地干劳动活，锄地、种树、锯木等，象谋求生计的普通老百姓一样。而当时，革命遭受挫折，中国广州起义失败，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越南干部也遭到逮捕。于是个别人产生了动摇，设法逃回国去。

胡主席在接触干部和群众中时，经常强调革命的长期性。他说，革命的前途必然胜利，但当时机尚未来到，革命者必须善于坚持，经受艰苦的磨炼，宣传群众，唤醒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的斗志。对内方面，胡主席提出，青年革命同志会必须发展组织，巩固群众基础。过去，合作组只吸收来自国内的青年，现在应该把决心参加革命的侨胞也吸收进来。他建议把《同声》报改名为《亲爱》报，指导干部写通俗易懂的文章，更加广泛地在侨胞中传播，甚至寄送到侨胞分散居住的地区。对外方面，胡主席提出，要使暹罗人更加同情越南人和越南革命。他教育侨胞注意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嘱咐我们要努力创造合法或半合法活动的条件。他鼓励我们学习当地语文，而且他自己带了头。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就能听懂，并多少能讲一些暹罗话。

他在合作组和青年一起劳动，抓住时机，在思想认识和日常生活作风方面，对他们进行帮助。每当越侨群众访问合作组，他争取和他们会面，询问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的时候，侨胞找他谈心，请他出主意帮助解决家里的难题。

胡主席在廊温还和学校师生一起参加劳动。他多次与学生一起上课，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

学校有一门叫作“雄辩”课，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辩论和在有群众的场合讲话。一天，胡主席提出“妇女要不要解放”的问题，大家辩论很热烈。大多数人认为越南妇女应得到解放。但也有人认为妇女解放要一步一步来，因为妇女群众的认识水平还低。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胡主席说：“现在请阿义老师讲话。”我支持妇女必须得到解放的意见。最后胡主席高兴地笑着说，大多数人发表的意见是对的，干革命就要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其中包括反对压迫妇女。但不是我们去解放妇女，而主要是让妇女姐妹有革命的觉悟，进行斗争，自求解放。妇女不仅要争取日常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而且还要争取在经济上和政治社会活动中的平等权利。

每次胡主席参加讨论，提出问题，我们都学到许多新的东西，提高自己对革命的认识。

约在一九二八年底，胡主席对我们提出，应向暹罗政府申请在廊布设立一所学校。我们按他的意见去办。得到批准后，许多干部和侨胞立即动手盖校舍。胡主席也跟大家一起挖土，平地基，挑砖砌墙。

在廊布，胡主席腾出较多的时间翻译革命理论书籍供干部和侨胞们阅读。他翻译《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ABC》等书，并把前者书名定为《人类进化史》。他经常要我跟他一起翻译，实际上是他边看中文书边口述，由我记录下来。他不拘泥于原作的每一字句，而是取其要意，用简明、精练的文句表达，使读者易懂，易记。有的段落译完后，他叫读给大家听。如果群众感到不好懂，他又重译。

在乌隆住了不久，胡主席去沙功，那里的侨胞比乌隆多。合作会、亲爱会、少年学校等革命组织也早已建立。

胡主席在沙功和在乌隆一样，仍然十分简朴，过着有规律、有严格计划的生活。他接近群众，与侨胞来往、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有些越侨人家，尊崇陈兴道为圣，供拜、或跳神求灵，治病则服用香灰、符水。看到这种情况，胡主席编写了一首陈兴道歌，讲述这位陈朝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事迹。歌中有一段说：

延鸿殿警告先圣，  
全民为国愿牺牲。  
谁人来侵我国土，  
定将它消灭干净。  
我越民一人尚在，  
我河山寸土必争。

胡主席这种宣传教育方法，使这支歌在侨胞中迅速传播开来。“降魔伏妖”的陈“圣人”恢复了民族救国英雄的本来面

目。陈“圣人”的许多信徒思想转变了，成为越侨亲爱会的会员。

在沙功住了一段时间后，胡主席到那空，他在那里象在乌隆和沙功那样继续对合作会会员和群众进行工作。他特别注意建立与国内的联系。有时他还同阮才同志一起坐船沿着湄公河，靠老挝河岸，了解那里越侨的情况。在乌隆时，他曾同我一起到廊开，并约在万象的阿渚和阿满来会面，了解在老挝的工作和与暹罗方面联系的可能性，借以推动越南国内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九年五月，胡松茂在香港召开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发生分裂。国英(陈文恭)、金尊等一批人退出大会，回国成立共产党。留下的代表决定把他们开除。旅暹青年革命同志会两位代表武从和邓太谗提议应征询老王同志(即胡主席)的意见后再作出决定，但大会不予置理。武、邓回到暹罗后向胡主席报告了出现分裂的情况和在香港召开大会作出的决定，胡主席建议旅暹分会暂缓传达大会决议，以便设法统一各共产主义组织。

以后，约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初，胡主席离暹去向共产国际东方局请示，东方局交给他统一越南各共产主义组织的任务。经过他在香港的一个地点主持各组织代表的会面，这个任务得以实现。

\*\*\*

约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底，胡主席到曼谷与华人共产党人

交换意见后，去乌隆向青年革命同志会省委通报越南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的情况，并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成立暹罗共产党的意见。

当时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乌隆省委，是旅暹越侨革命活动的中心。省委成员有阿廷、阿曾、阿海和我（化名老杨）。前此不久，省委书记邓太诠在曼谷遭到逮捕。

胡主席会见省委时，告知我们说，印支共产党组织与安南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分裂已得到妥善解决。两个组织的代表在香港会晤，就统一问题达成协议，已于当年一月六日合并，成立越南共产党。党通过了政纲、工作计划和简明章程，并一致同意接受印支共产主义联团组织参加越南共产党。虽然这个组织获得邀请参加统一会议，但因路上受阻，他们的代表未能及时赶到参加。

关于党的成立日期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主席当时说越南共产党成立于一月六日，但没有说是阴历，在座的人都认为是阳历，自此每年都以阳历一月六日为党成立的纪念日。直到一九六〇年，苏联提供的资料表明，越南共产党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成立的，而不是以前误认的一月六日。因此，一九六〇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把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定为建党纪念日。

胡主席对旅暹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组织说，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共产党人居住在哪一个国家，就要参加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因此，在暹罗的越南共产党人就

有帮助当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从事革命活动的义务。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人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革命，而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这是共产国际过去的决议。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决议已不再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要求）。

胡主席建议省委在青年革命同志会中挑选一些优秀分子转为共产党员，参加暹罗共产党。乌隆省委听了胡主席的情况介绍和讲解后，知道国内已有共产党领导整个革命事业，而自己也转为共产党员，都感到十分高兴。只是这次我们不转为越共党员，而是转为暹共党员。对我们来说，青年革命同志会转为共产党是很自然的，多年来，青年革命同志会不断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并在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阮爱国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几天后，省委召集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一些骨干听阮爱国同志讲话。

胡主席再次讲到几天前同我们讲过的内容。他说，今天住在暹罗的越南革命者要为暹罗革命的利益而工作。他分析暹罗的社会情况说，现阶段暹罗是一个半殖民地、封建的国家，不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帮助下，暹罗革命也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听后，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有的同志担心转属暹共后，

不能为越南革命作出贡献，得不到侨胞的同情。胡主席逐一作了解答，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他又与省委同志交谈，讨论具体组织问题。

他建议转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省委为旅暹越南共产党人组织的省委。先前，省委书记由邓太诠担任，由于他被捕，我们选举阿廷同志接任。

胡主席嘱咐我们要有选择地吸收具有高度革命热情，优良道德品质，自觉自愿毕生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第一批党员。以后，他向省委建议派阿曾同志代表旅暹越南共产党人的组织跟他一起去同旅暹华人共产党组织联系，讨论建立暹罗共产党问题。

一九三〇年四月，胡主席和阿曾到曼谷。启程之前，他嘱咐乌隆省委应与在老挝的青年革命同志会联系，帮助他们转为共产党老挝支部。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胡主席作共产国际代表在曼谷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成立暹罗共产党，选举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暹委）。乌隆省委委员阿曾和在暹罗出生的越南人吴正国被选为委员。

暹罗共产党成立后，胡主席去马来亚，协助当地同志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从一九三〇年四月以后，他没有再来暹罗。

\*\*

胡主席在暹罗的两次活动，留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迹。他除协助在暹罗的革命者建立暹共这一重要事件外，

还在越侨中培育了一代革命干部；对大家进行了革命长期艰苦性的教育；建立了越南革命者与暹罗人民之间的友谊；培养旅暹越南革命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在暹罗人民中培育革命幼芽作出了贡献。

### (三)

## 在暹共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阶段

胡主席离开暹罗后，阿曾同志回到乌隆向省委通报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在曼谷召开暹共建党会议的情况，以及会议作出有关暹共内越侨党组织任务的决定。

根据暹委的分工，乌隆省委负责开展暹罗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阿曾着重传达胡主席反复强调的意见，说必须十分重视选择第一批党员的工作。因此，省委决定把旅暹青年革命同志会转为暹共的一部分问题组织内部讨论，以便大家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只有两三个人不同意。他们认为为暹罗革命而进行活动，恐怕得不到越侨群众同情，而且可能遭到暹罗政府的镇压。省委对他们解释说，要干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到镇压，不管是越南人还是暹罗人，既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就会赞同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应该发动他们、领导他们起来干革命。

省委倾听大家的意见，初步拟就几十位具有良好品质的

骨干的名单，准备吸收为第一批党员。

一九三〇年十月，省委在乌隆省会附近召集了有乌隆他尼、沙功那空、那空帕农几个府的旅暹越南人党员参加的大会，确定工作方针与活动方向。在披集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参加大会，因为那里刚刚发生跟踪追捕武从和邓太谄的一个密探失踪，当局正大力进行镇压，披集几乎所有的同志都遭逮捕，有十一个人被驱逐出境，去了香港，其中有黎孟桢同志。

在这次大会上，阿我同志代表暹委介绍暹共建党情况，并宣布乌隆省委是暹共的一个党组织，负责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

为了贯彻新的路线，乌隆省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有关开展旅暹越侨工作问题。

在具体方针确定后，大家意气风发，投入工作。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大多数成员和合作组许多积极的青年都被吸收入党，他们积极学习暹罗语文，以便同暹罗人民联系。有的青年进暹罗学校读书，如阿碧（化名阿天）、阿乡（化名阿宋）等，暹罗文的水平相当高。

在乌隆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逐渐发展到各地。

一九三一年，乌隆省委书记阿廷病故，同志们选我继任。当时，我对暹罗语文已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了，省委分工我负责共青团和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三一年底，国内面临白色恐怖。义静苏维埃运动遇到许多困难，河静省委的几个同志由裴姜带路来暹找党联系。自此，在暹罗的越侨党组织增添了支援印支革命这一重大任务。

这时省委的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宣传鼓动暹罗群众干革命。二是支援印支革命。

关于宣传、鼓动暹罗群众干革命的工作，完全由暹委领导，不用多述，这里只谈支援印支革命的工作。

\*\*

**暹委把支援印支革命工作交给越侨党组织负责。**

在裴姜(柳汉)、黎禄、陈趋等同志从河静跑来暹罗后，省委就让他们到乌隆休息，恢复体力，同时让他们向省委通报国内情况。这时正好伞英同志被中国云南当局驱逐经缅甸来暹。他以前曾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的领导干部，参加过统一越南共产党的会议。在暹罗工作的同志对他很信任，知道他很有能力，常在胡主席身边工作，并得到胡主席的信任。省委和伞英同志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应当成立一个班子，由暹共几位同志和刚从国内来的几位同志组成，负责促进支援印支革命。这个班子的任务是：

一为国内撤出的同志安排食宿及其他生活条件，保证其安全。

一为理论水平不高、工作经验不多的同志开办训练班，使他们以后回国工作得更好。

——为从国内撤出的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尽快重返祖国开展工作。

至于这些同志与印支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底，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联系的问题，省委将向暹委汇报，并建议尽力协助解决。

事后，我们安排伞英同志去中国，同时把上述的意见向暹委报告。暹委完全同意把支援印支革命看作是暹罗共产党的国际任务，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乌隆省委。

一九三二年初，乌隆省委分工阿进、阿海组织印支援助部以推动各方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印支援助部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

#### **一保证了国内撤出的同志的生活。**

动员侨胞积极为国内撤出的干部提供食宿，并捐赠暹币五千多元支援国内革命的各项开支。(当时暹币与印支币的比价是一比一。)

这些撤到暹罗的同志，有义静苏维埃运动的参加者；有义安曙光集团革命者，他们是与当时义安省委有分歧意见的一些党员。此外，还有在老挝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当局追捕而跑过来的一些人。这些人都得到侨胞提供食宿及其他生活条件，以后经组织安排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待机回国。

#### **一为他们开办训练班。**

撤到暹罗的多数同志，都有很高的热情，但因为在国内

忙于斗争和对付敌人的迫害，许多人没有学过革命理论。我们用黎禄、陈趋从国内带来的印支共政治纲领、党群众组织章程作为学习的主要文件，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方法。对在暹罗的同志来说，这些文件也很宝贵，因为自从暹共成立，暹委尚未提出明确的纲领和党章。因而旅暹许多越侨党员也跟国内来的同志一起学习。此外，省委还提供了一些国内没有或很难找到的文件，如《革命的道路》、《沉船日记》、《俄国的榜样》、《人类进化史》等，这些文件是胡志明主席编写，并曾于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间向我们旅暹的同志讲授过的。

学习的方法是学员阅读文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教员只作提示和结论。原河静省委委员黎禄、陈趋等同志水平较高，既参加学习，又当教员。为遵守保密原则，我们把曙光集团、老挝来的和义静来的几批学员分开为几个班。

### 一安排一部分同志回国活动。

安排干部回国之前，在那空的万迈召开了一次会议，有阿海、阿进、黎禄、陈趋、裴姜等人参加，我以乌隆省委书记的名义出席。会上，阿海宣布暹委同意成立印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印支共的各项工作。委员会成员为阿海、阿进、黎禄、陈趋、裴姜等五人，阿海任书记。我听后感到这不符合暹委通过的方针。暹委的方针是：“从国内撤到暹罗的同志与印支共中央联系将由暹委协助解决。”但阿海说这是暹委的意见，我只好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

印支共产党机关成立后，阿海常到那空去会见从老挝他曲来的人。我一直认为这是印支党的事，没有过问。但向暹委汇报后不久，暹委表示，这是阿海提出的个人意见，不是暹委的主张，责成阿海作检讨，给他处分和撤销他在印支援助部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四月，黎禄和另外几个同志回国。当他们回到国内不到几个星期，还来不及进行活动就被捕。此后，裴姜又奉派回国了解情况，但没有做多少工作就暴露了，不得不跑回暹罗。

一九三三年初，组织上派陈趋同志回河静。工作有所恢复，但不久他也被捕。

从河静来的几个同志被捕后，乌隆省委改组印支援助部，由阿进、三督、阿才三人组成，继续进行各项工作，阿进任该部主要负责人。

一九三三年底，印支援助部派矮黄回国摸情况。在他积极的活动下，办了一个十五人的训练班。后来他患重病，送进荣市医院，不久在那里病逝。

一九三四年，三督和裴姜返回义静。裴姜在河静进行活动，不久被捕。三督在义安联系上未被捕的及刚出狱的同志，成立义安省委，并与旅暹的印支援助部取得联系。

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在澳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三督被选为中圻代表出席大会。

**一推动老挝的革命运动**

一九三〇年，烏隆省委幫助在万象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分會建立印支共產黨支部。當老撾革命運動遭到鎮壓時，印支援助部派阿鎮、阿指兩同志到老撾的布寧和豐鳩活動，並與在他曲、沙灣納吉和巴色的越僑組織取得聯繫。

一九三四年九月，印支援助部領導着万象、豐鳩、布寧、他曲、沙灣納吉和巴色的黨組織，並派出代表出席成立老撾地區臨時黨委的會議。

一九三五年，印支共產黨在澳門召開大會，老撾地區黨委派阮文蘇代表老撾參加。

通過一九三五年三月印支共產黨國外指揮機關在澳門召開的印支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可以看出，烏隆省委所進行的上述各項工作對鞏固黨的隊伍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 \* \*

在暹共方面，暹委成員也有變化。一九三三年底，吳正國在曼谷被捕，暹羅當局把他引渡給法國，我被指定參加暹委，到曼谷直接參與暹委的工作。這使我感到十分振奮，但是到曼谷後怎樣才能找到職業却不是易事。我在東北地區教學，由組織提供食宿，有時合作組的同志補助四五塊零用錢。而這次組織調我到曼谷，發給我四十塊錢，食宿要自理。這是總的規定，以前組織派其他同志到遠地長期獨立工作，也是發給這樣的一筆錢。

到曼谷工作，對我來說，語言問題並不很難，我從一九三〇年轉為暹共黨員後，努力學習暹羅語文。我一面自學，

一面请暹文水平高的青年教读音。我经常找公民教科书和好几种日报的文章、新闻来读，请他们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并反复大声逐句地咬准字音如同广播那样朗读多遍。还记得，一九三三年披耶帕宏·逢帕啾哈舍那任暹罗首相，为了准确地称呼他的名字，我练了几个礼拜才把他的名字读得像暹罗人一样。

最困难的还是生计问题。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儒学人家，长大上学，然后参加革命，我没有任何专门的手艺。

初到曼谷，暹委安排我暂时住在一位教私学的华人家里。住了不多久，我看到这位教师的收入还不够交房租和养家小，我必须自己尽力找到职业来解决生活问题。后来反复琢磨，发现卖报不需什么技术，也不要许多本钱，既能维持生活，又能接近群众。凭着手中的四十块钱，我只能干这一行了。

当时，曼谷有两种日报。向报社批购小报，每份半分，可卖一分。大报每份三分，可卖五分。

初次卖报，我还不惯于在人多的大街上叫卖。第一天，批了五十份小报，象学生夹书包那样夹在腋下，挨家挨户到人家门前卖报。结果只花两个钟头就全部卖完，赚得两角五分。

但是这种卖法只能维持几天，以后送报上门人家也不买了。于是我得学别人那样在街上叫卖。第一步试在行人很少的一条马路上叫卖，过了两三天，逐渐习惯了才走到人多的街上叫卖。

卖报的人经常是大清早到发行处批购几百份报，急速跑到各处叫卖，每天能赚两三块钱，足够养家。但对我来说，每天能赚五、六角钱就够生活了。我不需要跟其他卖报的朋友竞争。每天早晨，我到发行处，先取一张报纸看有什么吸引人的新闻，如有，就买他三四十份大报；如无，就买他二十到二十五份。我卖报时，从容地走在街上，清楚地叫唤那些能吸引人的新闻内容，这样，即使经过别人叫卖过的街道，也能卖出去。平均每天能赚五六角，有时能赚到一块钱。自此，我的物质生活不仅能自给，而且相当不坏。房租每月二块，在街头饭馆吃饭每月三到五块，抽烟每月一块五，剩下的钱用作进行活动的车费、零用费和防不时之需。每天卖报只花三个钟头，我卖完报回住处洗澡、洗衣服，然后到公园、广场休息，或去工作。

当时，在曼谷的越南人干部只有我和阿曾。由于暹委书记害病，阿曾代理书记，负责与印支共产党国外指挥机关联系和有关支援印支革命的工作。我负责暹委的宣传工作。工作不算多，经常抓各地党组织出版的报刊，并把华人党员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节所写的文章译成暹文。此外，在卖报或与暹罗工农劳动群众接触中，也进行口头宣传。

一九三四年，暹罗革命运动有所发展。在曼谷，爆发了碾米厂工人、铁路工人和汽车司机的三次罢工。罢工的工人大多数是华人，也有一些暹罗人，这些罢工大多是自发的，

华人党员在斗争中只起了部分作用。

在东北地区，越南人党员的活动跟暹罗人更为接近。虽然共青团、工会、农会的成员不多，但各地都有了组织，并已出现农民要求减税、反对劳役的小规模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有数百人参加的呵叻中等师范学校学生反对苛刻的住校制度和反对禁读报刊的斗争。这次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

总的看来，群众的斗争已进了一步，但斗争的方向还不明确。经常性的活动还是在国际性的纪念日发传单、挂红旗，或在小范围内集合少数人号召起来干革命。

从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开始，暹罗当局就对共产党进行镇压。在曼谷，华人党员在华人社会中活动，有的同志也遭到逮捕，但华人很多（曼谷有一百多万），较易于隐蔽。至于东北地区，越侨集中在那空、沙功、乌隆几个地方，每次搞活动都有越侨被捕，因为当局认为只有越侨才搞这些活动。警察经常将在街上捡到的传单，冲到越侨家中，出示传单抓人。这种情况使越侨很担心。老是这样下去，每发一次传单就有人被捕，人越来越少，今后怎么办？大家都在心里打鼓。直到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在挽塘监狱里，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但也得不出任何结论。有的认为没有暹委在场是无法进行讨论的。

一九三四年，在香港的国外指挥机关经常寄一些报刊到暹罗。《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提出要有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有

一篇文章还批判某同志主张刚恢复党组织的地方不应立即组织群众斗争是右倾思想。

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战略、策略思想，但总感到这种活动方式在华人社会中，或者在国内有成千上万群众的条件下，还可能进行隐秘的活动；但在东北地区，越侨总共只有两三万。在较为集中的地方如乌隆、沙功、那空等地，也只有几千人。如果遭到暹罗当局的镇压，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肯定要垮。因此，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当阿曾到香港参加印支共国外指挥部扩大会议时，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交换意见，建议他向党的领导同志反映。后来阿曾回到曼谷，仍按《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提法，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斗争。我的这些想法，直到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会见何辉集同志时，才有机会直接向他作充分说明。

我在曼谷负责暹委宣传工作一年多，虽然也做了一些事，但多次患严重头痛病。一九二三年，我在县里上学就有这个病，一受阳光曝晒，就晕眩头痛，要经常戴墨镜。在广州训练班，也常犯病，天天吃药。来曼谷两年，我因急性头痛三次住院。因此，我向暹委申请去中国治病，当时我认为中国医疗条件可能比暹罗好，同时我还可以找到我的一位爱国同乡胡学览先生，请他帮助我安排就医。

经暹委的同意和帮助，约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初，我离开曼谷去中国。

## 第三部份

# 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岁月

(1935—1942)

我在一九二六年到中国，在广州住了大约两个月，进了训练班，并参加青年革命同志会，随后回国工作。这次，经暹委同意到中国治病，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我不得不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二年，总共七年留在中国工作。为了便于叙述，我把各项活动按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南京到昆明，第二阶段从昆明到北坡。

### ● 第一阶段

### 从南京到昆明

(1935—1939)

这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五年三月离开暹罗到一九三九年初。活动的内容按下面为次序分述：

- 一去南京的路上。
- 一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
- 一在南京的生活和斗争。
- 一与暹委失去联系，留在中国。

## (一)

### 去南京的路上

一九三五年初，我得到暹委批准到中国治病，与曾白头一起乘船到香港。

坐海船越重洋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天海一望无际，未来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船快到香港，曾白头拉我上甲板，倚着船栏对我说：到香港后我们就分开。我又路熟，又懂话，不会有什么困难。你虽然路不熟，话不通，但问题也不大。船一靠码头就会有 很多小船和汽艇来接客人，你随便上一条汽艇，他们就把你送到旅馆。在那里，你买一张《商报》查看船期广告，就在旅馆买去上海的船票，要买最便宜的统舱票，要注意买泊在英租界的船票，不要买泊在法租界的船票，免得出事。到上海后，坐人力车去北车站，那里是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站。你到南京后，再雇人力车到三山里十号，就是胡学览先生的家。

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容易。刚踏上开往上海的船，我就发怵。一般买统舱票的旅客在上船之前都买

好咸萝卜、酱豆腐等食物，并自带被褥。他们提早上船占着好的位子，少受风浪之苦。这些我完全不懂，一下统舱我就愣住了，好的位子都给人占着，铺上被褥，剩下的位子对着风口，是人们进进出出的通道。早春季节的天气还较冷，阵阵海风吹来，身上冷嗖嗖，真不知如何是好。

一位广东老太太猜到我内心的不安。打过招呼后，我称是广东华侨，第一次回国，她很同情我，极力给我帮助。她找来船上的服务员，为我花两块钱租了一张折叠床，花五块钱订了五天的份饭，她还借给我一床被子。在整个旅途中，我有什么难处她都积极帮助。

船到汕头，泊岸几个钟头，在上客、上货，增购供应旅客的食品的时候，忽然一位少女来到面前，递给我一把扇子。我不理会，天这样冷她干吗要送扇子，我感到纳闷。幸亏那位老太太用广东话同少女讲了几句，少女才走开，她走到别的旅客面前又伸出扇子，人们不吭声，表示不要。最后，有一位成年男子接过扇子，打开来看，说了一句什么，少女便转头招呼一个弹琴的男子过来。接着升起琴声和歌声，唱得很好听，船上的人都侧耳静听。唱完，那男子给她几角钱。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卖唱的歌女，她的扇面写着歌名和曲牌，供人点唱。

\* \* \*

轮船到上海，看到高楼大厦栉比耸立，宽广的马路，车辆往来如梭。河岸行人麇集如蚁聚。美丽的景物映入眼帘，

但我的心中忐忑不安，又喜又愁。当船转头泊岸，我忽然看到一座大楼上面飘着三色旗。糟了！这是法租界！不知为什么买船票的时候他们说是泊在英租界，而眼下却泊在法租界！事到如今，只好处之泰然，冷静地想办法应付。

过去，我听说胡伯伯在上海曾被抢劫的事：他也是从香港到上海，船一靠岸，他雇了一辆马车去住地，不料这辆马车是劫匪用来骗乘客的。他们把车拉进一条小巷，停下车来，叫胡伯伯到小巷尽头的一间屋里，几个同伙就动手搜身，搜遍了只有五块钱，他们骂了一声“穷鬼”，并报以一拳，把胡伯伯推了出去。事前，胡伯伯就知道上海劫匪的一些招数，他把几百块钱都藏在袜子里，没有被发觉。我也学他这个经验，把几十块钱严严实实地藏好。因此并不怕遇劫，只怕在法租界发生意外。

上岸后，我提着装有一条短裤和一套内衣的手提箱，从路旁等待接客的一长串人力车面前走过，神态自若，象对上海很熟悉似的。走了几百米，有个上了年纪的人拉辆空车慢步走着，看样子是个善良、老实的人。我立即招手叫他过来，坐上车后，从袋里取出早就写好“北车站”的纸条给他看，他点了点头，立刻拉走。穿过几条街，忽然一个身体壮实的人拉辆空车和我坐的车并排走，两个拉车的人交谈了几句什么话。我一怔，正在想法子，两辆车却同时停下。老头指着那辆车，伸出两个指头，又把手掌伸到我面前。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两角车钱。这时才弄清楚因为路远老头拉不动，他把

乘客转给别人。这在手拉车的行业中是常有的事。

过了几条街，从法租界到华界，又走了一段路，前面一座建筑物出现“北车站”三个字，这就是上海车站了。车夫在站前把车停下，伸手要钱。我把轮船上换来的几块零钱掏出四角给他，他摇摇头，我再给两角，他还是摇头，我再加两角，他点了头，高兴地笑笑，拉着车走了。

\* \* \*

在北车站，等了大约三个钟头，才买到去南京的车票。将到南京下关站，许多旅馆服务人员跳上列车争拉旅客。有一个人走到我身旁，问我要不要住旅馆？我点点头，他就把旅馆标记贴在我的箱子上。这样，从车站到旅馆一切就由他们负责安排。

这是一家中等旅馆，座落在离车站约一公里的一条小街上。我到达时约在下午七八点钟，旅馆的工友把我带到指定的一个房间，隔了一会儿就有人送饭来。饭后我正准备休息，一个成年妇女提着一只红漆木桶进来，放在床下，一句话也不说就转身走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妇女，我以为她也是来收拾什么的工友，不料她过来紧靠着我坐下，讨好地对着我笑，伸手搂着我。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妓女。我立即站起来，轻轻地把她推出房外，关上门，环顾了一下周围才躺下睡觉。

到了南京就已抵达目的地，这时不用担心会出政治纰漏了。但明天怎么办？能不能按曾白头所说找到胡学览先生？找不到他又怎么办？想来想去，已到深夜，也就一觉睡到天

明。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便做出门的准备。约七八点钟，旅馆工友敲门进来，问用不用早餐。我摇摇头，拿出早准备好的一张中文字条，大意是请旅馆代雇一辆人力车，拉到市内三山里十号。他立即出去拿单子来结账：

房费三元

晚餐费一元伍角

行李费伍角

马桶费伍角

我看后，不知道什么是马桶，便在这项费用旁边画个问号。他指着昨晚工友放在床下的红漆木桶。我又写几个字问这桶作什么用？他笑着打开桶盖看了看，又盖上，用笔划去“马桶费五角”。我付了五元账，对我来说，这已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大开支了。后来我才知道，马桶就是便桶。

从下关到胡学览先生的家大约九公里，乘公共汽车只需一角钱。乘人力车当然要多花钱，但也得到浏览景物的好机会。一个多钟头后，车到三山里胡家。我付过车费，便去按电铃，一位成年妇女来开门，她是胡学览夫人。她说了几句中国话，我听不懂。我用越南话问：这是胡学览先生的家吗？她知道我是越南人，便用越南话问我：您从哪儿来，有什么事，来这儿找谁？我说：我是胡学览先生的亲戚，顺路经过这里，想来探望他。她带我进屋。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胡先生在家，进去就见了面。

胡先生是我的同乡，他是胡伯温的孙子。伯温老先生曾任南定省按察，一八八三年在抗法守卫南定城时牺牲。他又是胡松茂同志的叔叔，他的母亲就是文绅运动时期积极参加革命，被捕后在严刑拷问下坚贞不屈的阿绸婆。我在十六七岁时，常到阿绸婆家听她讲革命轶事，对她家的情况甚为了解。见到胡学览，当然谈到他家里、村里和国内的情况，并转达他母亲嘱托我出国有机会见到他的一些话。谈了好一会，胡学览对我有所了解，他劝我安心住下。

## (二)

### 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

当时在南京有二三十个越南人。有从事革命活动的，如胡学览的未成亲女婿黎铁雄和刚从国内出来住在一个华侨家里的高鸿岭；有同情、拥护党的，如胡学览一家以及反对阮世业、武鸿卿一伙从云南来的越南国民党人士东阿、杜登程、黎国柱(黑柱)和徐志坚(隆弓)；有态度暧昧的，如刚从法西斯德国来的陈仲克；也有在暹罗当过法国密探的邓元雄。此外，还有越南国民党的一个办事处。为首的是韦登祥(又名韦正南)和一个准备进蒋介石特务学校的青年严继祖。邓元雄、陈仲克和胡学览先生住在同一幢房子。黎铁雄在交通兵团当排长，两三个星期才回一趟家。

一九三五年四月，又来了阿海和阿文两人。阿海一九二

六年同我一起参加过广州训练班，以后经介绍到苏联学习。阿文是一位暹罗同志，受过党的影响，曾参加散发反对暹罗独裁政府的传单，我在曼谷见过他几次，这次是重逢。

过了一段时间，我同阿海交换意见，决定在胡学览家办一个训练班。我、高鸿岭和同情党的几个越南国民党党员参加，由阿海负责讲课。

一个多月的训练班，给了我很大的收获。参加革命十年，包括在广州训练班学习，这一次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如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同盟军、统一战线政策、苏联革命斗争经验、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我在每次课后，综合听讲的内容，用泰语讲给阿文听。

一九三五年八月，被暹罗政府驱逐出境的阿恰、阿术、阿大、阿其(黄森)、阿桢、阿德、阿禄、阿论等人从曼谷来到这里。在这以前，胡学览先生只担负我们几个人的食用，现在又来了八个人，生活多数由他负担，担子真不轻，但他仍然心甘情愿，经常还劝大家不要在意。

\* \* \*

约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小个(即何辉集)到南京。他是党驻外指导机关的代表，我早就想同他见面，这次总算见到了。

当初我向暹委申请到中国治病时，是想请胡学览先生帮助我找医院治疗十多年的头痛症。但更重要的是想找机会见到党的领导机关的同志，听取他们对暹罗革命工作的意见。

事实上，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组建暹罗共产党

后，便匆忙赶赴马来亚，来不及对各项工作给予具体的指示。仅就旅暹越侨党组织来说，在援助印度支那革命方面做得很不错。但从暹罗革命工作来说，越南党员怎样做才能适应侨民的处境却是尚未明确的问题。一九三一年阿廷去世后，我继任乌隆省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到曼谷工作，并参加了暹委，负责宣传工作。实际上，我与在暹党成立时任暹委委员的第一任越南人曾白头一样，感到惘然，还没有找到开展工作的路线。

一九三四年，党驻外指导机关在香港成立，我同曾白头商量派一个干部去向指导机关汇报和请示。这个人从香港回来，提起工作问题他含糊其词。指导机关拨给我们五百块钱他不报告，私自装进自己的腰包，随便乱花。后来，曾白头又去找指导机关，回到曼谷后我问他有关越侨党组织在暹罗革命中的问题，他只说：“还是按党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提出的精神，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斗争。”

一九三四年是旅暹越侨遭到白色恐怖的一年。在那空、乌滕、帕农、芒木等地，暹罗警察把传单塞到越侨家里，然后，借口进行逮捕。当时，暹委与指导机关的关系，按曾白头说，共产国际把帮助指导马来亚党和暹罗党的任务交给指导机关。现在曾白头传达指导机关这样的意见，越侨活动的方向依然不变。我听了以后，怀疑曾的汇报是不是把暹党工作成绩夸大了，而没有摆够存在的困难。有了这样的考虑，我决定向暹委提出到中国治病请求，并找机会跟党在国外

的指导机关联系。

因此，见到“小个”时，我非常高兴，把这看作是一个直接向上级汇报暹罗革命情况的好时机。

会见“小个”，我作自我介绍，并说得到暹委同意到中国治病。他说：你的历史和要求我们都知道了。我说：我的历史肯定你已清楚，但我的要求你不一定全都了解。还是让我说吧：

我这次向暹委请求到中国是想请胡学览先生帮助安排就医。但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了。第一胡先生的薪金并不多，还要给我们资助。这里十几个人都没有职业，生活全靠他资助。第二南京的医疗条件很差。在曼谷，我几次到医院看病，都被列入医院“乐善”减费，伙食和医药费用跟一般住院差不多。南京没有这种制度，设备较好的中央医院、鼓楼医院，一天花费最少是五到七块，我哪能找到这样一大笔钱来治病。因此，我现在不再考虑治病问题了。

“小个”说：我们也考虑过你的治病问题，准备安排你跟阿文、阿海一起去苏联，一面治病，一面学习，同时还可以帮助阿文学习。阿海告诉我说，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现在去苏联的交通困难太大，肯定还得等一段时间。

我说，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但我还有另外一个要求，请你允许我再谈谈有关暹罗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三〇年，暹罗共产党的成立主要是由华侨党组织和越侨党组织两部分合成。华侨同志在暹罗群众中没有太多的基础和影响。越侨在暹罗群众中影响较大。在许多地方，暹罗群众要进行抗税、抗劳役斗争，都去找越侨干部来领导；在教育界的一些进步教员很钦佩我们，希望我们帮助开展工作；一些越侨的暹罗人家眷愿意跟我们走；真正暹罗人的党员为数不多。旅暹越侨总数约三万人，但经我们组织起来的只有几千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暹罗当局完全掌握的一些地方，如乌隆、沙功、那空帕农等地。如果我们的活动方式还跟过去一样，每逢一些重大的纪念日，如十月革命、五一劳动节或广州起义、义安苏维埃纪念日就散发传单；集市上仅有二三十人也举行罢市；地方上有二三百人也搞示威等。要是暹罗政府采取塞传单到越侨家里来借口抓人，甚至采取更毒辣的办法把所有越侨都抓起来，象一九三〇年九月在彭世洛府披集所干的那样，那么我们的革命基层组织肯定难以保存，对暹罗革命的贡献将会削弱，支援印支革命也将受到难以估量的影响。

我同曾白头交换过上述情况的意见，我觉得应该向指导机关报告请示。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向你们汇报？

“小个”说：老曾向我汇报了有关暹党革命活动的情况，但没有象你刚才这样提出问题。今天，听你讲清楚了，使我看到有许多值得考虑的地方。但现在不能立刻给你答复，等我们讨论后，有什么意见再跟你谈。

\*\*\*

谈完暹党的工作，“小个”就胡学览先生拟在南京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的事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这件事胡先生已经跟阿海和我交换过意见。他的目的要使我们在这里的人取得合法政治地位，同时也想取得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帮助。我想，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做到这些当然很好，但我也琢磨，阿海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活动很积极，阿海究竟有何意图？对他这个人，我还不怎么放心。

“小个”打断我的话，有点吃惊地问道：怎么不放心？

说到阿海，我要讲几句。一九二六年他跟我一起参加广州训练班，化名P. V.。那时，我就感到他爱吃喝玩乐。多年不见，我以为他有很大的进步。但这一次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看到他身上有许多地方与革命者的品德不相称。比如：一男女关系不严肃。经常爱在妇女面前讲些淫秽的话。有一天晚上到公园玩，他看到有个青年妇女坐在石凳上，便跑上去坐在人家旁边，我和阿文感到很不好意思。又有一次上街，他看到一个女学生迎面走来，便快步向前，挽住那姑娘的手。他甚至还谈到他与别人妻子私通的事。他这样讲是为了显耀自己追逐女性的本领。有时说过了头，竟吹嘘他老婆的本事，说他老婆在一次从河内到南定的列车上，怎样同乘警调情，躲开了乘警的盘查。

一斗争中缺乏原则性。首先我要讲他同陈仲克的斗争。陈在东游运动时期出国，后为日本驱逐出境，到中国后得潘佩

珠先生帮助赴德学医，毕业后为医师。这次来到中国，得到他的同学福建省省长陈仪资助几千元，准备在南京开一家诊所，收费看病。他知道在暹罗搞革命而被驱逐出境的一些同乡生活上有困难，由胡学览先生一人资助，但他装作不知道，不予过问。阿文发高烧，就躺在他房间外面，他连一句话也不问。他的理论是病人需要医生，医生不需要病人。这种人很坏，实在应受指责。有一天，阿海同几个人商量要用武力迫他出钱帮助大家。我不赞成，但从云南来的几个人却同意。阿海利用我外出的机会，得到胡学览夫人的支持，带着从云南来的几个人去威胁陈仲克。我从街上回来，听到楼上有很重的跺脚声，上去一看，只见阿海他们几个人手持简陋凶器，气势汹汹瞅着陈仲克。陈十分害怕，愿出二十块钱。我觉得这是一种毫无政治原则的行动，如果不过问，将有损党的威信，便立即进去说道：

“陈老先生，我们在这里遇到困难，很需要得到帮助，但我们党从来不主张采取威胁的办法来取得帮助。这些钱请你留着，往后如你自愿资助再拿出来。同志们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党的主张的，请大家下楼去，有什么事我们再商量。”听这么一说，云南来的几个人撤了，阿海也撤了。

又有一次是同邓元雄的斗争。有一天，邓元雄请云南来的几个人下馆子，企图离间党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个人向我们讲了这件事，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主张直截了当拒绝邓的邀请。阿海却主张尽管同意，下馆子时，专点价钱最

贵的酒菜，在经济上给他一个打击。从云南来的几位都是刚刚有些革命觉悟，跟随党走的人，还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他们认为阿海有本事，是领导人，随即接受了他的意见。在下馆子的前一天，他们去了解菜谱和名酒，以便第二天点菜。但邓元雄也不是好作弄的，大家点菜时，他一声不吭，接着转身走进厨房，通知另做几个便宜菜。当工友拿两瓶酒来，打开一瓶，他就把另一瓶抢过去，看了商标后说不开了。这就使原来的打算无法实现。他们立刻站了起来，骂邓元雄一顿，离席而返。这个行动对邓元雄固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政治风度上，正派的人是不会这样干的。

一政治活动中有可疑之处。有一天，阿海对我说：他们（意指党在国外指导机关的同志）说要来，为什么过了几个月还不见有人来，可能在香港出了事。我们得带从云南来的几个人去上海，同时设法了解香港的情况。我说：这件事要组织决定才能走。阿海不听，仍通知云南来的几个人准备好油印机和行李就要走。我和黎铁雄一商量，认为要劝止他们，否则出了问题就不好对党交代。

我们商量后就找阿海他们来谈话，指出去上海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不能同意，因为党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劝他们别去；如果一定要去，那是他们个人的行动，出了什么事党不负责。这几位同志听后都不去了。阿海也只好算了。

通过以上几件事，我感到阿海可能是个蜕化变质分子。不知道他同你们在一起工作时，你们有无觉察。

讲完，“小个”拍拍我的肩头说：对！你有政治眼光。本来我们不打算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但现在你已看到了，我得对你讲明：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参加训练班一段时间后，他被介绍到苏联学习政治，接着又学无线电通讯技术，总共七年。在学习期间，他爱上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俄国姑娘，同学们和同志们都劝他不要娶这个姑娘，他偏同这人结了婚。他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后，向法国党发出一份电报，批评法国党不尽力支持印支革命。法国党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请苏联方面帮助了解，过了很久才知道是他胡搞的。他从苏联回国经海参崴，因为海船开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他竟擅自返回莫斯科看老婆，然后再买票到海参崴。由于他这样乱来，我们便不让他参加党代表大会。他心怀不满，秘密和法国驻香港领事联络，企图逮捕出席大会的全部代表。法国领事向他提出事成之后的交换条件是奖他五万元，给他到欧洲各国旅游一趟。他没有预料党代会不在香港召开，而是在澳门召开，扑了个空，谁也没有抓到。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想混在革命队伍中。但我们已经派人盯住他，并更多地掌握了他的活动。党代会后，我们追问他，他只得承认，但又说：我看到党太穷了，想从法国人那里骗一点钱供党使用！我们问：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要写一封信给巴士杰（当时印支总督）那家伙，骂他一顿，切断和他们的关系，以后请你们让我去苏联跟我的妻子生活。党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们考虑，这个

意见可以接受，因为送他到苏联受管教比留他在这里要好。第二天，他交来一封早已写好给巴士杰的信，大意说：我一生忠于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手头拮据，想骗你们一笔钱，不料你们竟愚蠢到认为这是能够破坏革命的一个机会。信的后面，他画一个人脱着裤子，旁边写了一句：巴士杰咬我的……我们把信寄给巴士杰，并要阿海带阿文到这里等待去苏联。现在去苏联困难很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程。

\*\*

谈完阿海的事，“小个”接着说：我这次来是为稳住他的思想。同时，还想了解几位被驱逐出境同志的情况，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被暹罗当局驱逐出境到这里的共有八人，阿伦、阿德是一九三一年从国内逃出，我见过两三面，情况不了解，其他的都是很好的党员和群众。目前留在这里，政治上有胡学览先生给我们担保，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经济上继续让胡先生负担恐怕不妥当。我的意见是如有可能，应安排他们去华南找工作，能都走最好，不然也应解决一部分人的去处。可能的话，你取些钱送给胡先生以减轻他的负担。

“小个”说：我考虑了，眼前在华南也有很多困难，可以带走几个人，其余还得留在这里。你在这儿可请胡先生帮助他们找工作，特别要在政治生活方面帮助他们。要设法稳住阿海的情绪和注意他的行动。胡先生想成立革命组织，向政府当局登记是一个好主意。你可以继续同阿海商量，协助胡

先生搞起来，但必须保证使它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具有反帝性质的群众组织。我同阿海也这样讲过，你不必顾虑。

几天后，“小个”离开南京，带走了阿术、阿大、阿其、阿楨、东阿和杜登程，人走了一半。我同另外几个人继续留在南京。

### (三)

## 在南京的生活与斗争

冬天到了，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是大伙住的问题。原来在暹罗来的同志暂时安顿在靠近下关站挹江门对面新民村的一个贫农家里，离胡家六七公里。住的房子是上露着天，四面通风，夏天还能住人，冬天就无法御寒了。我和阿恰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南京才在市中心离胡家不远找到一间便宜的住房，每月房租、水电费六块五。

接着，要解决冬衣问题。大家都是从热的地方来，没有冬衣。我想，这件事不便再麻烦胡先生了，只能设法向邓元雄借点钱。他说：我哪有钱借给你们。第二天，他交给胡夫人三十块钱，并说了一些有意转告我们的话，他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是知道“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我资助他们两个月，每月十五块，两个月后，他们还找不到工作，我就不管了。胡夫人接了钱并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我说，我们非常感谢胡先生和夫人对我们的帮助。强祗不是革命者，听到有几个同乡被驱逐到这里还寄来一百元资助。邓元雄吃革命饭，

还要咒骂革命，我们对他并不感谢。

拿到了钱，我又和阿恰跑遍南京城购买衣服。冬天御寒的衣服涨价，钱不够；等到冬末冬衣减价了才给大家买了几件。越南有句话：“冬穿纱，夏穿补”，说的是穷人家生活的反常现象。这一次买冬衣使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意。

\* \* \*

有一天，午饭后，胡先生叫我和阿海去谈话。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人，多数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政治上又没有一个名义。名不正则言不顺。以前我就同你们谈过要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向这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登记，争取个合法地位。同时要求他们给予帮助，如果他们能象帮助韦登祥等人那样成立一个办事处那就更好。对这件事，你们商量得怎样了？

我和阿海说：我们商量过了，大家认为如能实现那非常好。我们准备起草一份章程请您过目。如您认为可行，我们立即着手开展工作。胡先生喜形于色地说：那你们就起草吧，写好以后，我看一看，我们一起来干。

几天后，阿海用越文起草了一份章程，由我译成中文，内容类似反帝同盟章程，组织取名“越南独立同盟会”。

胡先生看后赞好，按中国的习惯，组织的名称较长要有简称，他建议“越南独立同盟会”后加“简称越盟”四个字。

我们表示同意，并提出事前商量好的工作计划：

一由胡先生写信邀请在广州的阮海臣和另外两三个人北上，作为广东越侨代表。

一作为南京越侨代表出席的有胡学览、黎铁雄，邓元雄也作为南京越侨，如他不愿参加就罢了。

一黎国柱、徐志坚，作为云南越侨代表。

一邓文怡和我，作为暹罗越侨代表。

一阿海，作为旅法越侨代表。

一高鸿岭，作为国内团体代表。

不久，章程越文本和中文本修改完毕。

这时，阮海臣从广州同一个姓韦的越侨来到南京。我们把章程拿给他看，并按商量好的意见对他谈了这一组织的宗旨。阮海臣立即赞成，十分高兴地脱口说道：我们这样做，中国国民党中央一定会帮助的。成立了办事处，我就在这里活动，不回广州干算命那行业了。

\*\*\*

一九三六年初，胡学览先生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请求接见。随后胡学览、阮海臣、阿海、黎国柱和我一起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当时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陈立夫的代表接见。听我们说明后，他接受了呈文，答应将予以登记并向部长报告。就这样，越南独立同盟会的建立工作初步顺利通过了。

宣布成立“越盟”的会议在加紧准备。

经过办理交涉，会议得在中国国民党一个街区党部的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越南方面有胡学览、阮海臣等二十人。中国方面有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两名代表。越南国民党驻南京办

事处的代表韦登祥也应邀参加。邓元雄推辞，没有参加。

会议首先由胡学览致祝词，介绍“越盟”创立的经过，说明章程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登记，宣读章程和成立宣言。接着，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实际上是街区党部负责人）讲话，大意是表示欢迎这一组织成立。他提到孙中山先生遗嘱愿意帮助弱小民族，但他的提法仍认为越南先前是中国的属国。韦登祥也讲了话。会议介绍了几个负责人（只作介绍，不选举，看作既成事实），有胡学览、阮海臣和我们几个人。会议很简单，目的在于政治上使“越盟”进一步合法化，实际上是使当时在南京的我们这批人的政治地位合法化。

为了说明“越盟”在积极地开展工作，胡先生掏钱出版了一张小型中文刊物，取名《越声》，发行量约一百份，主要寄赠南京中国国民党各机关，同时也寄给广州和昆明的越侨约几十份。

\*\*\*

胡学览先生出面创立“越盟”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前面我已谈到他的来历，下面我再进一步说明他所起的作用。

东游运动失败后，胡先生从日本来到中国，到过许多地方，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潘佩珠身边，一直到潘老被捕。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我们在中国的同志遇到很多困难。这时，他在南京蒋介石的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他不参加青年革命同志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每当我们的同志遇到困难或危险找到他，他知道是共产党员，仍给予掩护

和大力帮助。

一九三〇年，伞英同志(义安省清章县人，原名黎鸿山)化名黎拔群到云南工作，被武鸿卿一伙向云南当局告密，遭到逮捕。他知道后，立即去见总参谋长朱培德，请电龙云释放。朱培德说，现在在中国的越南青年都是共产党。他直率地回答说：我们越南人来到中国主要是请中国协助打法国人。国民党帮助他们，他们就跟国民党，共产党帮助他们，他们就跟共产党。我不知道黎拔群是不是共产党，但我很清楚他是接受流亡日本的越南亲王强柢的任务从日本来的，因而肯定他是一个爱国者。请总参谋长电云南省主席龙云把他释放。朱培德沉思了一会说：你的话也有道理。那你给我起草给龙云的一份电报。胡先生当即拟就电报，朱培德签发。伞英同志获释后被驱逐出境，按他的要求让他去了缅甸，不久他来到暹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东阿同志在南京被宪兵逮捕，他供称来南京是找胡学览先生。宪兵对质时，胡先生说：在中国的很多越南人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们，要让我亲自见一见才能答复。见到东阿，胡先生确实不认识，但知道他真是从云南来的越南人，便把他保了出来，后来还帮助东阿进了中国国民党的骑兵学校。

他在南京国民党那里当了八年参谋，没有得到提升，一直是个中校。有人劝他托当大官的同学保举提拔。他说：我在这里做事只是找碗饭吃罢了。有饭吃就行，“士宁死于沟壑”

（《孟子》），我不想靠谁来提拔。

一九四〇年，他患重病在广西桂林住院，他的同学白崇禧去看他，嘱咐医院院长要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病，要服用贵重的药物就服用，一切花费由我（白崇禧）负责。他对白崇禧表示感谢说：现在越南的革命很需要帮助，您是大人物，希望您能帮助越南革命，至于我个人，别的同学帮助就够了。

他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儒学家，他准确地实践了儒学中的一些美德：“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和“仁爱”等等，他对我党和我党同志帮助很大。

他不是共产党人，这一点中国国民党完全了解，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创立“越盟”，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效的掩护。

当我们进行创立越南独立同盟，蒋介石正进行疯狂反共。尽管当时要求抗日的群众运动遍及全中国，但蒋介石的反动口号仍是先安内，后攘外：他们的行动还是宁错杀一百也不能漏掉一个共产党员。在南京，处决共产党人的雨花台枪声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中也有人去告密我们是共产党。韦登祥仇视我们拉走了他的几个“同志”，邓元雄数次搞阴谋想分化我们都遭到失败，对我们也十分仇视。正是他们向中国国民党提供情报，破坏“越盟”。因此，《越声》出了三、四期，胡先生没有钱只好停刊。阮海臣到处借钱却毫无结果，最后同姓韦的越侨一起回广东。于是各项活动停止。越南独立同盟会这个名称就只能出现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的登记册中而已。

过了四年之后，一九四〇年底，革命形势起了变化。在胡伯伯的直接领导下，桂林越盟海外办事处成立，胡学览先生任主任，范文同任副主任。中越革命文化同志会成立，胡学览先生和范文同以“越盟”正副主任的资格参加了这个组织的理事会，“越盟”的名声才为人所知，它的积极作用也才得到适当的发挥。

中国国民党不会给越南革命什么帮助是我们事先估计到的。因此，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我们经常考虑到要为我们的人找到职业。

一天，我们让阿德单独找邓元雄，托他帮助找个职业。邓元雄看到阿德有点傻气，可以拉拢，便答应帮助，但提出几条作难人的条件。阿德向我们作汇报，大家听了都感到气愤，一致决定要揭露他的面目。

阴历年节后的一个晚上，在胡家楼下，大家都到齐了。那时，阮海臣还没有回广东，他也到场。按计划，我们派一个人去请胡学览先生，请他把邓元雄也叫来，说大家有事要同他讲。胡先生见大家都来了很高兴，邓元雄见有那么多的人有点胆怯，但故作镇静，也坐了下来。

阿德先发言，他说：胡先生、阮先生和诸位！我们在这里呆得很久了，没有找到工作，尽靠胡先生给我们资助，我们很不好意思。最近我托邓元雄先生帮找工作。他答应了，但提出这样的条件：

一、要是同意，可以跟他一起住，负责他家里做饭、烧

水、洗衣服，打扫卫生。由他供饭，但要分开吃。

二、每月他付给两元工资，但不是按月发，而是由他代为保存，等离开他家到其他地方时才一次付给。

三、住在他家不准读书看报，不准同他人来往。

四、他还说，现在还不能立即住进他家，等到其他的人都离开南京，我可以借故留下，然后住进他家，免得人家说他搞分化活动。这真是一些带有侮辱性的条件。如果不跟他干，就老要靠胡先生的帮助，跟他干，就得离开大家，离开革命。我该怎么办？请两位先生和大家给我出个主意。

邓元雄一下子站了起来说：你吐完了没有？我对你讲的话，我都敢对天下人讲。说完他就想溜，但阿恰、阿禄、阿文已经一排站着挡在关上的门口，瞪眼看着他。他默然坐下，不敢动一动。

按原来的准备，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说：

邓元雄！你对革命者所讲的话，你说敢对天下人讲，那么你对密探、帝国主义者讲的，也敢对天下人讲吗？肯定你要瞒着。今天趁两位先生和大家在场，我得讲清楚，免得大家看错人。

你同许多人一起到暹罗（同一时间出国的有黎鸿峰、胡松茂等同志），别人都干革命，你却逃避革命到处钻营，借口多学些知识为国为民多做事，你到美国的一所基督教学校读书，出来后宣传基督教，还写信给印支总督求降回国。印支总督要你将功赎罪，你同意先当法国驻曼谷领事杜雄的密

探，每月领五十块钱(暹币)。你在暹罗陆军学校毕业后任准尉，驻在乌隆省坤广，秘密向法国提供有关越南人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报。后来因事情败露，你在暹罗呆不下去了，便跑来中国骗取胡先生为你找了一份工作。

你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了如指掌，但我们曾认为你已远离敌人，安分守己谋生就算了，旧话不必重提。不料你仍继续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当几位同志被暹罗当局驱逐来到这里，你认定他们会埋怨革命，就散布革命的坏话，受到这些同志的驳斥；当几位同志从云南来，你又认定他们不再支持革命，便想方设法拉拢他们，遭到这些同志的揭露；你交给胡先生三十块钱资助大家买冬衣，但又讲了一些很无礼的话，值不得反驳；这次阿德托你找工作，你竟提出几条作难的条件。难道你认为这样做就能够侮辱革命的人吗？不能！你在自取其辱。我劝你从今以后安分守己谋生，别再干那些肮脏的勾当了。

话刚讲完，邓元雄看到房门打开，可以脱身，尴尬地说了一句：“我不屑再听你们的话”，挤出房门，溜到楼上去了。

阮海臣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先生摇了摇头，轻蔑地望着他消失的背影。

大家找工作的打算实现不了，不得不又依靠胡先生在他自己生活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给以资助，因此需要作出最合理的安排，尽最大努力来减少胡先生的负担。我们在二郎庙为他找了一间小房子，让阿文在那里帮他做饭。这样，胡先

生可以省去一些房租，也用不着雇人做家务。在这以前，云南来的两位同志已到一位华侨开的洗衣店当洗衣工；还有我和阿海、阿恰、阿德、阿禄、阿伦等六人都集中在这个冬天刚租来的那间小屋里。这就使胡先生的负担有所减轻，大家的生活安排也比以前合理。我们对这件事是这样考虑，但对阿海却不一样。胡先生和黎铁雄每月资助我们二十块钱，花在房租、水电费上六块五，还有十三块五作为六个人的伙食费，生活水平当然是很低的。阿海是个过惯吃喝玩乐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不得不对自己有所克制，但经常躲开大伙，自个溜到外头吃喝去，并且常常流露出不满来。

八月前后是南京最热的季节。天气又热，生活又苦，阿海经受不住，向我们讲了实话，说他想到上海去，要我们给他帮助。我们同意了，并请胡先生资助他十五块钱，让他走。

后来得知他到了上海，在夜总会教舞女跳舞。一九三七年，国内报纸登载他被捕，判了十年苦役和十年监禁的消息。判得这样重，可能是因为他一九三五年在香港给巴士杰写那封信的缘故。

#### (四)

### 与暹委失去联系，留在中国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前后，党海外指导机关负责联络工作的冯志坚同志来信并寄来路费叫我去香港。

到了香港，他安排我住到一个工人家里，每月分担四块钱房租。他把我介绍给这家主人后，带我去吃饭并告诉我说：

最近，暹委通知说那边组织遭到白色恐怖，在东北地区越侨的基层组织大部被破坏，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他们要我们安排你立即去暹罗。现在只等暹罗的交通员抵达便可以动身。你要住的这个人家是个很好的工人，但你装作是个失业者，正在找工作，因为我们是这样跟他说的。

为了装作自己在找工作，我每天一早起来就出门，到中午才回来，歇过两三个钟头又出去，有时到晚上九十点才回来。几天才见冯志坚一次，他只说尚无音讯。一直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消息。冯志坚说，在这里等得太久不方便，你可先回南京。我说如果还要等暹罗方面的消息，最好先去广州，暹委一有消息我就动身，这样可以快一些。冯志坚说，最近我们把以前在南京的阿恰他们中的几个人调到广州来，不知安排妥当了没有，如果你也去广州就会增加困难，现在阿文还在南京，你回到那里可以帮助他。

于是我又回到南京。

\* \* \*

到达南京，正好碰上交通兵团招考学兵，我随即托黎铁雄介绍到那里去学开汽车。入团后，随部队到安徽芜湖集训。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接到胡学览先生来电叫回南京，我想可能是香港来了消息。但回南京后，才知道胡先生为我在他所在的总参谋部找到了一个司书的工作。司书专职抄录；我刚

到职，给准尉衔，几个月后提为少尉，月薪三十多元。这样，生活就能自己解决。

中国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满洲国后，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底红军胜利完成长征，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上海，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和史良公开宣传联共抗日，被蒋介石集团逮捕，以亲共的罪名在苏州审判。这一案件，人民称之为“七君子”案。在一次开庭审判中，七君子中的一人说：共产党人吃饭，我们也吃饭，为什么共产党人懂得必须抗日，我们就不懂得必须抗日？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深刻的分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作出保证后才被释放。

然而，南京仍然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进步书报几乎进不去，我们看到成千上万大、中学生的示威游行，而南京所有的报纸却一个字也不敢登载。偶而能看到《世界知识》杂志和上海出版的几张进步报纸，对国际局势和当时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所了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进军卢沟桥，威胁北平。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抗战。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攻破江阴炮台，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政府和所属各机关都迁往重庆，只有参谋部（当时改称军令部）迁往武汉。我是军令部的司书，当然要随机

关转移到武汉。

\* \* \*

在武汉抄录工作大量增加，用毛笔在毛边纸上抄写，用铅笔在复写纸上抄写，用铁笔刻腊纸，文件一大堆，有时抄不完，晚上要加班，十分疲劳。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上海失陷后武汉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许多知名人士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在这里。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民党不得不让共产党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书店公开存在。因此，每天午饭后，我常上茶馆，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边喝茶，边读报，把报纸从头到尾读完。晚饭后又到新华书店或生活书店找书看，需要仔细读的书就买一本回去。这段时间，我读了相当多的书。因此，对国际形势，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

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冯志坚来到武汉，告知与暹罗党的联系已完全中断。他对我说，要去向叶剑英同志通报有关陈豹的问题，并介绍我和阿文到延安去学习。

陈豹在暹罗时化名阿卓，专为我们参加暹委的同志当翻译。一九三四年他奉派去向党的国外指导机关汇报工作，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而且还贪污了党的经费。一九三七年我们在暹罗的干部全部被捕，他在曼谷鬼混，暹委派他带四十个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他带到香港后扔下不管，自己却到处转，四十人等了好久，钱花光了，只好去广州。有的不得

已跑到余汉谋的军队中去，他们不但不能参加抗战，还受到法西斯式的对待。一九三八年，陈豹来到汉口见到叶剑英同志，自吹是从暹罗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叶剑英同志热情接待他，送他一张名片。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他就拿这张名片来吹嘘。

冯志坚对叶剑英同志谈了陈豹的来历和行动，提出对他应加以注意。接着，他谈到介绍我和阿文到延安学习。

叶剑英同志表示欢迎，并说将由陈家康同志与我们具体商谈。

经过与陈家康同志几次商谈，我辞去军令部司书的职务，带阿文一起住进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等待。过了两个多星期，办事处的同志告知现在交通有困难，走不成了。我们只好设法离开办事处，阿文折回交通兵团黎铁雄处，我到湖南省省会长沙，同胡学览先生住在一起。

\* \* \*

蒋介石的参谋部撤离南京时，就委任胡学览为“留守主任”把他留下来。留守主任就是留下来看守机关的主任。胡先生看清了他们这种卑鄙的做法，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就带领全家和阿文到安徽芜湖，安置阿文在黎铁雄处后，自己来到长沙，在湖南省省长张治中兼任司令的军管区当参谋。

这时的长沙还是太平无事，而且相当热闹。一些进步人士来到这里，经常举办时事和有关抗战问题的讲演。如果这些集会在晚上举行，我也去听，因为白天要上街采购和给胡

先生做饭。

突然传来广州沦陷的消息，接着九江、武汉相继失陷。长沙的形势也紧张起来，街上乱哄哄，店铺大多关了门，各机关又要撤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军管区征用的两条运送疏散人员的大船（胡先生、陈豹和我都在船上）离开码头时，长沙发生大火，漫天烟火，日本飞机在上空不停地盘旋。

船到湘潭，这里的老百姓象在长沙一样，仓皇逃难，码头没有脚夫搬运行李。我在码头照顾正害着病的胡先生，陈豹进街区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副轿子来抬胡先生和几件随身行李，别的东西都只好扔在码头不要了。

徒步走了十天到新化县，读报才知道长沙没有被日军占领，而是汉奸造谣岳阳（距长沙约一百公里）失守，“保卫长沙委员会”中的长沙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下令纵火“焦土”。这次大火造成五万人的伤亡，烧毁不知多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后来下令“焦土”的几个汉奸被枪决。

继续步行十多天到达湘西通往贵阳公路的沅陵。在这里，我们遇到黎铁雄当副营长的交通兵团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许多人以前就认识胡学览。因此，我们可以逐段乘他们的车，转移到更远的大后方。

\* \* \*

路上，我们在贵州的黄平县停留比较久。这里环境安静，很适合胡先生病后的疗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继续与黎铁

雄那个营的一些干部保持密切联系，其中有两个进步的排长，经常阅读一些政治书籍，他们对书中不了解的名词，都找我们帮助解释。这是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原来蒋介石宣布抗日，国共合作形成后，左翼出版工作者用了一些新词代替对国民党刺眼的词，以便于书籍的发行。例如，用伊里奇或乌里昂诺夫代替列宁。用卡尔代替马克思，用布尔乔亚代替资产阶级。用普罗列塔利亚代替无产阶级等等。而他们只有蒋管区的中学文化水平，对这些词是不能理解的。

还有另外一位排长，文化水平更低，他爱上在农村的一位进步女教师，每次会面，女教师都请他买几本政治书籍。他想，给女友买书，要是自己完全不懂，问起来怎么交待？他只好努力先读，不懂的地方得问清楚直到能够掌握。这也成为我们在理论方面和对革命的认识方面给他帮助的机会。

只有几个月，我们就争取他们成为党的同情者，其中的一人名叫祈昆，明确表示想去延安。后来，我们见到胡伯伯，把他的情况作了汇报，胡伯伯把他介绍到贵阳八路军办事处。中国解放后，祈昆同志有机会与我们联系，才知道我们是越南共产党人。

胡学览先生的身体康复后，趁有顺路车可搭，我送他到贵州省会贵阳。通过从云南来的几位越侨的介绍，我们住在武鸿卿的家里。武是以越南国民党的名义在云南活动，后因杀人和敲诈勒索，为云南当局驱逐出境，带着家眷和几个越侨青年到贵阳定居。

武鸿卿早已听闻胡学览先生的名字，这次亲晤，对胡先生的纯厚，谦和，道德高尚甚为敬服。我伴随同行，自称是胡的侄子，武也相信我是信奉国家主义的革命者，交谈中颇为亲热，相许以后到昆明共商开展云南越侨工作。我们住在武家不到一个月，给他的家人和从昆明随他来的几个越侨青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初，趁有车去昆明，我向胡先生提出先走，他同意了。于是我来到昆明，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一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 第 二 阶 段

### 从 昆 明 到 北 坡

(1939—1942)

这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初抵昆明到一九四二年底离开中国回到北坡。这段时间的活动将按下列题目分述：

- 一在昆明的情况和工作。
- 一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广西。
- 一在龙州的活动。
- 一在靖西的活动。
- 一在平孟被捕。
- 一在柳州的斗争。

一准备回国。

前四部分已刊登在一九七五年河内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源泉》一书上，现保留原文，但每一部分加了一个小标题，使其与全文规格一致。

## (一)

### 在昆明的情况与工作

一九三九年初，约春节后一个月，我辞别了胡学览先生，从贵阳到了昆明。到达后同志们安排我住宋明芳家。这是一个从一九三六年就跟着党走的有革命觉悟的家庭。我学了一段时间的裁缝手艺，就到一家小缝衣店做工，在越侨青年缝纫工人中开展工作。后来进入斯泰(STAI)汽车修理厂做工，搞工人运动。但几个月后厂方察知我搞革命活动，便把我开除出厂。自那以后，我有时住在宋明芳家，有时住在杜登程家。后来冯志坚到昆明组建海外部，建立一个秘密机关印发宣传品，我就经常住在他那里。

这里需要概括地谈一谈我们的同志在昆明的主要情况与工作：

昆明是云南省省会，属于中国西南地区。根据一八八五年清政府与法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法国铁路公司修建了一条从河内经过老街、河口，到达昆明的铁路。所有在列车上、火车站工作的越南人都由铁路公司雇佣和管理，中

国当局无权过问。

法国在昆明设有领事馆、专用电台和专用医院，还有一个斯泰汽车修理厂。在云南铁路沿线大小市镇居住的越南人共有二千多人，开设理发店、成衣店和从事其它零散职业，都是铁路公司职工家属，由法国领事按治外法权规定管辖。

一九二九年，阮世业在国内与阮太学争当越南国民党的领袖失败，法国密探安排他来到云南。到这里后他与充当中国国民党特务的一个越侨阮金语和一个充当法国走狗的列车长勾结，在越侨职工中从事秘密活动。一九三〇年安沛起义失败，武鸿卿从国内逃来云南，加入阮世业一伙。在法国当局的默许和中国当局的帮助下，组成越南国民党，以一些流氓分子为骨干，威胁和欺骗群众。越南国民党的机关分设在云南各地。在昆明，他们有一所越侨会馆，确切地说，这是他们骨干来往活动的巢穴。至于他们的“领袖”如阮世业、武鸿卿等都是借着迫使侨胞的捐款或直接勒索的钱财住在旅馆里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有一位侨胞得知他们的底细，把事情讲了出来，他们便把这位侨胞叫到会馆罚站，还打了几个耳光，勒令今后不得再议论“领袖”的长短。

在这段能公开活动的时空中，他们互相争权夺利，内部矛盾十分尖锐。阮世业、武鸿卿受到阮金语的公开指责和揭露，便派人去谋杀阮金语。事情败露，俩人都被逮捕。阮世业写信要求法国驻昆明领事干涉，到一九三三年，云南当局

把他们驱逐到广西。

经过这一事件，他们的威信一落千丈，他们在各地的组织都陷于瓦解。一些有革命思想的人都离开他们另找出路。陈国俊(东阿)、杜登程、黎国柱(黑柱)、徐志坚都离开他们去南京，在与我们党的同志取得联系并得到帮助后，逐渐转变赞同党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底，武英、东阿、杜登程奉派从南京回昆明发展党的组织，并成立了云、贵支部。

一九三六年，武鸿卿又“秘密”返回昆明活动，但群众对他已十分厌恶。甘心充当他的骨干暗中破坏革命的反动分子总共只有十余人。云、贵支部的同志运用正确的策略，以越南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又让武英同志也加入，形成了越南国民党组织中的左翼集团，与武鸿卿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左翼集团占了绝对优势。新成立的劳工亲爱会和青少年育才会，完全由东阿同志掌握。东阿建议把出版的小报《铁血》改为《大众》。武鸿卿不肯，他只好自己编写、印发给群众，但都被群众撕毁或加上批语退回。《铁血》从此寿终正寝。我们的同志出版《大众》报宣传党的主张。武鸿卿在昆明活动不久又被群众控告，再次被中国当局驱逐到贵阳。但他并不就此停止活动，昆明还有他们的一些人或公开或秘密与他联系，继续反对革命。

\*\*\*

一九三九年我到昆明不久，武鸿卿也来到昆明。这次他

得到重庆特务严继祖的庇护，中国当局允许他从事合法活动。但同过去一样，凡是他们召集会议，我们都派人与群众一起参加，揭露他们的面目。因此，他们很害怕召集公开会议。为了吓唬群众，他们的一个得力骨干倚仗自己是中国国民党的军官，公然到宋明芳家拔出手枪说，谁再听那几个共产党的话，给我小心点！有一回，他们召集一次十分秘密的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代表参加，我们得知后便安排一些我们的群众也去参加。会议刚刚开始，他们门卫便大声嚷道：“郑东海（武英）他们的人来了。”于是群众大哗，秩序大乱。他们只好宣布散会。我们安排坐在中国国民党代表旁边的黎松山向国民党代表讲了来龙去脉，使他们再一次在中国国民党面前丢脸。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通过中国国民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发表了一篇“关于时局的宣言”，主张同法国合作。当然这是中国国民党授意的，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投降主义和反革命路线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当即以“越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成立于一九三七年）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揭露。声明用中文写成，分别寄给各国通讯社、蒋介石政府、中国各报社、各人民团体以及在云南的越南侨胞。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

除武鸿卿和严继祖外，还有一个三四人构成的托洛茨基派小集团，为首的是一个有文化、能绘画、善雕塑，受谢秋偷影响较深的人。他们的理论似乎很革命，能蒙骗一些群众。

他们鼓动越侨上街游行，反对法国，并要求中国当局减税。他们无论到哪里活动，我们都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在群众中完全孤立。

一九三九年底，冯志坚同志从汕头回到昆明（一九三八年他在香港被捕后被驱逐出境，到了汕头，在那里参加训练民兵游击队，不久回到昆明）建立党的海外部，领导在中国的各项工 作，成员共有三人：冯志坚、武英和我（当时化名李光华）。海外部出版一份小报，取名《通讯》，后改为《同声》，主张团结抗法，支持中国抗日，同时揭露武鸿卿、严继祖和托派分子的欺骗宣传。

\* \* \*

一九四〇年初，胡主席化名胡光来到昆明，以八路军少校教官的身分出现，住在新华书店，但常到冯志坚同志处指导海外部工作。

在政治方面，胡主席认为云、贵支部争取了群众，清除了阮世业、武鸿卿一伙的影响，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对海外部工作的一些缺点也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意见。例如他认为前些时候云、贵支部领导的铁路工人罢工只单纯提出反对法国当局不为中国运送武器，而未看到借此机会应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和提高对革命的认识。因此，他建议以“越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在河口——昆明铁路沿线散发传单，号召越侨反法和支援中国抗日。

在宣传方面，他建议把小报《同声》改名为《D. T. 》

报。他解释说，D. T. 二字可以理解为“同声”，可以理解为“同心”，也可以理解为“斗争”，还可以理解为“抗法”。这张小报刊登的文章多半经过他审阅和修改，质量有所提高，文字简明易懂，深受群众欢迎。

在这以前，我们已取得与云南中共党员陈方同志、马子卿同志的联系，在胡主席的促进下，相互间的联系就更加加强了。

为了了解云南越侨情况，胡主席又与冯志坚同志到铁路沿线越侨较多的地方如蒙自、宜良、开远和芷村等地与群众联系。据冯志坚说，到芷村时，当地群众正祭奠碧色寨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人。他们俩参加了祭奠，冯志坚当众宣读了《D. T.》报上刊登的《哭碧色寨遇难同胞》一诗，群众深受感动。

遵照胡主席在边界地区发展组织的指示，海外部派阿录到河口工作，以便联系当地群众并秘密地同国内取得联系。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裴德明（原云、贵支部所属党员，较早调回国内工作）送范文同和武元甲来到昆明并带来了中央的介绍信，信中说，由于国内正遭受敌人镇压，特疏散他们到国外，请设法安排他们去学习。海外部布置他们秘密会见胡主席。胡主席决定介绍他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等待动身期间，按照胡主席的指示，我们组织学习《联共党史》。学习的方法是分工每人先读一部分，然后报告内容要点，由

大家讨论。这次学习，范文同、武元甲、冯志坚和我经常参加，邓文恰和武英只参加了一二次。

\* \* \*

一九四〇年六月廿日，法国巴黎沦陷。胡主席召集海外部的同志讨论当前形势，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边境地区，然后再向国内转移。

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做出决定以后，胡主席去重庆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他去重庆时买了飞机票，但回程只买到汽车票，在路上又多所耽搁，一个多月后才回到昆明。

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边境地区活动应选择哪一段？胡主席一到昆明就安排人到云南与越南交界地区，但由于当时云南政治情况不好，派到边界地区的人很难活动；而且与云南接界的河江、老街两省我们又没有群众基础。因此活动的方向应考虑在广东或广西边境。胡主席去重庆后不久，我们接到胡学览先生来信，说革命活动的时机已经来到：张佩公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帮助，现正到处联系，寻找越南革命者，并想邀请胡学览先生与他合作。胡学览先生本来就知道张佩公不是干革命的人，特此来信建议我们迅速去广西做张佩公的工作，免得他胡作非为。胡主席回到昆明后，我们做了汇报，他当即决定由冯志坚、武英和我去贵阳见胡学览，同时电告正在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去延安学习的范文同、武元甲和送他们二人的高鸿岭都留在贵阳等候我们同

去广西。

## (二)

### 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广西

张佩公本来是个越南人，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里担任少将衔军官。以前，由于怕受革命连累，他有意回避一切越南人。这次中国国民党交给他的任务是组织情报工作和准备将来充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向导，这样他才需要找越南人，才需要请胡学览先生出来一起工作。

通过胡学览先生介绍，我们到距离柳州市区几公里的大桥会见张佩公，他的工作机关就驻在那里。他看到我们都是文化、有政治水平的优秀青年，特别是熟悉国内情况，与他所搜罗到的越南人和华侨大不相同。

我们同他谈了时局问题、革命形势、国内人民和国外侨胞的活动等等。同时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如写了几份有关国内情况资料，编了一本革命诗歌，对他周围的越南人和华侨做了一些工作。但通过与他的交谈和几件具体事例，如他要我们作出预算和生活费支出的数目，动员我们参加军训，要我们在他进来时起立等等，都是一些愚蠢的做法，这些要求一一被我们拒绝。通过这些，使我们看清他是一个军阀式的人物，是中国国民党的走卒，只想利用我们为他搞情报，并以我们的工作能力作为资本向国民党吹嘘，换取他们对他

的信任。

而最愚蠢的是他把我们的全部名单开报给张发奎，说我们都是他属下的工作人员。但为我们坚决反对，一定要他把我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删掉，而且要他向张发奎汇报，说我们是干革命的人，不是他的工作人员。当然，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立足的余地，但我们仍然坚决要求这样做（有关张佩公的情况另作详述）。

一天，胡主席从昆明来到这里，我们与他秘密会见，并向他作了汇报。他分析了情况，主张离开张佩公，请胡学览先生一同到桂林，以桂林作为活动基地。不久，我们离开了柳州去桂林。

\* \* \*

约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我们到了桂林，当时胡主席已在那里。把胡学览先生安排到桂林医院治病。我们常到八路军办事处秘密会见胡主席，向他汇报，并请示有关活动的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以什么名义出面活动？胡主席主张用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的名义，邀请胡学览先生出面主持，我们借此开展活动。这一主张的出发点是越盟乃前次我们同胡学览先生一起成立的组织，并已在南京向中国当局登记，而且胡学览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但又真心实意支持我们，如果有他出面，我们的活动将有利得多。

胡学览先生十分同意这样做，答应担任越盟主任，并介

绍我们去见他的老同学、桂林中央军分校校长、蒋介石西南行营副主任林蔚，接着又通过林蔚的介绍，会见了西南行营主任李济深。

会见李济深那一天，林伯杰(范文同)、杨怀南(武元甲)、郑东海(武英)、冯志坚、高鸿岭和我(化名李光华)六人都参加了。按胡主席的计划，我们用中文写好一份越盟简史当面交给了他，并对他说，在中国，我们已成立了以胡学览为主任，林伯杰为副主任的“越盟海外办事处”。把材料交给他后，我们还补充了几点，大致如下：

越南现有两大政治组织，一是共产党，一是越盟。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得到第三国际的国际支援。越盟的力量主要在上层阶级和农村。我们一直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是一支相当强大的抗日力量。但我们也非常需要国际支援，十分希望得到主任的大力帮助。

李济深温和地作了回答，大意说，按照孙总理(孙中山)的遗嘱，我们应当帮助各弱小民族，但我个人能力有限，如需要大的援助，得由我党中央决定。最后，他还不要忘记提醒我们：你们与共产党合作，必须注意别让他们掌握了领导权！

通过与李济深的这次谈话，越盟实际上已得到承认，越盟办事处这一机关也被默认为合法。

几天后，胡主席启发我们，说搞革命活动也要显出自己手里有些什么，不要使人感到我们很拮据。我们要宴请李济深的秘书一次，使他尊重我们，更多地帮助我们。胡主席提

供了五百元，我们在冠生园大酒店搞了一个宴会。收到了胡主席预见的效果。

在这期间，胡主席还通过内部关系介绍范文同会见了一些中国进步作家，发起成立越中文化协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协会在乐群俱乐部成立，正式的名称是“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胡学览和范文同以越盟海外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的资格参加了协会的理事委员会。当时桂林各报曾有报导。这就使越盟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李济深过去是个反共的人。但现在担任行营主任，有名无实，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亲信特务杨继荣少将的手中。此人的任务是安排在这儿监视李济深的。这一点李自己也很清楚。因此，对已在国民党中央登记的越南独立同盟，他表示关怀和多少给些帮助，对他没有什么不好，而在面子上却是有利的。杨继荣态度很坏，每次见面时都想摸我们的底，而且常以训话方式谈话。有一次他甚至躺在躺椅上同我们谈话。他已知道我们怎样对付张佩公，因而也不敢搞得太露骨，但在谈话中他常常借故攻击共产党，以此来摸摸我们的态度。

一天，杨继荣到医院探望胡学览先生，竟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胡学览先生相当有力地回击了他。胡先生说：你们几位对越南革命还没有什么帮助，但以你个人来说，却已是靠越南革命赚了好几百万元。你要我们的青年为你充当情报员是做不到的，他们都是要干革命的人。你拉拢不了他们，便想诬告他们是共产党人，不错吧？你说他们是共产党，请

拿出证据来，我愿意用我的头来为他们作保证。从此以后，杨继荣就不再同胡学览先生见面，还说：胡先生倚老卖老，强词夺理，我又不好回敬。

这里顺便提一下，阮海臣初到桂林也曾想挑拨我们与胡学览先生之间的关系。胡学览先生当即给了他应有的教训。胡先生说：你阮海臣同我一样到中国已四十多年，但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没有作出什么贡献。现在我们已经老了，要让青年们去干，他们才是真正有能力干出一番事业的人。现在中国当局要我们出来工作，不过是想利用我们，实际上如果没有国内同志们的努力，我们也将一事无成。我劝你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要妒忌别人。阮海臣听后，心中很不痛快，但权衡利弊，还是参加越盟较好。因此，在桂林期间以及后来到了靖西，他仍自称越盟成员(此事下文另作详述)。

在桂林工作期间，由于有胡主席的直接指导，有胡学览先生出面和他的正确态度，有中国进步人士积极支持，我们争取到李济深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取得了明显的合法地位。

\*\*\*

我们离开柳州去桂林后，张佩公把他的队伍拉到靠近越南高平的靖西县。张佩公队伍里的张中奉同情革命，写信告诉我们，说国内有许多干部跑过边境来，建议我们赶快去联系。得到这个消息，胡主席立即指定武元甲、武英和高鸿岭先去靖西与这批干部联系，同时设法动员张佩公致电桂林，

邀请越盟办事处派人到靖西共同商讨工作。

接张佩公的邀请电后，胡主席和我们立即赴靖西。这一次启程，堂而皇之，李济深赠路费八百元，并发给“华南工作团”证件，上面盖有蒋介石“中正”二字红色大印章。胡主席和我们到了柳州，与昆明来的邓文恰、阮文禄、杜登程、阿贤姐等同志汇合，浩浩荡荡地乘长途汽车到南宁。两天后，雇船去田东。在船上由于还要对一些同行者保密，胡主席以中国记者的身分出现，常用中国话同我们交谈，当谈到复杂的国际时事时，他使用法语讲，由范文同翻译。船行七日到田东，范文同、阮文禄、杜登程和阿贤姐先乘长途汽车去靖西，胡主席、冯志坚、邓文恰和我留在天保等待边界来的消息。第二天，武英骑自行车来到天保向胡主席报告，一切都准备就绪。第三天，胡主席和我们步行前往，在足荣乡（即后来胡主席被捕的地点）吃午饭，然后继续赶路，约晚八点到达距离靖西约十公里的小集镇新墟，看到武英和黄森已在那里等待。胡主席和我们都被安顿在新墟街上的一个群众家里。

\* \* \*

胡主席到新墟是要了解在靖西的同志与国内同志联系的情况。

这期间，他常与我们在新墟与靖西之间的一个地点约见范文同和武元甲，听取情况汇报，得知从柳州来的同志已安顿妥当，从国内高平过来的四十三人（其中有黎广波）已被张佩公召来，组成一个训练队，由张中奉负责，但因受到

法西斯式的训练和对待，这些同志都在等待机会离开张佩公。

一天下午，胡主席、冯志坚、邓文怡和我吃过晚饭在路上散步，碰到黎广波和黄森从靖西赶来。他们说情况严重，不能再留在张佩公那里了；因此已经布置大家明天开小差逃回边界，他们俩到巴蒙后将绕道与大家葛麻会合。胡主席简单问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接着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换意见。胡主席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妥当，要我和邓文怡立刻赶到巴蒙把黎广波和黄森叫回来，待详细了解情况后及时妥善处理。我们立即动身，约晚十点到达巴蒙，半夜返回新墟。胡主席对黎广波说，目前中国国民党和张佩公非常需要越南人，他们不会逮捕和加害你们。你们尽管返回靖西去，组织大家公开走，就说要回国发动群众，等走脱以后再写信给张发奎，批评张佩公，并讲清你们回国的原因。这样做，他们不能说你们逃跑，对张佩公来说，今后也就失去利用革命的条件。

中国抗日时期，靖西、平孟一带是广西的一个重要的游击队活动地区。我们的一些同志如黎广波、黄森等一面参加中国群众组织的游击队，一面在靠近边境的高平省一带发展革命力量。后来因为在国内受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他们只好带领部分干部越过边界到张佩公处暂避。突然传来消息，说中国当局已下令搜捕，他们担心在那里安全没有保障，才想来个冷不防溜走。这是缺乏全盘考虑的处置，胡主席向他们

指出后已及时纠正。

听了胡主席的意见后，黄森留在新墟我们处，黎广波返回靖西，布置大家公开去葛麻，然后在那附近分散隐蔽。他们离开时，张中奉依依不舍，相约后会有期。

四十三位同志顺利离开靖西后，胡主席叫我用中文以他们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寄给张发奎。起草后交给胡主席看，他修改了几个地方，我看到修改几处虽然意思一样但语法有错，便提出询问。他说：你只知道写信就是写信，但不从政治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越南人写中文，语法哪能准确。要写错几处，人家才会相信真是他们的手笔。这封信写得好就好在语法有错，否则就不好了。事情虽小，但对我来说却是上了做群众工作和实际工作深刻的一课。

这以后，我和黄森经常到巴蒙地区做群众工作。这里的群众同情游击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同情越南革命。一九四二年底，胡主席从国内出来，就是在这里找了一位群众充当向导，后来这位向导与胡主席一起被捕，死在柳州狱中。

约在一九四〇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裴德明从国内送黄文树同志来到新墟会见胡主席，汇报国内情况和第八次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

不久，在边境越南一侧的活动基地准备停妥，胡主席与冯志坚、邓文恰、黄森准备回国，我按照胡主席的指示到龙州做联络工作，并在当地建立基层群众组织。

### (三)

## 在龙州的活动

去龙州那天，我再次经过靖西，但没有到我们同志的住地。在路上与一位去龙州买盐的农民结伴同行。走了两天到达硕龙镇，过一条小河就是越南高平省境。从这里去龙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穿过高平省地界，只需走四公里，路途平坦；另一条要走十二公里，要爬过十九座小山才有过夜的地方。中国人称之为“十九岗”。快到三岔路口时，同路的农民说，穿过越南地界较近。但我本身是越南人，不敢走这条路，只好对他撒了个谎，说我是抗日宣传队的队员，经过越南地界如被法军逮捕，事情将会败露。还是请他跟我同走十九岗这条路为好。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走了一段，遇上一个边防巡逻兵，他怀疑我们身上带有烟土或武器，为躲开法国人才走这条路。但从我们身上搜查不到任何违禁物品，只看到我身上携带着一张越盟的证明书，说明是派往龙州工作。他粗略知道越盟是一个抗日团体，就放我们通过了。但当他回到哨所向他的上司汇报，他的这位少校上司常与高平边境法军联系，曾抓过一些越南人交给法方领奖，便打电话给十九岗路口哨所截住我们，把人逮捕起来。

越过十九岗，来到平路，我看到前面一个哨所有士兵站岗。问了同行的农民，知道是中国边防哨所，我放下心来。

但快到哨所时，许多士兵拿着上刺刀的枪走了出来，似乎准备拦路逮捕。果然，刚走到哨所门口，就听见大喝一声：“站住！”，士兵们把枪口对着我们围了起来。他们又搜查一遍，仍然只发现越盟的证明书和一张《广西日报》。哨所所长叫把我们带到里面去，听候委员处理（委员就是负责与法国方面交涉的边防哨所指挥官）。我说，和我同路的只是一个去买盐的人，与我并无关系，请你们让他自由通过，我留在这里等候委员就是了。他们放走了去买盐的农民。我踏入哨所。

到办事处，所长仔细询问。我向他解释了越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并拿出那张《广西日报》，指给他看在桂林成立了“越、中文化工作同志会”的消息；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发电报去询问桂林蒋委员长行营，或者发电报到重庆询问中央也行，因为我们的越南独立同盟是一九三六年初便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登记过的。他听后，客气地请我一起吃饭，然后安排我在这里住下。晚上九点多钟，那位委员从硕龙镇回来，我向他重述了下午对所长谈的话。我估计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把我带到他们上级机关所在地龙州，于是我主动建议请他们派几位士兵明天早上送我去龙州。他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饭后，我与两位边防士兵同行。路上，我试探他们的态度，他们对我以礼相待，晚上住店，虽同住一间房，但一人一个床，不象是对待一个被捕的人。因此在途中小吃店歇脚，我请他们吃东西、喝茶并和他们交谈。第二天大约下午四点便到达龙州，我对他们说，先吃饱了，歇一会，再

到机关去。接着，我带他们到我正想要去的联络地点旁边一家饭馆吃饭。请他们在饭馆坐下后，我溜到街上，不到十步远，就看到裴玉成和胡德成站在门口。寒暄了几句，胡德成说可以立刻去机关，肯定不会出事，因为我们这里已同三十一军军部有了联系。

我与两位士兵尽快吃完饭，同胡德成一起去见龙州专区督办。那时已经下班，督办给军部打电话接不通，便安排我在机关过夜，第二天上午派人送我到军部。在那里，我会见了参谋长敢维雍，又会见了军长韦云松。我向他介绍了越盟的情况，他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越盟对复国军的态度。我说：从组织方面来说，越南复国军是日本人建立的，我们不予承认，但对个人来说，不管是谁，只要真心抗日，我们都愿同他们合作。他表示满意，请我喝茶，并说以后有事尽管找敢参谋长。就这样，由于得到三十一军军部的帮助，我们在龙州取得了合法地位，工作也能顺利开展。

\* \* \*

那时，在龙州有一支越南复国军部队。他们是受到法军的进攻，日军又不予理睬而撤逃到中国境内，为中国当局所收容。这支部队约有五百人，集中在上金县，由黄良和以前的一个法军少尉梁文意指挥。此外，还有另一部分约四十人集中住在斌桥镇附近的陇遮，是由一个越南人把他们从七溪带过来的，军部也予以收容，其待遇如同复国军的一个排。

首先的问题是设法找到关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在敢维

雍的帮助下，顺利地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我先到陇遮会见四十人那一批，知道他们当中有黄明草、阮清同、黄田三人是一九三六年就参加过民主青年组织的人。还有一个叫闭河经的人，原籍七溪，与革命也有联系。我立即跟他们几个人联系，帮助他们了解党的路线，并通过他们向其他人说明，从国内带人过来供军部使用是上当受骗。当他们弄清问题后，大多数人返回国内，只有黄田、黄明草、阮清同等八人留下来学军事，后来他们到了南宁、柳州，自认是越盟成员，并为支持越盟而斗争。

对住在上金的复国军部队五百人，由于道路遥远，其中又没有我们的关系，联系较为困难。一天，我向敢维雍表示想去上金探望复国军的弟兄，他表示同意，还写了介绍信。我带闭河经同行，因为他是七溪人，肯定在这五百人中有他的熟人。

到达上金，适逢黄良外出，梁文意礼貌地接待了我们。我自我介绍是越盟的人，得到军部介绍来看望大家，同时向他介绍了国内革命形势，他表示很感兴趣。我问他我想同弟兄们见见面行吗？他说，黄先生（指黄良）不在家，我不敢决定。这里有一位负责指导我们的中国官员黄参议，如果得到他的同意，我就下令部队集合，因为弟兄们都分散住在周围几个村里。我立即请梁文意派人带我去见黄参议。这位参议听我说越盟是在中央登记过的组织，在桂林还设有办事处，又读了敢参谋长的介绍信，立刻叫梁文意集合全体部队和我见面。

过了一个多小时，各单位的人均已到齐，在一片大草坪

上列队等候，并派人请梁文意和我到场。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本来我只想同他们见一见面，到他们驻地，找几个人谈一谈，哪想到竟组织一次这样隆重的会见仪式。当然这样做有点声势更好！梁文意介绍我和他们见面，请我讲话。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向他们讲了国际形势、国内革命形势以及团结国外一切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听了都很兴奋。队伍解散后各人返回驻地。我同二十多个干部到梁文意住处参加聚餐，象是一次招待会。这一天，天气晴和，月色明朗，饭后，一些干部又拉我们到练兵场继续交谈。这时我才知道这支部队中有的人已感到在中国国民党控制下并不好，他们希望越南人能团结起来，“自己的事自己管理”。这天晚上，我们住在梁文意那里，又同他交谈了一阵，约好以后再来拜会黄良。第二天清早便转回龙州。

几天后，我去会见敢维雍，感谢他介绍我同越南复国军的弟兄见面；同时向他提出在龙州设立越盟办事处，眼前先用别的名义以便开展工作。我建议使用“越南华侨抗日工作队”的名义，并印制徽章，在各地来往时佩带，免得经常要向军部领通行证，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们搞了一次茶话会，宣布成立“越南华侨抗日工作队”，在会上介绍了有关越南的革命形势。自此以后，我们在各处走动，都佩带着盖了军部印章的队徽。现在黄田同志还保存着一个这样的队徽。

\*\*\*

春节后五六天，黄森到龙州向我传达了胡主席的指示，要

我在龙州地区建立一个秘密机关以备用。胡主席还特别介绍我和黄森去见龙州一位游击队指挥员讨论此事。这位同志又把我们介绍给驻在紧靠边界下石地区的一位姓马的连长，我们赶到下石和他见了面。这位马连长可能是党的干部。我们在连部住了几天，看到他生活十分简朴，对士兵和当地群众都很好。连续几天细雨连绵，他毫不在意地和村长卷起裤腿同我们一起在这一带查看了许多地方，最后终于找到只有一家农民居住的一处山谷，适合建立秘密机关与国内联系，必要时还可以在那里印刷书报和资料。

除了建立秘密机关以外，我们还与中国境内以前帮助过黄文树同志的一些可靠的群众取得联系，例如在板激的老潘、在板庄的大头，还与龙州地区同情越南革命的一些人搭上关系，其中有《龙州日报》的主要编辑赵苦人，进行越南革命的宣传，争取他们的帮助。

在龙州的活动可以说是有效果的。后来我回北坡汇报工作，黄森仍留在那里，继续做好陇遮地区同志的思想工作，必要时向他们提供意见。

#### (四)

### 在靖西的活动

这次回北坡途中，我曾到靖西我们同志的驻地住了几天，了解情况。在这里，范文同、武元甲已有了单独的住处，不

再与张佩公他们搅在一起。除了从昆明来的同志，还有阮海臣和陈豹也自称是越盟成员，同大家住在一起。表面上，我们与张佩公的关系并不紧张，各干各的，我们的人直接和张发奎的代表、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苍建立了关系。

在靖西不到几天，阿录带我回北坡向胡主席汇报工作，然后折回靖西与范文同、武元甲一起进行公开活动。我被指定为党的书记，负责与国内党中央联系，汇报有关情况。

在这期间，我们在靖西的主要工作是准备召开“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以代替张佩公及其追随者大肆宣扬的所谓越南革命的领导机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

早在一九四〇年间，当中国国民党把张佩公调来成立情报机关的时候，就允许他印制“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信封和信签备用。这只不过是张佩公指挥的情报机关的别名罢了。去年八月，我们在柳州就已看到、并了解到一些有关情况，我们置之不理。后来我们离开柳州去桂林，张佩公匆忙来到靖西，举行一次招待茶会，宣布成立这个“委员会”，并介绍它的负责人，其中有张佩公、阮海臣和两位华侨。

招待会以后，张佩公立刻派阮海臣去桂林活动要求援助。当时正好武元甲、武英、高鸿岭也来到靖西，他们商量后，决定武元甲和阮海臣同行，争取阮海臣成为越盟成员。因为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成立越盟时，我们曾把他从广东请来，让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武英和高鸿岭继续留在靖西，执行胡主席的指示，设法争取从国内出来的四十多人。分化

张佩公的部下，并动员他发电到桂林邀请越盟办事处的代表到靖西商讨工作。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收到预期的效果：武元甲送阮海臣到了桂林并且果真把他争取到越盟方面来；从国内出来的四十多人果真被我们争取过来；张佩公也果真发了电报到桂林邀请越盟代表。

实际上，我们能够把这一批人公开从桂林争取到靖西，是在胡主席机智而周密的指导下取得的结果。而张佩公电邀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必须承认越盟的存在，必须承认与越盟商讨才能冒充一个革命角色，才能取得中国国民党的信任。

然而我们返回靖西并不是要和张佩公商讨工作，而是为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为组织国内革命力量，也是对他进行斗争和揭露，分化他所控制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提出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就是我们常说的“解放会”，来替代所谓“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我们阐明：既然说要解放越南，就必须有越南群众参加，有在国外的也要有在国内的越南人参加，如果只有脱离群众的少数人在这里搞来搞去，哪里谈得上解放？

我们建议成立“解放会”，在靖西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吸收国外代表和国内各革命团体代表参加，通过组织章程，选出领导班子。我们将出席这次大会，并将通知国内各团体也派代表到靖西参加。

中国国民党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只好接受我们的建议。

但确切地说，他们的用意并不在于成立“解放会”，而是企图通过这次成立大会，摸一摸我们在国内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中国国民党既已同意，张佩公当然只能俯首听命，不敢推托。

\* \* \*

约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出席“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成立大会的所有国内代表都已到齐。

我们从国内来的代表，以及在靖西或来自龙州的代表都按当时的需要作了分工。有的作为地区代表：如某某省代表，中圻代表，南圻代表等。有的作为各群众团体代表：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文化团体代表等。特别的是有一位何德芳，作为越盟领袖黄国俊的代表参加大会，黄国俊由于健康原因和路途困难不能亲自出席。其实，黄国俊是我们编造出来的向中国当局介绍的名字。

张佩公方面出席大会的有五六人。越盟方面约有二十人。中国方面有靖西当局代表、张发奎指挥所代表、边境地区军队代表数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队长伍根华和从桂林来的李济深的代表杨继荣。

成立大会的程序很简单。大会开幕，宣布解放会成立后，何德芳代表越盟总部宣读越盟领袖黄国俊致大会书；然后张佩公宣读大会致“蒋委员长”电。接着，中国方面边境沿线驻军师长颜增武讲话，他对越南革命表示同情；轮到杨继荣讲话，他以训示的口气说越南革命不依靠中国的力量，不支持华军入越则将一事无成。

讲话完毕，大会选出中共执行委员会。张佩公方面参加执委有几个人；越盟方面范文同、武元甲和我被选为正式委员；陈豹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还有来自国内的一些同志，现在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有阮海臣、裴玉成和邓文恰三人，由阮海臣任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各组：

一政务组：张佩公、林伯杰、杨怀南、李光华等。

一军事组：黎铁雄、张中奉等。

一外交组：陈豹等。

一财务组：高鸿岭等。

（具体人名可能略有出入，有待查清。）

这样，在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组的名单中都没有华侨。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胜利。因为在筹备大会的过程中，中国当局和张佩公都曾想方设法把梅公毅和杨清民两个华侨选进去。我们的同志对此也莫衷一是，不敢确定。但向胡主席汇报后，胡主席明确表示，既然是越南革命，就不能由华侨领导。我们据此作了斗争，最终他们也无法把这个企图强加于我们。

张发奎给大会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明瞩天南”四个大字，我把它译成越文是“明瞻南天”，有意把原意中国天的南边改成越南的天。

李济深也写赠一面锦旗，上面题四句诗：

中越民族，

唇齿关切。

瀚耻图存，

惟铁与血。

此外还有一面朝鲜反侵略同盟会的锦旗。这是中国国民党在桂林搞起来的一个组织，由一位朝鲜的张佩公——李若山主持。

大会结束后，胡主席计划把这些纪念品拿到高平省的一些地方去流动展览，扩大我们的影响，宣传我国革命得到同盟国的援助。

我们参加这个解放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在国外的活动合法化，也是为了尽可能争取到国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但是作为越南独立同盟，它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

这次按我们的建议成立了解放会，从政治和领导班子的组成来看，我们都占了绝对优势。可以说，这个组织已完全受我们支配。那么是否可把这个组织看作是革命的领导机构呢？不能！这只是中国国民党及其走卒企图建立为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的政治组织，通过我们的斗争把它变成一个对我国革命有利的机构。这一点开始时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完全领会，因此这个组织成立后，我们出版了一份小报名为《解放》。印好后送回国几份，胡主席看后就提出批评意见，他说：革命是由国内党领导。团结各种群众力量的革命组织是国内的越南独立同盟，而不是解放会。出这样一份报纸可能引起群众误会。需要停办，不再出版。已出的几期，只留下

几张寄给中国几个机关，其余全部销毁，绝对不能在群众中散发。这件事虽然很平常，而且已过去很久，我在这里旧事重提，是为了说明当时胡主席是怎样直接指导我们运用战略和策略的。

\* \* \*

在筹备解放会成立大会期间，越盟曾要求中国当局协助训练一些军事干部（胡主席的用意是让这些学员带着他们发给的枪回国）和一些爆破手。中国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他们肮脏的企图是想给我们的干部洗脑筋，在我们内部培养一些他们的得力走卒。

解放会成立后，以高平、谅山、太原和平原地区等地方调来参加训练班的干部陆续到达。爆破训练班十二人设在靖西陈宝苍指挥所附近的大龙潭，训练二十天左右便回国工作。军事训练班约六十人。他们借口靖西物资供应困难，集中到田东，实际上是想把训练班调离得远些，易于控制。在田东时，我们曾推举黎铁雄同志当负责人，后来他们设法挤掉，改派他们的人负责，并阻止学员和我们发生关系；接着又把训练班转移到南宁，离靖西更远，拖拖拉拉，直到一九四一年底训练班才算开办起来。在训练过程中，他们千方百计对学员进行分化和拉拢，但由于学员们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结果没有一个人被拉走，为他们所用。

与此同时，他们还想法子更进一步摸清我们的力量。张发奎提出要派一个姓陆的上校到越南视察。胡主席指示同意他

的要求。陆上校进入越南后，走过了高山、密林，涉过了山涧、湖沼，到达许多村寨，经常遇到我们的武装部队，绕过了敌人的哨所和据点，而且经常挨蚂蝗咬。白天只能歇在群众家里或山洞里，夜间才能出来走动，路上走得很累，很辛苦，常常还碰到危险；但是他走到哪里，都得到岱、慢、依、京各族人民的殷切款待，把他称为盟友。安排带领他去观察和接待他的计划都是由胡主席直接制定并给予仔细的指导。

陆上校完成视察任务回到靖西后，写了一份五十页的报告(曾让我们看过)送呈张发奎。他的结论是：“在视察过的几个省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拥护越盟(实际上他到过的只是我们为他安排在邻近的一些地方)，如果中国想在越南进行有效的工作，一定要和越盟联系。”当然，他的报告中为炫耀自己的功劳有一些夸大之词，但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 \* \*

有这么一件很可笑的事，解放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张佩公就跑到平孟去了。几天后，当我们内部正在举行联欢，张佩公因为牵连走私案在平孟被捕。确实如此，张佩公真的是个走私贩，他的一些军事学员驻在边境，在他的支持下从越南运私货到中国，又把战略物资从中国运到越南供给日军和法军。有时他们还强运私货过境，殴打海关人员。但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是由于政治问题。

原来张佩公自国民党起用至今，工作连遭失败：第一，在柳州我们要求把我们的名字从他的工作队名单上删去。第

二，到靖西的四十多个学员返回国内并写信控告他。第三，他到达靖西后，未能从越南调出一个人，也未能派出一个人到越南，相反地，越盟则是调干部有干部，调学员有学员，国内外人员来往不断。而最大的失败是这次成立解放会，他与越盟作了一次较量，却表现出十分无能。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与政治有关。这就是他出卖委任状给一些华侨，希冀一旦国军入越有现成的职位，可以享受多种特权。出卖委任状的事，使法国政府不得不向重庆政府正式提出抗议，要求处理。这是蒋介石下令张发奎逮捕张佩公的直接原因。实际上逮捕他是给他一次教训，要他今后成为更为驯服的走卒罢了。同时也是警诫别人，显示他们手中有权，想抓谁就能抓谁。

\* \* \*

张佩公被捕后，他的部下逐渐分散归属指挥所。在靖西的一切革命活动几乎都掌握在越盟手中。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中全会在北坡召开，我接到通知回国参加全会。会议期间，我还要经常来往于北坡与中国边界一带，布置北坡以北地区的警戒，保证会议安全。（朱文晋负责北坡以南，即谅山方面的警戒。）因此，我未能自始至终参加全会。

会议确定的路线和方针，在党的文件里已有记载。这里我只叙述当时对我印象很深的几件事：

一在会上，按照胡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把印度支那反

帝战线改名为越南独立同盟战线，简称越盟。这样，我们一九三六年初在中国作为争取合法活动而建立的越盟，到一九四〇年底，在胡主席的指导下，才做了一些实际工作，而现在已成为团结各救国团体的广泛统一战线，实现了八中全会决议所确定的“联合各阶级、各党派、各救国团体、各宗教以便抗法、抗日”的战略方针。

一会议上，大家建议胡主席担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直接领导全国革命。但胡主席坚决推辞，并建议由一直在国内领导党的工作的长征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然而，长征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仍然把胡主席看作导师，掌握最高领导权。

会议结束后，长征、黄国越等返回平原地区活动。由于北坡到平原的交通线为敌人严密控制，因而只能越边界进入中国，绕道龙州再从七溪、谅山折回。这次行程由高鸿岭负责组织。通过中国国民党各地哨所时，高鸿岭一直使用以前李济深发给我们的“华南工作团”证件，沿途畅通无阻。

会议结束后，我也去龙州安排那里的工作，主要是建立龙州越盟办事处，并介绍高鸿岭任办事处主任。

在此期间，我还向从谅山方面过来的黄文矫、闭振兴传达了越盟的纲领和工作方法，并派他们回去加强会欢地区和接近越、中边境地区的工作。这一工作与会后打通从高平、谅山至太原南下通道很有关系。

\*  
\*  
\*

越盟的各项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国国民党的阴谋和所谓华军入越的准备工作却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当局对这一点很清楚，特别是直接负责靖西指挥所的陈宝苍心里更明白，而他更需要找出积极的对策。

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曾寄希望于张佩公，那么现在张佩公已被捕，他只能寄希望于阮海臣和陈豹了，因为这两个人也算是越盟的“负责人”，而他又认为是可以信任的。

成立解放会前后，陈宝苍曾企图笼络我们，对我们表示重视，态度也很好。他常请我们吃饭，每隔一二个星期就请我们给指挥所和其它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作关于越南情况的报告。当我们去作报告时，陈宝苍亲自到门口握手欢迎。进入会场，听报告的人起立敬礼，如同在一个训练班学员向教官敬礼后听讲一样。

有一次，他还表示要委任我为上校军官，“便于联络”。但我们知道他的企图是想把我们变为他的部下，便于差遣。我们向胡主席报告并加以拒绝。但这时阮海臣却把他的女儿和女婿叫到靖西，要求指挥所给安排工作。我们劝说阮海臣，并严肃而明确地要求他不要这样做，但他暗地里仍然照样向指挥所提出要求。

阮海臣跟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但在接触过程中，他看到我们都在干革命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也无助于他。再加上叛党分子陈豹整天为他出谋划策，想方设法把我们挤走，让他们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曾向

陈宝苍告密我们是共产党人，并编造出证据来证实。因此，解放会成立后几个月，陈宝苍对我们就很冷淡，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诞无礼的事：杨继荣公然要求范文同和武元甲去重庆学三民主义！这些变化我们都回北坡向胡主席作了汇报。胡主席认真考虑后决定范文同、武元甲、黎铁雄、高鸿岭和其他一些同志立即回国。我继续留下维持靖西这个据点，并尽量缓和与阮海臣之间的关系。黎润之老先生、范越子、马成敬也和我一起留在靖西。

我们的同志大部分回国后，阮海臣自以为得意，采取更加对立的态度。陈宝苍却十分气恼，不管什么事情都和阮海臣、陈豹两个人商量，对我不象先前那样殷勤了，甚至尽量避而不见。我回北坡报告，胡主席仍主张继续维持局面，中央将另派人找阮海臣做工作，也许还可能争取他继续同我们在一起。但这一次我返回靖西，阮海臣的态度却比以前更坏。他拉黎润之老先生、范越子和马成敬离开越盟办事处住到别的地方，从政治上孤立我，并在经济上给我制造困难。他还向陈宝苍谎报越盟有阴谋要暗杀他。

一九四一年底，我再回到北坡。胡主席说，靖西的情况既然如此，可以安排我回国工作，但是要先到平孟告知陈宝苍，免得人家说是逃跑。做好一切准备后，谭明远同志把我送到平孟，住在平孟指挥所办事处主任梁静山家。梁是一个经常标榜进步的人，喜欢同我们就中国抗日、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经常与黎广波、黄森、谭明远接触，表示同情越南革命。但在他那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便被捕了。

## (五)

### 在平孟被捕

我在梁静山家被捕是有缘由的。梁静山原是平孟的一个小资产者兼地主，陈宝苍委任他为平孟少校专员。他常到靖西向指挥所汇报情况，也常同我们见面，表示友好，有时也拿几本进步书籍给我们看，或者告诉我们一些“内部”消息。同时，黎广波、谭明远、黄森等到平孟也常常住在他家。这一次我从北坡来到他家，立即请他打电话给陈宝苍，说我现在平孟，但他转弯抹角推托不肯打。我有些怀疑，但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天晚上，他娶小老婆，我拿出几块钱买爆竹向他祝贺。婚礼上，他请我同陈宝苍委任为上校参议的当地有名土匪唐岸以及平孟乡长和一位教员同桌吃饭，这些都算是梁静山的上宾，他本人从头到尾陪着。

宴会结束，我就在他家的客房休息。第二天一清早，我还在睡，他到床边把我推醒说：李同志，乡长请你去呢。我睁眼一看，四个挂着驳壳枪的乡丁站在旁边，催我快穿上衣服赶到乡公所。

到乡公所，他们二话不说就给我上铐关进厢房，各自走了。两个小时后，我看到那位教员在门前走过，连忙把他叫

住，请他转告梁静山，说我要找他，那位教员嗯呀了几声就走了。十点左右，梁静山派家人来送饭，我拒绝了。大概又过了一个钟头，唐岸进来，看到我被上铐，感到惊愕和生气。他叫乡丁过来骂道：你们不知道李同志是越南革命者吗？即使上面有令要扣他，你们也得以礼相待。在这里，你们人又多，又有枪，他还会跑到那里去，还会拒捕？你们怎么能这样野蛮对待！立刻把镣铐打开！

乡丁打开了镣铐，唐岸连忙请我坐到桌旁说话。他说：不知是指挥所还是中央对你产生什么误会，这些小子对你无礼了，请你别在意。现在乡公所按上面的命令要把你解到镇边县，得走三天路，经过三个乡公所。我打电话给沿路的几个乡长，要他们照顾你。现在就出发，我派一个人护送，使这些小子不敢乱来。说完，他让乡丁上街给我买了一碗米粉。

听唐岸的话和看他的举止，我知道这是他们有计划在做戏。实际上，梁静山、乡长、那位教员以及唐岸都是一路货。吃完米粉，四个乡丁带着枪和一条绳子催我起行。唐岸让他的一个干部带驳壳枪同行。在路上，我心想，这一回他们肯定要在半路上秘密杀害我了。以前就听说过在龙州的一位越南人韦南胞，押解到半路就被秘密杀掉的事。这么一想，每当经过树林见到拐弯的小路，我总等着他们把我带到那边去枪杀。后来多次通过树林，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才安下心来。天色近晚，到了一个乡公所，里面走出来一位乡长称

我李同志，并请进乡公所。他看过证件后，签了字。押送我的几个人便同乡长告别，到别处去了。乡长坐下和我谈了一会儿话，就有人把饭菜酒肉送来。他同我一道吃饭，劝我不必顾虑，说这一定是有些误会，到县里就能解决。这天晚上，他安排我在乡长办公室过夜，准备了被褥和蚊帐，外边还有几个放哨的乡丁在烤火。

第二天，这位乡长派两个乡丁带我继续上路。他打电话给前站的乡长，说唐参议(即唐岸)交代要照顾李同志，不能虐待。下午到第二个乡公所，乡长照样很好的接待。到第三个乡也是这样。唐岸是个土匪，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好呢？当时我认为他虽是土匪，但仍有点江湖义气；后来细想，这可能是陈宝苍的安排，打算以后对我进行收买。

快到镇边县，我拿出印有越南解放会中央委员头衔的李光华名片，在背面写好“要面晤县长”几个字。

这位县长原曾多次到过靖西，有一次在天保区专员招待会上和我们同桌吃过饭。他同情越南革命，很钦佩阮海臣。我一到县里，便把名片递给收发，请他交给正在县政府大门附近参加降旗的县长。他看了名片，立刻过来和我见面，并直接到收发室询取公函，带我径往县府公堂的内室。

谈话前，他拆阅公函，我对面坐着，瞟到公函头段文字，原来是梁静山向陈宝苍打了报告。陈命令梁配合平孟乡乡长将我逮捕送县。县长看完公函后说：看来也许有人怀疑你是不是和敌人有关系？我知道我的被捕是阮海臣引起的，这个

县长很钦佩阮海臣，要是以后他知道阮海臣提出要抓我，他也会以为我不是好人。因此，我先找话迎着他，我说，我这次被捕一定不是有什么嫌疑，主要是因为我們内部对革命方针有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越南革命主要依靠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越南基本群众；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越南革命不需要组织群众，只要华军入越就能解决。我赞成前一种主张。也许因为这样，就有人给我找麻烦。我建议你把我送到靖西见陈宝苍主任，一切就会搞清楚。他听后沉思了一会，说：你们内部的事我不了解，但我对你很熟悉，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我尽量给你帮助。说完，他叫来看守长说：李同志是一位越南革命者，不知道发生什么误会，上级叫我們暂时留住他，你带他下去好好照顾，等候上级的指示。

我表示感谢，跟着看守长下去，和他住在一起，一同开饭，不象其他犯人那样被关进牢房。大约过了二十天，县长叫我到公堂，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事解决了。我們接到陈宝苍主任的指示，要我們送你去靖西。他叫来一位警长准备明天带我上路。这一次从镇边押解到靖西，同路有一位警长和四位警兵，他们对待我很好，不象对待犯人。走了四天到达靖西，警长带我到指挥所办完手续后，辞别而去。他离开指挥所时，向我行了军礼，希望今后有机会再见。

\* \* \*

从镇边到靖西大致是一九四二年初。我被押送到指挥所，正是以前我们经常应邀赴宴和作越南形势报告的地方。负责

管我的那位科长是以前常迎送我们和听过我们报告的人，因而对我还很客气，他说：现在主任已去柳州，两三周后才回来，你就住在我们这里，有什么事等主任回来再处理。于是我被安排住到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房里，在指挥所开饭，还有一名勤务兵服务。

开头几天我还有些顾虑，不外出。但慢慢看到没有什么事，就试着到机关外头走一走，接连六七天外出都未发现有人注意。一天，我对勤务兵说要上街，他没有反应，也没有向上级报告。我走出大门，径直到以前我们的住地，看到房舍空空，只有韦德明夫妇住在那里，一问才知道阮海臣和所有的人都已去柳州。现在韦德明是指挥所的工作人员，仍然留下。我又到县城的街道走了一趟，看到景物依旧，来往都是中国人，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

遛了一会，我回到指挥所，拆开从韦德明那里拿到的黎松山的昆明来信。从离开昆明以后，我和武英都没有和那里的同志联系，看了信才知道黎松山还在继续与武鸿卿一伙斗争。他通过中国朋友，打听到我们的情况和地址，来信说要到靖西见面商量工作。我立即复信，劝他在同武鸿卿斗争时要讲究策略，争取保存那里的基层组织，目前不要来靖西，因为所有的同志都已回国，来了将遇到困难。就这样，我间接向在昆明一年多未曾联系的同志通报了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指挥所住了二十天左右，陈宝苍从柳州回来，稍事休

息后他便请我见面。他说：最近出了点误会，给你添了麻烦。现在所有的越南同志都已去柳州，你怎么考虑？我立即答道：我知道你了解我，才叫镇边县长送我到这里。这一段时间，科长对我很好，我知道你对我并无恶意，我很感谢。现在这里没有越南同志了，我想请您让我去柳州跟其他越南同志一起，好商量工作。他高兴地说：行！我给你安排！刚好第二天有车去柳州，他写信介绍我到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即张发奎的司令部，并交给我一个装有五百元路费的信封，交待一位副官与我同车去柳州。确切地说，送我去柳州是为了监视我。

新的斗争在继续，但不象过去只需对付张佩公一伙。现在要对付的是阮海臣、陈豹，对付复国军集团，还要对付中国国民党为华军入越的需要而企图建立越南傀儡政府的主张。

## (六)

### 在柳州的斗争

车抵柳州，不在街上停下来，径直开到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我猛然一想，也许他们会象在平孟乡公所那样，突然把我扣留下来。车停在传达室门口，那位副官请我下车，他说：司令部到了，你要找谁，可通过传达室。传达室负责人当即说道：这里有一个培养越南同志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由胡国粹负责。也许你先去看看他，以后找谁就随你的便。

胡国粹就是张国柱，绰号黑柱。是云南的一位越侨，先前反对过阮世业、武鸿卿等人。在南京我们见过面，在我们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愿意跟党走。现在由他负责的这个训练班，有越盟成员四人、同情越盟的越南复国党成员三人。黑柱见到我很高兴，因为以前阮海臣和陈豹放空气说我已被捕，肯定要杀头。他对我谈了当地几批越南人的活动情况。并说在陈豹出谋划策下，阮海臣自称是越盟代表，无线电报务班和军事班的全体学员不承认他们，但又不了解国内和靖西方面的情况，等待观望，也不否认。

这一天，我住在黑柱那里，和他一起吃饭，谈了整整一夜。我通过谈话了解到：

现在阮海臣得到张发奎的几千元资助，有一免付房租的两层住房。黎润之老人和范越子、马诚敬、徐志坚，张中奉等人都在这里。阮海臣只跟陈豹一个人商量工作，事情的端倪大家都不得而知。张发奎资助的钱统统由他掌管，有的同志没有鞋子穿也没钱买。黎润之老人常患腹痛，想要几块钱买药都得不到。

我说张中奉以前是张佩公的人，现在怎么又跟了阮海臣？黑柱说：自张佩公在靖西被捕后，他手下的人逐渐各分东西。张中奉加入阮海臣一伙，现在他好象看到阮海臣也不怎么的，想靠近我们。假如我们工作做好了，可以把他争取过来。他又说：这里还有中国从龙州调来的一伙复国军人员，他们就住在过去张佩公的机关所在地大桥。这伙人跟中国军队的

一个单位一样，很难接触。

这些话使我了解到阮海臣的活动情况和他的住址。我正打算在黑柱这里多呆几天，进一步摸清情况，商量具体对付办法。第二天，上街就碰到阮海臣和陈豹，他们骤然见到我都愣住了。为安定他们的情绪。我说，这次幸亏得到陈主任资助路费和发给通行证，否则要花很大力气，说不上哪一天才能到达这里。现在各位住在哪里？阮推托说：现在我们住得很分散，没有固定的地点。我问，那您老先生住哪里？阮说：我住在环球旅馆。现在，我还忙着别的事；你到旅馆一问，人家就会告诉你。说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作出想写房号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在撒谎，便说：不必了，到那里一定能找到。同阮海臣、陈豹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第二天晚上，黑柱通知范越子带张中奉、马诚敬到约定地点同我会面，互相交换了一些具体情况。大家认为，头一件事是设法让我住到阮海臣那里，跟大家在一起，才能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以后逐步开展斗争，解决其它问题。

按具体商定的计划，第二天，我把行李留在黑柱那里，前往阮海臣的住处，我是在阮海臣和陈豹都外出时去的。几小时后，阮海臣回来，看到我已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了。他感到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开口和处置？我立即说：来柳州之前，指挥所已经把地址告诉我了，所以昨天在街上见到您，您说住环球旅馆，我就不用记下房号，也不到旅馆去找了。今天我来这里，想讲几句实话，我们必须紧密团结，革

命事业才会有成就，在柳州也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过去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很长，认识很多朋友，找个住的地方，肯定有人帮助。但从工作考虑，如果每个人各住一处，会给中国当局和在这儿活动的几批越南人一个不好的印象，对我们本身工作也很不便。今天，我向阮、黎老先生和其他各位建议，请仔细商量一下，看对不对，有没有必要？现在我先回我的住处，过几天我再来。

我走后，黎老先生、范越子、徐志坚、张中奉、马诚敬同阮海臣讲理，坚持无论如何都得把李光华请回这里，否则在柳州的所有越盟成员都不支持阮海臣。阮默不作声。

两天后，我又去了，不带行李，仍象是串门的样子。屋里的人都在楼下吃饭，大家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而阮海臣却一言不发。饭后，阮的妻子和几个孩子收拾碗筷，其他的人都到楼上。谈话中我不提住处问题，只谈革命形势。大家同声说：老李应当来这里同大家住在一起。阮海臣还是不作声，我仍继续刚才的话题。当我起身要走时，我说了一句类似结论的话：我到别处住也行，但两位老先生和各位认为我来这里对工作更有利，所以，几天后我就来。就这样，住处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 \* \*

住到阮海臣这里，我与许多同志接触，进一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张佩公派。张佩公在靖西被捕后，他的人由陈宝苍直

接掌握，全部分了出去，只有张中奉跟随阮海臣。张佩公现在柳州，他受到管制但仍得到优待。在各项活动中，还提到他的名字，但不出面，即使有活动也只是同阮海臣、陈豹或黄良、农经猷等人秘密会见。

—**复国军派**。这一派约有五百人，集中在大桥，即先前张佩公工作队的驻地，由农经猷和黄良带头，梁文意任军事指挥。农本是禄平(谅山省)的一个地主，他之所以成为头目是因为这支复国军大多数成员或是他家的佃户，或是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他得到中国国民党委任为参议，并单独安排了一个住处，只吃闲饭，不管部队工作。他的儿子农国隆任连长，归梁文意指挥。这支队伍以前住在上金，现在驻柳州，中国国民党把他们看作是所属的一支别动队，农经猷和黄良作为下属任其调遣，实际上毫无实权。

复国军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被迫入伍的，如农经猷的佃户；有被抓来做饭、挑水、挑行李的伙役；也有盲目跟随他们的一些教职员。在大桥集中进行法西斯式的军训时，那些教职员工反对农经猷和黄良，要求分开单位。中国国民党安置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单独管理，企图将来加以利用。从这一派分裂出来的七八个人，我以前在上金见过面，他们曾表态寄希望于越盟。但到了柳州，看到自称越盟“领导人”阮海臣和陈豹的行动不符合他们所知的越盟主张，便采取了不信任和蔑视的态度。

—**阮海臣，陈豹一派和越盟的其他成员。**

## 一、阮海臣：

一九三六年初，胡学览先生约他到南京创立越盟时，他曾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分子。但后来得不到中国国民党的帮助，便返回广东。

一九四〇年底，当张佩公得到蒋介石集团的信任，他随张佩公到靖西。其后又到桂林求援。当时正好武元甲、武英、高鸿岭来到靖西，我们便安排武元甲接近他，争取他站到我們方面。按照胡主席的卓见，我们在桂林推胡学览先生出面活动，突出越盟的作用，把阮海臣也争取过来。一天，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由阮海臣主持，武元甲报告越盟在国内的工作和影响。蒋介石集团的《扫荡报》登了这个消息。张佩公在靖西知道这件事大怒，把报扔在地上，粗鲁地骂道：“阮海臣这家伙蠢得象条狗！”因此，在靖西召开解放会成立大会时，阮海臣以越盟代表的身分同我们在一起。后来张佩公被捕，接着，越盟的活动也遇到困难，多数干部转回国内工作。阮海臣便建议陈宝苍抓我，企图控制留下来的一些越盟成员作为资本，自称越盟负责人，从事政治欺骗活动。

## 二、陈豹：

阮海臣到靖西后的上述各项活动，都是由早已当上叛徒的陈豹为他出谋划策。一九三七年，暹罗共产党交给他带领几十位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的任务。但他害怕战争艰苦，把这些青年扔在香港，自己却东跑西颠。到一九四〇年底见到阮海臣，双方就挂上勾。他过去曾是党员，见到我们，嘴上

仍说自己跟随组织，实际上早已当上特务。他把党内情况和工作方针通过阮海臣向中国国民党密报，有时他亲自干。正是陈豹在背后捣鬼，给我们在靖西的负责同志制造困难。不仅如此，在我们的同志返回国内、我遭到逮捕的时候，他竟被委任为中校，公然穿上国民党军装到田东军事训练班（这个班多数是从国内来的越盟成员）要挟和欺骗学员。同时对中国当局和复国军以及其它几派越南人声称阮海臣和他是越盟的代表。虽然这个代表没有得到任何一个越盟成员的承认。

三、在阮海臣和陈豹声称为代表的越盟成员中又可分为三批：

最多的一批是我们陆续从国内送出来、在军事训练班的六十人。中国国民党当局把他们集中在田东，并安排陈豹去看过他们。这批人已转移到柳州，集中在距柳州七八公里的机场附近单独训练，他们受到很严格的管理，星期天才允许两三个人外出。而这是他们与柳州的越盟成员联系的唯一机会。经常得到外出机会的是黄明草，个别时候是黄文泰。

越盟的另一批人是报务员训练班，其中有四个越盟成员和三个秘密加入越盟的复国军成员，他们吸收复国军人员参加越盟进行得过于仓促，也没有必要。我对此作了批评，告诉越盟的同志继续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但不过组织生活。等学完后看是否真正跟我们走，经过工作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越盟成员。这批人中，黑柱是翻译兼做政治工作。

最后一批是住在阮海臣那里的一些越盟成员（那里也可看作是越盟办事处）。阮海臣和陈豹继续暗中单独活动，其他的人仍紧紧团结在一起。张中奉这时已不相信阮海臣和陈豹了，他在等待时机，打听风声。

\* \* \*

一个星期天，召开了一次经过周密筹划的越盟成员会议。大约上午八时，报务员训练班的学员，黑柱和住在办事处的几个人都已来了。军事训练班的学员因为环境的限制来不了。会议一开始，报务训练班的一个学员说：从李光华同志被捕后，几个月来，我们对国内外情况一无所知。同时听说我们的对外活动已经失败，中国当局不予支持，一些负责同志都已逃回国内。又有消息说李光华同志一定遭到杀害。今天，李同志已到这里，就请告知我们国内外形势和近日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后工作的展望。

我说：自从我被捕到现在，很多情况我都不了解。我建议阮海臣老先生和陈豹兄做报告。阮海臣的脸刷地一红，立刻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哪能报告。陈豹却一声不响地坐着。会场气氛忽然变得沉重，象一阵暴风雨即将来临，闷热无风。

我接着说：既然阮老先生和陈豹兄不讲，那我就讲几点主要情况吧。

一、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十分有利，越盟运动已扩展到北、中、南各地。

二、国外形势，正确地说，就是我们常称之为外交工

作的对外活动,我谈几点想法:当我们谈到外交,那就要站在革命团体的立场,民族的立场,以平等的资格同人家交往。假如对方不把我们看作革命团体的代表,民族的代表,我们就不与之交往。我们一些负责同志回国,主要是为了开展国内工作,而不是什么逃跑。任何时候革命团体都把干部集中使用到工作最多、最重要的地方。现在国内工作很多、很重要。而在国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不需要留下太多的干部。这怎么能说是我们的对外工作失败?有的人以对外活动为名,但不从革命和民族利益着想,只谋个人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和私利,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对外活动的干部,而是背叛者。

黑柱听后,立刻瞪着眼睛,举手说:“对这样背叛革命的人,应当消灭掉!”这句话有如当头一棒,阮海臣的脸刷白,站了起来想下楼。一位同志拉住他的手说,请您老坐下。阮海臣挣脱着说:总得让人上便所吧!挣脱手下楼去了。陈豹看到这种情景也站了起来,走进旁边他的卧室,从里面把门反锁。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笑了起来。黑柱又说:陈豹跑不了。他不出来,我们就砸门揪他。陈豹听见十分害怕,只好勉强出来,坐回原处。

对阮海臣,我们抓住他向中国当局声称是越盟“领导人”的话柄。一位同志以越盟成员的名义说:今天越盟开会由阮海臣老先生主持,如他半途退会,我们就要作出决议,把他从越盟开除出去,然后向大家通报,向所有在这里的越南人

通报，而且还要向中国当局通报。阮海臣知道后也很害怕，当有人下楼“请他”时，他也只好勉强回来。

会议继续进行。就这样给阮海臣和陈豹的初步打击就够了，我们还要争取他们留在越盟组织中，以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各方面的斗争。为缓和会议的气氛，我说：今天的会议，有的同志比较急躁，使阮老先生和陈豹兄不高兴。然而你们两位也得考虑，当前大家都关心和希望了解我们的团体和革命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你们两位却采取这种态度，使得大家都很生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工作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坚持这个原则，即使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能通过讨论解决。阮老先生是越盟的负责人之一，这没错，一九三六年越盟成立，他老先生就积极参加活动，以后他一直同越盟站在一起。目前柳州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应当相互谅解，紧密团结，才能应付局势的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革命有利。今天会议上发生不愉快的事应到此结束。阮老先生、陈豹兄和其他同志都不要放在心上。

听后，阮海臣和陈豹好象觉得保住了面子。大家领会了我的用意，都说：我们赞成李同志的意见，今后的工作就得这样干才对。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 \* \*

华军人越在积极准备着，但为这而服务的所谓的越南人

的“革命组织”，由于阮海臣和其他走卒的无能，直到这时还建立不起来。这一回，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只好自己出面来搞。他们召开讨论越南革命问题的邀请信秘密寄给阮海臣和陈豹，却落到张中奉手中，张给我看邀请信，问我怎么办？

立即召开了一次越盟会议。当大家到齐后，张中奉拿出邀请信来念，阮海臣和陈豹感到非常惊愕，不知所措。黎润之老先生、范越子和黑柱都说：越南革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四战区请我们去讨论，我们一定得去。但掌握国内情况和我们在国外的情况，只有李光华同志，应建议第四战区增派他参加，这样碰到重大问题，我们有三个人可以商量。

阮海臣不好拒绝这个意见，只说：对！对！于是会议推举徐志坚起草公函给张发奎。公函内容我们事先做了准备，写完后，阮海臣只好一字不改，签字、盖章，立即派人送去。当天下午，这封公函送了回来，上面批着一个“可”字，盖了张发奎的红印。

第二天清早，阮海臣、陈豹和我一齐到第四战区司令部，进入会议室，看到除了应邀前来的越南人外，还有杨继荣少将和梅公毅、杨声民两位华侨。过了一会，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代表张发奎来主持会议。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讨论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希望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尽快成立这个组织。情况紧急，时不我待。他说完，杨声民拿出一份印好的纲领读给大家听。读后，没有人作声。我站起来要求发言，我说：

这份纲领，刚听了一遍，还来不及考虑，但初步看到有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例如：

一关于“以三民主义作为今后建设越南的纲领”这一点，我认为三民主义是很好的，但其中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会不会使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害怕，不敢跟我们走？

一关于“以北越作为革命根据地”，据我所知，越南国土延绵千余公里，北、中、南三圻之间有很多山川阻隔。越南的抗日战争要求各圻、甚至各省都要有根据地。现在提出“以北越作为根据地”是否正确？也需讨论。

一关于“华军入越”，我认为可以为越南革命创造有利条件，但这是越南革命纲领，应谈及革命，谈及宣传、组织群众，如果只提“华军入越”，可能不够全面。

我说完话，吴石板着脸，梅公毅马上接上话，缓和一下凝重的气氛，他说：李光华同志的意见有的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和讨论。我们是否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重新研究这份纲领，同时讨论今后应做的具体工作。

好像事前已作了安排，杨声民走到吴石身旁，递给他一张列好几个人名的纸条。吴石看后说：我建议筹委会成员包括以下几位：

一阮海臣、农经猷、农国隆（农经猷之子）、黄良、陈豹、梅公毅、杨声民。

（当时张佩公在靖西被捕还未恢复自由，没有列名。）

听完后，我站起来说：中国方面，司令部提议谁参加筹

委我们都同意，至于越南方面，我们认为应让越南同志再交换一下意见。

吴石立刻打断我的话：筹委会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研究机构，过后就解散，有什么紧要，何必变来变去增添麻烦。

大家都说：参谋长的意见很对！

吴石起来，宣布会议结束，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

从此，每天早饭后阮海臣和陈豹都去开会。虽然规定每天会后都要向大家通报情况，但他们从不执行，只说今天没有什么事。

有一天，我见到杨声民，知道他爱到处打听，便问道：杨声民先生，筹备工作进行顺利吧？对这个组织的工作，我想谈一些意见，但不知怎么提出？他说：你可以跟我讲，我将向会议反映。

我说：我不了解会议进展情况，正在讨论什么问题，难以发表意见，提出来可能不合拍。

他说：我这儿有会议记录，你可以拿去看，有什么意见，尽管跟我说，我保证如实反映。说完，他从夹子里拿出一份记录交给我，约好以后再见面。

原来筹备会并未讨论那个所谓“越南反侵略同盟”纲领，而只讨论华军入越问题，并且确定了一份傀儡临时政府名单：

- 一主 席 阮海臣
- 一国防部部长 黄 良

—外交部部长 梅公毅

—财政部部长 杨声民

—宣传部部长 陈豹

—顾问 农经猷

……

情况极其严重！必须同大家商量对策。第二天，又召开越盟会议。我直截了当提出问题：

—阮老先生和陈豹兄去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回来不通报，说是没有什么，但实际上事情已经发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人家已经确定华军入越后成立临时政府，并拟定了政府成员的全部名单。

—阮海臣老先生任主席，但主席的职权如何？

—黄良是日本人提拔起来的，现在为何担任国防部长？

—梅公毅是华侨，怎么当外交部长？

—杨声民也是华侨，怎么当财政部长？

—农经猷对政治一窍不通，怎么当了顾问？

—还有陈豹兄，人家掌握了国防和外交，你宣传什么呢？为谁宣传？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中，国防、外交、财政都是重要部门，本来应由革命者来掌管，为什么人家安排亲日分子和华侨掌管而不敢提意见？更有甚者，这样的事不向组织汇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阮老先生和陈豹兄是怎么考虑的？怎样向组织交待？

原来在讨论和拟定临时政府名单过程中，阮海臣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权，心里很不满，但又不敢开腔。现在我抓到痒处，他坐起气来，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算啦！从今以后我不去开会了，管他们的！

从那以后，阮海臣和陈豹呆在家里，连着几天不去开会。张发奎发急了，只好写信请全体筹委见面，企图说服，阮海臣仍然顶着不去。我说：你老不去会得罪张发奎，如果他们不顾一切，把你老和陈豹都扔在一边，照样干下去又怎么办？阮海臣怕得罪张发奎，又考虑到在这个傀儡组织中自己将来的地位，不知怎样对付好？只得跟我说好话，问道：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

休会一会儿，我又请大家坐下来，继续谈我的意见，我说：要改变就得从根本改起，要改组筹委会，使我们能在其中起有力的作用。否则，象现在这样，不管提出什么意见，人家都置之不理。我想，明天阮老先生尽管去见张发奎，但不以筹委的资格，而是以越盟的资格，这样说话才有份量。阮海臣听了很高兴地说：那明天你和大家跟我一起去见张发奎吧。

第二天，阮海臣、陈豹、黎润之老先生、范越子、黑柱、隆弓和我一起去司令部。进入会客室，筹委会的人都已到齐。他们以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今天是张发奎约请筹委会成员开会，为什么不在筹委会的这么多人都来了？但是，没有人

开口，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交换着眼色。

不一会，张发奎从他的房间出来，杨声民大喊一声“立正”。所有的人象对上级一样站立起来。张发奎走过来，态度很随便，没有跟任何人握手，在正面荣誉席坐下。他本来就不知道谁是筹委，筹委会怎样进行工作，他见到我们以为都是筹委，便说：筹委会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要加快速度嘛！怎么这样慢吞吞的？

阮海臣心里本来就不高兴，他毫不客气地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筹委会，因为它是吴参谋长指定的，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张发奎一听愣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杨声民是个办事老练的人，立刻接着话茬说：报告长官，阮先生说得对，因为成立筹委会那天，吴参谋长没有听取几位越南同志的全部意见。最好长官让越南同志他们回去再商量一下，自己组成筹委会较好。张发奎有如从僵局中得救，立即同意，并劝越南同志要努力加快步伐。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回去时，阮海臣洋洋得意，认为这是他坦率敢言取得的胜利。回到家，我们请他坐在一起，对刚才发生的事作出评价，并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阮海臣立即说：现在我们要主动把越南人召集在一起，选出新的筹委会，李光华先生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两位华侨不参加筹委，只当干部。阮海臣讲完后，我请其他的人发言。大家表示还要考虑，没有人发言。我说：按阮老说的倒很干脆，但这样做会得罪司令部，

得罪张发奎、吴石和杨继荣，这样好吗？我想我们搞得简单点，不去动原来的筹委，只建议再补充几个人。这样，事情将会进行得比较顺利。阮海臣听了叫好，大家表示同意。

补充筹委会成员，我们曾考虑在脱离复国军那些人中选择一个人。但在同他们联系过程中，感到这些人比较复杂，虽然他们在复国军内部打击黄良和农经猷的威信方面做了一些事，但在别的方面就不起作用。从他们当中推选一人参加筹委会，要办许多繁琐的手续，这不一定有利，倒不如越盟推举自己的人。经过反复的推敲，我们和阮海臣商量，只提出补充李光华、范越子二人就够了。第二天，阮海臣写信把我们两人介绍给张发奎。李光华、范越子就成为筹委会成员了。

然而眼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并非从此一帆风顺。

\* \* \*

不久，“越南反侵略同盟”筹委又被召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开会，吴石、杨继荣没有出面。杨声民俨然以会议主持人自居。他慢条斯理地说：筹委会前几次讨论了一些问题，最近，阮先生建议补充筹委再作讨论。因此，今天的会议没有准备好的文件，诸位有什么意见请讲吧。冷场一会。梅公毅便说：前次李光华同志对纲领提出几点意见，司令部正在研究。李同志还有什么意见，请继续发表。我说：前次我发表的意见只是一种提法问题。今天我就这个组织的名称和性质再谈几点意见。我想，“反侵略同盟”这个名称具有国际组织的性

质，例如“中国国际反侵略同盟分会”可以吸收英、法等外国人参加。因此，人们也可能把“越南反侵略同盟”看作是这一国际组织的越南分会。但从纲领来看，它是指导越南革命的组织。因此需要考虑这个名称是否与纲领符合？我谈完，会上没有人发言。杨声民的眼光向着与会者扫视了一遍，好象催人发言，然后说：李同志提出的问题不是每个人能立即发表意见的。等我向张长官和吴参谋长汇报后再说。于是会议结束。从此以后，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再也不召集筹委会开会了。

显而易见，越南革命要怎样组织，怎样行动，并非由筹委会决定，而是由第四战区，正确地说是由重庆决定的。

这个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奋战，建立了许多广大的解放区。抗日联军在东北也加强活动。正面战场上，虽有一些爱国将领坚决抗日，但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遭到失败，日军占领了大城市。更坏的是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充当日本的走狗，公开与一切抗战力量对抗。日本袭击珍珠港并占领了香港、印尼、马来亚、缅甸等亚洲许多地方后，英、美不得不直接参战。蒋介石好象得到鼓舞，十分高兴，加紧准备华军入越。但为华军入越服务的这个“越南革命”组织由于这帮走卒无能，一直搞不起来。因此他们只得重新部署力量，搜罗骨干。在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计划受挫后，他们从重庆找来武鸿卿、严继祖，释放张佩公，同时找来邓

元雄(他的情况,见在南京的生活与斗争一节)和阮祥三,并在一九四二年底,把真正的越盟成员排除出去,不再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而准备组建所谓“越南革命同盟会”。

\*\*

我们早就预料,他们将把真正的越盟成员排除出去,因此当得知武鸿卿和严继祖要来的消息时,大家就要我设法撤走。我自己也感到有撤走的必要,因为严继祖是重庆的特务,在南京时就认识我,武鸿卿在昆明就知道我是共产党人。这两个人一来,我的真正身分必然暴露。

一天,我要求会见张发奎,坦率地对他说: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同这里的越南人就越南革命工作交换意见。但现在我看到,正如您所说,这里的越南人都不是干革命的,而只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这样跟他们一起搞下去没有什么好处。当前中国抗日,越南也在抗日,我希望您能帮助我,使我能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张发奎本来就有意把我弄走,听到我主动提出要求,感到十分称心,立即说:如果你同意,我将委派你到靖西“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伍根华那里,那边陈宝苍主任会给你帮助的。

这出乎我的预料!能回到靖西将是设法尽快回国的好机会!我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拿到了委任我为“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中校衔“译述官”的委任状。

我动身去靖西之前,会见了在这里的越盟成员,谈了一

些意见：

关于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一事，我们一直采取反对态度。现在我要去靖西，如果他们坚持成立，我们继续反对是不利的。因为这里多数的越南人，首先是复国军的几百人都希望有一个革命团体，由越南人自己领导以摆脱多年来他们被迫接受控制的局面。因此，在我走后，如果他们想要成立什么组织，由他们去，我们要宣传的是对这类组织不予信任，在这样一些人领导下的组织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这样做，事实证明我们的意见正确，越盟的威望便得以继续保持，将来有机会仍能争取群众。大家认为这样很对。

我向大家告别，返回靖西，作回国的准备。

## (七)

### 准备回国

这次离开柳州真是堂而皇之，持有相当高级职务的委任状，领到去靖西的路费。

现在靖西与一年多以前完全不同。越盟办事处已关闭，越盟干部不再来来往往；张佩公一伙中的越南人和华侨也无踪无影，甚至以前很热闹的饮食店和茶馆也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熟人。这种冷冷清清的情景不禁引起我今昔之感，但可以肯定，到了靖西就一定能够回国。

按手续，既然委任我为边区政治工作队的人员，那么首先就必须去向队长报到。伍根华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地说：

这次李同志来这里工作，肯定对本队很有帮助，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准备请你负责越文材料的出版工作，现在是由柳州调来的一位复国军同志负责。以前，在爆破训练班和在多次会议上，你都表现对译述工作很有能力。张发奎长官委任你担任这一职务是经过掂量的。

我知道得很清楚，出版越文材料的工作，只是印发一些内容反动的东西灌输给读者，实际上这些材料都堆在机关里或在边境地区乱扔，我们的群众谁也不看。从原则上说，我不应该参与这项工作，得找个理由推脱。我说：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有了一位复国军的同志负责，要是让我取代他，可能会影响团结，以后工作不好做。我建议让他继续做下去，我帮助校订他翻译或编写的文稿。这样做效果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有好处。除此以外，我可以翻译《三民主义》一书。这是一本重要的政治文件，需要认真准确译出。伍根华认为我讲的有道理，便同意了。

几天后，我按手续去见陈宝苍主任。见面时，他的态度还算和蔼，但流露出威胁的口气。以前他约见我时是会见客人，而现在我是他的部下。他说：你现在是我们的干部，就得真心实意地工作。我很信任你，但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却不一定。如果有什么疏漏，引起司令部的干预，我们也难以保障你的安全。你要知道，越南革命没有我们帮助，是搞不成的。你看林伯杰、杨怀南离开靖西回国至今，也只在边境一带转来转去，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伍根华队长为你安排了工作，

你应全力以赴。我听后，讲了几句客气话，便告辞出来。会见就算结束了。

到靖西几天，看不到一个熟人，不了解国内情况，更不了解边境地区情况。陈宝苍所说“林伯杰、杨怀南也只是在边境一带转来转去”，却无意中给我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我每天翻译《三民主义》，每天清早和晚饭后步出城门遛弯，有时走几公里再折回来。这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但每次都未发现问题。

\* \* \*

一个凉爽的下午，大约四点钟，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清楚地听到：今天下午六时，邓匡元副主任请你到城南门口饭店吃饭。我再问了一次，感到准确无误后，便连声答应，放下话筒。

真怪！邓匡元是个特务，是杨继荣的得力助手，在柳州的斗争中，他对我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今天专门请我去饭店吃饭？大概他请我去是要把我抓起来吧！这么一想，我立即整理好桌上的书报、纸笔，穿上衣服，缓步到饭店观察一下。在那里，只见门口站着四个士兵持枪并上了刺刀。对啦！邓匡元请我到这里来抓我是肯定的了！我径直往城外走去，转向熙熙攘攘的大街，一边走一边想办法对付可能发生的事。

怎样才不会被捕呢？逃往巴孟，那里有曾与我誓同生死的群众？但不妥！靖西距巴孟二十多公里，要沿公路走十来

公里才能岔上小路。走这条路脱不了身。要是被捕，又怎么通知自己人来营救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管去赴宴。如果被捕，群众自会知道，他们当中肯定有自己人。准六时，我来到饭店。边政工作队的一名大尉站在四个卫兵旁边，他向我打招呼，把我带进客厅。邓匡元的一个科长在那里等候，武鸿卿在昆明最阴险、最得力的助手黄国政也在场，那位科长请大家入席后说：今天邓副主任委托我邀请诸位吃饭，但非常遗憾，他突然有急事要办，不一定来得及与诸位一同进餐。大尉补上几句解释说：本来今天副主任只准备请黄国政同志，但我向科长建议，李先生新近得到张发奎长官委任为中校衔来边政队工作，应当一同邀请。得到他的同意，我立即打电话，来不及发请柬。

原来如此！这个晚宴以邓匡元的名义邀请，显然是表示隆重，实际上只由科长主持。他对我一无所知，听大尉这么一说，也就把我邀请了。黄国政早在昆明就认识我，他多少听懂了“张发奎长官”、“边政工作队”、“中校衔”等几个词，而且又是邓匡元邀请，他便认为我和他一样都是被收买充当走卒的。所以，对面坐在一起，看不到他有对立的表情。席间，科长、大尉和我都用中国话闲谈，而他光会吃，不会讲，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对他说，你要说点什么可以用越语说，我给你翻译。这样，话头多了一些，我可以减少应酬。饭后，当在喝咖啡准备回去时，邓匡元从外面进来。他瞟了一下宴席上几个人，装作没有看见，上楼回到他办公的房间。几分钟

后，科长请我和黄国政去见邓匡元。我们上了楼，邓匡元站起勉强握手，他只看看黄国政，不看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很对不起，今天我有事回来晚了，让诸位久等。我坦然象译员那样翻给黄国政听，提醒他要回几句话表示感谢并告辞，好让副主任早些休息。黄国政按我的示意一气讲了几分钟。我译成中国话，增减了一两个地方，使其有利于我目前的困难处境。讲完后，我提醒黄国政告辞。这次接见只有四五分钟，站着讲，没有坐下，没有喝茶、抽烟，虽然旁边摆着桌椅、茶具和烟。

从一九四〇年底在桂林同中国国民党开始接触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我看到他们使用的是两手：一面通过杨继荣公开打击；另一面通过陈宝苍进行安抚和收买。但这两手的结果只给后人留下笑柄而已。我准备着，有机会便逃回国内。

\* \* \*

一九四二年八月上旬，指挥所举办当地驻军和机关一次相当盛大的运动会。为时五天，有田径、排球、篮球、击剑、赛马等项目。周围群众竞相前来观看，有如赶庙会那样。陈宝苍指挥所下属各机关、部队也异常忙碌，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搞运动会。

第四天，运动会即将结束，观众更多，工作人员更忙。我利用这个机会，早饭后缓步走出城外，朝边界方向一直走去。当离靖西县城约四公里时，我回过头看没有人跟踪，立刻躲进树丛后面，脱下呢子制服，换上学生装，又到村里买了

一双草鞋和一顶笠帽，打扮得象个学生上路那样。

从靖西到北坡相距约六十公里，一般要走两天，沿途息脚的荣劳、葛麻两处，都有同情革命的群众掩护。只怕在葛申会出问题，但经过那里时没有什么动静，我快步前行。离葛申几公里，却遇上倾盆大雨，衣服全被淋湿，但这时已完全可以放心，不怕被人追捕了。

黄昏来到葛麻。这里的村长和副村长都同情越南革命。我不去座落街中的副村长家，而赶到村子外沿的村长家。在竹楼下，好象听到村长说话的声音，但踏上竹楼一问，他的弟弟却说村长不在家。我说：他不在，我上副村长家去。话是这么说，但下了竹楼我便向村外走去，过了一块长四五百米的山坡，再走一段，来到崎岖不平的石头山的一片玉米地，这时天色已晚。我的肚子很饿，在地里摘了几个嫩包米，剥开连子带棒，象马一样嚼碎咽下。然后在山后近旁一个地方靠着过夜。天蒙蒙亮，我立即起来赶路，爬过几座石头山就到达越、中边界界碑中国一侧的博万，进入一个村民家里。主人正在煮酒，看到我衣服透湿、泥污，猜出昨晚我一定遇到什么意外，随即安慰了几句，舀了满满一大碗热酒请我喝。我边喝边打听北坡的情况，忽然往下一看，黎广波正在走过，真是喜出望外。我放下酒碗，跑下竹楼一把抓住他，他笑着指了指后面说：“老爷子就在后边！”他刚说完，就看到胡伯伯从山坡下走了上来。一见面，胡伯伯说：一定是在外面碰上困难，跑回来了？好吧，你到大华家，我现在有事，以后

再见。说完，胡伯伯继续往前走。我上竹楼把酒喝干，烤干衣服，搓去泥斑，拍打干净，然后跨过边界。走完一个相当长的山坡，来到北坡大华的家。

## 第四部份

### 八月革命前后的岁月

(1942—1948)

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十四年之后（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五年在泰国，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二年在 中国），我获得了直接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参与创建越北解放区。

我回到越北，一个有利的条件是懂得泰语。泰语与中国交界的越北各省侬、岱等民族的语言基本相通。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在我担任海外党委书记期间，在靖西、龙州工作，常常回国汇报。每次回国都在胡伯伯身边，如在北坡山洞，在陇岚，在奎南，有时住下一两个星期。而这次回越北有一年多的时间，胡伯伯一直外出，但我对他创建解放区的路线以及教育干部、训练群众的工作方法是很有领会的。

这一部分包括：

- 在高平发展和巩固越盟组织。
- 南下谅山。
- 胡主席在中国被捕和他的活动。

——胡主席在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

——在新潮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

——八月革命后的岁月。

## (一)

### 在高平发展和巩固越盟组织

按照胡主席在博万的嘱咐，我回到北坡后，住在他以前常到的大华家，等候在和安府让畔的高平省委来联系。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葛麻的村长来了。

他问：昨天下午是不是你到过我家？我反问你知道是我为什么避而不见？昨天我经过你家的竹楼下，明明听到你的声音，上到竹楼你弟弟却说你不在家。

他连忙解释说：以前每次和你相遇，你讲的是普通话，这一回，见到我弟弟，你却说起广东话。我以为是国民党来抓人，便避到屋里，端着上膛的枪，要真是他们来抓人，我就干掉他几个，把房子烧了，把家迁到越南。我叫我弟弟提灯照你的脸，让我认一认，而你偏把脸转过去，我看不清。后来听你说要到副村长家，我猜一定是你，忙叫我弟弟到副村长家看一看，但又不见人，我又怀疑是坏人；再让我弟弟和另外两个人带着三支枪到村口去找，如果是李光华就请回家里来，免得他在草丛里或田埂上露宿遭罪。要不是他，就不管是谁，抓回来查问清楚。

我说：原来是这样。昨天你弟弟说你不在家时天已入黑，我说到副村长家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实际上一出村口，我就朝着越南的方向大步下了长坡，到了玉米地天已一片漆黑。山路崎岖难走，我只好在附近的石壁下过夜，天一亮爬山去到博万，越边界回到这里。

村长问：你干吗要这样折腾？我说：在靖西，陈宝苍想迫我给国民党做事，我坚决不干，只好跑回国内。在你家里借宿，万一夜里出事，你又不在家，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我只好连夜赶路。

村长抱歉说：我太糊涂了，使你遭了罪，很对不起。现在平安到达，我很高兴。

他说完话就要走。我请他多呆一会，我要写一封信给陈宝苍，并请转告柳州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大意说我由靖西返回越南是因为国内工作的需要，而不是逃跑，信中附上一首汉文诗：

蛇豕纵横日，  
鱼龙寂寞时。  
惊弓疑曲木，  
越鸟巢南枝。  
亡羊牢可补，  
失马福安知。  
龙泉岂埋没，  
闪光终有期。

我把信封好，托村长带回葛麻寄给在靖西的陈宝苍。

\* \* \*

在等待高平省委安排工作期间，我仍住在大华家，协助地方同志加强朔江六区一带的工作。大华的胞兄大林是这一地区的负责人，每当我给当地群众讲话或讲解革命问题，都由他给我翻译。

在北坡时，大林常常带我去访问群众，并让我参加当地干部的几次婚礼。有时还和那里的小伙子一起跟村中的姑娘们对歌。对歌，侬族叫做“连代”，同义、静地区唱《调情调》，北越各地唱《对口调》一样。开始由男方在村口或在女方住处附近唱。唱得好，对答得好使姑娘们满意，就被邀请到家里叙谈，交流情感。得不到姑娘们的邀请，就看作对歌失败，只好准备新的对歌，或不再去唱了。

经过同当地干部和群众接触一段时间，我听懂了相当多的岱语，并把一些政治常识编成简明岱语的歌谣，例如有一首《世界局势》的岱族歌谣，内容是：

现今的世界，  
分为五大洲。  
每个大洲上，  
又有许多国。  
英、法和德、意，  
均属于欧洲。  
越南和日、中，

均属于亚洲。

.....

一天，听下去工作的同志汇报，得知这一地区各村几乎都建立了组织，只有一个村的几个反动豪绅叫嚷，越盟分子一进村就要抓起来去向法国人和日本人领赏，因而干部不敢进村。这个村又是坐落在重要交通线上，这里建立不起组织，将影响整个地区。我们经过研究，想挑选几个擅于对歌的小伙子到这个村去对歌，如果得到姑娘们邀请回家叙谈，就把这当作立足点，在该村青年中开展工作，然后逐步争取村中老耆。通过他们明白地告诉几个反动豪绅，说越盟是抗法、抗日，救国、救民的组织，现在已经发展到各州各县，而且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谁要是反对越盟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找阿壬来商量。他是个对歌能手，到哪里唱都讨到姑娘们的欢心，有的姑娘还做了鞋子送给他。阿壬听后说，这是个好办法，不会出什么危险。果然，他带了几个小伙子去对了几次歌，姑娘们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去了。阿壬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全村都同意跟越盟走。当然，每次越盟干部进村，还要安排有思想觉悟的人看住那几个反动家伙。

\* \* \*

在六区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到和安县去见高平省委书记博望同志和以前在暹罗一起工作，八中全会上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武英同志。他们告诉我，胡主席认为向南推进十分重要。一年多来，武元甲负责打通经北泮到太原一线，但从谅

山到太原一线还没有人负责，省委的意思是要我负责南下凉山这一线。我当即接受，并建议省委调给我几个政治坚定、道路熟悉、能随机应变的干部。省委同意了，但调配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很快解决，眼下先协助省委就地加强和开展越盟工作。

我在省委机关住了几天，就到陶岸开办地方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海阔同志负责，他同时也象六区的大林那样给我当翻译。陶岸是个群众组织相当广泛的地区，几乎各村都跟着越盟走。训练班传授革命知识和工作方法，每期十天左右，学员少则十人，多则二十人，大都是男女青年，偶尔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或十三四岁的少年，所有的学员都不识字。

培训办法很简单，每节课提出几个问题，先让学员自己解答，答不上来，才由我作简明易懂的解答，再让每个学员把答案重复两三遍。等大家都能解答问题时，就算学完一课。由于群众不识字，也就用不着看书本和记笔记了，碰上个别会写字的学员，也不要求做笔记，避免泄密。训练方法举例如下：

一讲解宣传问题。首先提问：什么是宣传？解答：宣传就是让群众仇恨法国人、日本人，参加革命。

一讲解组织问题。首先提问：什么是组织？解答：组织就是劝人参加越盟，或参加青年团体、妇女团体。

一讲解政治常识。提问：巡抚、府官、县官、州官有没有本事？学员一般都回答有本事。因此就得解释说，这些人

很愚蠢，因为法国人、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把侵略者看作亲爹亲娘。我们才是真有本事，因为我们懂得团结抗法、抗日，救国。

一游击队为什么能打法军和日军？解答：法军、日军虽强，但游击队更有对付的办法：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一什么是守秘密？解答：守秘密就是不管谁问都说：不曾听到，不曾看见，不知道。使敌人“有眼睛象瞎子，有耳朵象聋子”，我们的活动敌人摸不着。

此外，也提出生活中一些要求。例如家庭要和睦，邻里要亲爱，对同志要忠诚，对敌人要提高警惕。

培训项目虽然很简单朴实，但效果却很好。受过培训的人回去后都成为干实际工作的干部，他们不但能争取家中的父母、兄弟姐妹，而且把村寨中的其他居民也争取了过来。

这种简单朴实的培训方法是我在暹罗时从胡伯伯那里学来的。也是最近期间，我来往于靖西、高平之间，在北坡、陇岚、奎南经常接近胡伯伯的收获。

\* \* \*

在陶岸一段时间后，我返回让畔，准备带干部向南推进，建立通往凉山一线。但高平省委仍未把同行干部调来，我只好继续留在让畔协助发展和加强这一地区的越盟工作。

干革命本是份内事，为什么又说是协助呢？这是因为胡主席主张平原地区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直接参加当地

领导班子，以免当地同志产生依赖思想，在工作中不能当家作主，因而我们只以顾问身分工作，切实尊重当地同志的自决权。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以后回到高平工作的干部，如范文同、武元甲、高鸿岭、黎铁雄等，都以顾问身分工作。这是胡主席倡导的一项十分英明的主张，目的是防止从平原地区来的通常有较高政治、文化水平的干部包办一切。同时也为了加强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的自重和自决精神。

让畔群众中虽然有不少人懂得越语，但我外出工作，经常要和高平省委书记博望同志同行，他熟悉当地情况，必要的时候能给我当翻译。

这期间，我住在垄威莫王朝旧城址附近的琏大爷家，也就是高平省报和发行机关所在地。虽说如此，但更经常的是住在高山上的山洞里，有时得到法军出动搜索的消息，便呆在山上，由当地干部送米送盐上山，自己做饭。当时所写《仙境》一诗就是描述这种山居的情景：

高高山岭入云端，  
怪石嶙峋丛莽间。  
成年寂寞人迹罕，  
整日鸟兽啼声喧。  
幽凉情景笔难写，  
谁人至此不茫然。  
步步攀登上高顶，  
愈高愈觉天地宽。

奇峰屹立巍峨处，  
繁花茂叶是仙寰。

……

\* \* \*

几个月后，省委调来阿黄、阿南（几年前他们都相继去世）同我一起到高平春山地区，建立通往凉山长定府的路线。去春山必须经过黄花探村。这里的群众是跟着越盟走的，但法国人强迫村民在村庄四周围起竹篱，天入黑就关闭村门。村里的同志为给干部夜晚进村了解情况或找人带路，安好了一个活动的篱柱作为出入口。

出发去春山的当天，博望同志特别吩咐要注意身体。他说，外边的人到那里住上三四天就害上疟疾。我听了不怎么相信，但到春山三天后真的打起“摆子”来，这是一种丛林恶性疟疾，发起冷来盖三四床被子还直发抖，但一阵发冷过后又恢复正常饮食。

在春山，我住在陇坡村一位老大爷家里。他有四个孩子：老大金夏，不参加公开活动；老二风菊，丈夫已去世；老三金庆，已成家；老四金杯还是个青年。他们四个人都是这一地区的骨干。经过当地同志积极展开活动，越盟组织很快得到发展和加强。我在春山住了两三周，便回让畔省委住了几天以掌握情况和交换意见，同时领些医治疟疾的药品。这些药品都是通过群众进入高平市区零买凑起来的。为提防法国人发现，每次都不敢多买。防治疟疾的主要药品是奎宁，每

次最多能领到几十片，少则十片左右，不发冷发烧就停药，留着药片防备，不敢多用。

一九四四年初，省委又来了一些干部，其中有谭明远同志，他化名技师，很有能力和冲劲，因而南进工作发展相当迅速，在不长的时间内，春山的越盟组织不但得到加强，而且还发展到了石安州一带以及与谅山省接壤的高门、北溪所属卜上、那洼、那洞、那该、那木、那贯、南担等地。这些地方开办了约十个训练班，每个班有十至二十人，训练时间十天左右，办法和以前在陶岸、让畔一样。

石安州民间特有的对歌调叫做“连厢”，每首四句三韵，有如唐诗。也许这是从前某位儒生按唐诗格律用岱语作歌，后来广为流传。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虽不善对歌，但仍努力写出了几首岱语的“连厢”，教当地男女青年对唱，如收入我的《诗选》中的《话说南国》就是这个时期所作。

大约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法帝国主义变本加厉镇压革命。我在春山，有时也不得不住在金庆同志家山坡地附近的草棚里，当地同志常来送米送盐和汇报地方情况，偶尔也进村与群众接触。回到让畔仍住在山洞里。这时，高平省的多数干部都离家离乡，进山搭棚居住。这样的人多了，法国人便沉不住气，责成高平省巡抚下令各地乡、里长设法诱劝这些人回村自首。有个干部失去警惕，主张让干部回去自首，“以利于工作”。为了和这种倾向作斗争，我在《越立》报上发表《官衙诡计》和《反迫害》两首诗。

《官衙诡计》中有这么几句：

身为救国革命者，  
要忠心耿耿不忘。  
官衙设骗人圈套，  
革命者决不上当。

《反迫害》诗中写道：

狂犬已途穷，  
乱噬乱咆哮。  
日、法已途穷，  
肆意逞凶暴。

……

我们要决心，  
反击以其道。  
日、法并不强，  
一定要打倒。

## (二)

### 南下凉山

尽管法、日加紧镇压革命力量，但南下凉山是一项务必完成的战略任务。原来计划从高门、北溪方向推进，后因有一天两个同志在高门附近河里洗澡，把枪和衣服搁在河岸上，被外出巡逻的高门保安队从远处看到，报告了保安队长阿体，

阿体下令他的手下在高平与谅山交界地区日夜警戒。因此，向高门、北溪推进的计划只好停了下来。

约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回让畔，读到陈宝苍转来一张《广西日报》，上面有刊载胡主席汉文诗，他并附来口信说明主席已经恢复自由。原诗有四句：

云拥重山山拥云，  
江心如镜净无尘。  
徘徊独步西峰岭，  
遥望南天忆故人。

虽然陈宝苍附来口信说胡主席已获自由，但我仍反复琢磨诗中的深意。我猜想：“云拥山”句是说斗争极其复杂；“江心如镜”句暗喻革命仍然充满活力，如江河奔流，明洁无瑕；“徘徊独步”句明显告知自身已获自由；“遥望南天”句示意想要回国。我把自己的想法告知博望和武英同志。同时要了几十片奎宁准备去谅山。这次确定不再从高门方向走，改往胶贵到长定。这条线路要爬山涉水，十分难走，途经那绵、那告几个村，还有死心塌地跟着法国人的走狗挡道。但我们仍努力设法越过这些障碍，到佐虑，直下七溪。这曾是黄文树同志活动的地段，早就有了群众基础。

到达七溪，我们经常住在章村黄明昌同志家和洞葛陈德馨同志家。在那里，巩固已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并向周围发展。我们在巩固和发展工作中，得到许多早就认识的当地同志有力配合，如曾在靖西爆破训练班的如意、阿林、开乐，

以及一九四一年在靖西解放会成立大会上见过面的闭河经和在龙州认识的闭振兴、黄文乔等。他们都能掌握越盟的路线，对当地的情况也很熟悉。

最近几年，凉山地区遭到残酷的白色恐怖，但我们这些同志的活动很机智，既巩固了群众基础，又得到较大的发展。他们在高平的那闲、那外、那戛和凉山的那告、巴谢、岱虑站稳了脚跟，通往七溪的道路便一往无阻了。

上述地区虽已有越盟组织，但尚未普遍建立。经胶贵南下交通线入夜才能通过，胶贵位于深山密林里，沿途各村寨来往都要涉过山溪，夜行要打火把。我们不能点火，只好用手帕包着几只萤火虫挂在前面行人的颈后，随后的人跟着萤光走。有时涉足渡溪，遇到曲折难行的地方，便只好由响导拽着走。碰上特别崎岖的地段，前行的人等后行的人把脚放稳后才能挪步。

在高门地区，唐文识、陈文廉两个同志掌握了考章、奎鸟、奎海奏、奎托、奎詹、奎肥等地段，阿全和其他同志在别的地段也建立了群众基层组织。

不久，我们还发展了七溪据点的几个越南班、队长。老家在义安的队长阿恩和老家在高平的班长阿台和我们保持着密切关系。我们对他们讲革命形势，在陈德馨同志家里请他们吃饭，并到他们家属宿舍去串门而安然无事。

阿恩和阿台建议我们来个深夜突然袭击，占领七溪据点。据点门卫和据点的几处重要地段由他们派自己人把守，他们

带我们一起去抓据点的法国指挥官，然后下令士兵把武器弹药运到我根据地。据他们说，据点里几乎所有的越籍军人都要跟随越盟，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拿下据点。

说起来是这么简单，但起事之前要深思熟虑。谭明远必须回高平请省委补充一些好子弹。因为我们随身带的手枪，曾在晚上碰到保安兵开枪还击时，发现子弹“瞎”了，打不响。而我自己还得去中国龙州布局一带与群众联系，以防拿下据点后，法国人从各地调兵反扑时队伍好撤入中国境内。一九四〇年，朱文晋领导北山起义失败后，就曾带领部队在布局地区隐蔽。一九四一年我在龙州建立越盟办事处，也常到那里与当地群众和国内同志联系。布局的群众革命觉悟很高，他们把支持越南革命看作自己份内的事。当听到我说想拿下七溪据点，他们立即表示，如果越南方面遇到困难，过来百把人也能供应。

虽然我们有布局群众作后盾，但攻占七溪的主客条件还未成熟。我想还得再去靖西与陈宝苍恢复联系，同时打听胡主席的消息。有了这个打算，我立即写了一份电报托人到龙州邮局发给张发奎，大意说：我拟往靖西唔陈宝苍主任，希长官同意。

两天后张发奎复电同意。我拿着这份复电作为通行证，在中国境内沿着以前走过的路线，从布局经龙州、科甲、保圩、硕龙、下雷、化洞到靖西，再经阳楼、葛麻回北坡。走这条路远一点，但比较安全，还可以看看我离开了近两年的

这曾经熟悉的地方的情景（我是一九四二年八月离开这里回国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启程去靖西，到了指挥所，陈宝苍的态度仍很殷勤，亲切交谈，还设盛宴招待。席间，他问及许多有关法、日方面和越南革命发展的情况。我说，现在越南再不是法国人当家了，实际上是被日本控制。法国人也想反对日本，但他们又肆意镇压越南抗日力量。因此我们主张既反法也反日。按照这个方针，许多革命组织迅速发展，活动范围十分广泛。

谈了越南形势，话题转到胡主席的那首诗。陈宝苍问，前些时曾寄去一张广西报纸，上面写有胡志明同志的一首诗，想必你已看过？我说看过了，而且还读到您的和诗，我也写了一首请您过目，并请您转到柳州给胡志明同志。我的诗如下：

碧空未扫净浓云，  
难挽天河洗馮尘。  
声气相求终有应，  
断金频梦见佳人。

“断金频梦见佳人”，对胡主席来说是时时刻刻渴望得到他的指教，对陈宝苍来说是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断金”是借用中国古书“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句。陈宝苍听我读后，称赞写得好，叫人拿来纸笔，让我记下。并告诉我胡志明同志已获完全自由，正作准备，也许不久便可回国。

同陈宝苍见这么一面很有收益。

第二天我动身回国，还是在阳楼过夜，隔天就回到北坡大华家，呆了几天后去让畔。

这时，高平为敌人白色恐怖所笼罩，我住在堑外石山上的草棚，不再住在璩大爷家了，有时回村里活动。不多久，我见到武英，得知胡主席已回到国内，批评了高平、北潞、凉山三省干部会议悬案中有人提出立即发动游击战争的主张。

还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我返回蓝山找高平省委，遇到范文同、武元甲和武英。武元甲起草了一份类似行动纲领的文件交省委讨论，其中提出在高平、北潞、凉山三省发动游击战争和组织游击队的具体意见。我看后认为立即发动游击战争的意见不妥，因为有两个条件尚未具备。一是还没有国际联系（胡主席还在中国被扣，因而未能掌握国际形势动向）。二是越南北、中、南三部之间的联系尚未畅通。如发动游击战争，必将遇到种种困难，陷于孤立。当然，此时能组织游击队的地方，仍应着手进行组织，加以训练，必要时也可以打游击。

武元甲说，既然赞成组织游击队，就得赞成发动游击战争，因为两者密切相联。范文同赞成这一主张。我说了许多理由他们都不听。后来只好建议武英向省委讲明，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发动游击战争是不切合实际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召开高平、北潞、凉山三省干部会议（我在凉山未出席）。会上热烈讨论了发动游击战争的问题。

武英认为目前还不能这样干，许多同志拿不定主意。最后，会议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放一放，待进一步研究，未付表决（现在有些资料说在三省干部会议上决定发动游击战争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次会议，除了提出发动游击战争问题外，还提出建立解放军问题，但也没有作出决定。而武元甲却着手组建，武英以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布解散。

当双方为这些问题相持不下时，胡主席从中国回来了，他解释说：

一．主张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是不对的，目前情况下，发动游击战争将会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仅就军事方面来说，干部和武器都不够，没有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

二．目前还未到用解放军名称的时候，只能用越南解放军宣传队的名义，它的性质是政治重于军事，是武装宣传队。同时胡主席对武英宣布解散的做法也作了批评，认为不够慎重。

我得知这些意见后，如释重负，十分振奋，坚信有胡主席对重大主张和全局掌舵，就不必担心了，只需努力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

\* \* \*

高平继续遭到敌人残酷的镇压。东溪越盟新发展地区的群众感到惊慌。一天，大约晚上十时许，我和阿黄、阿南到一个群众家去，主人说家里来了生人，可先到地里的草棚暂

避，等生人走了再进屋。我们知道这是推辞，哪来的生人，便说，真有生人，我们以乡长的名义查问究竟。主人说，不必了，请你们到屋旁牛圈上的竹楼先呆一会儿，天亮那个人走了再请你们下来。第二天，我们到南坦附近的另一群众家，受到亲热的接待。还听他说，村里有个巫师劝村民别让你们进村。我们请他找巫师一起来交谈。巫师和村民们听了我们讲的道理，不再担心受怕了。这位巫师不但赞同我们进村，还请我们住到他家里。在听我们讲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后，新参加组织的群众稳定下来，而且我们的工作发展到那谷、奎洪一带许多村寨，同时还办了三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新干部。

正当我们在整顿东溪地区的工作时，日本人从法国人手里夺得了政权（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机构全部瓦解，除极少数乡、里长和保安兵继续盲目反对越盟外，其余都愿意支持越盟或对越盟的活动不予过问。我们掌握这个机会加紧活动，白天公开携带武器走村串寨，我们每到一处，就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壮大群众的革命声势，压倒少数执迷不悟分子的气焰。

东溪地区工作结束，我们转到春山开了几次类似规模的群众集会，然后返回让畔会晤博望同志，正巧这时遇到胡主席从北坡南下，我跟他同行了一段。途中胡主席又打起摆子，范越子同志用奎宁给他作静脉注射，说这样效果来得快。我们不懂得药，以为这样处理是对的。一九四六年我在四联区

工作，有一次打摆子，护士也用奎宁给我作静脉注射。针头刚拔出来我就昏了过去，自己感到好象活不成了。幸好周围同志给我作了好一阵热敷才苏醒过来。后来问医生，才知道静脉注射奎宁十分危险，以前范越子给胡主席作静脉注射没有出事，实在是胡主席的大幸，也是全民族的大幸。

跟胡主席同路一天后便分了手。他去宣光，我去东溪赴谅山。

这次去谅山，我带了部分新增派的干部。潘杯负责电台，与中央联系；男同志有谭明远、黄田、国瓚、保安、德荣、新钢、俊生等；女同志有月娥(云)、武胞、阿燕、阿纯、阿玉、阿碧等。增加这批干部，加强了长定地区工作的开展。

\* \* \*

日本发动政变后，法军虽已瓦解，但长定地区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有的地方还有一些顽固反动分子死心塌地与革命作对，他们警戒防备极为严密。不久，我们缴了那告里长的枪并解决了这个反动家伙。接着写信责令在陇坡的副里长交出五枝枪。派武装把在平君的副里长阿肯抓起来，这家伙过去曾砍下教师阿利的头送给法国人，领了几十斤食盐的赏，至今仍顽固反对越盟。自此以后，反动势力有所收敛，群众消除了顾虑，积极支持越盟。

对当地形势有较大影响的另一件事是中国境内的土匪趁法国人垮台，日本人还未建立起稳定秩序之前，越境骚扰，抢牲口、抓妇女。当地群众担心受怕，不知道越盟能否保卫

他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组织打土匪。打了几仗，土匪不敢骚扰了，群众有了信心。自此，许多地方州县和乡里的保安队才自愿接受越盟干部的指挥。

还有一件大事是，我们打下婆马据点，打死了顽固的乡保安队头子，在据点上插起越盟的旗帜，收缴武器并宣布保安兵愿加入越盟队伍者欢迎，愿回家者保证安全并给以帮助。这一行动使群众十分佩服。但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陶醉于胜利，却犯了一个错误，把队伍呆在据点内好几天，幸好及时纠正，只在据点上挂越盟的旗子，队伍撤到附近各地，在群众中展开宣传、组织工作。同时规定日军开入婆马据点也不进行反击，以免引起敌人摧残当地群众。我们要积极保存实力，准备发动更大的进攻。果然，日军来到婆马，发现据点空无一人，以为越盟在采用中国古时诸葛亮的“空城计”。只在据点周围转了一圈就全部撤回七溪。

经过上述这些活动之后，各州、乡保安队都表示愿意接受越盟指挥。起初，由于我们部队数量不多，没有要他们的枪，只同他们约好，部队需要时调用。

还有一个重要事件是金童乡一名越盟干部蜕化变质，强迫群众捐款，公开胁迫一位已有对象的妇女与他同居，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天，我们带领一个排到那里，召集群众到丛林里开会，传达政策。当这个干部来到主席台跟前准备汇报情况时，会议主席团立即下令逮捕，卸了他的枪，并从他身上搜出几千块钱，问过群众，是他逼迫群众捐献来

的，当即把钱退还捐献的人，同时就地处决了这个干部。这一消息在各地引起轰动，法国建立的统治机构自告解体。越盟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或争执都来找越盟帮助解决，实际上革命政权已经形成。许多地方的乡、里长交出印鉴，乡丁和保安队主动向越盟缴枪。越盟的武装白天公开活动，所到之处，反动头人或逃走，或投降。人民安全得到保障，到处组织学习。

除长定外，朱文晋同志已打通从北山至新潮一线，开乐、闭振兴、黄文乔等同志也拿下了那岑、同登、文奠、平嘉、恬系等据点，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高平的东溪、北卜据点也向越盟投降。这样，高平到谅山一线完全打通。高平的武工队开到谅山，与当地武装紧密配合。法国军官和各府、县官员纷纷逃跑，乡保安队和伪军都投向越盟。

胡主席一九四二年八月在中国被捕，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才回国直接领导工作，但越北的同志和我个人在这些年的活动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遵照胡主席提出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机动灵活的工作方法进行的。

### (三)

## 胡主席在中国被捕和他的活动

胡主席决定去重庆会见蒋介石是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从来很少有人知道，有的人虽有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避免

谈及。也有人说胡主席去重庆是为了与中共中央联系，不是去会见蒋介石。这种说法是由于没有看到当时越南革命应取得国际地位的需要。具体地说，没有看到越南革命和中国这个反法西斯盟国建立明确关系的需要，因为中国当时为日本占领大片国土，正在进行抗战，并准备派遣军队进入越南。

胡主席途中被捕，后遭到一年多的囚禁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由于他的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机敏灵活的行动，在柳州争取了张发奎和肖文的同情，被推选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执行委员会，并获得行动的完全自由，为回国领导八月革命前的准备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八月革命后越盟战胜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事态简要分以下三点记述：

- 一胡主席被捕与我们的营救工作。
- 一胡主席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
- 一胡主席获得自由回国。

### 1. 胡主席被捕与我们的营救工作。

一九四二年底，胡主席在中国被捕是众所周知的，但大多只知其梗概。至于他怎样进行活动，使自己取得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地位，却鲜为人知。有的人在当时了解到胡主席的若干情况，撰写回忆录时却大肆吹嘘，编造一些细节，侈谈自己是知情人，当时如何得到胡主席的信任、教导和接受交托的任务。事实上，胡主席在柳州还未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时候，他把精力集中在锻炼身体，刻苦读书、读报和翻

译一本《三民主义》的书上，既不发表政见，也不和任何越南“政治家”接触，因为他对这些人是有警惕的。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后，他同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希望大家都为实现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标真诚团结。正是这种态度，才得到张发奎的敬重和信任，最后让他完全恢复自由。在本节重述下列的具体事实是参考了新近搜集到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原始材料，作为更明确和肯定的证明。

事实是，在高平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越盟组织遍及越北各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在迅速发展。这时，胡主席感到必须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和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宋庆龄，正式与反法西斯五大盟国之一的中国建立关系。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黎广波从北坡护送胡主席到中越边境，托付一位中国同志给胡主席带路后，便自己回国。胡主席走到广西天保专区足荣街时被捕。

胡主席去重庆是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代表的名义向蒋委员长致敬，并会见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负责人商讨抗日事宜。以这样的名义，正在抗日的中国本应亲切接待，鼎力相助；但中国地方当局却借口证件不合规定，不问情由，任意逮捕，当作囚犯押解。

胡主席在足荣被捕的消息，我们直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底才从中国群众那里获悉。这时，高平省委当即决定一方面发动各群众团体和海外侨胞联名致书中国当局，要求立即释放正在领导越南抗日运动的老革命家胡志明；另一方面派黄庭

勇到越中边境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要求立即释放胡主席。原电用中文，内容如下：

“孙院长：敝会代表胡志明赴渝向蒋公献旗致敬，行抵靖西被扣。伏乞电释”。

孙科接电后即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十一月九日，吴铁城致电广西省政府和张发奎立即查明释放。但这时胡主席正被押解在同正与南宁途间，广西省政府和张发奎未能查明。

大约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到让畔同武英、博望和范文同研究对策，认为只致书、致电中国当局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必须造成国际舆论才能对中国国民党施加压力。我们决定致书世界各大通讯社。致中国中央通讯社的信由我用中文书写；致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法国通讯社的信由范文同用法文书写。内容如下：

“中越前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最近中国当局与越南革命党之间发生一次极为严重之误会。革命同志胡志明代表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赴重庆向蒋委员长献旗致敬，并与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商讨事宜。九月二日行经靖西至天保途中，为中国地方当局以通行证不合规定为由，擅加速捕。

“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赖胡志明同志之奔走，成立于一九四一年。该会包括青年、妇女、农民等各人民团体，有会

员二十多万，支会分布于越南各地，自南圻、中圻以至北圻。

“胡志明同志系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之重要成员，享有崇高声望。此次在华被捕，造成越南革命党人对华之极大不满。近来许多越南人民团体曾致书重庆陈明情由，但迄今胡志明同志仍被看守。建议贵通讯社向中国当局说项，请其立即释放胡志明同志。

“此电文如贵通讯社认为必要，可予公布。”

当驻重庆各国通讯社收到这一电文时，胡主席已被解送到桂林，但几个月过去了，桂林仍未查明，他又被解送回柳州交第四战区处理。第四战区把他当作政治嫌疑犯，拘禁在军人拘留所，供给充足的食物，允许阅读书报，不服劳役。一九四三年七月，第四战区查明他是一位国际活动人物，张发奎立即交给战区政治部侯志明将军负责“感化”工作。

侯志明敬重胡主席，常同桌吃饭，以平等态度交谈，但每当问及本人身分，胡主席拒不作答。后来由于内线反党分子陈豹告发，他们才知道胡志明即李瑞，也即共产党和越盟的领导人阮爱国、黄国俊。

反党分子陈豹向中国当局告密的目的是企图使胡主席完全失去自由或被杀害，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但不料张发奎得知胡主席的身分后，反而更加敬重和优待。一九四四年一月，张发奎致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胡志明迄留政治部察看，予以礼待感化”。当时，张发奎有意释放胡主席返回越南。对此，蒋介石驻柳州的特派员甚为不满，但张发奎仍不为其所

动。

## 2. 胡主席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

如第三部分所述，第四战区企图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作为越南革命的领导机关，并以越北为基地，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本和成立越南临时政府为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效劳。对这些不合理的主张，我们曾以越盟的名义予以揭露，使第四战区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不再谈论成立越南反侵略同盟问题了。后来以重庆为靠山的越南国民党人武鸿卿、严继祖从昆明来到柳州，第四战区就改变了主意，准备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把越盟完全排除在外。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成立大会在柳州正式开幕。大会选出由七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严继祖、陈豹、农经猷、张中奉。常务委员为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从名单上看，张佩公、阮海臣排列在前，但事实上，属重庆方面的武鸿卿、严继祖却占了优势。

为使越南革命同盟会变成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有力工具，张发奎委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兼任“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

侯志明本来准备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整顿问题，但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各持己见。明争暗斗，互相排挤，使会议未能开成。直到这一年的年底，越革内部状况依然如故。

张发奎见侯志明办事不力，便亲自出面抓指导权，同时以肖文将军为副手，成立了指导代表办公室，由肖文任主任。

肖文与胡主席交换意见，提出要召开越革代表大会，增加包括胡主席在内的新领导成员，以整顿越革组织。胡主席说，目前越革成员都是侨居国外人士，没有国内代表，因此，说召开代表大会是不适宜的，应称召开一次海外“越革各团体代表会议”更为合适。至于我（胡主席）个人参加越革与否，由张长官和肖主任决定。胡主席还建议，召开会议应邀阮祥三参加。阮祥三虽曾是亲日大越党人，但有学问，如能与会，他必定十分感谢张长官，可能自我改造成为抗日队伍之一员。

张发奎听了肖文汇报胡主席的意见后，十分赞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整顿越革领导机构。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会议在柳州召开，到会各团体代表十五人，包括原属越盟方面的云南越侨解放会代表黎松山、驻南宁别动军代表阮清同（越盟成员）、龙州解放会代表胡德诚（越盟成员）、大越党代表阮祥三和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代表胡志明。

上述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几个团体，过去都不是越南革命同盟成员。

经过这次整顿，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七人中，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三人改任监察委员会委员，补入执委的有黎松山、蒲春律和陈廷川三人。胡主席和阮祥三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陈廷川被撤换，胡主席补为正式中委，在越

革中取得了稳固的地位。

### 3. 胡主席获得自由回国。

在柳州完成越革改组（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后不久，约在六月初，肖文去昆明改组云南越革分会。改组的结果，分会执委五人中越盟成员占了三人（范越子、李涛、范明生）；常委三人中越盟占了两人（范越子、李涛）；监委三人中越盟占了一人（杨宝山）。这使武鸿卿、严继祖十分不满，他们竭力反对。肖文当即下令将正在东兴活动的严继祖和武光品抓了起来，并准备以“违犯纪律，破坏越革分会”的罪名逮捕在昆明的武鸿卿，后由于重庆方面的庇护而未果，但自此不准他再到柳州活动。

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胡主席获张发奎允许完全恢复自由，并即准备回国。

回国前，他向张发奎提交了一份工作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援助要求。工作计划包括在边境建立两个相隔不远、能互相呼应的游击根据地，共需枪六百枝；此外尚需枪四百枝以便编组若干小队，动则游击，静则武装宣传。经费方面，要求提供印支币二万五千元，作为开头两个月的伙食费，中国纸币若干作为从柳州回到越南的旅费。个人方面，胡主席要求：

- ① 张发奎写一封致越南各爱国团体的信。
- ② 发给越革中央派胡志明回国工作的委任状。
- ③ 发给越南军用地图一幅。

④ 发给长期证件，以便往返。

⑤ 提供部分宣传品，如《日寇暴行录》及图片等。

⑥ 提供自卫手枪一枝。

⑦ 提供个人初期必需的费用。

张发奎接到胡主席的工作计划和个人请求事项后，即发给：

一长期来回使用护照一张，其它必要证件和部分药品。

一中国纸币七万六千元。

至于建立根据地和组建几支游击小队的经费，张表示尚待研究，未能立即提供。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胡主席同十八个干部一起离开柳州，经龙州、靖西、平孟回到高平。

根据莫一凡同志（广西人，一九四二年到越南参加革命）回忆，胡主席到达平孟，由于身体不好，加上当时国内敌人对革命残酷镇压，因而只好隐蔽在平孟垄依村林建通的家里。垄依村的同志怕呆在村里暴露，便在山里搭一个草寮给他住，指定几个同志轮流照顾和保卫，过了不久，才把他送回北坡。

#### （四）

### 胡主席去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

胡主席去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一事也很少为人所知，

有人略有此闻却避而不谈。我认为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必须充分叙述，使人们弄清事实真相。本节所谈的事实，也参考了新近收集到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原始资料。

一九四四年冬天，美国派出多批飞机从中国起飞袭击在越南的日军，其中一架为日军所击中，坠落在高平市附近的山林里。飞行员珊中尉被日军追捕，后为当地群众收容和掩护，送到边境地区见胡主席。一路上，他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接待，为难的是他不懂得越语和法语，无法交谈。他见到胡主席时，忽然听到一句英语：“你好飞行员，你从哪里来的？”他十分激动，拥抱着胡主席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好象听到我在美国父亲的声音。”交谈了几句后，胡主席问：“现在你有什么要求？”珊说：“我的指挥机关在昆明，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把我送到中国边境，我便可以回到昆明。”胡主席说：“我也有事要去中国。你可以跟我同行。”珊说：“这样太好啦，到中国后，我将建议我们的指挥机关邀你同去昆明。”

就这样，很快地作出了启程的准备。冯世才当胡主席和珊中尉去昆明的向导。在中国境内走了五天，中国当局对他们采取分别对待。他们只接待珊中尉，并把他送往昆明。但对胡主席却不给安排，也不加阻拦。因为胡主席是得到驻昆明美国空军司令的邀请，又持有张发奎发给的长期护照，张发奎在致重庆的报告中证实胡主席去昆明是得到美方邀请的。

一九四四年底，胡主席到宜良，住在黄光平家里，过了

几天并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便去昆明。

在昆明，他住到曾表示把全部家产贡献给革命的宋明芳家，这是一家门面作咖啡馆，实际上是胡主席与有关人员接触的机关。宋明芳夫妇把胡主席当父辈看待，照顾十分周到。一九四二年底从柳州来昆明的黎润之老先生和范越子也与宋明芳夫妇一起尽力协助胡主席。

胡主席以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央委员的资格来到昆明，他当然要了解云南越革分会的情况，并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帮助干部，使分会成为群众所信赖的革命组织。

但胡主席这次到昆明主要目的是与美国盟军取得联系，使越南革命在反法西斯同盟阵营中取得明确的国际地位。

胡主席在宋明芳家里住了不久，就去晤美国驻云南空军司令陈纳德，陈纳德和他见了面，亲切交谈。

胡主席介绍了越南抗日团体都已参加越盟的情况。陈纳德询问越盟能否组织一个救护站，救助在越南空降的盟国飞行员（这里所说的救护站，就是搞一块直升飞机着陆的场地和提供一些美军联络人员的住所）。

胡主席作了肯定的答复，表示随时愿意配合盟军抗日，并说明目前抗日组织在越南已经得到广泛的发展，如果美方能在武器弹药和装备方面给予帮助，越南的抗日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至于“救护”盟军空降人员，我们早就这样做了。掩护珊中尉并安全把他送到中国便是具体的例证。

陈纳德对胡主席的回答表示满意，但他没有忘记要求越

盟给美方提供情报。胡主席说，我们不当美国情报人员，但为了配合共同抗日，我们可以把越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与日军的活动通报给你们。我们把这看作是越盟与各同盟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越盟自一九四一年成立以来，就是这样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我们知道，越南只有站在盟国方面，与盟国密切合作抗日，才能摆脱日本法西斯的统治。

胡主席除了会见陈纳德，还同美方其他人员接触，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离昆明时，美国人送给胡主席六枝手枪、二万发子弹，一些药品和现款。胡主席不接受现款，只接受武器、弹药和药品，并表示感谢，希望今后美国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胡主席在昆明期间，国内外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在中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日本占领柳州，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广西的一个小县城百色。越南革命同盟会的一些“要人”：张佩公、阮海臣、陈豹、农经猷仓皇逃离广西；六百名复国军近于瓦解，只剩下一百四十人和蒲春律、黎松山一起随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往百色。

一在越南，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日军夺取了法国的统治权；十三日，保大宣称归顺日本，甘当傀儡。

一在法国，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戴高乐政府宣布决心重新统治越南。蒋介石政府不愿出现与法国关系上的麻烦，不表态反对。在昆明越南国民党人也默然不作任何反响。四月七日，杨保山在胡主席的指导下以越南革命同盟会

分会的名义在昆明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反对戴高乐的主张，声明中说：“越南的命运应由越南人民决定，法国人无权干涉。现在越南人民在革命团体（故意不提越盟或越革）领导下，其武装力量正同敌人作战。”这次记者招待会有肖文参加，使人认为杨保山的态度就是四战区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日军在越南夺了法国统治权以后，有一部分法军逃到中国边境。张发奎提出一个处理此事的计划，主张中国对法军保持盟军关系，协同作战；对越南革命党（指越南革命同盟会）则尽力帮助，在日军被逐出越南后，将由越南革命党成立新政权，宣布越南独立。（见邢森洲一九四七年七月《越南汇编》。邢是中国国民党中央驻越、中边境一个地区的代表。）蒋介石方面的一个记者看到这个自相矛盾的计划后便提出问题：为什么协助法国又帮助越南独立？张发奎回答说：协助法国是友谊的说法，帮助越南独立才是事情的实质。

通过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到，当时重庆主张接受法国重返越南统治；张发奎和肖文却主张帮助越南革命同盟会建立新政权，宣布越南独立（固然这个独立是在中国庇护之下）。这就是重庆不信任张发奎，华军入越的任务由张发奎负责转由卢汉负责的主要原因。当然，重庆派遣卢汉入越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趁机撤换云南的龙云。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昆明部署华军入越。三月三十日肖文到昆明会见何应钦，要求中国

军队进入越南时继续由他负责帮助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亲华政府。这个要求得到何应钦的同意。(华军入越情况见本书《八月革命后的岁月》一节。)

蒋介石与张发奎存在分歧，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胡主席在柳州受到优待，能选入越革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四年三月），并获得自由带领十八个干部回国（一九四四年九月），及后又不受任何阻拦去昆明与美国方面接触（一九四四年底），在昆明时还能以越革名义开展工作，最后又自由折回百色再度回国。

胡主席在昆明停留的时间相当长，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才去百色。他到百色后两天，肖文也从昆明到了那里。

肖文派遣了几支别动队进入越南：

一蒲春律带领五十人从龙邦方向进入。

一张中奉带领五十人从百南方向进入。

一黎松山带领十人从平孟方向进入。

一吴光合带领五十人从东溪、七溪方向进入。

一胡德诚也带领一部分人从平加方向进入。

正当这几支别动队准备进入越南，胡主席即动身回国。

一九四五年五月，胡主席回到北越见到武英、武元甲，便要他们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作为联络中心。他们与双豪、朱文晋商量后，确定新潮是最合适的地点，因为那里人民政权已经建立，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处在山林险阻，远离公路的地方。

胡主席到新潮不久，托马斯少尉等几个美国人，在我们刚修整完毕的丛林着陆场空降。

托马斯少尉给安顿在新潮山住地从事联络工作。胡主席常常去看他们，就国际形势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景亲切交谈。托马斯感到心情舒畅，确信越盟真心实意和盟国站在一起。

同美方这样的联系是着眼于在人民群众中扩大影响，造成发动起义、从日本人手中夺取政权的气氛。同时，胡主席也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力量还弱小，在同盟国军队进入越南之前，我们不一定能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政权；而同盟国军队中肯定包括法国军队，这样我们不得不和法国对话。当时胡主席就通过美国电台致电驻在昆明的法国圣德尼将军，建议会晤交换意见，但因存在障碍而未能实现。八月革命后，圣德尼任法国驻越南代表团团长来到河内与胡主席谈判，并签订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初步协定。

\*\*

八月革命前胡主席决定去重庆会见蒋介石（由于中途被捕未能实现），到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以及与法国圣德尼将军联系，这几件事是少为人所知的，有人虽有所闻但却不谈，他们担心有右倾、妥协之嫌。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对胡主席采取这些措施的战略、策略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

人所共知，自党的八中全会（一九四一年五月）决定以越

盟阵线代替反帝阵线，我们就声明站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我们派遣了十二人到中国学习爆破，六十人学习军事，就是站在盟国方面的表示。我们的群众掩护美国飞行员和胡主席去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也是我们站在盟国方面的表示。胡主席准备与法国圣德尼将军会谈同样也是我们站在盟国方面的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阵营分明。德、意、日为法西斯阵营；苏、美、英、法、中为同盟国阵营。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世界各国共产党必须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既是反法西斯，那么我们就必须支持已经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阵线。我们早已多次声明支持同盟国，站在同盟国方面，但当时实际上还没有和同盟国取得直接联系。我们确信法西斯必败，同盟国必胜，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与同盟国取得实际联系，盟国取得胜利，我们才取得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胡主席表示愿和法国取得联系和对话，是因为他确信日军战败后，同盟国必将同意法国重返越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就会陷于被动。因此，胡主席要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到昆明会见美国空军司令以及要与法国圣德尼会谈采取上述几个重要行动是英明的战略决策。在策略方面，胡主席非常清楚干革命必须依靠群众，没有群众就没有力量；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武装力量就不能战斗。我们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但自己手上要有资本。胡主席也很清楚地知道，美国虽然同情法国重返越南，但仍然要取而代之。蒋介石虽然不得

不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但也想趁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时机给法国制造麻烦。胡主席早就料到美、蒋不会向我们提供很多的援助，但通过与美、蒋的会晤争取影响，争取哪怕是少量的援助也是好事，会晤可以起到分化和制约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因而，在张发奎让胡主席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自由返国，又不加阻挫让他自由去昆明与美方接触，使重庆的特务十分恼火。他们在向重庆打的报告中批评张发奎“左”倾，肖文亲共，说胡志明去昆明是“联美反华”，准备与法国对话是“向法国妥协反对中国”等，都可以从反面说明问题。可见胡主席要会见蒋介石、会见美国人和与法国人会谈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策略意义的。这些战略、策略对越南革命十分有利。历史事实就是明证。

## (五)

### 全国党代表会议与新潮国民大会

大约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们在凉山研究工作部署，黎铁雄、黄田、闭振兴返回会欢一带整顿工作，建立政权；谭明远、莫一凡和我到北山一带与当地同志一起解放凉山省会。

在要启程去凉山的时候，我接到中央来电要我回新潮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党代会。我把工作交给谭明远和其他同志，便同黄有南一起去新潮。这次路上不需要隐蔽，白天走路还有武器护送，从七溪经平嘉、罗轩、上笼、神沙、富都、馆

方，越过页山顶到新潮。

这里的同志立刻带我去见胡主席。当时他不住在村里，而是住在离村不远的的一个山岗上的草棚里，他依然穿着依族老人一样的蓝粗布服，桌上放着打字机，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时他的身体比先前健康，不再象刚从中国回来那样常爱打摆子。他详细地询问了谅山的情况，然后说：很好，现在我们已经具备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的条件了。几天后，北、中、南各地的同志到齐，就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决定。时间极其紧迫，也极其重要。

我知道这时胡主席正忙于工作和思考问题，便告辞回村里瞧一瞧。

我和黄有南给安顿在村里一个老乡家里。平原地区不少同志陆续到来。一天，美国飞机在新潮村中的场地空投干粮和一些军装，大家知道这是盟军的供应，都很高兴，但没有看到盟军到来可能引起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局面，而这，胡主席正在作出思考和筹划。

这时我们已经设有电台，能比较及时地了解国际形势。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苏联军队长驱直入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巢穴柏林。苏军战胜德国法西斯后，八月八日，进入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日本失败后，盟军进入越南该怎么办？中国军队正加紧准备进入越南，入越后我们该怎么办？也可能有英、美、法的军队进来，又该怎么办？面对日本法西斯战败是争取祖国解放的良机，而盟军入越又可能出

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怎样应付局面和运用策略，是必须加以思考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胡主席主持下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北部有长征、阮良朋；中部有阮志清；南部有何辉甲；越北地区有武元甲和我；从泰国、老挝回来参加的有杨智中、陈德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现在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在新潮村一个群众家里召开的。

胡主席在听取各地报告后说：目前日本虽然还没有投降，但在苏军攻克柏林后德国法西斯已宣布投降，伪“满洲国”的六十万日军已被苏军击溃，日本法西斯必将投降，这是肯定无疑的。日本投降后，盟军就要来接管印度支那。来接管的盟军可能是英军、法军，也可能是中国国民党军，因为从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中国军队就准备进入越南。从国际方面来说，不论哪国的同盟军队进入越南，我们都不能拒绝，准确地说，即使我们拒绝，他们仍然要进入。因此，我们必须同他们接触，同他们对话。要对话就要有强有力的地位，这强有力的地位就是越南从日本人手里取得独立。这就要我们在日本投降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动总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已有了群众基础；法军被日军夺权后已经瓦解；大多数亲日保安部队都接受我们的影响；夺取政权是能够做到的。会议开得

很简短精干。除了必须留下来参加国民大会的一部分同志外，其余的都赶回地方和单位准备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交给我的任务是担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留下继续巩固和建立这个地区的革命政权，为今后必要时撤回越北作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越盟总部在新潮大亭召开国民大会。参加大会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各民族代表约六十人。我以越盟总部委员的资格参加大会。

会上，胡主席以越盟领导人的名义致词，谈了国内外形势，他的分析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分析的一样；他阐述了越盟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全国人民抗法、抗日，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胡主席又谈了盟军接管印度支那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提出，应该怎样对待进入越南的任何一个盟国军队，他说，如果我们反对，就意味着拒绝盟军入越，这样，名既不正，言也不顺。我们要和他们打交道，打交道就要处在有力的地位，这有力的地位就是政权，就是要以独立的越南国家代表的资格和他们打交道。我们必须迅猛地发动总起义，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取全国政权。对日军，我们要善加说服，使他们不再抗拒。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日本已经投降，我们有越盟领导下强大的人民力量；我们有解放区，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坚决克服一切困难，争取祖国独立，建立一个新的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

这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总方针。然而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可

能出现极端困难的局面，这就是法军以浩大之势进入越南，悍然不顾一切向我们发动进攻，并得到英、美的尽力支持，而且还可能得到中国国民党的认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回击，要用刀矛和一切土制的武器回击，宁死不做奴隶。在坚决回击的同时，我们还要和法国人谈判。怎么谈判？为了减少我们的牺牲，争取法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同情，我们要求法国承认越南在法联邦内实现独立，拥有自己的国会、政府、军队、财政和外交；我们保障法国在越南的经济、文化权益；五年后越南实现完全独立。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如果法国拒绝或毫无诚意接受，我们就坚决抵抗。我们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正义属于我们，法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同情我们，我们一定能赢得胜利。

听了胡主席这一席话，大家精神振奋，一致同意越盟的总方针和发动全国总起义的命令；同时选举产生了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总起义。

国民大会一结束，代表们急速准备返回各地。在平原地区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早在全国代表会议后就立即返回。武元甲和一些军事干部准备带领部队南下占领太原。胡主席也准备到平原地区。根据中央的决定，我留在新潮巩固后方，以作为即将起义的根据地。

与法国对话的问题，胡主席在新潮国民大会上就讲述过，八月革命后他与圣德尼谈判，达成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

初步协定。但后来有关新潮国民大会的文件却对此避而不谈。我认为这件事应该讲清楚，这是个知彼知己、合情合理、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抗法战争取得胜利有赖于胡主席远见卓识的英明领导，既要坚决斗争，又有灵活的策略，赢得了—一个对我十分有利的环境。

\*\*\*

同我一起留在新潮的有与中央电台联系的负责人黄有南，协助我工作的黎简和珠姐。几天后，我们正准备开展工作，便得到太原日军向我们交出部分武器、我军自由通过太原开赴平原地区的消息。接着，喜讯纷至沓来。

八月十九日，河内人民奋起夺取政权。这一天就是后来称之为“八月革命”。

八月廿一日，越盟致电顺化，要求保大退位。保大立即复电邀请越盟代表到顺化接管政权。

八月廿四日，保大宣布愿做越南独立国的一名公民。

八月廿五日，在顺化皇宫，举行了保大向越盟代表陈辉燎、瞿辉近移交玉玺和皇剑的仪式。

八月三十日，胡主席回到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包括以下成员：

主席兼外交部部长	胡志明
内务部部长	武元甲
国防部部长	朱文晋
财政部部长	范文同

经济部部长	阮孟河
劳动部部长	黎文献
青年部部长	杨德贤
教育部部长	邓台梅
司法部部长	武重庆
交通工程部部长	陶仲金
卫生保健部部长	范玉石
社会部部长	阮文素
宣传部部长	陈辉燎
不管部部长	瞿辉近、阮文春

陈辉燎和阮文春以前是越南国民党党员，以后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五十多万群众在巴亭公园举行大会。金星红旗到处飘扬。下午三时，胡主席登上主席台，以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宣读《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与河内、顺化和全国各地配合行动。八月廿四日，西贡人民奋起，全市插遍金星红旗，当晚，钦差大臣胡文牙向越盟移交权力。

八月廿五日，以陈文油为主席的南部行政委员会在西贡市政厅宣布成立，号召全体人民大团结。

九月二日，西贡数十万群众在圣母教堂后的广场举行大会，聆听胡主席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

九月四日，越盟在西贡市政厅召开扩大会议，邀请各群众团体代表组成“南部人民委员会”，替代南部行政委员会。前行政委员会主席陈文油任人民委员会委员，范玉石医生任主席。

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振奋，但又很焦急。为了进一步掌握全国形势，我们派黄有南去河内，但中央有令要他留下，任他为内务部副部长，协助胡主席新近邀请从广南来接替武元甲内务部长的璜叔抗老先生。就这样他再也不返回新潮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自己去河内，这时正好碰上河内五十万群众集会，抗议英军帮助法军占领南部人民委员会所在地(九月廿三日清晨四时)。我径直前往临时政府办公的原北部总督府向胡主席和中央请示工作。胡主席说：当前的工作重心是保卫政权。我必须赶紧返回河内与中央一起掌握局势的发展。于是我又回到新潮，安排好工作，带上黎简和珠姐，一起返回河内。

到了河内，我把黎简和珠姐介绍给阮良朋安排工作，我自己搬到胡主席所住的行桃街郑文逋家，以后又搬到行鼓街八号在“开智进德会馆”旧址隔壁的一所房子，面对着还剑湖的水榭(这所房子后来被美国飞机炸毁)。

不久，中央决定朱文晋返回越北，负责解放区工作，武元甲任国防部长兼卫国军总司令(这时解放军改称卫国军)，我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卫国军总政委。

这时，英军已进入南方，进行罪恶活动。进入越南的中

国国军不是早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准备入越的张发奎部，而是卢汉所指挥的云南部队。张发奎只派遣肖文以指导代表团的名义进入越南，负责协助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政府，同行有阮海臣和两个步兵团。蒋介石调云南部队进入越南的阴谋是抓住时机在云南排除龙云，正如过去他排除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一样。

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接管，造成了八月革命后极其复杂的局势。

## (六)

### 八月革命后的岁月

八月革命后的岁月是形势极其紧张的岁月。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和十六纬度以南的英军及十六纬度以北的蒋军，又要对付英、美支持下企图重来统治印度支那的法军。

#### 1. 关于对付日军的问题。

日军虽已无条件投降，但宣称他们只向盟国投降而不向越盟投降，非但不肯向我们缴纳武器，在个别地区还为我们的活动制造困难。

中央对日军的方针主要是通过说服争取，让他们知道越南是属于越南人民的。过去被法国侵占，近期又被日本侵占，越南人民都是反对的。今天越南人民起来为自己争取独立自由，你们应当支持这一正义斗争。你们不向我们缴纳武器，

盟军到来，你们也得向盟军缴纳。这样，向我们缴纳武器是一件义举，你们将会受到越南人民的欢迎，而对你们却没有任何损失。如果你们和越南人民作对，我们只有坚决回击，你们多少总得牺牲。这样的牺牲对你们将获得生还来说是死得冤枉。今日的越南已是独立的国家，你们应该识时务，支持越南人民的独立事业。

这样的解释，日本军人感到合情在理，但无论如何，他们仍要把武器缴纳给盟军。有的地方他们私下把一些武器交给我们，有的地方我们向他们买了一些。大部分日军对我们的活动不加干涉，持中立态度。也有一些日本人害怕盟军的报复，要求我们庇护，到人民群众中隐蔽。这种人虽然不多，但到处都有。有的得到我们的友好相待，在抗法战争期间，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或驾驶车辆、修理机械等工作。记得，我任第四联区党委书记期间，日军蓝山大校和青松中尉曾在义安帮助我们工作，后来返回日本，成为日、越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

对付日军虽然比较复杂，但仅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盟军到来后由盟军负责，我们不再过问。

## 2. 关于在南方对付英军的问题。

日本投降之前，英、美双方曾达成协议，英军负责十六纬度以南战区。日本投降后，在本战区内理所当然由英军负责解除日军武装。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即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格

莱赛少将指挥英军一千四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在西贡登陆。

九月二十日，英军通告禁止越南报刊出版，禁止越南人携带武器。

九月二十一日，英国军舰运送法军进入西贡，同时宣布戒严令，禁止越南人集会，晚九时至晨五时实行宵禁。

九月二十二日，英军占领西贡大监狱，释放被日军囚禁的法军俘虏五千人，并允许法军从日军仓库中获取武器弹药，接替日军守卫码头、仓库和巴松造船厂。

九月二十三日，在英军支持下，法军强占中央警察署和金库，同时占领南部人民委员会所在地——西贡市政厅，西贡市大部分街区处在法军控制之下。

十月五日，法国派遣勒克莱将军率领欧、菲籍军增援西贡，同时在柬埔寨和老挝空投部队，目的是重占印度支那全境。

十月十二日，法军占领嘉定、鹅洼和富美。

十月二十三日，英、印军占领土龙木、边和后，交法军驻防。

十月二十九日，法军占领永隆。

十月三十日，法军占领芹苴。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法军占领邦美蜀后在沿海登陆，占领芽庄、庆和、大叻。数天以后，鹅贡、美萩、沙沥、隆川、朱笃、河仙、迪石、金瓯各省的省会都被法军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南部人民委员会不得不撤到槟榔，毁桥、破路，发动抗法战争；同时还要对付越南国民党员阮和协为头目的一股所谓国家主义派武装。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破坏抗战。

为了支援南方抗战，北方先后派遣黄廷勇、谭明远、阮平等同志率领部队南下，与南方人民并肩抗击法军。这几位同志都先后在战斗中牺牲。

### 3. 关于在北方对付蒋军的问题。

在北方，卢汉将军率领二十万蒋介石军队从云南进入越南解除日军武装；肖文将军指挥的一部分军队作为张发奎的代表以帮助越南革命同盟会建立政府的名义也进入越南。这才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重庆交给卢汉、肖文入越的共同任务是“灭共、擒胡”，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充当中国国民党的得力走卒。

卢汉和肖文早就知道武鸿卿、严继祖虽以越南国民党的身分从事活动，但却是重庆方面的人。他们在云南监视龙云的行动，在广西监视张发奎的行动。当时卢汉要飞河内，武鸿卿便请求同机前往，为卢汉所拒绝。到这一年九月底，武鸿卿才来到老街，但那里的政权已经回到人民手中，并且得到卢汉部下李游生的支持。武鸿卿看到无法活动，只好改道去沙巴，指使赵越雄一伙占沙巴。李游生立即逮捕赵越雄，并把武鸿卿也扣了起来，直到重庆来了命令才给以释放。这以后，武鸿卿一伙倚仗着蒋军的支持，在老街、安沛、义路、

越池、富寿、永安、海宁等地成立反革命宣传机关，但却处在当地我军民包围中。

十月二十日，当武鸿卿到河内，早已跟随越盟的原越南国民党党员阮文春、裴文赫、范光祝、陈玉遵、陈德政等人出面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得不到肖文和卢汉支持的武鸿卿、严继祖一伙仗着重庆的撑腰，仍然大肆活动，并与阮祥三、张子英、杜进喜等人相勾结，把一些官吏、公职人员和资产者收罗到党内，他们在蒋军庇护下胡作非为，群众极为痛恨。

阮海臣九月初进入谅山，依靠肖文的权势和兵力缴了我们几支部队的武器，并召集当地官吏、豪绅抨击越盟；到了河内，大越党分子推崇他为最高领袖，在关圣街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办事机构，让宋任书记，阮召律任政委，谢元汇任财经委员。办事机构悬挂着越南革命同盟会会旗。双十节，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河内大剧院搞庆祝活动，肖文到会参加，指示阮海臣会上只能谈辛亥革命，不要离题随便发挥。

为消除肖文和卢汉的顾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胡主席公开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自动解散，共产党人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对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奉派到第四联区向各省党组织进行解释：迫于当前的局势，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宣布，但党仍然存在，仍然进行秘密活动，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共产党宣布自动解散缓和了紧张局势。

十一月十九日，肖文以张发奎代表的名义出面召开一次和解会议，有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盟参加。经过磋商，三方达成协议，成立联合政府，各方军队互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同时停止在报刊上互相攻击；最后，共同商定派遣一支武装部队进入南方，与南方人民共同抗战。当然，这支军队全由越盟成员组成。

我们赞同成立联合政府，但建议按照原定计划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进行大选，以组成国会，由国会选举政府，这样更为民主。武鸿卿和阮海臣借口来不及准备，建议推迟。我们同意把大选日期缓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到了这一天，武鸿卿和阮海臣仍说来不及准备，要求不经大选，在国会中给国民党五十个席位，给越南革命同盟会二十个席位。我们也同意，并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进行大选。在北方，选举进行十分顺利。在南方，有几个城市是在战火中进行选举，但人民仍踊跃参加。

大选以后，在肖文的调处下，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方协议成立联合政府。胡志明任主席，阮海臣任副主席，越盟和民主党掌管四个部，国民党与越南革命同盟会掌管四个部，国防部和内务部由无党派中立人士掌管。

三月二日，第一届国会开会，承认了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七十个席位的代表资格，同时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① 选举产生了抗战联合政府，成员如下：

主席

胡志明

副主席	阮海臣
外交部部长	阮祥三
经济部部长	周伯凤
卫生部部长	张廷智
教育部部长	邓台梅
财政部部长	黎文献
司法部部长	武廷槐
交通工程部部长	陈登科
内务部部长	璜叔抗
国防部部长	潘 英
不管部部长	蒲春律

② 成立以最高顾问永瑞(即保大)为首的顾问委员会。

③ 成立由委员九人组成的抗战委员会,武元甲任主席,武鸿卿任副主席。

④ 成立国会常设委员会,阮文素任主席,成员有黎思令、陈晋寿都是经国会承认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代表,而不是民选代表。

虽然我们作出了这样的让步来赢得和平,但是阮海臣和武鸿卿仍继续倚仗蒋军的庇护,与我们公开对抗。他们在西湖畔的关圣庙架设高音喇叭,整天对越盟进行攻击诋毁。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与法国签定了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享有主权的协定。对此,越南国民党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杜友伟小学内的据点仍然加紧反对越盟的活动。直到蒋

军撤走，他们才跟着撤。被丢下的人便向我们投降，我们不加追究。日内瓦协议签定后，法军集结到十七纬度以南，这些人当中有的也跟随法军撤往南方。

为什么以二十多万的军队仍不能贯彻重庆“灭共，擒胡”的命令呢？这是因为卢汉和肖文深知阮海臣、武鸿卿品质不好，而严继祖又是重庆的特务，负有监视他们活动的任务。肖文是张发奎的高参，早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就为华军入越作了准备，但却不为蒋介石所信任，把这一任务交给云南军队，使他们心中怏怏不乐。加之早在柳州，他就对胡主席很敬重。卢汉洞悉蒋介石调云南军队进入越南的阴谋是调虎离山，趁机撤换龙云，控制云南，因而内心也是十分愤懑，采取消极态度。

但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群众支持。当蒋介石军队进入越南时，沿途曾遭到人民的抵制。如果这时他们做得太过分，越盟动员各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他们的军队就会碰到更多的困难。而逮捕胡志明，必然引起更大的公愤，越南全国人民将起来战斗，谁能保证蒋介石不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以失职论罪呢？

虽然蒋军在北方各地干出了许多悖逆常理、欺压人民的坏事，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绝对信赖胡主席，既积极准备战斗，又避免了对对方的一切挑衅。我还记得，占姆地区的干部曾缴获卢汉军队一个排的武器，胡主席知道了，立即派阮德葵下去，责令当地把全部武器交还，并处分了出这个主意的

干部。

依靠群众，积极准备战斗，面对对方的挑衅不急燥，同时善于争取肖文和卢汉，这就是粉碎蒋介石“灭共，擒胡”狂妄的秘诀。应该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没有胡主席掌舵，驾驶这艘航船越过急流险滩，就不能捍卫新生的政权，保全和建立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前进道路上随时出现极为复杂的形势。

显然在北方对付蒋军的斗争，到了这一步，可以看作已经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不是胡主席在柳州被拘留时赢得张发奎和肖文的敬重，当选为越革中央委员，并能及时恢复自由返国，为全国起义作好思想准备；特别是对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斗争中，如果肖文不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不承认胡主席在联合政府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当时越南局势的发展可能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从越南革命的利益来看，张发奎和肖文当时的态度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必须给予客观的评价。

在这里，我还得顺便谈一谈对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陈宝苍的看法。一九四一年，陈宝苍听了阮海臣和陈豹的建议把我逮捕起来。如果他同别的反动国民党人一样，我从那时起可能就完全失去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但他却把我看作越盟领导人之一，在整个被扣留的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好的接待和照顾，最后还发给我五百元路费，派人送我到柳州四战区监管，未向上级作过对我不利的汇报。他在柳州见到胡主席，

也表示敬重；愿把胡主席写的诗和他和的诗一起寄到高平给我们，并告知我们，胡主席已获得自由。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陈宝苍是一位具有政治风度的正派人。最近，得悉他在台湾被加上“亲共”罪判处死刑。可以说，陈宝苍是一位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

#### 4. 关于对付法军的问题。

正如第五节所述，在新潮国民大会上，胡主席提出如果盟国让法国来接管印度支那，那该怎么办？他的结论是：我们要同法国对话，同法国对话就要有强有力的地位，这强有力的地位就是政权，就是以从日本人手里取得独立的越南国家代表的资格同法国对话。他的这些估计完全正确。一九四四年底，张发奎给他恢复自由回国，随后，他借送美国飞行员从高平去昆明的机会，在接触美国空军司令部的过程中，听到法军将要接管印度支那的传闻。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国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宣布要重返印度支那的意图，要成立象过去包括北圻、中圻、南圻、老挝、柬埔寨五个部分的印度支那联邦。这说明蒋军接管越南北方只是临时性质，我们必须暂时忍受和善加对付；而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要长期对付的却是法军。

法国通过美国从中斡旋，在与蒋介石磋商后达成协议，蒋军撤回中国，由法军接防。这一妥协的背景是日本投降后，美国希望蒋介石集中全部兵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法、蒋之间斡旋以达成协议。其结果

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蒋、法签订了协定，蒋方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以换取法方把上海、汉口、广州的租界和广州湾交还中国，并把滇越铁路转卖给中国。蒋方保证中国军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撤离越南北方，后来，蒋军拖延到这一年的五月，继续搜刮财物后才全部撤走。

事实正如胡主席在新潮国民大会上所估计的一样，法军可能进入印度支那，而我们的对策，正如他所提出，要和法军对话。

胡主席和法国驻河内总代表圣德尼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签定了初步协定。协定明确规定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自由国家，拥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法国可派兵进入越南北方取代收缴日军武器的蒋军。越、法双方在南方停火，为双方继续举行会谈解决有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权和法国在越南的经济、文化权益问题创造良好气氛。南北统一问题将由全国人民决定。协定的附录还说明，进入取代蒋军的法军为一万五千人（当时法军已无越南籍兵，只有欧、菲籍兵），只能驻在我方指定的北方若干地区。协定也明确规定，双方签订协定十个月后，法军应开始逐步撤离越南，并在五年内撤完。

初步协定的重大意义是法国不得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而且只有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同意才能派遣军队进入越南，并只能驻在我方规定的若干地区。

初步协定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一万五千欧、菲籍法军进入，换取二十万蒋军连同他们的走卒阮海臣和越南国民党的撤走。在这以前，这批走卒的武装力量曾在一些地区滋扰，蒋军一撤他们就失去凭借，多数来不及撤走，只好向我们投降或被消灭。

我们明明知道，法国同我们签定协定的目的是为了能派兵进入越南，然后逐步使用武力扩大其影响，直到推翻我国政府，恢复其在印度支那全境的统治。但我们还是同意签约以促使二十万蒋军撤离北方，同时争取时间组织力量，以备一旦法方不履行协定时发动抗法战争。

胡主席在与法国签定初步协定的同时，还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原在老根据地工作的一些同志重返原地准备战斗；阮良朋指挥拆卸一部分机械设备运往太原，建立兵工厂；我奉派到第四联区与胡松茂、阮志清商议部署各项工作，同时到清化商定在那山区建立根据地的方案。这里在历史上是阮惠击败满清孙士毅率领入侵的军队收复升龙城的前进基地。

签定初步协定以后，胡主席在夏龙湾会见达尚礼，双方达成协议：越南国会派遣代表团去法国，法国同时派遣代表团来越南与越南政府商谈，为在巴黎签订一项正式条约作好准备。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国会代表团启程赴法。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与法国代表团在大叻举行会谈，草拟预定在巴黎签订的正

式条约，但由于法方持顽固态度，未能达成协议。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胡主席以法国政府贵宾的名义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就越南南北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权、以及初步协定中规定法国在越南经济、文化权益等问题进行商谈。

但当胡主席赴法途中，六月一日法国驻西贡高级专员宣布成立南圻共和国及其政府成员名单：

总理兼内务部部长 阮文声

副总理 阮文春

司法部部长 陈文仲

财政部部长 阮成立

工政部部长 刘文郎

农业、贸易、技艺部部长 应保全

教育部部长 阮清江

社会劳动部部长 羌有龙

同时成立了由十二人组成的南圻咨询委员会，其中成员四人为法国人，八人为法籍越南人。

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枫丹白露会议开始举行。我国代表在发言中严厉抨击法军违背已签订的初步协定，强烈谴责成立所谓南圻共和国。

七月九日，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议程，每周二、五开会；成立四个委员会分别讨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

但到八月二日，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在大叻

召开了有老挝代表沙逢、柬埔寨代表州龙、南圻共和国代表阮文春(原总理阮文声已自杀)参加的会议,“以确定组成印度支那联邦的原则”。

我国参加枫丹白露会议的代表团当即宣布:如果法国驻南圻当局有权决定印度支那各国命运,那么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初步协定不再有效,枫丹白露会议也毫无意义;同时宣布暂停举行枫丹白露会议,直到大叻会议造成的事态得以澄清才能复会。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能够复会。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法国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草案,承认三月六日的初步协定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又提出越南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都由法国控制的许多问题。

八月十八日,我国代表团逐项予以答复,明确提出越南在各方面拥有主权,并具体提出南圻的归属问题由南圻公民投票决定。但法方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声明,对枫丹白露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表示遗憾,然后离法返国。胡主席留下来继续进行交涉。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胡主席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代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殖民地部部长穆德签定临时协定(即九·一四临时协定),约定一九四七年一月恢复枫丹白露会议。

临时协定签定后,胡主席回国。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越南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授以胡志明主席为首政府全权处理一切事态;同时选出国

会常设委员会监督政府工作，成员十五人，裴凭团任主任委员，孙德胜、范伯直(天主教)任副主任委员。裴凭团因病未能参加会议，孙德胜当选为代主任委员。我也当选为国会常设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军在芒街、先安、谅山挑衅，制造事端。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军在海防挑衅，制造事端。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军在河内行粉街、行炭街和许多地区制造流血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军占领在河内的财政部和交通部。同时，法军司令莫利哀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自卫队和公安部队放下武器。

局势已经发展到了我们不得不奋起抗战的地步。

我们留下一个团保卫首都河内，胡主席和全体高、中级干部都撤回越北。我奉派到第四联区任区党委书记、越盟主任和中央政府驻第四联区代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胡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全国抗法战争开始。

这次我到第四联区工作的条件是相当好的。法军未敢侵入清化、义安、河静三省，又能与胡松茂、阮志清和区委、省委其他同志密切合作，各方面的工作都很顺利。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派我到泰国接受新的任务。

## 第五部份

### 新任务——整顿几项国外工作

(1948—1949)

一九四八年三月，范玉石同志从泰国回国汇报，向中央转报了在泰国工作的同志希望中央派我到泰国负责工作的建议。

这时我正好到越北就准备召开第四联区党代会问题向胡主席和党中央请示。

那天晚上，在越北丛林胡主席住地火塘边，胡主席、长征、范玉石和我都在场。

范玉石的汇报，谈到在泰国的工作正在多方面展开。但越侨中负责干部的水平都不相上下，谁也指挥不了谁。曼谷虽设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特派代表办事处，但负责在泰国东北越侨工作的同志和它联系不密切，不积极协助代表处工作，而代表处的同志也近乎不关心东北地区的越侨工作。范玉石说，在泰国工作多年的同志都知道黄文欢同志以前在泰国负责工作。他们建议胡主席和党中央派他到泰国抓总，肯定能

团结所有干部，那里各方面的工作将会开展得更顺利。

胡主席和长征问我：怎么样？你能去吧？

我说：如果胡主席和党中央作出决定，我随时接受任务。

于是我回到四联区，开完了联区党代会，把党委书记的工作交给阮志清同志，便返回越北办理各项手续，作去泰国的准备。

我接受的任务在党内是作为中央的代表，负责全面指导旅泰越侨工作和在泰国、印度、缅甸、捷克、法国等外事干部的工作。在政府方面，胡主席亲自签署了任命我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驻外特派代表的委任书。

约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底或六月初，我返回四联区探家两天之后，立即动身前往泰国。

这一次在泰国工作的时间不长(1948——1949)，但是经历了八月革命那些日子的前后，在胡主席的直接指导下，怎样对付反动分子，怎样面对严峻的局势处理问题，我已经有了运用战略、策略的一些基本认识，因而在风浪无常的环境中，哪怕是轻风细浪，都要求我掌好舵，独立思考，在困难复杂的条件下解决了一些问题，例如：

- 一整顿侨居泰国越侨工作。
- 一整顿驻曼谷和仰光代表处工作。
- 一整顿协助老挝、柬埔寨革命的工作。
- 一处理赴北京途中的若干问题。

## (一)

### 整顿侨居泰国越侨工作

在叙述正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谈及越侨在泰国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一九三〇年暹罗共产党成立，当时越侨是在暹共直接领导下从事活动。一九三八年，暹委决定暹罗的革命应以暹罗人民为主，外侨只在自己的爱国组织中活动。一九四一年，日本占领越南一年之后，越南独立同盟成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法。泰国（这时暹罗已改国名为泰国）越侨响应号召，把革命活动的方向转到印度支那。在抗日、抗法救国运动中，越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这时称为特委的领导机关仍或多或少囿于前几年的指导思想。因此，整顿越侨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到泰国，开头就在湄公河畔的小市镇邦干住了两天，我们的同志把我接到乌添，然后去那空。在这里得知我国政府驻曼谷特派代表阮德葵到乌汶参加新建的越侨农场落成典礼，我立即赶到乌汶和他会面。

在乌汶的负责同志知道我是党中央委员和政府驻外特派代表，想很好招待一下，以表示重视。但我建议他们安排我住到一个群众家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让我作为一般干部参加农场的落成典礼。

阮德葵向我汇报了在泰国工作的情况。这时，奎披汶已

掌握泰国政权，越侨从事爱国活动的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

胡主席给我的委任以及我动身去泰国前同我谈话中他的最初设想是由我接任驻泰代表，调阮德葵回国另作安排。但是我听了情况汇报后，经过权衡，认为阮德葵继续留任较好。在当时情况下，如贸然调换代表，泰国当局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借口泰国未正式承认胡志明政府而对我代表不予承认。

我和阮德葵商量，要他继续担任政府特派代表，我不出面，但在路线、方针以及党的工作由我负责。我协助他对泰国政府履行越南国家代表和侨胞代表的职责。

乌汶农场的落成典礼相当隆重。当初，侨居老挝的越侨疏散到泰国，乃比里政府给予极大帮助，曾拨出部分土地供他们建立“农场”。越侨救国总会干部在条件顺利的那几年，把疏散到乌汶的侨民，安排在一片开阔地盖房，每户分给面积相同的一块地搞生产。虽然是个体经营，但房屋一式，布局整齐有序，看起来很象集体农场。干部和侨胞都自豪地称之为“农场”。泰国人也把这叫做“越南农场”。

我对他们关心侨胞生活所作的努力很赞许，但称之为“农场”名不符实，在政治上也不利，奎披汶政府可能因为“农场”这两个字在泰国人民中造成革命影响而产生疑惧，给我们今后的活动增添麻烦。我对阮德葵说，不要用“农场”这个名称，应该让泰国人了解这里只是从老挝过来避难的越南人村落。

乌汶“农场”问题只是整个情况的一个表现。我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感到必须在工作的总体上加以纠正。

\* \* \*

我在乌汶住了几天，和阮德葵交换了意见后，便到乌隆会晤越侨特委和越侨救国总会负责人。

从邦干经那空、乌汶到乌隆，一路上耳闻目睹以及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使我感到抗战以来，我们的干部和侨胞做了很多工作，表现了爱国、团结精神，很得泰国人民的赞许。但前几年泰国政治气候较好，他们采用了不适合难民地位的工作方式。銮披汶发动政变后，形势逆转，他们仍未能充分认识到工作方式必须彻底转变，一些过于张扬和暴露的做法虽然有所收敛，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仍然相当普遍，如果不立即改变，就会危及越侨爱国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人在泰国进行活动，却很少注意阅读泰国报纸，掌握当局的政治态度。在乌隆，我看到几份泰国报纸刊登诬陷越侨违反社会治安，在某地抢劫、某地放火的消息。尽管都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但显然是为镇压越侨作舆论准备。

我和特委商定，要召开一次有各地党支部和越侨救国会分会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认清形势，解决今后越侨工作长远方针的若干问题。

会议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起，连续开了三天。

在会上，听取了特委和各地代表的汇报，可以概括越侨

爱国的活动如下：

一九四六年三月，许多越侨从老挝疏散到泰国，使越侨总数从四、五万人增到九、十万人。在侨胞和泰国人民以及当时进步政府尽力帮助下，难侨的生活迅速趋向安定。一九四六年，特委和侨胞组织了陈富支队，回国参加南部抗战。一九四七年又组成九龙一队和九龙二队携带武器回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成千越侨青年踊跃参军，开赴老挝、柬埔寨前线协助两个友邻国家抗击法国侵略。泰国境内成为“西部战线”的后方。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的许多个省建立了“西部战线”的军训和修理武器的基地。各特区的指挥机关还经常设在泰国境内，去老挝或柬埔寨参战的人员常回到泰国境内休整。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这两年，乃比里政府热情支持我国抗战，帮助疏散到泰国的越侨解决生计问题，并提供了部分武器，对在泰国境内越侨的爱国活动保持着善意的默许态度。

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和侨胞不免主观，搞了一些活动，侵犯所在国主权自己却不知道。例如在许多地方悬挂越南金星红旗，部队指战员任意携带武器在泰国境内来往。陈文油从曼谷到泰国东北地区探望越侨，当地组织欢迎仪式，还搞越侨武装列队等等。有些干部公开表示自己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的文件、书报任意陈列在越侨救国会办事处，并在“新泰”书店出售。就连给这家书店起的泰文名字意为新的泰国或新的泰人，也反映出政治上考虑欠周。

我们的干部和侨胞充满爱国热情，对民族的神圣抗战和自己的伟大领袖感到十分自豪。但他们对自己活动的所在地和自己所处的政治地位缺乏全面认识。

\* \* \*

在特委扩大会议上，我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同时讲了几点意见，重点如下：

我首先讲泰国所处地理位置的战略地位：

自我党成立之日起，泰国越侨党组织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义静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成立印支援助部时期的工作，接着是一九四五年组织驻泰、老的越侨参加老挝革命。目前我国抗战正处于困难时期，四面受到包围，泰国越侨党组织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里侨胞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和广泛的群众组织，前几年又得到泰国进步政府提供从事爱国运动的方便，因而泰国已成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为了与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阵营各国取得联系，一定要维护好这一通道。为了争取国际支援，使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越南抗战的正义斗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也需要努力维护好这一通道。要为国内抗战提供武器和必要的物资，更需要维护好这一通道。因此，在当时，泰国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革命事业具有着极其重要战略地位。也正因此，每个干部、党员和侨胞的职责就是要在泰国坚守岗位。

接着，我讲到越侨的政治地位和越、泰友好的人民外交

路线。

要在这一战略要地担负重任，首先每个干部、党员必须认清我们自身和侨胞都只是寄居别国的侨民。既是侨民，纵使进行活动的条件多么有利，也得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过去几年，由于泰国进步政府和人民的协助，侨胞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我们的干部和侨胞常常忽视这个问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活动方式，如到处悬挂金星红旗是不对头的。按照国际法，任何一个国家只能在自己国家的代表机关悬挂本国国旗，我们的部队驻在泰国境内，并在那里进行训练和建立兵工厂，只能在泰国进步政府十分同情、支持我国革命时期才可以这样做，而且要做得隐蔽。那种毫无顾忌的做法，比如从“西部战线”过来的干部公开携带武器，甚至要部队持枪敬礼等，而这样做大家却不知道是违反国家关系准则的。

以前，泰国进步政府和人民对我们非常谅解，默许我们这样做，但上述大肆张扬的形式主义做法已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他们可能借此挑起事端，破坏越、泰友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泰国发生政变后，反动派上台执政，我们有些人的那种毫无顾忌的做法有所减少；但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倾向，过于暴露，这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当前必须彻底克服上述种种不适当的活动方式。

避免暴露，避免挑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对付泰国反动势力的压力，我们必须争取泰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这才

是根本的、长远的措施。过去胡主席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侨胞要接近泰国人民，与泰国人民友好。邓叔许老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并且劝告侨胞也这样做的。今天越南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我们更要强调越、泰友好。我们一方面要与泰国人民相亲相爱，尊重泰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要使泰国人民清楚了解越南抗战的正义性，同情和保护越侨的爱国活动，反对泰国政府的迫害和镇压。不仅要争取劳动人民的同情，而且要争取上层人士和官员们的同情。泰国当局虽已掌握了中央政府，但还没有完全控制到各个地方。如果地方官员同情侨胞的爱国活动，那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

\* \* \*

确定几项重大方针之后，我提出若干具体措施让大家讨论。有人认为銻披汶本质上反共，但目前还忙于对付内部，清除国内和他对抗的势力，抽不出手来镇压越侨。这种想法十分错误，它可能带来主观主义，丧失警惕。我们从每天的报纸，都可以看到泰国政府正为镇压越侨作舆论准备，我们必须积极准备对策，并立即采取具体措施。

在立刻停止那些大肆张扬的形式主义活动的同时，要坚持和发扬越侨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金星红旗和胡主席像对侨胞来说是神圣的标志，完全拿掉是不行的。为了避免发生事端，劝说侨胞把旗、像挂在家里，布置成为象征祖国的供桌。如果还有人来干涉，就说这是人民的信仰，用讲理来维

护自己的爱国权利。

我们的干部和侨胞要设法争取来往泰国各地的方便条件。以前，特委主张侨胞不领那种可以在泰国境内自由来往的侨民证。他们顾虑领了侨民证会失去战争难民的资格。这个主张是不对的，它给我们和侨胞制造了往来和营生的障碍。领取侨民证虽然每人要花费几百铢，但这样做却能使干部和侨胞早日取得自由往来、营生和从事爱国活动的合法地位。

取得合法地位十分必要，必须立即进行。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方面，最根本的方面是必须大力巩固侨胞的团结和增强斗争力量。组织上既要搞扎实，又要隐蔽、精干。虽然泰国当局还允许越侨救国会活动，但要预见到有一天会被取缔，要准备转为“越侨救济会”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形式，以免一旦泰国政府禁止越侨搞政治活动而陷于被动。脱产的干部要限制到极少数。党员和越侨救国会的干部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像一般侨民一样谋生，一样生活，不要让泰国人看出自己在搞政治活动。

依靠侨胞做好保密工作，每个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会议讨论了几项具体措施：工作机关和干部住家不得存放武器、军装和“红色”书报；从“西部战线”过来的指战员，在侨胞中不得像过去那样着军服，带武器；干部不得随身携带政治文件，即使被警察逮捕也拿不到罪证。以五天为期，一切机关、干部必须彻底执行上列规定。如有违反而发生被捕事件，造成革命损失，那就是对人民、

对祖国的犯罪行为。

\*\*\*

大家在讨论方针与各项措施时，联系到本地的具体活动。那空越侨救国会分会负责人说，当时当地侨胞正在准备一次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八月十九日总起义的胜利。会议决定让他立即赶回那空制止这个活动。

扩大会议从总的方面解决了各项问题后，我又找了一些干部和党员骨干谈话，进一步说明党的领导机关在保证各项决议得以执行时应有的职责。大家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的估价，认为会议使干部和党员系统地提高了对本身职责和工作方针的认识。

我继续留在乌隆了解情况。八月底左右，接到一些同志的汇报，有的地方已经发生搜查干部住宅和越侨救国会住所的事件，泰国警察还在乌隆的通道对越侨进行检查，但他们查不到任何文件或武器。这说明各地干部都能严格执行会议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乌隆召开的会议精神，成为坚持发展越侨爱国活动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解决内部团结问题的思想基础。实际上，前些时几位主要负责干部之间发生的齟齬，只是由于工作方式互不协调。在没有明确的工作路线时，细小的分歧通常会引起矛盾，影响团结。一旦工作路线得以确定，相互间的意见也即随之消除。

在同几位主要负责干部谈话中，我批评了一些同志不积

极支持驻曼谷政府代表处工作的错误。可能有些驻曼谷工作的同志在生活和行为上有些放任，但不是政治原则问题。我对负责东北侨胞工作的同志作了许多说服工作，说明在革命取得胜利，掌握政权之前，大家同甘共苦。现在，我们赢得国家政权，一些同志作为国家的代表需要有庄重的仪表。我们支持他们的工作不是支持他们的个人，而是考虑到民族和革命的利益。某些个人在生活上可能犯错误，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他纠正。但不要把对个人的意见与支持国家代表机关的活动混为一谈。特别是在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面前，越侨群众拥戴自己国家代表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

在对我国政府驻曼谷代表处人员抱有成见的几位同志，认清了这一基本问题的政治意义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相互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 (二)

### 整顿驻曼谷和仰光的代表处工作

我从乌隆出发，走了几个地方，了解贯彻最近这次会议决议的情况，同时看望了几个支持革命的家庭，然后去曼谷。

这时，曼谷设有我们政府代表处，越南通讯社分社和直属南部抗战委员会的一个秘密采购单位。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们在这里的同志对国内抗战事业和对外宣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总的看来，工作

还不够全面，办公的地方很凌乱，不像一个国家代表机关的样子。

通常一个国家驻外代表机关应负责管理本国在驻在国的一切活动，才能掌握情况，统一指导。然而驻曼谷的我国代表机关却只管有关的外事活动。对其它各部门的工作几乎都不关心，也无力过问。

因此，要整顿代表处的工作，首先要建立起某种组织机构，保证代表处与我驻泰国的各个部门如越侨工作机构，西部军事机构，后勤机构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我把这个意见同阮德葵以及几位特委研究，他们都认为合理可行。接着，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驻外干事会，负责全面领导我在泰国境内的各方面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一组织、动员泰国越侨团结爱国，拥护抗战，维护好在抗法战争中的越南和印支全境通向世界的“通道”。

一整顿从西面帮助老挝和柬埔寨的工作。

一指导向国内供应物资工作。过去这个部门的工作是独立活动，不参加当地党的组织生活，现归属中央干事会指导。

一指导外事工作，包括国际宣传以及驻泰、驻缅政府代表处的活动。

一与在法国、捷克等地工作的干部联系并指导其工作。

中央干事会由我任书记，阮德葵任副书记，各部门的几

位负责人任委员，如越侨特委的阿洪、双松，西部战线指导部的阿卿、阿秉以及供应国内物资的部门负责人高鸿岭、容文福。

\* \* \*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驻外干事会刚组成，正准备开会研究整顿驻曼谷代表机关工作时，发现黎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知去向。黎希以前在南部工作，南部抗战爆发后来到泰国，负责越南通讯社分社工作，属政府代表处管理。

黎希在工作中常与苏联驻曼谷大使馆联系。苏联同志理解我们在一个属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工作的处境，在有关事务交往中，他们常常不要求我们办理正规公文手续，只要口头提出，就给予尽力帮助。

约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黎希趁阮德葵去东北地区的时机，利用自己的地位，擅自向苏联大使馆谎称我党准备派他去莫斯科发行越南通讯稿。苏联使馆立即给予帮助，为他办了去苏联的手续。

黎希已经离开泰国一段时间，政府代表处和越南通讯社的同志都一无所知。阮德葵从东北回到曼谷，泰国警察查问黎希的去处，他只好说不知道。

我到曼谷听了阮德葵的汇报，判断有两种可能：一是黎希已被泰国警察逮捕，他们反过来故意查问；二是黎希看到局势严重，扔掉任务躲到泰国某个地方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苏联大使馆向我们通报黎希已安全抵达

莫斯科，大家才放下心来，放心黎希没有被逮捕，但并没有警惕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事件。特别是黎希走时还带走一个澳大利亚人，据说这个人是范玉石从新加坡找来帮助越南通讯社驻曼谷分社做英文翻译的澳共党员。

听了这个汇报，我对阮德葵说，黎希擅离岗位是无原则的行动，也许不单是由于心怀恐惧，是不是还会有政治原因？因此，必须立即设法防止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如果泰国当局再来查问黎希，阮德葵可答复说他到外地探望越侨，或处理他的私人事务去了，因为当时我们不在曼谷，所以不大清楚，过些日子肯定会有消息。同时要立即向苏联大使馆通报，说明黎希此行是无组织无纪律行动，我驻曼谷代表机关事前毫无所知，建议大使馆立即向苏共中央和政府报告，以免引起对我党和我国政府的误解，同时也为阻止黎希在莫斯科干出违背原则的事。

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才知道黎希的行动是受到我国驻法国政府代表陈玉名错误思想的影响。

陈玉名和黎希都是党的干部，脱离国内革命实践。他们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但未能很好消化，导致犯错误。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我党既已掌握政权，却只提出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统一，而不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提出在国内限制资本主义的主张，而且也不像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党过去和现在那样公开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了解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越南革命政权处于初创时期，必须对付国内外的

各种敌对势力，胡主席和党中央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争取朋友，减少敌人，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打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眼前的第一号敌人——法帝国主义侵略者。

对党的路线发生误解已是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但他们走得更远。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泰国，秘密相互串连，交换怀疑党、反对党的思想，相约到苏联和东欧去胡说我党的坏话。当黎希准备离开曼谷时，陈玉名在巴黎竟擅自宣布解散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驻法代表机关，自己跑到了捷克。

黎希自以为骗过苏联驻曼谷大使，一切便可以安然无事，不料苏联政府得知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之后，不允许他继续留在莫斯科，使他不得不前往捷克。到了那里，陈玉名和黎希又设法拉拢在布拉格的越南驻国际青年组织和工会组织代表，但这些同志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件事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我途经捷克，见到陈玉名和黎希，才有机会当面批评他们。

\* \* \*

黎希擅自去苏联是一个突出而十分严重的个别事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当时我们在曼谷工作制度不够严密有关。那里有的外事干部在生活方面对自己有些放任。还有的同志看到乃比里有社会主义思想，热情支援越南抗战便公然宣称是共产党人，到处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做法带来相反的结果，泰国、马来亚、缅甸等国一些共产党人怀疑黎希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而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

误认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泰国反动政府则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准备逮捕。

党中央得到有关这一情况报告后，决定立即将他调回国内。我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才把他送回国，以免惹出麻烦，而当时泰国的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坏。

这时在对外和国际宣传方面，驻曼谷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如建立了越南政府驻缅甸特派代表处，由陈文伦负责；扩大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机关与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驻曼谷大使馆之间的外交联系；与国际青年联合会、国际工会联合会等国际团体常驻捷克的机构取得了联系；越南通讯社驻曼谷分社出版了《越南新闻》英文版送许多国家和世界各地的越南侨民。

然而，在做了许多工作的同时，有些做法还存在浮夸和形式主义。

我们的同志在曼谷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叫做“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际联络处”。这个机构与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活动频繁。西方报纸散布消息说，这是共产党情报局在东南亚的办事机构。我建议解散“国际联络处”，把干部调去加强曼谷和仰光的外事和宣传工作。多办有实际意义的事，避免泰国反动当局的注意。

驻曼谷政府代表处十分凌乱，不像一个国家代表机关。工作人员衣冠不整，仪态随便。我与他们商量，要租一幢比较像样的别墅，把政府代表处与宣传机关的办公处分开，建

立起平等友爱，严肃认真的机关生活，每个人都要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做好工作，使之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国家机关。接着代表处在沙吞街找到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够几十个人工作和住宿，还有相当宽敞和荫蔽的庭园，像个政府代表机关的样子。生活、工作制度也比过去有了改观。

在仰光，陈文伦的特派代表处比驻曼谷的代表处还要简陋。越南政府代表应邀参加宴会时，陈文伦夫妇只好雇三轮车前往。为了照顾面子，不让外人看到自己的穷相，他们只好在离宴会地点半公里的地方叫三轮车夫停下，然后徒步走去。

当时我们在国外活动的经费实在非常有限。各地侨胞虽然积极捐助，但数量不多。靠国内政府提供经费困难更大。然而，外交工作中这种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建议干事会批准驻仰光越南政府代表机关购买一辆小轿车，作为对外活动的交通工具。

\* \* \*

约在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中央干事会在曼谷召开了一次各地外事干部工作会议，讨论外交活动和国际宣传的问题。驻仰光代表陈文伦也来参加。

会上，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谈了一些有关对外工作原则的意见：

对外活动中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坚持和体现我国政府的路线和政策。在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外事工作干部任何时候

都必须坚持原则，反对一切自由主义，违背政府路线、政策的表现。外事工作中任何违背原则的行动都可能损害国家利益。（这时我们党尚未公开活动，因而在有党外干部参加这次会议上，我没有谈及党的问题。）

有些同志常着重考虑衣着、言谈、接待方式等问题。固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注意，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尊严，不能让外人蔑视或误解我们的国家。因此，在内部我们要十分注意节约，精打细算，但在对外方面却要具有一个国家代表机关的姿态，作为外交干部，特别需要严肃和正派。

借这个机会，我还进一步谈了人民外交问题。不论在任何国家，我们的外交工作都必须争取驻在国人民对我国抗法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不仅我们的外交人员要搞外交工作，还要动员越侨群众参加人民外交活动。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我国抗战政府时，人民外交路线更具有决定意义（直到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还没有承认我国，中国则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为了展开人民外交，在曼谷的国际宣传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一九四八年底出版了《越南消息》泰文版，宣传内容适合当地情况，泰国僧侣和知识界购阅的人很多。一九四九年，《胡主席的轶事》一书被译成泰文，由一位泰国人士作序出版，向泰国人民介绍我国人民敬爱的民族领袖。

总的看来，在曼谷解决的几件事都属于整顿工作作风问

题。一方面维护了我对外机关的合法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在反动势力随时可能进行挑衅和破坏的环境中保持警惕，确立谨慎、细致的工作态度。

### (三)

## 整顿协助老挝、柬埔寨革命的工作

协助老挝和柬埔寨革命是中央干事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泰国东北越侨特委和在曼谷的负责同志早已进行这项工作。从全面抗战爆发，党中央就指示在泰国的越侨党组织从西面积极支援老挝和柬埔寨前线。那里的同志建立了“西部战线军事委员会”，由武有秉负责军事，陈文油和黎有惯负责政治，阿苏、阿卿、阿恭任委员。

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他们把整个“西部战线”从上寮一直到柬埔寨西北部划分为五个特区。大部分越侨干部调到这一战线。侨胞捐助的几百万元款项大都用在这里。

对流亡泰国的老挝伊萨拉政府成员，驻曼谷的同志常常在生活上和政治上提供协助。但我们的能力有限，法国和美国间谍却积极使用金钱拉拢，使老挝政府成员逐渐分化。其中的卡代、钦茂、苏发那·富马由于受不了艰苦，不了解长期抗战的方针，先后返回老挝，卡代甚至成为法国反对抗战的有力助手。只有苏发努冯亲王坚持正义，团结了在泰国的老挝干部和群众，与越南同志密切联系，虽然有时产生一些

疑虑，但过后稳定下来，决心把抗战事业进行到底。这时，在上寮、中寮和下寮都有一些人积极参加抗法，如西吞·库马丹、辛加坡、富米·冯维希等人。他们都与我们有密切联系。

对柬埔寨，我们在曼谷的同志曾与一部分反法的高棉人取得联系，并同他们研究建立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些力量派回柬埔寨洞里萨湖、马德望和西北边境一带活动。但后来由于内部矛盾，各人掌握一批武装，互相发生冲突，有的还在当地抢劫，骚扰人民。

泰国越侨也组成几支武装部队开到柬埔寨境内活动，他们在柬、泰边境的当列山建立了根据地；并到柬埔寨境内有越侨的地方进行宣传、鼓动，后来与越南南部抗战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高棉干事会建立了联系。

我到曼谷组成中央干事会的时候，我们协助老挝和柬埔寨抗战的工作正在展开。可以说，我们的干部和侨胞在这一工作中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西部战线，越侨战士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战斗。然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天，阮德葵告诉我说，苏发努冯亲王想离开曼谷到别处。这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苏发努冯一贯主张坚持抗战，与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什么现在突然要离开曼谷到别处去呢？

经过了解，我们才知道这与我们在老挝的同志不顾政治影响的一些行为有关。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下寮的一支部

队拿走了老挝部队的武器，他们简单地认为这些武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更能发挥作用。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麻烦。阮廷馨反映说，苏发努冯亲王对这类行动深感不满，减弱了对我们帮助的信任。

我们认为，苏发努冯亲王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本质上与那些前次脱离抗战阵营返回老挝的人有所不同。值得担心的是，可能有某种力量正在对他做争取工作，或者是他正在寻找某种力量取代越南对老挝的帮助。这一力量可能是泰国境内在老挝民族地区本来就有权利的“自由泰国”集团。更坏的一种可能性是美国正在企图寻找可供使用的王牌，插手印度支那问题。无论如何，争取苏发努冯亲王恢复对我们的信任是十分必要的。

我与阮德葵商量后，决定必须立即与苏发努冯亲王会面，安排一次亲密的饯行宴会，讲清两个问题：首先由阮德葵代表在泰国的越南同志向亲王诚恳地承认，下寮那支越南志愿部队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深感遗憾，现在已给错误者严厉的批评，责成他们交还武器。

做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以后，我们还要让亲王了解，他这次行程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同时向他讲明，邀请他去的人并非对老挝人民和争取老挝独立的抗法战争抱有诚意。目前越、老两个民族面对法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共同敌人，只有合作抗战才最为可靠，在互相配合战斗的过程中，下面的干部有时会犯错误，但胡主席和越南政府帮助老挝革命的政策、路

线是真诚的，始终如一。现在亲王暂时离开泰国，我们将安排购买飞机票并派一个干部与亲王同行，今后如果遇到困难，请亲王再回来与我们共同筹划老、越两个民族的抗战大业。

苏发努冯亲王到孟雷住了一段时间，经过接触和了解，看清了邀请他的人不是真心实意帮助老挝革命，他又折返曼谷，继续与我们联系，组织老挝抗战力量。不久，他返回老挝，与越南干部和老挝同志密切合作，组建巴特寮抗战部队，推动老挝的抗法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 \* \*

面临着像苏发努冯亲王想离开曼谷等一些问题，我进一步摸清了我们帮助老挝和柬埔寨革命的全部工作。我又会见了各特区的许多负责干部，听他们汇报情况，提出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底，中央干事会召开了“西部战线”干部会议，分析研究在帮助老挝、柬埔寨革命工作中的优缺点。

会议高度评价各特区的越侨干部和战士不畏艰难和困苦，为老挝、柬埔寨的革命事业和越南革命事业牺牲奋斗，作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会议也总结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一、对帮助友邻民族的认识尚不完全正确。虽说是“帮助”，但实际上更偏重于考虑越南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忽视了为友方动员、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训练军队和干部。

一重军事，轻政治。虽然也对群众做宣传，但实际上只

是为了使我们自己获得对敌作战的立足点，而不是把在老挝和柬埔寨人民中做群众工作，建立基层组织作为中心任务来抓。

一过“左”的主张和机械搬用越南经验。我们的同志把许多在越南的做法生搬硬套到老挝和柬埔寨，如建立“人民委员会”，把越盟的纲领和章程翻译出来拿去训练老挝和柬埔寨人。

一对待友方干部失当。有的同志不看对象，拿共产主义的教育计划去给柬埔寨人上课，不管是否合适。结果是有的人学习过后产生怀疑，逐渐对我们疏远。

我向中央汇报了上述看法，并着手研究协助老挝和柬埔寨革命工作的总路线。一九四九年初，我集中时间起草了一份“老挝、柬埔寨工作纲要”，这个纲要不仅要使在老挝、柬埔寨工作的越南干部了解，而且也要让老挝、柬埔寨的主要负责干部了解，以便于很好地互相配合进行工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把这份纲要提交中央干事会扩大会议讨论，征求意见。“西部战线”的许多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赞同《纲要》，把它看作是一份有关路线问题的文件，在老挝西部和柬埔寨西北部各特区的干部和战士中广泛传达。《纲要》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份，“老挝、柬埔寨三年工作”**（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的回顾，总的评价是：

“我们虽然帮助老挝、柬埔寨建立政权，发动革命运动

和组织抗法战争，但老、柬尚未建立起广泛的群众组织；老、柬的行政、抗战机关还软弱无力；尚未建立起老、柬的人民武装力量，主力部队尚未形成。总的看来，老、柬抗战的基础尚未稳固。

“我们虽然开辟了老挝、柬埔寨战线，迫使法帝国主义穷于应付，但尚未能阻挡他们的推进。敌人仍能使用老、柬的基地向我们进攻，还能使用我国的部分资源和物资供应他们在老、柬的统治机构，以破坏老、柬的解放运动。

“我们虽然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建立了友善的关系，但由于我们某些缺乏考虑的行动引起了老、柬方面的内部纠纷，被破坏分子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越南与老、柬之间的关系。

“这些缺点从何而来？”

“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尚未认识到老挝和柬埔寨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在帮助老、柬问题上态度还不正确，尚未抓住在老、柬的主要工作。”

**第二部份，谈老挝、柬埔寨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几点分析如下：**

“总的看来，老挝，柬埔寨社会发展的水平低于越南……”

“因此，老挝、柬埔寨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

“越南革命也是争取民族解放，但由于越南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可以提出独立与民主同时并进

的口号。至于老挝和柬埔寨则只能提争取独立一个口号。为了实现独立这一目标，必须实现全民团结，不分封建阶层，资产阶级，不分贫富，不分是否具有进步思想，只要真心实意抗法，争取国家独立就要团聚成为一个统一体，共同抗战。

“但这样说并非老、柬革命的结果将是某些人实行‘独裁’。我们必须看到老、柬革命虽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萌芽阶段，但既是一场革命，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站在世界民主阵营方面。而且在革命过程中，一切都必须依靠人民，民主思想将会在人民和领导者的头脑中产生。既已具备民主的内容，民主的形式也将随之产生。君主立宪制、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民主的性质，而且还在逐步前进。现阶段勉强提出争取民主的口号不利于老、柬的民族团结，而有利于敌人……。”

在谈到老、柬革命的特点时，纲要提出了在这两个友邻民族抗战事业飞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矛盾：

1. 在没有群众基础条件下产生政权。
2. 在没有革命军队条件下却要进行武装斗争……
3. 领导机构薄弱……

“因此，目前老、柬的革命虽已处于高级发展阶段，但还得注意做低级发展阶段的工作，即建立群众基础和建立根据地。”

**第三部份**，谈到关于帮助老、柬革命的方针，其中包括

四个要点：

“a，不能站在越南利益的立场上去从事老挝和柬埔寨的工作……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是一个革命的民族，在帮助老、柬的工作中，我们要完全站在老、柬利益的立场上……部队袭击暹粒后全部撤回越南南部，广治省借老挝部队的武器而迟迟不交还，把老挝西吞的部队拉回越南第五联区，这几件事都是违背了‘不能站在越南利益的立场上去从事老挝和柬埔寨的工作’这一原则的错误行动。

“b，掌握民族自决原则……民族自决是解决两个民族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则。与老、柬两个民族的命运有关的主张都应由老、柬自行决定。例如老、柬今后是与越南组成印支联邦还是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我们绝对不能勉强确定的问题。但老、柬真正的革命者也绝对不是只抗击法国而又仇视越南……”

“c，不把越南的主张机械搬用于老、柬……为了避免机械搬用，我们要十分仔细地调查研究老、柬的经济、政治、社会情况。我们要同接近我们的老、柬干部一起去认真了解……敌人在老、柬的政策如何？老、柬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怎样？自问自答就会发现我们对老、柬还十分生疏。既然生疏，提出的主张怎能适合当地情况，怎能避免机械搬用。

“d，协助老、柬方面逐渐自己担负工作。

“革命不能输入，而是广大群众觉悟和斗争的结果。老、柬革命是老、柬人民自己的事。在老、柬人民尚未觉悟，干

部尚未掌握工作方法，尽管越南派出大量部队也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做到让老、柬方面逐渐自己担负工作，我们必须绝对避免包办代替。这种毛病的根源在于不善于用人，甚至对人不信任……从事任何工作我们都必须想方设法接近老、柬干部，并争取他们也接近我们，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具体的实际工作到高深的理论，不厌其烦地指点、引导他们，才能使他们独立工作，成为人材，这样，帮助老、柬的工作也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第四部分**，谈到“老、柬目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虽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目前老、柬的抗战力量仍很弱小。总的说来，老、柬在政治、经济方面仍处于敌人控制之下。人民散漫，尚无组织。军事方面只有两、三支武装流动作战，粮食得从很远的地方送去，指战员负伤后只能转到国外治疗。抗战的指导机关，如老挝政府还要在国外流亡。柬埔寨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不和，实际上起不了作用。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当然应当注重组织群众，但有别于秘密活动时期的组织方式，也不是只注意建立政权，更不是只进行作战。必须同时注意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建立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流动作战的部队总是流动不止，将日益消耗，日益涣散。

“没有根据地，革命政权将不能存在。”

“没有根据地就不能抗战……”

这部分中有一个小题目谈到建立老、柬政党的问题：

“……政权机构要做政权工作；军队专注于军事工作；只有政党才能深入群众，真正唤醒民众、动员民众……政党是由觉悟最高，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团体。如果说群众组织是一个果子，那政党就是果仁；如果说群众组织是一支军队，那政党就是不可缺少的参谋部。

“……老、柬革命的性质是争取民族独立，因此老、柬需要的政党也是一个独立党，而不是像一些老挝干部主张成立的民主党，也不是像一些柬埔寨干部主张成立的社会党……”

这份纲要得到老、柬工作干部会议通过。全文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向老、柬战场的全体越侨干部和战士广泛传达。这份纲要使帮助老、柬的工作有了转变，工作发展较快。老挝和柬埔寨的同志看了这个纲领也很高兴，他们看到越南帮助老、柬是为了老、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越南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来电指派我为越南总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一九四九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地区工会会议。我立即准备去北京，和裴阁同行。裴阁通晓英、法语，而且对旅途应办种种事宜很有经验。可以说，这一次出行，如果没有他，就很难这样周全到达目的地。

## (四)

### 处理赴北京途中的若干问题

从泰国去中国，通常是自曼谷搭海轮到香港，然后乘火车去中国内地。但这时中国刚刚解放，华南地区还不很安定，香港又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经过那里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我们决定走缅甸、印度，再经捷克、苏联到中国；这些国家对越南都很友善。况且在捷克还有一些在国际工联和国际学联工作的越南干部，也要顺道了解情况，便于指导他们的工作。这样安排基本是对头的，但实际上沿途并不顺利。

出发前我们给越南总工会驻捷克的代表黎德整发了电报，同时电告世界工联主席路易·赛扬，说我是越南总工会代表团团长，并有代表团秘书一人同行，请他从法国到捷克时代为办理到捷克、苏联和中国的入境签证。

我们尽快赶到仰光，等待驻捷同志告知路易·赛扬代为申请过境签证的消息。在此期间，我对我国驻仰光的同志作了几次讲话，所讲内容与对驻泰同志相同。等了约廿天，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复电：“签证在孟买”，可理解为入境签证已在印度孟买办好。

我们立即动身到孟买，向捷克领事馆询问，他们答称未接政府任何指示。我们只好付给捷克领事五十卢比，请他发电报向国内询问。不久，我们得到了捷克入境签证。但购机

票时，各航空公司均表示要去捷克不但需有捷克入境签证，还需有飞机经过国家的过境签证。航空公司才能售票。于是我们只好到意大利领事馆、瑞士领事馆、伊拉克领事馆申请签证。他们都答复说因同越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给予签证。我们考虑，情况既然如此，继续留在孟买不可能解决问题，还不如到巴基斯坦，也许能申请到过境各国的签证，即使遇到困难也可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或内务部长帮助，因为他们两人对越南同情，很有善感并且曾经真诚帮助过越南干部的革命活动。

我们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我们得到巴基斯坦内务部长的亲切接见，并把我们在卡拉奇停留的时间延长三个月，还表示如遇到困难，尽管提出，他将尽力帮助。我们在这里也象在孟买一样，又向各航空公司打听情况。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是去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的越南代表，竭力设法帮助。一天，机场负责人告知我们，有一架英国飞机去捷克，只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停一小时，加油后立即起飞。乘客只需在机场等待几十分钟，不需申请过境签证，虽然票价较贵，但当天即可到达捷克，建议我们争取购买这架飞机的机票。听后我们非常高兴，立即买了机票，第二天我们即乘这架飞机到了捷克。抵达布拉格时，驻捷克的越南工会代表黎德整和学联代表阿向已在机场迎接我们。

\* \* \*

到达布拉格，我们住一家中等饭店，从黎德整和阿向那

里得知路易·赛扬和从曼谷来的两个越南干部已同路易·赛扬去北京，我们去苏联的过境签证已经向苏联使馆申请。裴阁同志赶到苏联使馆要签证。开始时使馆答复并无此事，但裴阁肯定地对他说，路易·赛扬告知我们已在这里申请好签证。听后，他们答应要查找，三天后通知说已找到给裴阁签证，但没有我的。裴阁说，既然有就两人都有，因为他只是代表团的秘书，黄文欢同志才是代表团团长。苏联使馆又答应再找一找。

在等待签证期间，通过黎德整的汇报，得知黎希被苏联驱逐到捷克。由陈玉名具保他留在布拉格。陈玉名宣布解散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法国代表团后，法共中央介绍他到捷克，似乎想在这里成立一个越南政府代表机关。捷克当局拨给他一幢堂皇和设备齐全的房子。当时他的妻子蔡氏莲正在捷克音乐学院学习。

我们进一步询问陈玉名的活动情况，得知他仍继续积极进行反党活动。陈玉名是陈富同志的亲弟弟，参加革命较早，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学习过不少理论，但因缺乏实践，未能很好消化。他看到八月革命后我党不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地却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接近，认为我党右倾。他曾写信给几个党，说胡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不正确。当时就有一位在法国留学的越南南方女青年胡氏明反驳他说，如

果说不正确，那为什么能领导八月革命取得胜利，能动员全体人民起来抗法？陈玉名无言以对，但继续在我们驻捷干部中散布反党思想。听了他的宣传，黎德整和阿向都不同意，但没有足够的理论来反驳。黎德整和阿向留在布拉格，其他同志都与路易·赛扬一起去北京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

这个情况很严重，我感到必须迅速着手解决。我同黎德整和阿向谈了两次话，使他们有充分的认识，能够驳斥陈玉名的论调。我又去找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的负责同志谈了我们在路上遇到的困难，请他发电报给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我可能来不及参加亚澳地区工会会议；我也同他谈了布拉格越南干部的思想情况，向他借阅毛泽东同志和陆定一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等中共文件作为参考，用以纠正当时在布拉格工作的越南干部中的错误倾向。他十分热情地给我帮助，尽量找出这些文件给我。

看完文件，我和裴阁到陈玉名的住处找他谈话。我直截了当地批评他宣布解散驻法国代表团是违反原则的行动。他辩解说，当时法国方面派人进行挑衅，甚至指使一些流氓开车冲撞代表团的车辆。我说，情况也可能是这样，但代表团办事机构属于国家，机关负责人是国家任命的干部，不管遇到多大危险，负责人都无权决定解散一个国家机关。退一步说，一个负责人要离职，国家是要派人接替的，如代表团一旦宣布解散，国家要派人接替也不可能。如果说法方想给代表团制造困难，你便宣布代表团解散，这无异是使法国殖民

者的阴谋轻易得逞。我作了这样分析后，陈玉名自知理屈，但仍东拉西扯，不肯承认错误。在这次谈话中，我也批评了黎希，但是他一直坐着，一声不吭，既不承认错误，也不辩解。最后我说，你们两个人出国时间很长了，现在需要回国向政府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黎希仍然默不作声。陈玉名则说他现在有病，医生劝他不要乘飞机和火车。我了解他得到法共中央的介绍，捷共又给予特殊接待，因而想继续留在捷，不愿回国。

陈玉名和黎希的问题在布拉格只能初步作这样的处理，待向中央报告后才能彻底解决(后来他们两人回到国内，受到中央严厉的批评并被无限期开除党籍)。然而这一件事对黎德整和阿向来说，也是一大收获。黎德整说：以前听到陈玉名那么讲，我们一直感到不对头，但因为理论水平不高，无法给以反驳。现在听到您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了分析批判，我们对问题也有了把握。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驳斥陈玉名各项错误主张了。我们始终相信党中央和胡主席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几天以后，苏联驻布拉格使馆终于找出了裴阁和我的人境签证。但是还有六天就要满期。我们急速离开布拉格去莫斯科，争取尽快到达北京。

## 第六部份

### 担任政府和党中央驻华代表的岁月

(1950—195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我与裴阁同志离开捷克首都布拉格，两天后到达莫斯科。我们找了一家少花钱的小旅馆住下。旅馆知道我们不是富裕的客人，但接待周到，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双人房间，每天廿五卢布。往下以后，我们立即到中国大使馆办理入境手续，以便赶赴北京。

但是又发生了意外。中国大使馆说，约一个月前有几位越南人与路易·赛扬同行到此，也是办理入境签证到中国参加亚澳工会会议。当时他们并未说还有其他越南朋友将要到达。我说，我是越南工会代表团团长，和我同行的是代表团的秘书。我们都是从泰国来的，因为经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时受到阻滞，现在才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说，亚澳工会会议已经结束，我们也未接到我国政府有关此事的指示。因此，原则上不能发给入境签证。

我说，虽然原则是这样，但我们是越南人，因为路经几

个资本主义国家碰到许多困难而误期，如再次折回这些国家，必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而且我们在苏联的过境签证还有四天就要期满。如果中国使馆不能发给我们入境签证，请发给过境签证，让我们通过中国返回越南。经过北京时，我们将向中共中央说明情况。我们参加亚澳工会会议一事，肯定我们党中央已通知了中共中央。中国大使馆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便同意发给我们过境签证。

取到签证，我们立即购买火车票去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到达中苏边境中国一侧的第一站满洲里。我们被安排住在外事处，得到亲切的接待。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外事处为我们做好一切安排，并派一位解放军同志陪我们到北京，直到外交部。从捷克与路易·赛扬同行先期到达北京参加亚澳工会会议的几位同志早在那里等候。我简单谈了路上遇到的阻碍并听他们复述亚澳工会会议的情况。外交部安排我和裴阁住到廊坊头条外交部招待所，等候中国政府的安排。

这时，得知胡主席和陈登宁同志也正从中越边境前来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谈。

胡主席到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住地。我也被安排和胡主席住在一起。

## (一)

### 按胡主席的指示留在北京

在中南海，胡主席向我详细询问了旅泰越侨情况以及我国驻泰国、缅甸、法国代表机关和其他在国外工作同志的情况。我逐项作了汇报。胡主席听后，肯定了中央海外干事会的工作做得好。又说，现在中国已经解放，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事物。但最有利的一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尚待克服。

早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胡主席从苏联到中国寻找与越南革命组织的联系，在昆明会见了越南党海外部的同志。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法国首都，胡主席主张把活动方向转移到越、中边界后返回国内。那时他就到过重庆与中共中央代表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从那以后，约有十年未同中国同志会面。在这期间，他成功地缔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在抗法战争中取得了成就。因此，当他会

见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求援助时，中共中央即以一个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亚洲最大国家的姿态（这个国家由于满清封建王朝和蒋介石官僚资本主义政府的无能而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分割与控制），把援越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国际义务。

\*\*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宴会，宴请胡主席。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出席了，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以及其他六七位同志。可以说，这是一次祝贺越南八月革命成功的宴会，一次赞扬越南人民抗法的坚强决心与意志的宴会，赞赏胡主席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卓越领导的宴会。同时也是表达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英勇抗战的团结战斗情谊的宴会。宴会上，刘少奇同志问起胡主席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参加过广州训练班的现在还有谁？胡主席指着我说，今天在这里的黄文欢同志就是一个。

接着，胡主席说，刘少奇同志就是当年常在广州训练班讲课的同志之一。我立即举杯走到刘少奇同志面前祝酒，祝他身体健康，并表示将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刘少奇同志也祝我健康，共同干杯。

宴会后，两党开始了实质性的会谈。

刘少奇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决定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将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得到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朝鲜、蒙古的承认。英国也已承认。法国已准备

承认。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我们强大起来，法国也不得不予以承认。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其尽快取得胜利。

以这样的意向，中国立即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志提出，请他把中国的想法报告苏联政府，并建议胡主席亲自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同志，直接向他介绍情况。后经苏联同意，罗申大使为胡主席访苏举行了一次宴会，陈登宁同志和我也应邀参加。宴会上，胡主席向他介绍我将担任越南党和政府的驻华代表。并说，今后需要交换意见或请求给予帮助时，请他们积极协助。

两天后，胡主席与陈登宁同志去莫斯科。我留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国外交部联系，办理有关建立越南驻华使馆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主席结束在莫斯科的会谈后，乘机返回北京，在这里逗留了几天，继续商谈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向中国提出任命我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印度支那共产党驻中国的代表。毛泽东主席表示同意。为了尽快在新情况下展开各方面的工作，胡主席急速返回国内。

\*\*\*

胡主席和陈登宁回国后，我从中南海搬到六国饭店（当时是政务院招待所，后改为国际饭店），直接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联系，准备建馆事宜。

这时中国外交部正要开办一个培训班，专门培养准备派往各国担任大使的第一批外交干部。我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借用刚回国华侨的名义参加培训班。在外交部只有李克农同志才知道我是越南人。培训班结业后，李克农同志派了一位熟悉业务的干部协助我准备建馆工作。我们选定史家胡同作为馆址。这里先前是美国一所学校的楼房。使馆需要的设备以及厨师、司炉、管理员、清洁工等服务人员都由外交部配备齐全。不久从国内和泰国调来的一批干部先后到达北京。使馆建立了精干的机构，这时政府的委任书也已从国内送到。

按外交惯例，只有特命全权大使才向国家主席呈递国书。政府代表则只需要向外交部递交委任书。但由于特殊照顾，中国外交部也安排我谒见毛泽东主席，相当于呈递国书仪式。谒见后，中国外交部又介绍我会见了驻华的苏联大使、捷克大使，并与中国文化、经济等对越工作有关的部门联系，拜会了北京市党政负责人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负责人。

在与各兄弟国家驻华使馆的交往中，几位大使都提出为什么越南不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只设置政府代表？他们这样提问是因为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是最高级，而政府代表则较低。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代表就是大使。通过广泛交往才知道有所区别。我向国内作了报告。党中央和政府才作出决定，任命我为大使。因此，我虽已象大使一样参加外交

活动，但直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才正式被任命为大使。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始递交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同时，我还被任命为我国驻蒙古和驻朝鲜的特命全权大使。

\*\*\*

抗法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国内干部均需全力以赴，因此党中央和政府把在国外的绝大部分外交活动都交我负责办理。当时，有密切联系的是各兄弟国家驻华大使，特别是苏联和捷克大使，不仅要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往来，而且还要向他们学习外交上的许多知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虽然尚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我仍同这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保持经常联系，互相交往，向他们介绍越南情况，争取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我也与芬兰、丹麦、瑞士等不支持法国侵略越南的西方国家大使馆保持联系，联络感情。

为了扩大对外活动，一九五〇年五月，党中央和政府派我到苏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然后参加五月九日的捷克国庆纪念活动，顺便处理一九四九年底经过捷克时尚搁置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参加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使我第一次看到以最新武器装备起来的，体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战胜的威力的苏联红军威仪；亲眼看到了情绪高昂的几十万苏联人的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地通过列宁陵墓主席台接受检阅。参加纪念活动以后，我在苏联同志的引导下参观了莫

斯科市雄伟的市容和一些工厂。晚上，观看歌剧、杂技、木偶戏等文艺演出。过去经常听说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照亮各被压迫民族前进道路的灯塔，这次才有机会亲眼证实，使我对革命前途更充满信心。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可以用“伟大！伟大！”两个字加以概括。

\*\*\*

为了准备参加捷克国庆，我到中国驻苏使馆了解一些外交礼节和请他们协助一些工作。这次到中国大使馆，得到大使王稼祥同志亲切热情的接待。他说，去年你来使馆时，我们还不认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是越南革命的一位负责干部，非常高兴能在使馆接待你。他对我谈，余年年初胡志明主席会见斯大林同志时他也在座。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并说援越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我们一定要尽力援助越南，越南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说，这次我到中国使馆拜会是为了表示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同时，我即将去参加捷克国庆纪念活动，有些关于礼宾方面的问题还不了解，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教。听说，在国庆纪念会上，各国代表都要发表贺词。我写了一份贺词并已译成中文，请你们帮助修改，使之合乎惯例，还请你们帮助译成法文，打印一份，以备到捷克时交给他们的国庆筹备会译成捷文在纪念会上宣读。

王稼祥同志看了中文译文后说，这样写就成，不需要修改。我们将协助译成法文，打字后交给你备用。我们使馆没

有法文水平很高的同志，但还能翻译。

谈完，王稼祥同志建议我与使馆一些负责干部会见，介绍越南情况。我接受了这一建议。约十分钟后，我就与使馆的同志们会见，作了越南情况介绍。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能够谈一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我们两国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谈一谈八月革命后的情况和当时抗法战争的形势。谈话后举行了一次十分愉快的亲密宴会。宴会后王稼祥同志把打印好的法文译本交给了我并祝我访捷获得圆满成功。

到中国驻苏使馆拜会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第二天我乘飞机去捷克，中国大使馆派人到机场为我送行。

参加捷克国庆纪念活动是我一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在越南革命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一个兄弟国家最隆重的纪念日，有机会会见各兄弟国家的许多重要人物和革命同志，亲身体会到各国对越南的重视，在主席台上参加检阅了军队和几十万群众的游行队伍。这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统治近一个世纪，而今已获得独立的民族在国际上享有应得地位的荣誉。

纪念大会组织得井井有条，各项活动配合默契。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在我住的那家招待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外宾的饭店，有一位负责室内卫生和为客人服务的女服务员，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对客人态度十分亲切，开头我一直以为她

是一位旅馆的普通服务员，但未想到在国庆纪念活动结束后，客人和主人举行联欢，才知道她是一位法科大学五年级学生。通常，在越南或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是不会乐意做这种工作的，但在这里，服务员则把在国庆期间为外宾服务看作是一种荣誉。这是我认为必须学习的。回国后我向中央汇报和同干部谈话时都就此作了介绍。

据一起参加国庆活动的朋友介绍，捷克在东欧不是一个大国，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居世界第二位（第一是荷兰）。布拉格市不像莫斯科那样壮观，却是一个十分美丽和清洁的古老城市，街道上看不到一片废纸和乱扔的烟头，不像我到过亚洲的许多城市那样。

可以说，参加捷克国庆纪念活动是我了解欧洲物质文明的一个机会。

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后，我在布拉格继续停留一个星期，与捷共中央联络部会见，介绍越南情况，并就请捷共中央为我们从法国撤回的干部提供入境和过境的方便，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提供路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次我到捷克，陈玉名正在斯洛伐克治病，他曾到布拉格探望过我一次。黎希经常陪我上街，给我当翻译。离开捷克回北京时，我安排黎希同行，陈玉名继续留在捷克治病，过一段时间后也将回国。

## (二)

### 深厚的越中情谊

我担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派驻中国代表的八年期间，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越、中之间深厚的情谊，是中国对越南抗法战争所提供的极其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对于越南抗法战争取得全胜具有决定意义。

作为历史见证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简要记录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援助，使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对其重要性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

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简述：

#### 1. 中国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支持。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开始的越南全国人民的抗法战争，直到进入相持阶段；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三个多月，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中国政府便正式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继后，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苏联也宣布承认，接着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亚洲的朝鲜、蒙古也接连宣布承认越南。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虽未正式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明显地对我国表示同情和友好。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带头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南在国际上取得了强固的地位。这是越南人民争取独立斗

争史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因此，我国曾把一月十八日定为“外交胜利纪念日”，每年都隆重纪念。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同志和越南代表团密切合作，粉碎了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使整个越南北方获得完全解放，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一个有首都、海港和有国际地位的国家，成为争取祖国统一斗争的巩固基地。历史的发展证明，日内瓦协定是越南革命的重大胜利，因为有了北方这样一个稳固而强大的基地，才能大力推进越南南方的解放斗争。中国在会议上的贡献正如在越南战场上的援助那样，具有着改变力量对比，迫使法帝国主义完全撤出越南北方，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作用。

——中国积极援助越南在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它以斩钉截铁的決心表示：“中国将给越南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共同战斗。”中国广播电台和各种报刊经常报道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的消息。中国出版了许多书刊和画册，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如舞剧“椰林怒火”等等，争取世界人民对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北方后，中国掀起了援越抗美的新高潮。中国各省几亿人上街游行，声援

越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七、八两日，美国又派出飞机轰炸东海市、永灵区和广平的其他地方，因此，二月十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北京一百多万人的群众集会。中国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强有力的声援，对阻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越南北方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 2. 在抗法、抗美战争和越南北方的经济建设中，中国提供的物资援助。

中国政府曾经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不只是言词，事实也是这样。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援助我国物资的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占中国援外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的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在抗美战争时期，大部分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由中国提供，其中包括军装、药品、卫生器材和许多大炮、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火箭、飞机、舰艇以及各种零配件和油料，足够装备我军二百多万人，并按各战场连续作战的需要充分供应弹药和各种装备。

一援助我国在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一九五四年

和平恢复后，按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国帮助我国立即修复了已被战争彻底破坏的河内——同登段铁路，约长二百公里。那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窄轨，毛泽东主席立即决定拆卸中国山西省同蒲铁路（也是窄轨）运到越南铺设，并配备了全部机车和车厢。在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助下，四个月就修复了这段铁路，“使我国更加靠近中国、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它把河内同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连结起来，直到柏林”（胡主席语）。接着，中国开始帮助我国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作为实现自力更生的物质基础。

一自一九五四年起，中国帮助我国建设四百五十个工程项目，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完成了三百三十九个项目，包括碾米厂、制糖厂、纺织厂、针织厂、造纸厂、发电厂、化工厂、橡胶厂、肥皂厂、卷烟厂、火柴厂、灯泡暖水瓶厂、搪瓷厂、陶瓷厂、红河文具厂、味精厂、化肥厂、农药厂、造船厂、太原钢铁联合企业、采矿设备、无线电系统、国营农场、农业技术学校，并继续修复自河内到老街、到太原的铁路，重修咸龙桥等等。所有中国援建的这些项目，都是为了满足越南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一九六五年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以后，中国又接受了我国政府的要求，派出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越南拆卸中国援建的几十个工业企业的机器和设备，疏散到安全地区，免遭美机轰炸。

一在供应前线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资方面，仅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中国总共援助粮食五百多万吨、布

匹三亿多米、汽车三万多辆、各类船舶六百多艘、机车一百多台和车厢四千多节、汽油近二百万吨，以及各种针织品和日用百货总值人民币七亿多元。

——一项特别宝贵的援助是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十分需要外汇从事国家建设的情况下，援助了我国六亿多美元的现款供越南在争取南方解放的斗争中机动使用。

### 3. 中国派出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和军队支援越南。

一九五〇年以后，越南的迫切任务是努力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按胡主席和越南党中央的要求，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工作。

——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建设军队和传授作战经验。除了帮助越南中央军委外，还有参谋、政治、后勤等顾问组织，帮助越南的三〇八、三一二、三一六、三〇四等主力师团和其他兵种。通过中国顾问同志的帮助与越南军队本身的极大努力，我们建成了拥有几个野战师的主力部队，能逐部分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实际上在从边界战役（一九五〇年底）到奠边府战役（一九五四年）的几次战役中战胜了敌人，直到获得越南北方全部解放。

——以罗贵波同志为首的政治顾问团的任务是就各部门的政策和具体工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各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建设强大的解放区，使解放区能负担起支前任务。除了顾问团团团长经常与党中央政治局交换意见外，

还有各顾问组在财政、税收、银行、交通运输、公安、情报等等部门协助工作。中国顾问同志与越南干部一起制定了各部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建立了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培养了许多具有政治和业务水平的干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五年越南北方全部解放后，按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政治顾问团才全部撤离越南（军事顾问团也撤离越南）。罗贵波同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

自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和平得以恢复直到一九七八年，北方的迫切任务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使北方成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地。为了完成中国援建的各工农业项目，多批中国专家来到越南，方毅同志担任中国专家团团长（以后改为中国驻越经济代表处）。

中国专家们尽心尽力地工作，越南干部和工人深为敬佩。直到一九七八年，黎笋集团大肆反华，中国政府才决定把全部专家撤走。

有一点必须说明，中国顾问和专家在越南工作，越南方面只需供应膳食、住房和交通工具，至于薪金、补助费和其他开支都由中国方面自己解决。这不仅是一项巨大的援助，而且也是政治态度的体现，说明中国干部在越南工作如同越南干部一样，在生活方面并不特殊。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五〇到一九七八年，中国援越顾问、专家和技术人员总数为二万人。胡主席对中国顾问、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曾说：“对中国顾问我绝对信任。”他亲

自向顾问团和专家团的团长颁发了越南最高级勋章。越南政府和中央军委也向中国同志颁发了多种勋章，表彰他们在越南抗战和建设中的功绩。

一自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美帝国主义使用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疯狂轰炸和炮击，甚至企图派兵直接侵犯越南北方。根据胡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器材、机械和物资前来支援越南，完成了多项重要任务，例如修建公路一千二百三十一公里，铁路四百七十六公里，建成了安沛机场等等。在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中国同志还击落了许多美国飞机，与越南军民一起保卫了从北方进入南方的几条交通线。中国同志在驻军地点，还积极帮助当地人民疏散老人和儿童，挖掘防空壕，治疗伤病人员等等，加强了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在完成国际主义任务的过程中，一千多位中国同志在越南的土地上献出了生命，三千多位同志光荣负伤。一九七〇年七月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国军队驻在越南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使美帝国主义不敢直接出兵侵入越南北方，我国军民能集中力量为争取南方解放而斗争。

#### 4.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中国真正成为越南巩固的后方。

在美国飞机空袭下，交通运输工作极其困难。中国千方百计协助我们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为我们铺设了约四

千公里长的油管，把中国的汽油输送到越南南方。自一九六七年开始，中国动用了五百辆运输车把物资直接运到越南。在海防港被美国投放水雷封锁之后，中国又增调二千二百辆运输车分五路把援助物资运到越南内地。

在海路方面，一九六五年以后，中国开辟了一条沿海的秘密航线，把援助物资送到中部的几个小岛，便于越南继续运入南方。中国还在海南岛提供两个港口作为越南运送物资到南方的中转站。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到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把中国援助的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等物资直接运给南方解放军。

中国还经常帮助苏联和其他国家把援助越南的物资过境运往越南，并对全部军援物资免费运输。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允许越南使用中国领土作为活动场所并提供各种设备，例如：

一在抗法战争时期，由陈子平少将和黎铁雄少将负责的越南陆军学校就设在云南省，在中国教员的帮助下训练军事干部。

边界战役前，新组建的一些主力部队如三〇八师等，曾直接开到中国境内领取全部武器装备，然后回国参加边界战役。

一在抗美时期，越南机场受到美国空军威胁，越南空军部队曾在云南省的机场训练和隐蔽。

中国在云南为越南建立了备用广播电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遭受美机轰炸，仅九分钟之后，在云南省的越南广播电台即代替国内电台继续广播，及时向全国人民报导胜利消息。

设在广西桂林有六百张病床的南溪山医院，专供越南伤病员使用。七年中有越南干部五千多人在那里治疗。以后，这所医院的全部设备送交越南运回国内。在桂林还设有越南少年学校，主要培养烈士子女和集结到北方的南方学生。

此外，在广州春秋季节商品交易会，中国还专门为越南提供了一个展厅，协助越南向国外推销商品。中国还帮助越南印刷各种书报、图片、词典、教科书等等。

周恩来总理经常教育负责援越工作的中国同志要“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之所急”。中国援越的精神是：节衣，缩食，少用，优先供应越南高质量的物资和设备，而且以不叫苦，不宣传，默默无闻地完成国际主义义务的精神，千方百计援助越南各项必需物资，包括向国外购买。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曾亲自到长山交通线，不顾美机狂轰滥炸，视察运送援助物资到南方的情况。胡主席曾用慷慨的、无私的、极其巨大的和有效的这些字眼来形容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越南人民的友谊使我们十分感动和极为感谢。”

中国对越南援助的二十八年（一九五〇——一九七八）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对越南援助是越南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取得胜利所不能缺少的国际因素。反之，最近几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六）的历史事实也说明，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陷进了极其严重而又无法摆脱的境地。

简略记述中国援助越南的情况就是写下了越南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重要篇章，写下了越、中两国人民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关系史上最美好的篇章。当然，对苏联提供用以击落美国B52飞机的导弹等军事援助和建设中的援助，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也深为感谢，而且永志不忘。

### (三)

## 在国内的几项活动

我虽然担任越南驻华大使和党中央驻华代表，但为了履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责，也经常回国汇报工作和参加国内的有关活动。特别是边界战役胜利后，交通来往比过去方便，我回国参加一些活动的机会也增多了。在国内参加活动中，有三件事触感最深，记忆历历在目：

一关于一九五〇年九月的边界战役。

一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一关于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土改后纠偏问题。

#### 1. 关于边界战役（一九五〇年九月）。

谈及边界战役，首先必须了解清楚其来龙去脉。一九五

〇年初，当我国抗法战争处在相持阶段，中国革命赢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主席秘密访问北京，请求中国提供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要求。如前所述，第一件事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接着中国派遣罗贵波同志带领一批干部进入越南，与越南党中央共同研究抗战形势。通过研究表明，要接受中国的大量援助，必须打通越、中边界，这就是说，必须歼灭驻在边境地区的法军。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军事工作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动边界战役打开中、越边界交通，并决定派遣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就和胡主席结识、身经百战的名将陈赓同志到越南帮助组织战役。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陈赓同志带领一批干部从云南出发，翻山越岭到越北，在太原省某地丛林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官邸”会见了胡主席，共同研究边界战役。时值炎夏，两人如家中亲人一般，只穿着一件背心，摊开地图纵横指点，筹划战役方案。胡主席说，“有人主张先打高平敌人据点，高平得到解放，边界就打通了”。陈赓同志认为，高平是敌人的一个大据点，我军还不擅长打较大的阵地战，打进去时间一定要拖延，带来的牺牲可能很大。最好是先打高平与谅山之间的据点东溪，那里的敌军只有三百左右，我可以速战全歼。高平之敌将陷于孤立，七溪之敌必北上救援，我将在敌行军

途中截击歼灭。我们的目的是尽量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军遭受重大损失后，或者收缩，或者逃跑，我们便取得边界地区的主动权。胡主席十分赞赏这一意见，提交中央政治局和总司令部讨论时也得到大家一致同意。

作战计划确定后，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胡主席亲临边界前线掌握战役的指导工作。这时，韦国清同志率领配备有参谋、政治、后勤机构的军事顾问团从广西到达。他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整个边界地区到处洋溢着越、中两国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各族人民精神振奋，信心百倍，积极支援前线。一片人民战争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我军开始进攻东溪，十八日上午守敌三百人被全部歼灭。东溪失守后，敌军高平兵团司令沙尔东上校不得不放弃高平，率全部守军向七溪方向撤退，七溪敌军兵团司令勒巴热上校的二千人向东溪方向推进救援。这两股敌军当即被我堵截包围。经过几天连续战斗，十月八日，两股敌军都被歼灭，沙尔东、勒巴热及其指挥部的部分军官被俘。河内敌军司令部慌忙命令七溪、那岑、同登、谅山、老街等据点敌军全部撤退。法军在边界地区的整个防御系统土崩瓦解。我们的解放区与中国大后方连成一片。

边界战役胜利后，胡主席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边界战役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胜利。”战役司令员武元

甲说：“边界战役粉碎了殖民者在边界的封锁线，粉碎了敌人企图孤立我们的战略意图。这一胜利将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是越南抗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对越南非常适用，对我们的武装斗争非常适用。”

我参加捷克国庆(五月九日)纪念活动后回北京呆了一段时间，约在九月初回到边境，当时战役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我听到两党中央主张先打东溪而不打高平，简单理解东溪是个较小的据点，比高平好打。直到打东溪，全歼沙尔东和勒巴热两个兵团后，我才认识到打东溪的主张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攻点打援”和运动战的战术果然十分有效。战役结束后，我与几位地方干部进入高平市内，看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非但没有一个敌人，市区居民也都已疏散。我在高平市停留了两天，便回到党中央和胡主席的工作地点，汇报请示完毕后我又去中国，十一月五日回到北京，随身携带越南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向刘少奇同志具体通报了各项有关问题。

我在北京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初，便回国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2. 关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一年二月)。

这次党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九日在宣光省的丛林深处召开，被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称为越南劳动党成立大会。原因何在？为了说明

问题，这里简略回顾二十一年来越南党的成立和发展过程。

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在胡主席的主持下，越南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为越南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底，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党中央把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作为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共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国家共同的共产党。义、静苏维埃运动爆发后，法国殖民者残酷镇压，革命处于低潮。一九三五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国外指挥机关在澳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整顿党的队伍。这次被称为澳门会议即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何辉集同志接替已经牺牲的陈富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当时越南被分割为两个地区，十六纬度以南由英国军队接管，十六纬度以北由蒋介石军队接管，柬埔寨和老挝的大部分领土再次为法军占领。为了对付这一复杂情况，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公开宣布自行解散。但实际上党仍然存在，通过越盟阵线的名义领导革命。经过四年英勇的抗法战争，特别是在边界战役胜利之后，越南已与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联成一片。“国内外形势新的变化需要我党公开进行活动，以便领导、组织和动员全党、全民坚决战胜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因此，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党代会具有着几个突出的特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越南劳动党和强调了中国的革命经验与毛泽东思想对越

南革命的重大意义。

● \* \*

一越南劳动党的成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我党已成为执政党；党的政治生活与活动方式也有了新的改变，与过去不合法活动时期有所不同，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与革命新的要求，党章需要适当的补充和修改。而且印度支那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是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工人阶级的共同政党。全国抗战爆发后，越南社会具有着三种性质：即人民民主与部分殖民地和半封建并存。在柬埔寨，虽然三分之二的国土得到解放；在老挝，虽然在上寮、中寮和下寮都有广大的解放区，但总的看来，这两个国家普遍存在的仍然是殖民地和封建社会，而且在老挝的许多地方，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因此，虽然三个民族都居住在印度支那半岛，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和美国干涉者这样的共同敌人，同处于世界战争与革命的新周期，但其历史条件与民族条件各不相同，这一形势要求每个国家需要有各自的工人阶级政党，并有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纲领。

“这一形势迫切要求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民族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纲领和策略，确定党转入公开活动状态并修改党章使之适合于革命的新形势与新任务，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者领导全党、全国的工作”（引自《我党三十五年的斗争》第二集第九十五，九十六页）。

因此，越南劳动党的成立即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结束，同时也是促进柬埔寨和老挝成立本国的政党，按照两国各自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领导本国革命。

\*\*

一强调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思想对越南革命的重要意义。

在这以前，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列主义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任务。自中国革命成功后，各国党都把研究和學習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课题。就越南革命来说，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前，胡主席已把中国革命的经验与越南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建立了解放区，组建了军队，成立了政权，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保卫政权的斗争，并使抗法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把学习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到了全党任务的高度，在新党章中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可以说，这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它体现了越、中两国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战斗友谊。

我们还记得当时的大会，“面对全体代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像片的下面悬挂着斯大林、毛泽东的肖像”（见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越南劳动党成立大会致中国共产党电中说：“越南劳动党愿以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为榜样，学

习引导中国人民和东亚各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见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报》）。

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内和在我国人民保卫祖国的战斗中有着相当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人民报》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刊登的介绍长征所著《抗战一定胜利》一书中说：“我党具有着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又说：“长征同志遵照胡主席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毛泽东思想，分析了越南人民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出了长期抗战的战略、战术方针”。

《人民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社论《祝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伟大胜利》一文中写道：“为了祝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斗争的胜利，我们要：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

值纪念奠边府大捷十周年之际，武元甲大将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国人民在奠边府以及在抗击法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者的神圣战争中取得历史性胜利的经验》一文中说：“一九五〇年以后，中国革命已取得了胜利，我国军队和人民更有条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经验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有助于我军迅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他对我军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对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秋冬战役和伟大的奠边府战役作出了贡献……”。

粗略回顾上述情况，我们便能看到，那些后来主张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和反华的人背叛胡主席的路线，忘恩负义和堕落到了何等程度。

### 3. 关于土改纠偏问题的党中央全会(一九五六年九月)。

实行土地改革是为了农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改善农民生活，促成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一项战略决策。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能按正确轨道进行，一九五三年二月，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土地纲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又建议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在整个越南北方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成立了负责指导实现土地改革的土改委员会。

① 党的土地纲领。几项基本原则如下：

一没收叛国越奸的土地、耕牛、农具和财产。

一没收或征收(视罪行轻重)反动地主和恶霸的土地、耕牛、农具和财产。

一征购抗战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土地、耕牛、农具；抗战地主，民主人士得到适当照顾。

一不得侵犯富农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其它财产。

一坚决保护中农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与其它财产。

一不得侵犯由于参加抗战，由于缺乏劳动力和从事其它职业而出租少量土地的人。

一实现土地改革必须按照党的农村路线发动群众，即依靠贫雇农，紧密团结中农，联合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生产，大力促进抗战事业。

② 国会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有如下具体规定：

一关于土地的没收、征收、征购事宜(第二章)。

一关于土地的分配事宜(第三章)。

一执行和实施土地改革的机关(第四章)。这一章中有两条限制在执行中发生偏差的严格规定，如第三十四条：“阶级成分由农民代表会议评议。当事人必须参加评议”。第三十六条：“犯法者须依法审理，严禁非法逮捕和杀害、殴打或使用其它肉刑”。

③ 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党中央总书记长征任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国越、黎文良、党中央委员胡曰胜任委员。

党中央提出按上述方针路线实行土地改革和成立了上述重要干部参加的指导委员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长征的家长作风和左倾意识，导致了出现严重偏差，把打击面扩大到了中农、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扩大到了党的基层组织。

我记得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土改委员会汇报了太原省黄国越负责的土改试点。这期土改中，共有漏网地主五百人，错划地主四百人。中央委员同志们提出，漏网的以后可以补划，但被错划的人却失去了全部财产和荣誉，

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怨仇，这是一种不能容许产生的有害现象。但土改委员会对这个意见不予重视，相反地却自行决定允许各土改工作队处决恶霸地主来提高农民的威势。处决地主从太原省开始，以后扩大到许多地方，而且被看作是提高农民威势的一个好办法。

接着，土地改革扩大成为整顿党的组织。由于只重人证不重物证，使用肉刑逼供，结果到处都有“反党分子”和“混入党内的破坏分子”。义安、河静是党的基层组织最强大的地方，也就成为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在这以前，中央一直信任长征、黄国越、黎文良，现在由于在义安、河静所犯的严重错误，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应传到河内，中央才紧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土改形势。开始纠偏工作。

\* \* \*

讨论土改纠偏的中央全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这是自我党成立以来开得最长的一次会议(近一个月)。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认为在土改过程中，土改指导委员会未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例如：

一党主张“斗理”，提高农民的觉悟，并使地主了解剥削农民是错误的。但各土改工作队却让农民任意辱骂被称为地主的人，甚至让儿媳辱骂婆婆，儿子辱骂父母，而被称为地主的人只能低头认罪，不能作任何申辩，有的人被管制得没有饭吃，邻里和亲友可怜他们，偷偷给他们几块红薯或木薯。

一党主张对革命有功的家庭和“抗战地主”应得到照顾，但各土改工作队都把他们一律看作是对农民有罪的地主而乱斗，乱控诉一气。

一党主张有少量土地出租但主要依靠其它生活来源的人，如商贩，工人等等只劝说他们把土地归还农民，而不能视为地主，但各土改工作队仍把他们看作地主，让农民任意辱骂。因此，只有三、五分地而划为地主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农是农民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应当紧密团结，富农在土改中本应处于得到联合的地位，但不少的人也被划为地主，被没收土地、房屋、财产，受到各种侮辱，不能作任何申辩。

危害更大的是转入“整顿组织”阶段，不仅打击中农和富农，而且扩大到打击党的基层组织。一九三〇年入党或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大部分党员都被斗争，被控诉，被监禁。特别在由邓试负责的义安、河静两省，到处都是监狱，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全部被搞垮。

上面这些错误，在会上得到相当清楚和充分的反映，土改委员会的负责人长征虽然无法辩解，但仍然强词夺理说：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土地便是巨大的胜利，对于错误则尽量避开不肯坦率承认。黄国越也不承认错误。只有中央组织部部长黎文良诚恳地承认了整顿组织中的错误。胡主席虽不是土改委员会的成员，但作为党的主席，他在会议上就检查督促不够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并主张坚决纠偏。

中央全会本来应就土地改革的经验总结作出决议。但党

中央总书记、土改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征由于思想不通，因此几次提出的决议草案都未能得到中央全会通过。后来由于会议时间过长，不能再继续拖下去，只好在决定坚决纠偏和对几位负责干部给予处分之后宣告结束。至于全会的决议搁置起来，交由长征重新起草，提交下次全会审议。

关于处分问题，中央全会决定如下：

一免去长征的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总书记职务由胡主席暂兼。

一免去黄国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免去黎文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免去胡曰胜党中央委员。

中央全会投票补选阮维桢、黎清毅、黄文欢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考虑到胡主席担任党的主席又要兼任总书记，要总管各项事务性的工作，因此总书记的人选必须另行物色。

黎笋是在南方工作的干部，以前曾给中央写信建议实行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生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考虑到有这一创议的人一定能充当中央书记协助胡主席工作。不久，黎笋奉调从南方来到北方工作。

\*\*\*

约在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初，黎笋到达河内，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代理总书记，协助胡主席处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黎笋担任党中央代理总书记后，不象长征那样整天坐办公室，而是与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广泛联系。在中央政治局和党中央的会议上，他表现谦虚，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发表意见不多。他说，我初到北方，还不了解情况，还得学习，特别是搞北方的建设还需要研究经济情况。

关于土改纠偏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黎笋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说，土改中的错误主要是不依靠党组织，而只依靠土改工作组。中国解放之后，在华中、华南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只能依靠土改工作组，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很弱，有的地方几乎还没有党组织。至于越南，经过多年战斗，党组织已广泛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但进行土改不去依靠党组织，反而把打击面扩大到党的基层组织上。听了他这样的分析，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关于总结土改经验的决议交由黎笋负责起草应属合理。但黎笋推托说长征是土改的负责人，仍由长征起草更合适。然而自此长征起草的决议仍然难产，直到一九六〇年底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草案还是提不出来。在党的历史上，这样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却没有作出一份总结性的决议，许多党员都很不理解。不仅中央全会未能作出决议，在土改纠偏过程中，长征的态度仍不鲜明，因此，冤案、假案得不到改正，被错划成分的人未能明确宣布纠正，土改中结下仇怨的一些人，至今仍耿耿于怀。长征由于在八月革命前后认真贯彻了胡主席的方针和路线，对缔造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引导抗法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较大

贡献，在党内党外威望很高。但在土改中犯了错误，纠偏又不彻底，威望明显下降，特别是黎笋在背后使用巧妙的言辞贬低长征，更促使干部和党员逐渐把对长征的信任转向黎笋，而长征本身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参加讨论土改纠偏问题的中央全会结束后，我再到北京。周恩来总理知道有关消息后，十分关心越南的土改纠偏问题，与我见面时立即询问：土改中的问题与中国顾问有关系吗？我说：中国的土改经验是很好的。越南土改委员会犯了错误，如地主划得过多，多数地方打击面扩大到富农与中农、以其他生活来源为主的小土地出租者、参加抗战或对革命有功的地主，特别是把打击面扩大到党的基层组织，这都是越南土改委员会的错误，而不是中国顾问的错误。

土改中的错误对长征来说是一场悲剧，对黎笋来说却是一个良好时机，使他能逐步拉帮结派，逐步离开胡主席的路线，把祖国引向灾难。

## 第七部份

### 越南革命与黎笋的背叛

(1957—1979)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央决定阮康同志接替我任驻华大使，陈度同志接替我任驻朝鲜大使，我奉调回国另有任务。

这期间，党的工作在各个方面展开。分工我负责国会的工作，协助任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年高体弱的孙老（孙德胜）。一九四六年十月，经国会选举，我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一年在河内市党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河内市委书记。不久，中央决定我不再担任市委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除了我率领(或参加)党政代表团、国会代表团在国外访问或在国外休息疗养外，我的政治生活和党中央政治局的生活紧密连结在一起。

按照规定，政治局每周开一次会，会议都由胡主席主持，只有胡主席缺席的情况下，才由黎笋主持。中央召开全会，

政治局委员都是主席团成员，按全会的日程安排，轮流担任一天或一次会议的主席。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和黎笋接触，通过这些接触，我深知黎笋的为人。

黎笋是一个聪明，有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人。但又是一个不诚实，对名位有很大野心的人，爱听阿谀奉承，讨厌坦率直言，在革命队伍中缺乏作为兄长的风度。这本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来自封建和殖民地的旧社会，参加革命队伍以后仍然或多或少带着旧社会的思想影响。然而，革命者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真心实意自我改造。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具有革命品质和革命道德的人，成为一个诚心诚意为革命的利益，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人。

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相处和观察，我看出黎笋并没有自我改造的觉悟。既然没有为革命利益进行自我改造，那么，逐步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是理所当然。

黎笋背叛越南革命的国际背景是由于一九五三年九月，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共产党大权，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国内背景是由于胡主席那几年都一直患病并在南方解放之前去世。

黎笋背叛越南革命不仅使越南人民感到痛心，而且也使曾尽心尽力帮助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以及希望世界获得和平、越南人民获得温饱和幸福的善良

人们感到痛心。

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底一九五七年初，黎笋调来北方工作。最初几年，他还没有培植好自己的党羽，在党内领导机关还没有牢靠的地位，所以显得谦逊平易近人。一九六〇年底，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正式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自此，他一步步逐渐离开党和胡主席的路线，直到南方全部解放，他便公开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他的具体背叛行动是一九七六年底利用党召开四大，把三分之一（七十一人中的二十三人）的中央委员排挤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迫使党中央作出反华决议（一九七八年七月）；签订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是反华的军事联盟条约（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动二十万军队入侵柬埔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为了阐明黎笋走上背叛革命道路的经过，这一部分记述那些年月的若干有关事件：

一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与越南劳动党的态度。

一苏联对越南抗美提供军援后所发生的事件。

一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与黎笋的作用。

一越南革命与黎笋的背叛。

一决心离开祖国继续革命。

一有关的文件。

## (一)

###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的事件 与越南劳动党的态度

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苏联发生了人们意料不到的事件：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推翻了马林可夫，当上苏共第一书记，接着出现了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系列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把“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的主张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的总路线；把“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作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的总路线。这次大会，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秘密”报告，诋毁斯大林，实际上是诋毁苏联。当时，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正在千方百计诋毁苏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恰恰给帝国主义各国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美国获得了这份秘密报告，当即予以公布：

——一九五七年六月，赫鲁晓夫指控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反党集团，实际上这是为篡夺党全部权力所作的诬告。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纪念十月革命之际，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主席参加了这次会

议，会议的宣言提出：

“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上。这是重要的原则。”（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越南《人民报》。）

——一九五九年，中国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压中国对印度作出让步，中国坚决反对，因为这一段有争议的边界线是原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擅自划定的，中国从来不予承认。

——一九六〇年六月，社会主义各国党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迫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彭真不得不当场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一九六〇年七月，赫鲁晓夫单方宣布撤退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六百多个与中国签定的协定和合同，同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运动。

\*  
\*  
\*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暴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特别是苏联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越南劳动党面对这一情况深为忧虑。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以胡主席为团长，黄文欢、春水为团员的代表团急速动身去苏联，说服赫鲁晓夫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因赫鲁晓夫顽固坚持反华而毫无结果。虽然如此，这时胡主席仍然主张要维护苏联的威信，把苏联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老大哥”，团结苏联、团结中国，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这些主张体现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至十日召开的越南劳动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

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党的代表大会首次在首都河内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有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等一些大党的代表，还有一些尚处于地下，不公开的党的代表。这是一次“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为国家统一而斗争”的大会，是一次“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大会。

大会选出七十一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四十三人，候补委员二十八人。接着，新的中央委员会又选举胡志明同志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黎笋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全会还选出政治局正式委员十一人：胡志明，黎笋，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黎德寿，阮志清，阮维桢，黎清毅，黄文欢。候补委员二人：陈国环，文进勇。

大会在意气风发的气氛中结束。大家期望黎笋在团结苏联，团结中国，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中取得良好的结果。但是大会以后不久，黎笋逐步倒向赫鲁晓夫，越来越背离这一崇高任务！

\*  
\*  
\*

党的三大以后，胡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趁着纪念十月革命的机会，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坦率发表意见，温和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而后取得协商一致，通过了具有建设性的共同声明。其中提到：“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平等，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而提出政策，同时相互支持。”（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越南《人民报》。）这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兄弟党所期望的是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党的路线而不是被迫跟随任何一个党的指挥棒转。

但是在那以后，赫鲁晓夫仍然压一些兄弟党反对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趋分裂。具体表现在各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如一九六二年底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捷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及一九六三年初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都公开指名批评中国，中国党的代表不得不在这几个大会上进行反击。我作为出席上述各党大会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深为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不和而感到痛心，回到河内，我如实地向胡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

从东方到西方，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兄弟党，都发生了分化：被称为“正统”的一派，追随赫鲁晓夫的主张，进行反华，“马克思主义”一派却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各派都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在他们看来，当全世界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却主张与帝国主义搞和平

竞赛，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这无异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大泼冷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越南劳动党在内部的会议上多次讨论这一形势，到一九六三年底，党内基本取得一致，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必须坚持，当南方人民奋起反对美伪破坏日内瓦协议并加紧镇压要求实现祖国统一的任何人的时候，赫鲁晓夫式的“共处”是不能接受的。这时，胡主席主张召开党的九中全会讨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

黎笋在这以前的几年中曾多次往返莫斯科，在赫鲁晓夫想方设法的拉拢下，他暗地里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反对中国，因此，当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全会研究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黎笋避开了报告的起草工作，而把这一任务推给长征。

\* \* \*

越南劳动党中央开会讨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是在一九六三年底。

会上，大家听取长征的报告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素友以诗人抑扬顿挫的声调列举十大罪状，强烈地批判苏联。只有黎笋不发表任何意见。经过多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决议。决议草案中指名赫鲁晓夫，黎笋建议删掉，最后中央决定不点赫鲁晓夫的名。中央决定这个决议只作为内部学习文件，不予公布。决议主要精神和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公报内容一样。其中有几段是这样的：

**“越南劳动党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努力奋**

斗，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党站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仅是我党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是捍卫党的团结一致，捍卫三大的正确路线和推动全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迫切要求。”

中央作出反对修正主义这样的决议是从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公开反对中国以后在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决议通过不到几天，苏联便邀请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去访问。政治局立即派出以黎笋为团长，黎德寿、黄文欢、素友、阮文敬为团员所组成的代表团。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路过北京，毛泽东主席设宴亲切接待。席间，黎笋向毛泽东主席说明，我们这次去苏联，是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也随时听取苏联共产党阐述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政治局和胡主席嘱咐我们不发表共同声明。毛泽东主席对越劳中央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心中国和苏联的团结表示钦佩。毛泽东主席预祝代表团完成使命并取得成功。

\* \* \*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经过与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多天的会谈

后，苏联方面提出一份共同声明，越南代表团拒绝签字，因为在启程之前胡主席曾明确地嘱咐不发表共同声明。而且代表团拒绝签字的具体理由是因为声明的内容有些地方不符合我党九中全会反对修正主义的精神。

越南代表团不在共同声明上签字引起苏联方面的不快，因此当代表团要回国的时候，苏方只买了四张民航机票（阮文镜为越南驻苏大使，会谈结束后留在苏联）。在正常的情况下，象这样性质的代表团，苏联理应提供专机。正当我们在莫斯科机场候机室待飞，苏联方面单独把黎笋找去。黎笋就这样擅自同苏联签署了共同声明。回到候机室，他向我们解释说，不在声明上签字不礼貌，我当即问道，动身以前胡主席就已叮咛过不发表共同声明，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黎笋回答说，这件事，我将向政治局和胡主席负责。

不一会儿，苏联礼宾干部通知我们说，苏方已为代表团准备一架专机飞往北京。显然，这不是一架普通的专机，而是一桩买卖交易的结果。

代表团从莫斯科返抵河内后，黎笋仔细阅读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越南《人民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增强团结一致，提高战斗意志，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有一段写道：

**“党中央第九次全会是我党一次重要的思想生活。中央的决议是统一全党全民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基础。”**

还有一段指出：**“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是歪曲和阉割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实行阶段妥协，与帝国主义无原则合作的政策，抹煞敌友我的界限，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年一月二十九日，越南《人民报》又刊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明，其中写道：“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继续粉碎修正主义。”

黎笋看了这些文章，立刻把黄松找去警告说，如果继续刊登这样的文章，就要把他《人民报》总编辑的职务撤掉。黄松承认自己的过失，并许诺今后不再刊登这样的文章。

如上所述，与苏联发表共同声明和不允许《人民报》刊登某些文章实际上是和中央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相对抗，与修正主义沆瀣一气，“实行阶级妥协，与帝国主义无原则合作的政策……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

同帝国主义无原则的合作政策丝毫没有减少帝国主义的残暴性。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美国编造所谓北部湾事件，出动飞机轰炸荣市(义安)，箐河口(广平)鸿基市(广宁)，中国和苏联对这一事件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八月六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同中国有着唇齿相依密切关系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骨肉的兄弟，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决不袖手旁观，坐视不救。美国一定要向越南人民

**偿还血债。”**

接着，八月九日，北京十万市民举行有周恩来、陆定一、罗瑞卿、黄炎培、林枫、郭沫若、廖承志等同志参加的群众大会。我和素友访问古巴归来，路过北京，也受到邀请参加大会。大会宣读致胡主席的一封信，表达中国人民支持越南的决心。信中写道：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甘共苦的兄弟。美国侵略者反对越南人民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和越南兄弟站在一起……”。**

接着，八月十日，上海一百八十万人，福州十万人以及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拉萨(西藏自治区首府)、海南岛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人民都上街游行，表达了支持越南的决心。

中国的上述活动，越南《人民报》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至十五日都作了充分的报道。

苏联政府和中国不一样，没有作出什么表示，只由苏联通讯社发表声明：

**“苏联权威人士坚决谴责美国在北部湾的侵略行径，这个行径正引起东南亚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更进一步恶化。这些行动与新的愚蠢行径或对本地区的挑衅可能导致最近发生麻烦的事件扩大成为军事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险后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越南《人民报》)。

诗人素友对苏联和中国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有所感，九月二日在越南《人民报》刊登了他的诗：《归途日记》，有这么几段：

### 布 拉 格

消息突然，坐卧不安。  
强盗闯进家乡，投下颗颗炸弹。  
美帝妄想侵占天空海洋，  
英勇无比的家乡，给它的是死亡！

### 莫 斯 科

我们的莫斯科啊！  
十月革命的足迹依稀可见。  
浓雾里的红星，  
仍在注视着我们的每天每步。  
列宁正在思索什么？  
克里姆林宫墙的影子，默默不语……

### 北 京

天亮了！心怀激荡。  
归途欢畅，鸟儿任飞翔。  
万里长城旗飘扬，  
北京弟兄环抱着千万臂膀。

庆贺我们辉煌战果，

我欢欣，象前线战士在后方。①

由于苏联对越南的态度这样冷淡和不友好，因此，范文同、黎德寿赶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向苏联建议派一个代表团访问越南，表示随时准备援助越南抗美斗争，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用以降低中国在越南人民中的威信。这个建议获得苏联的赞同。

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苏联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以政府代表团的名义而不按惯例以党政代表团名义）访问越南。经过几轮坦率的会谈，二月十日，范文同和柯西金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其中有一段写道：“两国政府达成关于巩固越南国防能力而要采取的措施的相应协议。”（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越南《人民报》。）对这项声明人们可理解为苏联将对越南抗美进行军事援助，但用词却模糊不清。

接着，四月十七日，黎笋、武元甲又赴莫斯科进一步讨论军事援助越南的问题。这次讨论，苏联才承诺在联合声明中写明：“苏联确认今后随时准备给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必要的援助，打败美国的侵略。”（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越南《人民报》。）

---

① 原诗译登《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七版。

## (二)

### 苏联对越南抗美提供军援后所发生的事件

苏联对越南提供军援后所发生的事件，可以概括地说：黎笋完全追随苏联的路线，反对中国并寻求同美国谈判以解决越南南方问题。这两件事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北方全部解放，越南劳动党曾就越南国家统一斗争的路线问题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交换意见，苏联提出“越南南北两方和平共处，进行经济竞赛，北方的经济比南方优越，南方将统一到北方”的建议。中国则介绍敌占区的工作经验：“长期埋伏，联系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越南劳动党中央不赞同苏联的主张，而同意运用中国在敌占区的工作经验。到了一九五六年，吴庭艳拒绝举行大选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九五九年又公布59/10号法令任意残杀南方人民，这时党中央就提出南方要进行武装斗争自卫的主张，中国认为这个主张合理，并答应在军事方面给予帮助。具体的表现是一九六二年中国专门援助南方人民九万支(挺)步、机枪发展游击战争，及后南方人民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援助数量日益增多。当时黎笋推动南方的武装斗争是积极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赫鲁晓夫的说服下，他逐步随着反对中国的风向，期望苏联从中斡旋和美国进行谈判，解决南方的问题。

关于黎笋反对中国，同美国谈判的主张，下面将作具体的叙述：

### 1. 关于反对中国的主张

我们还记得，日内瓦协议签订(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后，越南革命的任务是一面建设北方，一面进行解放南方的斗争。在建设北方方面，中国和苏联都给以援助；至于进行解放南方的斗争，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越南只得到中国的军事援助，而苏联赫鲁晓夫仍提出南北两方和平共处的主张，不给越南任何军事援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留苏的越南学生中灌输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反对中国的思想。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倒台，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第一书记。同年十一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国派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参加纪念活动，以表达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但在招待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直言不讳对周恩来总理说，苏联对中国的方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共同方针，而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方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更为露骨，以挑衅的口吻对贺龙元帅说，苏联已经推翻赫鲁晓夫，中国也应该推翻毛泽东。这样，在苏联，赫鲁晓夫虽然倒了台，但他反对中国的方针仍毫不掩饰地继续推行着。具体的表现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苏中边境沿线部署六十多万部队，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增到一百多万。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勃列日涅夫提出各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是“有限主权论”。

因此，苏联向越南提供军援抗美虽然对越南有利，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危险的因素，即通过黎笋的配合，扭转越南的方向使其偏离胡主席正确的抗战路线，从南面建立起一个反华基地，同时为今后控制越南以至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创造条件。

一九五七年初，黎笋经中央调动到北方接替土改中犯了错误而辞职的长征，任代总书记。这时他背地里培植自己的羽翼，首先是找那些立场不稳随风转舵的人，附和他唱反华论调的人，如军事部门的文进勇、阮文咏，宣传部门的素友、陈琼、黄松，外交部门的阮基石，公安部门的陈国环，检察院的黄国越以及黎笋认为最可信赖的党中央组织部长黎德寿。这个时期，可说是黎笋在搜罗党羽，逐步篡夺领导权，以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随着一九六四年同苏联发表共同声明以及反对中央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决议之后，这时黎笋又抓住苏联给予越南军援的时机，与苏联领导人密切配合，加紧推进反对中国的活动。

当越南处在反美斗争最激烈的阶段，苏联却不把优良的武器援助越南，借口给了越南，越南会把技术泄露给中国。例如苏联援助米格23喷气式飞机给印度和埃及，而不援助给越南。

本来苏联可以把一部分武器和其他援助物资经海路运往越南，以减轻中国的运输负担，但苏联偏要陆路运输，在中国

过境，需要中国的车皮装卸。因此，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本身的援越物资在中国境内的凭祥车站积压很多，由于越南缺乏装卸运输条件，效率很低。黎笋对这一情况十分清楚，但却与苏联取得默契，在内部散布流言蜚语，说中国不肯转运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援越物资。在苏联的暗示下，某些西方记者便利用这一情况大做文章。

为驳斥这类谣言，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越南通讯社奉越南政府之命，通过报纸和电台公开辟谣，声明中国完全按计划转运苏联的援越物资，同时谴责西方通讯社散布谣言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苏联除了上述造谣生事之外，还通过黎笋一伙采取恶毒的手段挑拨越中关系。

\* \* \*

大约在一九六五年间，黎笋访问莫斯科，曾在驻苏使馆召集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代表讲话，赞扬了苏联并批评中国的一些政策。越南留苏学生代表认为黎笋的讲话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们向中央写了报告并对黎笋的这篇讲话提出了四十多个问题。这个报告寄到中央办公厅就给黎笋扣下烧毁了，政治局的同志没有直接看到这个报告，只从文书处人员那里私下获悉。黎笋从莫斯科回来路经北京时，又召集驻华使馆人员讲话，在许多问题上批评中国，他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没有人发表意见，后来回到河内，黎笋却说陈子平同志（驻华大使）赞同他的论点。后来我有机会见到陈子平同志和使馆其他人员，才知道黎笋说的话完全是杜撰。

也是在一九六五年，当黎笋还在莫斯科的时候，素友召开了一次北方宣训干部会议，由陈琼出面批判中国的一些政策，他的论调和黎笋在驻苏使馆和驻华使馆的讲话同出一辙。

黎笋批判中国的论调是：中国在抗日、反蒋时期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建设时期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些方针都是农民思想，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至于中国提出依靠贫雇农、下中农的农村政策是臆造出来的矛盾，因为土改之后，农民都是一个样。从组织原则来说，这样公开批判中国的方针，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批判一个兄弟党的政策，只有经过中央讨论，至少是政治局的讨论之后，允许发表才能公开发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经得黎笋同意，素友的反华诗篇《心事》在越南《人民报》上刊登出来。后来受到胡主席批评，中宣部才下令收回这一期的报纸，但报纸已发到国内外，哪能回收？

一九六七年，在苏联发生了几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其一是中国留学生谒列宁墓时，在红场遭到苏联保安人员毒打，围观的苏联群众高声劝止，但保安人员仍置若罔闻。

另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也发生在莫斯科，留苏的越南学生结队到美国驻苏使馆，要求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侵略。这是正常的合理的行动，而苏联保安人员却痛打越南学生，其出手之狠毒致使一些学生受伤，需要几个月治疗才恢复健康。

不久以后，黎笋出访苏联，在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时，他两次为这一事件表示歉意。胡主席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在看了这次会晤的情况通报后，都认为表示歉意是不对的。

还有一起事件是越南在抗美斗争极其激烈的岁月，有一些到苏联学习的越南学生和干部不愿回国参加抗美斗争，请求在苏联政治避难。苏联不顾越南提出抗议和正式要求他们回国，却把政治避难者留下来，不让他们回国。这一批学生和干部多达四十八人，其中有军队师级干部黎荣国，《人民军队报》的笔杆子文尹，河内市委委员阮明勤和陈明越。试问，正当越南进行抗美救国，苏联却同意越南的学生和干部请求政治避难是想达到什么意图？没有别的解释，苏联领导当局是企图豢养一批人，以便今后必需时搞颠覆活动。

\*\*

对于上述的几起事件，作为正在抗美的越南人，通常很自然地会感到非常气愤，但黎笋却漠然置之，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仍然赞美苏联，并把反对中国的论调向更深处扩散。

为什么黎笋参加革命多年，竟能这样忘恩负义地对待中国——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和越南人民共患难、共战斗的朋友？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灵魂深处的反华思想是法殖民主义早年所灌输的，而后来又得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进一步灌输。

我们都知道，法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它在越南的统治地

位，想尽一切办法破坏越中两国人民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固有关系，这种关系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在越南语言中有百分之几十是受到中国语言的影响。法殖民主主义者把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的罪过描述为整个中国对越南的罪过。按他们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专门从事侵略的民族，他们用“黄祸”这个词形容中国的侵略。

我们也知道，在苏联，当赫鲁晓夫推翻马林可夫，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之后，他就采取种种手段，强迫“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兄弟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党要跟着他的指挥棒转，特别是要把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开除出去，这就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大的不满和对立。当赫鲁晓夫还在横行一时，人们把这称谓“赫鲁晓夫主义”，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还在推行他的方针，人们称之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黎笋的反华思想由来已久，这使他深深陷入反华的泥潭之中。但这时黎笋的反华思想并不是因为害怕中国的“侵略”，而是暗地里同胡主席的反对美国，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抗战路线相对抗，逐步追随赫鲁晓夫越南南北两方和平共处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依靠苏联从中斡旋，同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来解决南方的问题。

## 2. 关于同美国和谈的主张

我们还记得，胡主席确定抗美路线和过去的抗法路线都是“长期艰苦，但一定胜利”。但从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轰炸

北方妄图迫使南方人民停止战斗，黎笋就有意想由苏联从中斡旋同美国和谈解决南方问题，并且在群众中散布一个与胡主席相反的论点，认为抗美援朝“长期艰苦，但要争取在一个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解决问题”。那么，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是怎么样的胜利呢？所谓“解决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黎笋吞吞吐吐不作回答。因为在他的头脑里仍牵挂着谈判，期望能抓住时机实现同美国谈判。当战场上还处于相持状态，我方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而对方也未陷于完全被动，这时同美国谈判，解决问题仍只能是南北分治，尽管这个分治对我比较有利也罢，例如我方得到广治、承天两省，甚至得到整个五联区，美国只控制南圻，但这仍是南北分治，这样的分治等于承认美国对南圻的统治。黎笋吞吞吐吐不回答问题就在于此。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戊申战役打响了。南方解放军同时攻进四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和集镇，其中包括西贡和顺化。在西贡，解放军攻进独立宫，广播电台，警察总署，新山一机场，伪军指挥部，并打进美国大使馆三楼。在顺化，攻占了整个城市，皇宫以及各机关和街道飘扬着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达一个月之久。但是此时从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这一形势的出现是敌人所不能接受的。美伪不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以飞机、大炮及其他各种火力，向我军占领的地方发动猛烈的反扑。我军不得不后撤，造成了人力、兵力和武器的极大损失。

敌人在惊魂甫定之后，确信解放军不可能占领整个南方，它一面继续进行扫荡，一面放出要和谈的空气，企图使南方解放军急于求和，松懈斗志。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戊申战役后两个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一方面声称轰炸越南北方只限于北纬二十度（义安）以北，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要与河内谈判的建议。同年四月三日，黎笋自作主张声明将派出代表同美国谈判。这时胡主席正在北京养病，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去向胡主席，胡主席也感到愕然，回答说对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同美国谈判解决越南问题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本来黎笋理应到北京向胡主席报告，并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竟擅自匆匆忙忙地给了约翰逊回话，这是事出有因的。一九六四年美国轰炸北方，黎笋和另一些人想同美国谈判，但又怕胡主席不同意，所以变了一个说法，他说同美国谈判是根据中国“边打边谈”的经验。胡主席说，如果是这样倒还说过得去，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谈判桌上怎能解决呢？应该以打为主，同时也可表示随时准备谈判。这些问题必须跟中国同志缜密磋商。胡主席的这些意见十分清楚，既掌握战略原则，又有灵活的策略，同时十分重视与中国同志磋商交换意见。但黎笋故意越权，把胡主席悬空，避开而不跟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一意孤行，直接回答约翰逊，造成既成事实，胡主席即使不赞同也不好再说什么。

有人认为这样重要的大事，如果没有胡主席的同意，黎

笋怎敢越权自作决定？

为了弄清楚黎笋故意越权答复约翰逊这件事，我们看一看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越南《人民报》登载胡主席的号召书，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约翰逊及其同伙要知道，他们可以派遣五十万，一百万甚至更多的军队推进侵略越南南方的战争。他们可以使用成千架飞机，加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但他们决不能够动摇英雄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钢铁意志。他们越是凶残，他们犯下的罪恶就越大。战争可以延长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河内、海防和其他一些城市、企业可能被摧毁，但是越南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

我们再读胡主席同年二月十五日答复约翰逊建议“安排可信赖的代表直接对话”以“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的信，其中写道：

**“如果美国政府果真愿意对话，首先必须无条件停止轰炸以及其他一切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行动。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以及其他一切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行动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才可能对话，并讨论有关到双方的各项问题。越南人民决不在武力面前屈服，决不在炸弹的威胁下对话。”**

胡主席的号召和复信这样坚决和果断，旨在打破黎笋要和美国和平谈判解决南方问题的幻想。然而黎笋仍然抱着幻想，在约翰逊宣布要同越南谈判时，他竟胆敢越过胡主席，

表示同意，造成既成事实，急忙同美国举行巴黎会谈。我们不妨看看巴黎会谈拖了多少年以及它的进展情况。

\* \* \*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开始第一轮越美会谈。越方要求美国停止轰炸北方，美方则要求双方共同降级，换句话说，要求南方军民停止战斗。要求共同降级的讨论拖了五个多月，直到十一月一日，约翰逊才宣布停止轰炸北方全境，使双方可进而讨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阮文绍政府参加的四方会谈问题。然而会谈争论不休的尽是一些枝节问题，如会谈桌是长方形、方形、棱形或圆形等等。争论了近三个月才达成一致意见。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四方代表才同坐到一张圆桌上举行会议，达成每周一次例会的协议，但例会有时没有开成，美伪方面仍把会谈拖着企图在军事上寻找决定性的胜利。因此，直到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第92次会议为止，拖了将近两年的会谈却仍毫无进展。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又重新轰炸海防、广宁、河西、和平、广平、河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中止会谈，大力促进南方军民的斗争，但黎笋却主张继续会谈，到第148次会议仍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南方军民奋起猛烈进攻广治、承天、西原、五联区和南部。

同年四月六日，美空军、海军轰炸炮击北部各地。

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对会谈不抱任何幻想，遂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下令猛烈进攻，解放家乡。这一年十月，南方军民一齐奋起猛烈进攻，俘敌三万余，消灭伪军特种部队重要据点四处，袭击破坏六个飞机场和成百座碉堡（越南《人民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美国空军又对河内、海防及永富、河北、太平、义安等地施行战略轰炸，但结果惨遭失败。美国八十多架飞机被击落，其中有B.52飞机三十四架，F.111飞机五架。因此，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175次会议，也就是巴黎会谈最后一次会议上，基辛格才同意和黎德寿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草签，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协定由四方外长正式签字。

必须看到，在巴黎和谈拖了近五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时间里，美国滥施轰炸四次既吓不倒英雄的越南军民，而美国人民和军队以及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斗争却此起彼伏，不断发生。越南军民的英勇斗争和要求停止在越南战争的呼声迫使白宫不得不考虑到“光荣的撤退”。

显而易见，巴黎协定之所以得到签定，是因为：

① 越南军民，特别是南方军民对胡主席的正确路线无限信赖，宁死不当奴隶，不管任何艰苦和牺牲，坚决战斗到底。

② 美军在战场上遭到猛烈的打击和惨重损失。根据所

获知的资料，美军在战场上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为三十万人。这是个被缩小了的数字，尽管是个缩小了的数字，上述死者也是为了美国军火商而屈死送命的。

③ 美国人民和军队在全美各地斗争运动的兴起与世界人民斗争运动的展开，要求美国停止在越南的战争。

④ 美国受到越南战争的牵制，与苏联争夺霸主地位的日程被推后。苏联在科技方面有些已经赶上美国，有的领域则超过了美国。

黎笋急于同意派遣这样一个庞大机构去巴黎同美国谈判，是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急躁从事，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把在巴黎近五年所消耗的人力物力用来增强南方的战斗力和在北方采取反轰炸的措施，美国最终还得会谈，还得撤出它在越南的全部军队，并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这样做，会谈的时间可能将缩短，如同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谈一样，只须两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总之，巴黎会谈的胜利正如胡主席所说，是由战场而决定的胜利，而不是黎笋所自我夸耀为卓越谋略的妥协主张的胜利，更不是由于黎德寿在巴黎三寸不烂之舌所决定的胜利。

当然，从工作方面来说，黎德寿如同其他参加巴黎会谈工作的人一样，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就是，通过他们在会谈中的活动使人认识到越南人民在战场上的英勇，同时也表明了越南干部在会议桌上的勤勉和机智。

### (三)

## 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与黎笋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主席逝世后，黎笋掌握领导权，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方获得解放。这样，人们可能错误地认为我国人民抗美援朝赢得最后胜利是由于黎笋的英明领导。在黎笋的党羽中也常有人这样吹捧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号的《共产主义》杂志上，就刊登了题为《美国军队艺术黑暗的一页》这样的文章：“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尖锐、激烈和长期的较量中，在以总书记黎笋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无与伦比的英明的战略和战术指导下，越南军民谱写了越南军事艺术二千年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只对黎笋个人阿谀奉迎，竭力吹捧，不提胡主席的方针路线，不提军队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不提及曾及时纠正黎笋错误的集体智慧，这正说明雇佣文人的无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几点：

一巴黎协定签定后黎笋的错误主张。

一南方中央局和干部的反应。

一西原战役带来新的展望。

一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与黎笋的作用。

#### 1. 巴黎协定签定后黎笋的错误主张。

在我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斗争中，黎笋曾有过一些错

误的主张，譬如我在上文批判的戊申战役中估计敌我双方力量的错误，急忙同美国在巴黎会谈的错误。这里谈的是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问题和黎笋的作用。

我们知道，巴黎协定签定后，美伪方面从不尊重协定，他们进行扫荡和蚕食，妄图消灭南方解放军和革命者。而这时黎笋的主张是，不要搞武装斗争，只采用政治斗争和搞兵运形式，达到民族和解。这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这个主张，甚至追随黎笋说过中国坏话的陈文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不得不吐露出真情来：“一些干部和少数地方为了贯彻上级为彻底实现巴黎协定而斗争的指示精神，担心若给敌人以回击会违反协定，因而在执行兵、敌运工作方针时采取了对伪军毫无效果的右倾和危险的做法，具体提出了五个禁止：禁止进攻敌人，禁止回击出来扫荡蚕食的敌人，禁止包围敌据点，禁止炮击伪军据点，禁止建立战斗村。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把形势稳定下来，避免出现紧张局势，达到民族和睦。一些地方把队伍从第一线后撤，进行整顿巩固。认为队伍不后撤就会给敌人搞掉。实际上当我武装队伍后撤时，敌人又重新蚕食，破坏我们的群众基础，搞掉我们的党组织，把这里犬牙交错的状态一下抹光。”（陈文茶回忆录第54页）。

这本回忆录又写道：“巴黎协定并没有结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按照协定的规定结束武装斗争，因为

如上所述，敌人违反协定进行蚕食的企图是，达到只存在一个伪政权，一支伪军队的目标。可是，我们自己却主张明确分为两种地区：敌区和我区，以便在每个地区实行适当的斗争方针，以稳定形势，重新建立我们已被削弱的武装力量，建设我们的经济区，建设我们的政权。这种主张完全不符合实际。”（陈文茶回忆录第70页。）

巴黎协定签定后不久，敌人利用黎笋的这个错误主张，驱使军队蚕食我们的一些重要地区，如广治的越河口，龙川的七山地区，美萩的四号公路，巴地的二号公路和广义的沙瓏。特别是在南部敌人攻占了军区各省我所控制的一切地区。在西贡，敌人用推土机铲平居民区的房舍庭园，建立战略村，增设据点，派出特务搜捕、杀害我许多基层干部。同时他们还涌向一直为双方相持的地区进行大扫荡，把那里变成他们的控制区，增设新据点。仅在美萩、鹅贡、建祥和槟榔就建立了将近三百个据点。敌人在这一行动的同时，从上至下巩固伪政权系统，在各乡成立许多新的军支区，严密箝制人民，加强围捕南方革命者。

## 2. 南方中央局和干部的反应。

“南方中央局和地方军委看到了南方人民面临这一危机，不同意从第一线把部队后撤，而是下令就地巩固和整顿部队，保持三个地区犬牙交错的形势，并积极地把这个意见报回中央。”（陈文茶回忆录第68页。）

根据陈文茶的回忆录，南方的干部和战士对黎笋的主张

是不满的，他们申明：“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志趣而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希望祖国得到和平，人民不再遭涂炭，但是敌人进行扫荡蚕食，把枪口对准我们，企图搞掉我们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直挺挺地站着举手高呼‘和平万岁’？不！我们真不愿意重演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那种幼稚而又痛心的一幕。我们的心，还为当时拿着武器不敢放枪而倒下的不少同志，为许多地方革命运动被沉浸在血泊中而感到阵阵刺痛。在美荻，我们的游击队因为怕被说是错误执行（兵运）方针而挨批评，背地里（背着上级）组织攻打敌人非法在我们根据地内建立的据点。在莫盖、槟榔，我武装力量面对敌人的蚕食而不能给予回击，撤了又撤，同志们叹息说：‘只有钻到地板下面去住这一着了！’最后他们主动反击，才收复县原有的根据地。”（陈文茶回忆录83页。）

南方军民同黎笋的主张相反，决心对敌人的非法蚕食给予回击。中央南方局同成百万的人民，成万解放军战士、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站一起，日夜同敌人周旋，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群众。结果，我们赢得了许多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摧毁了敌人在我根据地内非法建立的据点，重新控制了在这以前曾被敌人非法占领的几乎全部地区，迫使敌人缩回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即巴黎协定生效以前所占据的地盘。

南方军民的勇敢行动终于粉碎了美伪要消灭我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也帮助中央政治局重新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有南方各战场代表参加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战略任务的方向时，黎德寿说：从签定巴黎协定到现在，我们对敌人的估计偏高，对自己的估计偏低……现在通过实践，说明我比敌强。

虽然如此，在具体计划中，总参谋部仍然规定一九七五年各个战场都不能大打，只能小打，粉碎敌人的绥靖计划，要为一九七六年大打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积蓄力量。直到解放军攻占福隆后，政治局才决心发动邦美蜀战役，并派文进勇南下，向西原战场传达政治局的指示，组织南方解放军各部队，（包括西原主力部队，五联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三一六师和总司令部直属的几个加强团协同作战。

### 3. 西原战役带来新的展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清晨，我军进攻邦美蜀的枪声打响了。在我军势如雷霆的进攻下，第二天，大部分伪军纷纷逃往丛林，邦美蜀获得解放。

邦美蜀大捷使阮文绍惊惶不安，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他下令全部伪军撤出西原。

在邦美蜀战役进行的同时，治天方面军区的武装力量也发动对敌包围进攻，拔除并迫使敌人放弃许多据点，摧毁敌仓库并切断了他们的重要交通线。

三月十九日，我军进攻并解放了广治。

三月二十一日，我军进攻顺化，二十五日顺化完全解放。

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我军解放三畿、巡养。广义地方武装力量奋起战斗，解放广义全省。

由于我军在战场上接二连三取得胜利，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确认，攻占邦美蜀，揭开了西原战役的序幕，使战场的形势朝着对我极其有利的方面发展变化。新的时机已经出现。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具备着决心早日解放南方的条件。也在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调文进勇从西原到南部，配合范雄和陈文茶指挥解放西贡——嘉定战役。

三月二十五日，我军进攻岷港，这里大部分伪军象在顺化的一样，毫无斗志，争相逃命，许多指挥官都离开战斗岗位，设法携带家眷南逃。这时，还未受到我军攻打的一部分敌军，自行瓦解了。

面对着这种局面，三月二十八日，伪一军团兼第一战术区司令吴光长根据阮文绍的指示下令撤出岷港。

三月二十九日我完全解放岷港市。

西原、顺化、岷港相继失陷，特别是藩朗——春禄防线的崩溃，伪政权面对军事和政治迅速垮台的危险。四月初，政治局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指示军委令各兵团、各军区紧急行动，争取发起对西贡的总攻击，越快越好。

四月十四日，政治局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同意解放西贡——嘉定战役定名为胡志明战役。

胡志明战役打响以前，南部军民为战役的各方面工作作了充分准备。地方主力部队频频向敌人发起进攻，解放了广

大的地区，形成连为一片的环状解放地带，逼近包围西贡。因此，当总部主力部队赶来参加这一战役时，能够顺利而秘密地到达集结地点。

四月二十八日子夜，我各路部队同时向西贡市区各主要目标发起总攻击。

为配合我军攻打西贡，地方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纷纷行动起来，领导人民奋起进行武装斗争，动员伪军放下武器，并从伪政权手中夺取政权，完整地保护了建筑工程和工厂，以待移交给革命政权，就地维持社会治安。西贡的大中学生，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还积极为我部队接近各进攻目标和进驻各机关带路。

四月三十日十一时三十分，我军在独立宫顶端插上旗帜，结束了有历史意义的胡志明战役。

这一天，西贡全城处处飘扬着金星红旗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红蓝两色旗帜。无数市民兴高采烈欢迎解放军。城市的秩序和一切生活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工厂、企业照常活动，市民的水电供应也很充足。

四月三十日这一天，不仅在西贡，而且在全国各地，无论大街小巷或穷乡僻壤，到处人们神采飞扬，一片沸腾，歌声在四方回荡：

庆大捷如有伯伯同在，  
大捷是您教诲的结晶。  
越南——胡志明。

越南——胡志明。

#### 4. 解放南方统一祖国与黎笋的作用。

在欢庆胜利中，我们回顾我们民族几十年走过的英勇牺牲的艰苦斗争道路，这是布满荆棘，迎着风暴，淌着泪水和鲜血，但又是极其光荣的道路。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同志，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山河，他们是胜利的奠基人。

在评价四月三十日的胜利以及我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时，我们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作出客观、真实和充分的评价。饮水不忘掘井人。必须看到胡主席的主张，政治局和全党的集体智慧以及全军、全民的贡献。同时，也必须看到各兄弟国家，特别是和我们同在一个战壕的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朋友的巨大援助。绝对不能把我们全民族和朋友的集体功劳和牺牲说成是黎笋个人的功劳。

如果南方的军民在有了巴黎协定之后彻底执行黎笋的错误主张，要是领导集体和在实际战斗岗位中的军民不及时纠正这些错误的主张，那就很难预料在南方将会出现什么危机，我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斗争将招致什么结果。

实际证明，只有坚持实现胡主席的指导思想，只有全国军民坚韧不拔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才赢得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的辉煌胜利，越南才得到全部解放和统一。

光荣永远归于胡主席和越南劳动党，光荣永远归于越南军民，特别是英雄的越南南方军民。

在谈到胡主席的正确路线，谈到政治局和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谈到全体人民的功劳，特别是南方军民的功劳时，我们没有忘记个人的贡献。因此，对于黎笋，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估价。黎笋参加革命多年，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尽管在革命的过程中他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革命过程常常出现新事物，任何人都不会很快就能全面认识。必须边做边学，紧紧地结合不同地方不同阶段的实际，不断总结经验，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培养革命品质，防止腐蚀蜕化，而这些，也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完美无缺的。

**我们把黎笋在全国解放以前所犯的错误看作是革命者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错误。**

但自从全国解放后，黎笋完全背离了胡主席的方针路线，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破坏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民经过艰苦斗争作出无数牺牲得来的成果，把英雄的越南变成去侵略别人的国家，制造紧张局势，与各邻国世代对立；同时，他还把越南变成外国的军事基地，危害自己的国家和东南亚以至世界的和平。

**全国解放以后，黎笋所犯的一切错误，不再是一个革命者的错误，而是一种质变，是对革命，对民族，对祖国的背叛。**

## (四)

### 越南革命与黎笋的背叛

抗美救国斗争的目标正如胡主席指出的是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抗美斗争胜利后，黎笋反其道而行之，他从反革命战略的目的出发，阴谋把越南变成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霸主。

黎笋很清楚地知道，中国对他的这个阴谋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为了决心实现上述反革命战略目标，阻挡中国的反应行动，黎笋绞尽脑汁采取欺骗手段，干了一些后果极其危险的事：

——一九七六年底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排除异己。

——强迫中央作出反华决议。

——签定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后进占柬埔寨。

1. 一九七六年底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四大本应在一九六四年底或一九六五年初召开，但是由于当时苏联仍提出南北两方和平共处的主张，不肯给越南军援，越南在国际上还不是处在有利的地位。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苏联同意向越南提供军援抗美，这时国内外形势对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十分有利。然而，黎笋正在酝酿同美国谈判，还未确定

路线问题，因此起草大会政治报告没有基础。而这些年，胡主席不断跟病魔作斗争，虽然曾敦促过黎笋，但黎笋总说大会来不及准备，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后来胡主席去世，黎笋掌握了党的大权，可以随意把召开大会的事一直推迟到南方全部解放以后。南方的全部解放，再也用不着考虑跟美国搞妥协；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的企图肯定能实现；依靠中国的援助进行抗战再也不必要了；拉帮结派，排除反对自己的主要人物再也不必顾虑到影响人民的抗美积极性了。黎笋把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归功于己，自我显耀。因此才决定在一九七六年底召开大会。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黎笋向政治局建议让我率领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党代会。我十分清楚黎笋的意图，他想把我支到远处，这样，他们一伙就可以随意拉拢亲信，排除异己，成立一个符合他们反动方针路线的新领导班子。我对此心里有底，但我仍表示高兴接受这一任务。这样，我可以不参与人事问题的磋商，黎笋一伙无论如何也会把我从党的领导机关排挤掉，最低限度也要把我排挤出中央政治局。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四大召开预备会议，这时，正好古巴召开首届国会，邀请我国派国会代表团参加。黎笋仍然想让我率团去古巴，但又怕干得太露骨，因而一方面决定由国会常委会副主席阮氏十夫人任团长，另一方面又让春水私下跟我说，阮氏十夫人任团长古巴方面可能会不很高兴，

可是我们在准备开党代会，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懂得春水的用意就是黎笋的用意，便说：如果党认为需要我率团参加古巴国会，我将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尽管党代会预备会议我不得不缺席。按照各党的惯例，党代会的预备会议是事先讨论有关思想、人事问题，然后提交正式开幕的党代会。我接受去古巴的决定，主要也是避开讨论有关人事问题。果然，七月十二日我从古巴返抵河内，预备会议也正好当天结束，黎德寿见到我，连忙解释预备会议不提我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原因。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更不会使我感到气愤，因为我知道在黎笋的控制下，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即使参加中央委员会，也不能真正发挥一个中央委员的作用。多年来，自从胡主席的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就连中央会议也几乎已失去了作为党的最高集体领导作用。

\* \* \*

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发生的一个政治案件。当时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批学生和干部，相互勾结成立反党组织，他们露了馅便被逮捕，供认出许多人，其中有人民军中将、国会统一委员会主任阮文咏，他秘密给外国提供军事资料和政治情报，是一名重要罪犯。这么重要的案件，通常是要向政治局作全面报告以便呈请中央作出处置。当时胡主席还健在。黎德寿却借口案件正在调查中，只偶而向政治局报告案件的进展情况。胡主席去世后不久，他向政治局建议成立三人调查小组，由他任组长，陈国环、阮良朋为组员，实际的工作

由他和陈国环抓，阮良朋只好听任他们。自此以后，黎德寿再也不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案件，只有当中央开会有人提问时才作汇报。直到一九七六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黎德寿才建议中央作出把阮文咏从中将降为少将、从部长级国会统一委员会主任降为副部长级的处分决定。中央会议一致反对，决定把阮文咏开除出党，剥夺军衔，撤去国会统一委员会主任职务，并交中组部长黎德寿去执行。黎德寿在中央会议上不得不接受这一决定。但私下却对阮文咏说，虽然作出这样的处分，但你仍是自由的，安心等待一段时间，会有办法撤消这个案件的。党四大以后，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黎笋控制了组织大权，在一九七七年一次中央会议上，黎德寿建议中央重新审定阮文咏一案，决定免去他任国会统一委员会主任职务，军衔只降了一级，从中将降为少将。按组织原则，只有新的中央委员会才有权否决前届中央所作出的有效决定。为什么一九六七年发生的这个案件直到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才能解决呢？这是因为阮志清同志被暗害一案，阮文咏是掌握底细的知情人，如果按党纪国法处分阮文咏，他会亮出全部底牌，这样黎笋一伙就会完全暴露，他们的罪恶就会公诸于党和群众舆论之前。

\*\*

我还记得一九六八年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胡主席因健康关系未出席)，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候补中委、驻苏大使阮寿真同志谈到当前抗战主要依靠中国的援助，苏联虽然也

援助我们，但他们很怕美国。话还没说完，就被坐在主席台的范文同打断，他讲了很长一段话，说中国才真的害怕美国。阮寿真继续说了几句又被打断，只好站着在讲台听范文同的训话，因为范是政治局委员，又是总理。阮寿真听完他的话，又举例说明苏联害怕美国，结果又被打断，阮寿真只好走下讲台回到座位上。

一九七〇年，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讨论抗美斗争问题，中委范文苏同志发表意见，说必须很好领会胡主席教导的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他的讲话也三次被打断，如同前一次阮寿真一样，未能把话说完。

一九七三年，当美军撤出南方以后，在另一次中央会议上，曾经参加戊申战役的几位军事干部发表意见说，戊申战役拖得过长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损失，在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地方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有的同志怕自己的讲话被歪曲，写好发言稿，上台郑重宣读，然后把文稿交给主席团。这样重要的问题，由军事负责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直接提出，但是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的会议主席团既不把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也未作任何解释。参加会议的中央同志面面相觑，接着按照会议执行主席的安排而转入其他问题的讨论。

\* \* \*

由于上面列举的事实，所以当黎德寿对我转达预备会议不提我为中委候选人时，我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只提出要在

四大正式会议上发表意见。黎德寿听后立即毫不掩饰地说，大会的发言已经安排妥了，您要发表意见，别人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就很难办。就这样，我既不被提名中委候选人，也被剥夺在大会发言的权利。

这次党代会的结果，有三分之一的上届中委被排除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三大中委七十一人，这次大会增至一百三十三人，正式委员一百〇一人，候补委员三十二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追随黎笋反华，一部分人虽然并不支持反华，但和黎笋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张，或者只保持缄默，不敢直率发表意见。

全国党代会开过后，接着省、县党代会也陆续召开。黎德寿主管的中组部在各级开党代会时都派人参加。根据中组部通知(口头传达，不发文件)，中央规定凡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不得参加省委，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得参加县委，经中央决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实际上是由组织部决定)。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成批不赞同黎笋的人都被排除出党的领导班子。黎笋一伙为他们的冒险事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组织方面的准备。

一九七六年底召开党代会，我早预料到大会和大会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年值春节来临，我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决心：

七一年龄未算高，  
国家大事把心操。

眼明看透谁好坏，  
耳亮闻详音近遥。  
指点江山赖胡伯，  
决心实干有吾曹。  
为国尽瘁五十载，  
添花还要付辛劳。

## 2. 强迫中央作出反华决议

如上所述，黎笋的反华思想由来已久，但各个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当他还没有把党的领导权真正篡夺到手，便采取两面的手段，有时讲中国几句好话，有时甚至认为某些人低估中国顾问的功劳是忘恩负义。

从一九六〇年底被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后的时期，他巧妙地掩盖着反华思想，但已略见端倪。

一九六五年以后，苏联对越南提供军援的时期，这时胡主席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那赫鲁晓夫式的反华论调在追随他的干部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四人帮推行极“左”政策，给中国带来巨大危害的日子里，中国仍然始终如一援越抗美。周恩来总理曾不准北京红卫兵对正在执行援越任务的方毅和李强同志搞批斗，他还禁止武汉红卫兵阻拦援越武器和物资的列车。这些情况黎笋一清二楚，但他还是宣传中国文化革命危害到越南的抗战，并且故意制造带有对中国挑衅性质的

事端。黎笋强令河内华侨联合会改组，把一个曾反对过中国革命的反动华人塞进华联会，替换了对越南革命曾作出贡献，品质好的原领导人。这个反动分子每次出席越南祖国阵线的会议，总要上台发言诋毁中国共产党。黎笋还强令华联会出版的中文《新越华报》关门。对于这些挑衅行径，中国都把它当作越南的内部事务，不作任何表态，黎笋却把中国视为软弱可欺，得意忘形。

美国从南方撤出全部军队的时期，在这之后不久，南方全部解放，黎笋的反华活动变得更明目张胆和更猖狂了。

突出的一件事是中国建议在西贡设立总领事馆，黎笋却翻脸说在越南没有华侨问题，只有华裔越南人问题，不同意设立总领事馆，而当时越南却在中国的昆明、南宁和广州设立了三个总领事馆。

还有打击华人“买办资产阶级”事件。说是打击买办资产阶级，其实是一古脑儿打击安分谋生的华人，甚至是那些对越南革命曾有过功劳的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迫一些华人迁往新经济区，迁去的人必须留下所有的不动产，只能携带随身细软。到了荒无人烟、光秃秃的新经济区，又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结果有的人只得返回旧的住处，但这时房屋家俱都已被掠夺一空，上不了户口，没有粮票，只得露宿街头巷尾，还经常遭到驱赶和斥责；有的人无计可施，留在新经济区，凄惨地在疾病和饥寒中受折磨，了却残生。

另一突出的事件是至今已有二十七万华人被驱赶到中

国，十万华人被赶到海上，任其漂泊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两类人虽然遭到不同方式的驱赶，但他们共同的遭遇是财物都被掠夺净尽，理由是他们来到越南时两手空空，他们离开越南时也应该是两手空空。

\* \* \*

这还不够，为了更进一步反华，黎笋还把反对中国作为基本国策和党的总路线。在国家方面，黎笋通过长征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宪法中写上：越南人民“必须同中国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及其在柬埔寨的走狗进行较量”。

在党的方面，大约在1978年间，黎笋压中央作出反对中国的决议。决议指明中国是越南人民直接的危险的敌人；必须推翻北京亲毛的反动领导集团；必须帮助在中国的进步力量起来掌权；必须在一切领域中批判毛泽东思想；必须派人到东南亚各国说服他们反对中国。

自从作出反华决议之后，过去背地里相互传递的赫鲁晓夫的反华论调，现在却在全党广泛传播了；过去王明的反革命著作只少量印行并在亲近黎笋的一些干部中传阅，现在则印了上十万册，规定省级以上干部都要学习。王明何许人也？他的著作为什么得到黎笋这样青睐？王明是一个和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人，他时而“左”倾，主张在城市夺取政权，当蒋介石挥动上十万军队企图消灭江西苏区时，他主张打阵地战，不放弃一寸土地；他时而右倾，国共合作抗日时，他主张“一切都要通过统一战线”。他的“左”倾和右倾错误造成党

在城市的组织有百分之九十被瓦解，使江西的红军陷于危险的境地，不得不放弃苏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艰苦长征，遭到很大的损失之后才到达陕北。

为实现反华决议，范文同出访东南亚各国，到处诋毁中国，并保证不帮助各该国的共产党。说保证不帮助，实际上是对这些党搞破坏。他们驱逐驻在河内负责与越南党中央联络的这些党的中央代表。最荒谬不过的是，他们诱骗在河内的泰共同志到万象讨论工作，然后把泰共同志留了下来，不让再返回河内。后来，这些同志生活无着，只好离开老挝，在泰国当局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逃回泰国。他们还鼓动泰国的民族败类乃汶然成立所谓“新党”，后改名为“东北党”，企图把泰国东北十六个府分裂出来，搞一个独立国。汶然经常和一些人到泰国东北各府活动，被捕后供认其活动和任务都是黎笋他们交下来的。显然，黎笋对泰国党上述的一些做法，既不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来行事，也不是按国际公认的和平共处原则“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来行事，而是背叛兄弟党，从事阴谋活动颠覆邻国。

为了实现反华决议，黎笋继续迫害、驱赶华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把在党政机关和军队中的华人干部调离出去，哪怕这当中有曾获歼美勇士称号、劳动模范或对越南抗战和建设有过贡献的人，更为恶毒的做法是把越南人夫妻一方是华人的家庭拆散，不管他们是否有儿女，都要他们和华人离婚，或者要他们承受着与华人配偶相同的命运去新经济区，或离

开越南迁居国外。黎笋一伙还禁止越中边界沿线边民按过去两党协议的精神相互往来，交换货物和走亲戚。他们还在这些地区挖壕沟、插竹桩、埋地雷进行军事挑衅，枪杀中国一侧在地里干活或在公路上行走的平民。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内部大搞清洗，把主张保持睦邻关系或经常提到中国在抗法、抗美时期功德的人排除出去。

### 3. 签定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后进占柬埔寨

黎笋压中央作出反华决议并干出上述的许多勾当，目的是让苏联看到他反华的决心以及破坏不赞同苏联反华主张的其他兄弟党。这样做当然讨得苏联领导人的欢心和赞许。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黎笋、范文同亲自到苏联签定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条约。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在双方中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将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宁。”显然，这一条款不是要黎笋保障苏联的安宁，而是要苏联保障黎笋的安宁来反华，并对付中国就黎笋的其他冒险行径可能作出的军事上的反应。

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定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黎笋出动二十万军队进攻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占领了金边，同年一月十日抬出韩桑林傀儡，宣布成立所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使他的侵略行动“合法化”。

黎笋的如意算盘是以优势的兵力作闪电式进攻，在几个星期内全歼抗战力量，一举吞并柬埔寨。但是从一九七九年

一月至今七年多，越军仍然深陷在柬埔寨的泥潭中，越南的子弟还要不断去当炮灰，越南的农业衰退，工业停滞，人民备受饥饿、疾病、死亡的折磨，过着失却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国际上，越南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联合国连续七次作出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决议，黎笋不仅拒绝执行，而且还派出军队扰乱和威胁泰国的安全。

黎笋经常宣传柬埔寨领导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但事实上正是黎笋在柬埔寨搞种族灭绝，他们到处焚烧、破坏，杀害柬埔寨人民，把越南人迁移到柬埔寨定居（据来自柬埔寨的消息，现在已有六十万移民）。同时强迫韩桑林傀儡集团为越南移民让出土地和房屋，以便这些移民与越南军队一起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控制柬埔寨。他们还强迫柬埔寨妇女嫁给越南人，柬埔寨学校教越南语，逐步把柬埔寨人同化，以实现由越南充当霸主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美梦。

黎笋完全暴露了他欺师叛友的面目。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所谓“国际主义”、“特殊联盟”完全是欺人之谈。

#### 4. 黎笋背叛的后果

黎笋背叛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切美好的东西、革命的成果、祖国光明的未来以及越南人民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破坏殆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关于党的方面。过去胡主席建立和培育的越南共产党是一个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今天，这个党在黎笋领导下，实际上大部分已成为黎笋及其党羽所控制的组织，他们

相互包庇，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党内没有丝毫自由和民主，没有人敢对国家和社会的大事说出自己真实的意见，谁要是大胆批评他们的错误，不管在哪一级，就要受到打击报复和陷害。黎笋凭借着党，把宪法、法律以及革命建立起来的国会、统一战线和人民团体的意见置于不顾。实际上只搞法西斯式的“党治”，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黎笋通过电台和报刊自我吹嘘忠诚于胡主席路线，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我吹嘘在搞社会主义，对柬埔寨、老挝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欺骗不了谁。

② 关于对内方面。由于推行侵略和好战政策，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入战争和战争的准备中去，我们的子弟不得不到战场上送死。因此工农商业停滞，人民生活下降到世界最低的水平。贪污、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赌博、卖淫、乞丐、迷信等社会弊端蔓延日甚。在这样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农村却出现新的土豪阶层，工厂、企业出现新的工头阶层，国家机关出现新的官吏阶层，军队出现新的军阀阶层。

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自治制度激起了各民族的反抗，为一些反动分子进行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制造了机会。

建设新经济区本来是一个好主张，但黎笋一伙把这变成一种惩罚的形式，用以对待他们不欢喜的人，包括越南人和华人，造成劳动力和财产极大的浪费，使几乎所有被迫去新经济区的人产生极大的不满。

对南方的政策也是对内政策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还记得，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间，当传来黎笋一伙想要跟美国搞妥协的消息时，南方的干部就宣布“宁死也不再到北方集结”。这表达了他们反对美伪，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而斗争的坚强不屈意志。南方全部解放以后，黎笋一伙把一切战斗成果攫为己有，甚至要南方生搬硬套不切合当地实际的北方模式，让北方干部掌握各部门的重要职权，排斥为数不少的南方干部和曾参加抗战的爱国人士，其中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成员。这错误的做法引起南方干部、群众强烈的反应。

③ 关于对外方面。他们动员全部力量捏造和歪曲历史，把反华的段落写进宪法和党中央的决议中，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掀起反华运动，这不仅是忘恩负义的行为，而且是愚蠢的行为，势必把越南人民推向世代代连绵不断，不知何时终了的对抗中去。最近黎笋一伙不时声称要同中国和解。但试问，如果他们不删去宪法和党中央决议中的反华段落，不从柬埔寨撤出军队，那中国怎么能够同越南和解呢？

他们派出成十万军队到柬埔寨进行抢掠、烧杀，妄图永久吞并这个国家，这也是背信弃义的反革命行径。柬埔寨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对于越南来说，这将是埋下很深的祸根。

他们倚仗苏联来实现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称霸的政策，这将导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从属于苏联，只

好出卖祖国的利益，把越南变成苏联的军事基地。这是反祖国反民族的行径。

他们吹嘘越南是世界上第三军事强国，气势汹汹侵犯泰国领土，这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干的。

他们上述的愚蠢行为，使越南陷于同所有邻国敌对的地位，造成与本区域各国关系紧张，而世界各国人民对越南也失去信任和尊敬，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再给越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了，越南在国际舞台上明显的陷于孤立。

\* \* \*

黎笋对越南革命的背叛给国家带来极其严重、广泛和深远的后果。如果黎笋受良心谴责，愿意重新回到越南人民一边，治愈人民在心理上和社会上留下的创伤，弥补给祖国造成的损失，也得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到。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仍看不出黎笋有任何迹象要想回到人民这一边。因此越南人民今天要选择道路只有团结斗争，推翻黎笋一伙残暴和腐败的统治。这是唯一的道路，别无选择。

## (五)

### 决心离开祖国继续革命

大半生从事革命事业，等到革命成功还要在垂暮之年离开祖国，这确是罕见的。但我别无选择。因为黎笋已背叛革命，拉帮结派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党内外依靠着密集

的公安特务网，使关心祖国利益的人不能讲出自己的意见，革命者在推动革命过程中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为对革命具有责任感的人，我不能眼看革命事业被葬送，人民遭涂炭，祖国面临危境，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被黎笋一伙严重破坏。我要表达对人民痛苦的同情，支持其他干部批评黎笋的意见，向人们指明产生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设法为一些无罪的人在被诬告的案件中得到解脱，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惩治那些利用职权陷害人民的人（原因在于这些人得到黎笋一伙的包庇）。

正因为这样，黎笋及其同伙把我看作眼中钉。首先他们对我进行封锁，把我孤立起来，指使一些爪牙和特务明目张胆地在干部中造谣，说公安部门正在监视着我，使一些干部对我产生怀疑，不敢接近。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降低我的威信，在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不安排我上主席台；有的场合，我是以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的名义接见外国大使，他们不让这些活动见报；有时在我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或接见外国贵宾的隆重场合，他们却指使摄影者故意拍下我被挡住的镜头。这个摄影者是谁，我不想指名，但这个人得到黎笋的中宣部的补贴并要他这样干的。

此外，他们还派特务在我的住所和我妻儿住屋周围对进出的人盯梢。甚至还向我的警卫和医护人员布置任务，要这些人监视我。在我的办公室，客厅和我在医院的病房里都安上了窃听器。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时，同情我的

人也秘密告诉我要小心提防。对于黎笋一伙这些做法，我毫不畏惧，因为我做的是革命的事，说的是革命的话，即便他们在跟踪或窃听中有所获，也只能证明我是干革命的人。虽然如此，在可能范围内，我仍力争做一些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

直到黎笋压中央作出反华决议并明目张胆侵占柬埔寨，我才感到假如继续留在国内，也不能做出什么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事了。因此，趁去东德治病的机会，我设法摆脱了黎笋一伙对我的控制和迫害，来到中国继续从事革命。

\* \* \*

去东德之前，我在河内一〇八医院住院两个多月。这段时间，我的体温每天都在三十七摄氏度以上。我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但医生的会诊只说看到肺部的阴影，疑是肺结核，建议中央让我到东德检查、确诊和治疗，这样比留在国内治疗好。在去东德途中，我决定设法转赴中国。

到中国几天后，我被送往三〇一医院检查，果然是得了癌症。河内医院怀疑肺结核阴影，实际上是一个长六厘米、宽五厘米的大瘤子。经过一个多月的放疗结合服用中药，其中有熊胆、麝香、犀角等稀有的贵重药材，瘤子缩成长五厘米、宽四厘米。完成放疗阶段后，我出院作门诊治疗，医生则进行总结研究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当我知道自己得了严重的肺癌，我决心同意手术切除，但是医生还要检查观察我的健康情况是否能经得起一次大手

术。为了作出更有把握的诊断，中国共产党从日本请来了三位专家，其中一位是日本肿瘤医院院长，一位是肺癌专家，另一位是肺外科手术专家。他们到北京后便与中国医生共同研究治疗方案。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必须动手术切除有肿瘤的肺叶。这次会诊，我感到十分高兴，对手术的成功也很有信心。过后，日本专家回国，我的手术由三〇一医院院长主持，手术进行时，有关部门专家都在场配合工作。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我在医院手术台上昏迷地躺了整整四个钟头，醒来时，医生告诉我手术的结果很好。在医院调养两个星期后刀口愈合，胸背的伤口拆线完毕，不需再住院，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住处继续治疗，身边经常有两位医生和四位护士轮流值班，受到了十分周到的照料。几个月后，医院进行全身复查，我的癌症完全消失。我喜不自胜，写了一首汉文诗赠给中国医务人员：

病入膏肓一载多，

神州有幸遇华佗。

如今病已连根治，

愿把残年谱战歌。

必须指出，我来到中国虽然是为了继续革命，但我仍想通过组织途径进行斗争，就是说，我想写信指明黎笋当前各方面的错误并提出纠正的方法，再通过越南驻华使馆转回国内。但遗憾的是我的想法无法实现。我到中国不到几天，河内电台就播出我“叛国”的消息，撤掉我的国会代表资格，以

及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祖国战线主席团成员职务，同时决定由法庭以“叛国”罪对我进行缺席审判。

因此，我不得不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我的《致越南全国同胞书》，说明我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全文见“有关的文件”部分）。

相隔二十天后，黎笋一伙又作出把我开除出党的决议。我写了一份声明，指出黎笋有篡党的野心以及他是怎样背叛人民的利益的（全文见“有关的文件”部分）。

接着，大约十个月后，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黎笋又指使法庭搞缺席审判，对我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什么死刑？我仍然活着进行反对他们的活动。至于我的财产，只有几件夏天我不需要带走的冬衣，一些革命书籍，以及我曾率领党政代表团或国会代表团出国访问，各友好国家馈赠给我的一些礼品和影集。

北京《人民日报》记者曾就这件事采访过我，我作了答记者问，登载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见“有关的文件”部分）。

我到中国并不只是为了躲开黎笋对我的陷害，主要是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揭露黎笋的背叛，让人民看到团结斗争推翻他们残暴和腐败统治的必要，使越南成为一个与各邻国和平友好；民主和民族团结；人民温饱和社会健康；独立自主和中立不结盟的国家——实质上是把胡主席的主张具体化成为癸亥新春我寄给全国同胞的信中所提的四大主张和二十项

措施。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从离开越南到现在，我和许多越南爱国者在一起，出版了《越南消息》月刊，刊载了许多有关文章，在国内外广泛发行。我撰写见刊的文章有：

一《致越南全国同胞书》（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一《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

一《越中战斗友谊的真相不容歪曲》（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越南必须再次进行革命》（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为恢复和发展越中友谊而斗争》（《越南消息》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期）

一《评越南新宪法》（分四期刊于《越南消息》一九八一年三，四，五，六月第一，二，三，四期）

一《关于黎笋篡改胡主席遗嘱的声明》（《越南消息》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七期）

一《恢复和发展越中友谊是越南人民当前的历史任务》（《越南消息》特刊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

一《胡志明选集与叛徒黎笋》（《越南消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期）

一《癸亥新春致越南全国同胞书》（《越南消息》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期）

—《致老挝朋友的公开信》（《越南消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四期）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定与祖国统一问题》（《越南消息》一九八四年七月四十一期）

从离开祖国到现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建立胡主席所指出的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我希望违背这一主张的黎笋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使祖国和民族解脱种种厄运。如果黎笋仍然一意孤行，人民将坚决斗争，终有一天，黎笋的错误是会得到清算的，胡主席的方针路线将得到恢复，越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将得到重建和不断发展。

从国际范围来说，我希望苏联领导人不切合实际的主张得到纠正，以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和世界革命人民的要求。我希望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裂痕能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国家党会议）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重新愈合。

对世界的未来我坚信：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衰老的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如过去封建主义制度代替奴隶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一样。

至于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有时不协调，在建设事业中这个方针或那个方针有时不切合实际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个制度的诞生，都要经过幼年时期，步履蹒跚，有时还要跌倒。但是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继续前进。

在革命低潮产生悲观失望的人们，请你们清醒地等待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吧！那些仇视革命，在革命遭到挫折而幸灾乐祸，大言不惭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人，都是一些糊涂的梦幻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这是我的钢铁信念。

## (六)

### 有关的文件

下面是三个有关的文件：

一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

一 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

一 就黎笋指使法庭对我作缺席审判，并对我判处死刑问题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 1. 致越南全国同胞书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亲爱的同胞们：

最近这些天，对我到国外一事，黎笋一伙指使一些人大事喧嚷，使全世界议论纷纷。同胞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很关心。因此，我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如下：

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奋斗，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取得祖

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建设祖国，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但是，这些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面，被黎笋一伙破坏得一干二净，人民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使我国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窒息的生活，他们自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

他们颠倒黑白，以友为敌，在西南边境制造事端，侵占柬埔寨；在北方边境制造事端，动员成千万人，进行反华战争准备；派遣成万军队去镇压老挝人民，控制整个老挝。众所周知：柬埔寨、中国和老挝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

实际上，今天的越南，在黎笋一伙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越南将变成外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加工厂和外国的军事基地。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沉默无言。我要革命，要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控制，继续革命。我从二十年代以来，跟随胡伯伯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我热爱祖国和人民。但黎笋一伙独断专行，迫害革命者，使我无法在国内为人民工作。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知道，我走后，黎笋一伙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同胞们讲，但因为健康关系，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趁此机会，谨向全国同胞和海外同胞亲切问候，并致以最亲爱的敬礼！

黄文欢

## 2. 关于黎笋把我开除出党的声明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

最近，黎笋控制的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决定把我开除出党，为此，我发表声明如下：

胡主席创建和培育的越南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把国土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全部解放出来，使越南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为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越南共产党人可以引以自豪的。

但是，自一九六五年以后，胡主席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黎笋乘机用阴谋手段，一步一步地篡夺党的领导权，特别是在胡主席逝世后，他和他的同伙就完全控制了党。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属和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同时规定，在

党的各部门和各级党委中，一定要有公安部门的代表担任党委委员，以便监督党委，并对那些不是他们同伙的人进行侦察，捏造罪名，横加陷害。党内民主原则被他们彻底破坏了，党员对党和国家的事务都不敢讲真话，甚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也失去了集体领导机构的作用。独断专行、阿谀奉承、贪污腐化和欺压剥削人民等现象，普遍出现，从中央各部门到省、县、乡各级，到处都有。

一九七六年，在党的“四大”上，黎笋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把人民在抗战中付出了极大牺牲才取得的全民族的光辉胜利归功于己，吹嘘自己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向干部和群众灌输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在新阶段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方面，他只提出一些空洞的公式，如无产阶级专政、当集体主人、社会主义大生产等等，却蒙蔽党员，不让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革命有何区别，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应如何进行等等。

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他只提出一些空洞的词句，如三大革命洪流等等，却蒙蔽党员，不让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民族独立运动中各种力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在方针路线上出现的变化。

在“五年计划”方面，他提出一大堆有利条件，而掩盖了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路线错误；同时提出了一些毫无实际依据的虚夸指标，借以自吹自擂，蓄意欺骗人民。

就在这次大会上，黎笋一伙把三分之一的老中央委员排除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外，把他们同伙的一些人塞进中央，甚至把那些在“三大”时胡主席不同意进入中央的有政治问题的人，也都拉了进去。

在“四大”之后，黎笋已成为党的太上皇。他们一伙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干了许多完全违反人民意愿，完全违反真正马列主义政党原则的坏事，其中有些事情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共产党人的立场，一面同他们斗争，一面努力做一些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工作。

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危及我们民族命运的事件。约在七月召开的四中全会，通过了诬蔑中国要“吞并”越南的决议；确定中国是越南的直接敌人，提出要打倒“北京的毛派”，帮助“进步力量”（即“反毛力量”）上台；责成宣教部门在一切领域开展对“毛思想”的彻底批判；派人出国活动，拉拢东南亚各国跟他们一道反华。十分清楚，他们不可告人的狂妄意图是要颠覆和改变中国的领导机构，而不仅仅是他们所经常叫嚷的什么反对中国“侵略”。为了实现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不可告人的狂妄意图，只能乞灵于外国力量，他们就和一个大国缔结了实质上是军事同盟的条约，以便进行冒险活动，威胁邻国。条约墨迹未干，他们就出兵侵占柬埔寨。

通过上述种种事实，我肯定了黎笋是一个野心家，他使党离开革命路线，背叛了人民利益，把民族命运置于危险的

境地。因此，我坚决反对。

黎笋把我开除出党，并不出我所料，这个违反真正共产党人意志的决定，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革命的决心。我在八月九日致全国同胞的信中曾经说过：“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我发表这篇声明，正好在胡主席逝世十周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周年的前夕，缅怀胡主席创建我党和领导革命的功绩，想到八月革命后群众磅礴的革命气势，今昔对比，更增加了我对祖国前途的焦虑。我相信，每个真正的越南共产党人，这时的心情，都同我一样。

为了挽救革命，拯救垂危的祖国，越南的真正共产党人团结起来，和人民一道，坚决斗争，粉碎黎笋一伙的法西斯统治！

黄文欢

### **3. 就黎笋指使法庭对我做缺席审判， 并对我判处死刑问题答《人民日报》 记者问**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

**问：**最近得悉，六月二十六日黎笋一伙把您来到中国一事提交法庭审判。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黎笋一伙对我的“审判”，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去年八月，我在《致越南全国同胞书》中就说过：“我知道，我走后，黎笋一伙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黎笋一伙的法庭加给我的罪名是到中国就是站到敌人的行列里。这是卑鄙的歪曲。中国正是越南最好的朋友。在漫长的三十年中，中国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救国的援助达数百亿美元。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派出了数以百计的干部到越南，献计献策，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抗美战争时期，中国派出了几十万人帮助越南人民的后方建设，数以千计的人牺牲在美国炸弹之下。因此，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把中国称为敌人。

实际上，自从胡主席去世后，黎笋一伙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并推行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作出反华决议之后，彻底暴露了他们一伙出卖祖国、充当外国走卒的面目，给国家带来极其巨大的灾难。为了实现这些反动政策，他们对反对他们的人横加迫害。

作为和他们完全对立的革命者，我留在国内已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只好离开越南，继续革命。据我了解，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所发表的意见，在越南人民和军队中产生了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黎笋一伙十分恐惧，强令法庭捏造出这一案件。对我说来，这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壮壮声势，借以恐吓和镇压反对他们的人。而目前反对他们的人，无论在国内或寄居在国外，到处都有。今天，在越南，黎笋一伙正坐在火山口上，他们正在挣扎，等待着人民对他们的惩罚。

从我个人来说，我极端蔑视他们，唾弃他们。他们对我的一切捏造和诬蔑，都是毫无价值的。我仍决心致力于革命，为建立胡主席所希望的一个真正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仍决心为恢复胡主席所建立，而被黎笋一伙蓄意破坏的越南和中国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而斗争。

这就是我对六月二十六日在河内捏造出来的案件的意见。

黄文欢

# 附录 部份

## 一 简 历

- 一九〇五年 出生于义安省琼瑠县琼堆村一个穷儒家庭。
- 一九二三年 毕业于县法越初等学校。
- 一九二四年 开始有了革命觉醒，积极寻找革命组织。
- 一九二六年 由革命组织送往广州参加胡主席主持的政治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奉派回国活动。
- 一九二八年 因被法帝追捕，经青年革命同志会中圻圻委决定介绍到泰国从事革命活动。
- 一九二九年 青年革命同志会省委在暹罗成立，为省委成员之一。
- 一九三〇年 加入暹罗共产党，任暹共省委委员。
- 一九三四年 被选为暹罗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简称“暹委”）委员。
- 一九三五年 到中国治病。后与“暹委”失去联系，经印支共产党国外指导机关同意留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

- 一九三六年 与越南爱国者在南京创立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
- 一九三七年 南京受日军威胁，离南京到武汉。
- 一九三八年 武汉将失陷时去长沙、贵阳，后到昆明，与那里的越南同志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 一九三九年 冯志坚同志到昆明建立海外工作部，领导在中国的各项活动。我为该部委员之一。
- 一九四〇年 胡主席从延安到昆明。六月德国法西斯占领巴黎，胡主席主张工作方向转到广西，以与国内革命力量联系。首先到桂林与西南行营主任李济深办交涉。经胡主席指示，成立“越盟海外办事处”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李济深帮助下，胡主席和我们一起到中越接壤的靖西县。
- 一九四一年 胡主席回北坡，我奉派到龙州建立越盟龙州办事处，后折回靖西，与范文同、武元甲、黎铁雄、高鸿岭和国内来的一些同志以越盟名义公开活动。

五月回北坡参加党的八中全会。会议决定以越盟阵线代替反帝阵线。我被任命为越盟总部委员。是年底，由于反党分子陈豹的告密，越盟在中国的活动遇到困难。大部分同志回国，我接受中央指示继续留在靖西维持工作，不久在平孟被捕，先后被送到镇边、靖西，后送往

柳州监视。

一九四二年 在柳州领导越盟组织，与复国军中进步分子联系，对中国国民党及其走卒企图建立越南傀儡政府为华军入越服务的主张进行斗争。

六月，张发奎委任我为驻靖西的“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译述官”。到靖西不久，即回国在高平、谅山活动，参加越北解放区的创建。

一九四五年 出席在新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

九月底，经党中央调动，回到河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全国卫国军（这时解放军已改名卫国军）政委。

一九四六年 河内受法军威胁，党中央撤离河内，我被任命为第四联区区委书记、中央政府代表和越盟主任。

一九四八年 被任命为越南政府驻海外特派员、党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整顿国外的几项工作。

一九四九年 被委任为越南总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

一九五〇年 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后，胡主席决定我以党和政府代表名义（后改为大使）留在北京，同时兼任驻朝鲜和驻蒙古大使，直到一九

五七年党中央调回河内工作。

- 一九五一年 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 一九五六年 在讨论土改纠偏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一九五八年 在第一届国会第八次会议上当选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时当选为国会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这次会议，选出以胡主席为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
- 一九六〇年 在第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会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
- 九月，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一九六一年 在河内市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河内市市委书记。不久，不再担任河内市委书记，任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党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同时负责指导老挝、柬埔寨工作的CP38委员会。
- 一九六四年 在第三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 一九七一年 在第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国会法律起草委员会主任。
- 一九七六年 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黎笋一伙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但在第五届国

会第一次会议(全国统一后的国会)上再次当选为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七九年 黎笋公然背叛革命，我再留在国内也不能发挥革命者的作用，只好离开祖国，到国外继续革命活动。

一九八六年 继续为反对黎笋祸国殃民的主张而斗争。

## 二 若干具体活动

### 1. 以党和政府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五四年 出席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成员。

一九五五年 陪同胡主席正式访问中国、蒙古、苏联。

一九五七年 陪同胡主席正式访问朝鲜、捷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一九六一年 任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越南政府代表团特别顾问。

一九六四年 率领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古巴国庆。

一九六五年 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参加罗马尼亚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乔治乌·德治同志的葬礼。

一九七二年 出席俄国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成员。

一九七三年 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参加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

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乌布利希同志的葬礼。

## 2. 以党的名义进行的活动

- 一九五八年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 一九五九年 陪同胡主席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
- 一九六三年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匈牙利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 一九六六年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 一九七五年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工人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一九七六年 率领党的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 3. 以国会名义进行的活动

- 一九六五年 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朝鲜、蒙古、苏联、中国。
- 一九七〇年 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
- 一九七一年 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波兰、捷克、罗马尼亚、

苏联。

一九七六年 率领国会代表团参加古巴国会首届会议开幕。

#### 4. 离开祖国后的活动

一九七九年 到达北京，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多位同志的亲切接见。几天后致书全国同胞说明离开祖国的原因。

一九八〇年 对越南侨胞就越南必须再来一次革命问题发表讲话。

一九八一年 对越南侨胞就恢复与发展越中友谊是越南人民当前的历史任务问题发表讲话。

三月与越南爱国者出版《越南消息》杂志。

一九八二年 为旅华越侨干部开办两期学习班。

一九八三年 癸亥春节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斗争，推翻黎笋的残暴、腐败统治。

一九八五年 值八月革命四十周年，举行招待会，宴请以前曾在越南工作过的顾问团、专家团成员。参加招待会的还有越侨和越南难民代表。

封面  
目录  
正文